

186



200025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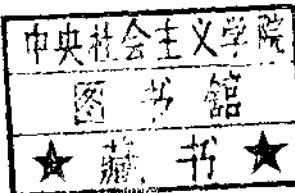
2206/64

欧洲共产主义 资料选编

上 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研组编

上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邢台地区印刷厂承印
850×1168 32开本 15印张 376千字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2—3 成本费：2.25元
印数：1—2000
（党校系统内部发行）

关于编印《党校教学科研 参考丛书》的说明

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目的，在于为各级党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以促进党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凡是党校工作人员编写译述的资料、试用教材、译作、专著，具有相当参考价值而不宜公开发行者，均在编选之列。希望广大党校工作者给以支持和批评，帮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使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党校教育正规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出版前言

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出现还只是几年前的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不断深入，广大群众的思想从“左”的桎梏中逐渐得到解放，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主人翁责任感也不可抑止地迸发出来了。怀着对祖国前途的关切之情，多少有志之士在沉思着，争论着，探索着国家民族前进的新路。在那个酝酿着重大变革的时期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了最流行的警句，有的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学者的政治观念，有的人赞扬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有的人把国外的改革模式奉为圭臬，有的人热衷于传播多种多样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甚至还有人称颂和向往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人们的思想既活跃，又混杂。

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二度“欧风东渐”。这一阵欧风是如此强烈，以至很多人在这些五光十色的舶来品面前眩晕倾倒，而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以前经过千辛万苦才终于找到、而且已被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却被很多人，包括某些共产党员，有意无意地忘却了。

这种短暂的、昙花一现的现象，早已被历史车轮碾入前进的轨迹。它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风靡一时，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在事过境迁的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了。

应当指出，在当时那些曾经使某些人迷醉的意识形态中，有一

些是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思潮，欧洲共产主义毕竟是西欧一些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他们自己的国情结合起来的产物，是在当代欧洲的特定条件下运用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进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这些立志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和理论，并在中国加以实践的人，就没有理由对欧洲共产党人的这些积极的思维成果漠然视之。我们固然不应毫无保留地赞同欧洲共产主义，但也应盲目地拒绝它，更不应视为“修正主义”的邪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借鉴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比较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异同，探讨国际共产主义的前景。因此，将这样的资料提供给党校教学研究工作者，还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是《国外社会主义问题资料》的一种，另几种是关于各国社会党和苏联、东欧各国及亚非拉各社会主义流派的材料，即陆续发排。这些资料是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1982年组织二十余位对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有研究的同志翻译整理的，他们的劳绩值得我们感谢！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

1984年8月15日

编 者 的 话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主要选自1975年以来意共、法共、西共和英共的双边及多边会谈的共同声明、各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决议以及主要领导人的主要讲话和著作。

本选编共分五个部分和附录。第一部分：欧洲共产主义概论。主要内容是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和含义及基本特征、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的论述。第二、三、四、五部分，是欧洲共产主义几个主要党：意共、法共、西共和英共对本国的现行国内路线和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基本方针的具体论述。书后附有欧洲共产主义大事记和部分参考书目索引。由于材料较多，分上下册出版。这里收入的资料反映各方面不同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本书编选工作主要由牛景敏同志负责，李明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1983年8月

欧洲共产主义概论

目 录

欧洲共产主义概论

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联合声明 （一九七五年六月）	〔 1 〕
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共同声明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 4 〕
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联合公报（一九七六年五月）	〔 9 〕
贝林格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发言（全文） （一九七六年七月）	〔 12 〕
卡里略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全文） （一九七六年七月）	〔 23 〕
马歇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全文） （一九七六年七月）	〔 30 〕
西共、法共、意共三党联合声明（一九七七年三月）	〔 40 〕
贝林格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论述（摘录）	〔 48 〕
卡里略谈今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 50 〕
〔 意 〕 塞尔焦·塞格雷： “欧洲共产主义”的历史 概论	〔 59 〕
〔 意 〕 卢契亚诺·格雷皮： 列宁、列宁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	〔 78 〕
〔 西班牙 〕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欧洲共产主义 现状： 它的政治与理论的主要特征	〔 109 〕
〔 法 〕 让·卡纳帕： 欧洲共产主义的特征	〔 122 〕

〔法〕让·卡纳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昨天和 今天	129
〔法〕雅克·德尼：论欧洲共产主义	142
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国内的 路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论述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通过）	163
意大利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通过）	254
恩里科·贝林格：欧洲和世界上争取和平与社会主 义的斗争	262
贝林格在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关于武装力量民 主化问题	282
贝林格在北京大学集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	284
贝林格谈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 ——贝林格和意大利《共和报》主编的谈话	289
开辟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阶段 ——意共领导机构决议（节录）	294
恩里科·贝林格：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第三阶段	301
争取变革的代替建议（节录） ——筹备意共十六大政治文件	316
〔意〕乔瓦尼·贝林格：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326
法共关于国内的 路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论述	
乔治·马歇：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335
未来从现在开始 ——一九七九年五月法共二十三大通过的决议	368

法国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七九年法共二十三大通过）……………(420)

为了民主的前进（摘要）

——乔治·马歇在一九七九年法共二十三大的政治报告………(428)

乔治·马歇：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摘要）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465)

让·卡纳柏：法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472)

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 联合声明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

随着葡萄牙和希腊法西斯独裁的倒台，随着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正遭受的不可逆转的危机的发展，欧洲正在出现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法西斯政权的大陆的可能性，而西班牙也可预期将建立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对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来说，在由于缓和进程取得积极进展而出现的新条件下，无论在一国范围内，还是西欧范围内，都比以往更迫切需要指出有利于使整个民主力量就采取一项对社会进行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改革，以便积极地摆脱波及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的政策，取得一致意见的新方针。

这场危机证明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发展的一般要求，和由这场危机所引起的种种问题。例如在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非此不能确保各国发展的结构改革的问题。垄断集团和巨大的多国公司推行的政策，同对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自由、参与和经济、社会与文化进步的呼声予以积极回答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变得愈来愈尖锐了。有必要也有可能积极地摆脱这场危机，为此而必须加强今天大陆上的工人和民主运动的各种力量之间最广泛的谅解和联合。为了要挫败某些资本主义集团采取公开的反动的独裁的办法来解决这场危机的企图，也必须这样做。

认识到这种责任、并怀有尽力实现这种汇聚和联合的愿望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庄严地声明，它们在和平和自由中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工人运动的全部经

验和在西欧背景下的各国独特历史条件进行考虑之后产生的战略信念。共产党人和整个民主力量的共同任务是要以行动来真正满足社会需要和关于自由、正义和文化等人的价值，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和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今天就从现实本身中产生，而且它基于下述信念，即在我们两国只有通过发扬民主和充分开展民主活动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种信念的基础是肯定个人和集体自由的价值，肯定这种自由的保障，即不建立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肯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扬民主的价值。这种信念还肯定相互进行自由对话气氛中的多党制，工会自治，宗教信仰自由，言论，文化、艺术和科学自由。在经济领域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通过执行民主的计划化政策同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公营和私营企业的活动，以确保生产大发展。

从这些构成我们政治和理论路线的基本部分的信念出发，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随着在西班牙重新取得并确立民主。随着民主在意大利得到发展，将为所有感到迫切要求给予由目前这场危机引起的巨大而严重的问题以积极回答的政治力量实现非常广泛的、民主的联合而努力。这种建立在完全尊重各种力量和各种力量的完全自主之上的联合，是唯一能指明进步和自由的前途。推进工人阶级、农民群众、中间阶级和知识分子利益的前途，并且创造能孤立社会上保守和反动力量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全国团结的前途的道路。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有一种基于人民为青年群众和他们的组织积极参与的新的政治态度和新的治理方式。

正象1974年1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布鲁塞尔会议已经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我们两国还是整个西欧，都迫切需要同包括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天主教人士、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在内的愿意为西欧巨大的民主潜力就一项变革和进步的政策寻求一致方面而努力的一切政治力量，就上述问题

进行最广泛的意见交流，并且最负责地寻求因他们意见一致之点和取得谅解。

国际缓和的发展——最近将要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将表明这一点，苏联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对外政策同西方各国表现出来的新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趋向一致，这是使会议得以召开的基本原因——肃清了这条道路上原有的障碍和困难。要寻求各种各样的新的机会，来保证西欧各国和整个西欧，能够对建立一个建立在尊重各国人民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前途的道路的基础上的、建立在铲除不平等，正义、进步、发展与和平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西欧各国采取一项在平等基础上同世界各国，首先是美国和苏联和在新的关系的基础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政策，会保证为实现这些伟大目标做出不可代替的贡献。

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决定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地中海地区都要在这方面加紧努力，率先工作。西班牙的重新获得民主，意大利民主的获得发展——同作为本大陆许多国家的生活特点的新进程一起——，能够为西欧解决其在自由、民主、进步与和平的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新的推动力。

完全独立自主地制订其内外政策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完全了解它们对本国和欧洲所负有的伟大使命。两党从这些共同看法出发，今后将进一步发展为悠久而牢固的友谊联结在一起的兄弟关系。

（译自马克西莫·洛伊苏等人合编《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巴塞罗那前进出版社1977年版。齐明山译 吴名祺校）

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 共产党共同声明

意大利和法国的形势的特征是危机加剧，触及经济，社会，政治，精神和文化各个方面。

危 机

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是冲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世界经济关系的危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危机沉重地压在受失业和价格上涨危及的人民群众和劳动者身上，同时也沉重压在遭到严重困难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身上。

公民生活秩序碰到越来越严峻的问题，政治危机和加深的衰退现象，危及社会和精神生活。

这次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包括不能满足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需要，对保障工作权力，提高生活水平，繁荣文化以及人类的各种作用等需要也无能为力。整个社会大倒退的威胁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这两国，完全象在西欧其它国家一样。

帝国主义和大资本的力量企图在这种形势中获利，破坏人民、劳动者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斗争挫败这些企图，取得新的胜利，为民主和社会新成就开辟道路。

为此，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它们正在为人民群众

和劳动者切身利益而进行斗争——同时也为制订一项能解决他们国家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深刻的民主改革政策而斗争。

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意大利和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必须发扬民主，并使民主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两党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开展各自的活动，并都为此执行了一项符合各自国家的需要和特点的政策。因为是同时两个政党在这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着斗争，同时还发现：他们面临着的基本问题有它们的共同性，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该协调一致。

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高阶段

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把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各自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的过程中加以实现。社会主义将是民主和自由，即“彻底”民主的最高阶段。

从这精神出发，一切自由，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还是本世纪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伟大人民斗争所取得的成果都应得到保障和发展。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在国内外自由迁移，私人生活不受侵犯、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和流派的见解表达等自由也同样应得到保障和发展。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主张多党制——包括反对党的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权利——主张自由组织多数和少数派，主张多数派和少数派可以民主轮换执政，主张国家的世俗性、民主行使国家权力，司法独立。主张工会独立活动自由。两党特别重视在企业中发展民主以使劳动者能有真正的权利参加管理，享有作出决定的广泛权利。国家应该实行民主分权，让地区和地方团体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地区和地方团体应在行使权力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

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公众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实行公众监督，要求对这些手段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计划。中小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中小工商企业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

这种改造只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大多数人的强有力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斗争。它要求有充分代表人民权力的民主机构，确保并发展这些机构的权力，要求自由行使直接的普选和比例代表制的普选。两党——它们过去一贯尊重并将继续尊重普选的裁决——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设想劳动阶级掌握国家的领导权。

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认为这些民主生活的条件具有基本原则的价值。他们的态度并不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是源自对各自国家特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分析，出于对整个国际上已取得的经验的考虑。

广泛的联盟反对垄断资本

两党认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这种关系应当是在新的国际分工中紧密合作——应当确保每个民族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力。因而，两党强调必须同美帝国主义干预各民族事务的奢望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外国干涉。

两党认为，为了保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其主要敌人——垄断资本的胜利，实现各派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谅解，统一的工人阶级应该表明有能力在其中行使领导作用，这是不可少的。这种广泛的联盟不仅在现阶段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必要的。

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牢固、持久合作的发展是这联盟的基本

础。

今天，广大的天主教徒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人类对于友爱、社会正义、高尚道德精神、个性的充分发展的深切向往之间存在矛盾，这一变化为共产党人和全体工人力量以及信奉基督教的人民力量之间结成联盟，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工人力量能够并且应该在新社会的创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种危机形势中，面对这危机的形势所带来的巨大任务，两党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并认识到它们的作用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 的欧洲而斗争

按照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资本主义欧洲共产党会议决议，两党重申为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经济结构深刻的民主改革，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任何危害自由的行为，促进欧洲各派民主进步力量以及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共同行动的愿望。对跨国和国内垄断集团以及他们的领导阶层奉行严重违反人民利益的方针，和他们在共同市场的欧洲引起失业和社会不平衡的政策，面对这种情况，两党对左派力量（包括在欧洲议会内的左派力量）和人民群众团结愿望的发展极为重视，其目的是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工作、方针民主化，逐步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的欧洲。

西班牙处于关键时刻。本着同样精神，两党——对这方面肯定地坚信所有民主人士——谴责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佛朗哥制度永恒的任何企图。他们重申与为保卫和释放政治犯，为建立一个有充分政治自由的制度而斗争的西班牙工人阶级和一切反法西斯者的战斗团结。此外，他们对年轻的葡萄牙民主所面临的困难表

示关切，希望所有工人和民主力量在斗争中重新联合起来，抵制反动派的任何威胁和保障国家的社会和民主进步。

赫尔辛基会议后

赫尔辛基的欧洲国家会议——苏联为这次会议的举行和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国际缓和道路上一个重要阶段。只有和平共处才能取代毁灭性的战争。它是解决国与国的争端，发展国际间全面合作的条件。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维持社会和政治现状，而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阵地。两党在继续进行这种斗争的同时，为和平和互相逐步的裁减军备、直至全面裁军、逐步摆脱并解散军事集团的新进展而开展活动。两党表示决心为团结一切有关力量来制止军备竞赛而作出贡献。

意共和法共重申各党独立自主、尊重不干涉内政和国际主义，两党准备继续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兄弟般合作。

罗马 1975年11月15日

(译自法国《国际研究》杂志第88—89期。沈肖肖译 蔡智强校)

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 联合公报

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戈登·麦克伦南于1976年5月19日在巴黎举行了会谈。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杰克·沃迪斯和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让·卡纳帕，中央委员雅克·德尼和保尔·弗罗蒙泰尔，对外政策部成员科莱特·贝纳斯和热拉尔·斯特雷弗也参加了会谈。

这次讨论指出在由于深刻危机打击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和英国的劳动者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在这两个国家里，统治集团竭力想用把经济危机转嫁到劳动者及其家庭身上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指责人民群众长期斗争所获得的民主权利。

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一致认为经济危机源在两国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奉行不顾人民群众利益，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政策的大垄断寡头应当对此负责。

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坚信两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一定能在每个国家中只要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就一定能挫败垄断寡头和跨国公司的努力，动摇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开创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在各自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开展工作。因此，两党应当按照本国特点决定自己的政策。同时，由于他们都是在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着斗争，所以他们所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又具有共同的性质。戈登·麦克伦南和乔

治·马歇的会谈强调了，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当协调一致。

各国要走的道路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的形式应当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条件和传统，每个国家都应该按照这条道路。但是，两党认为，不管怎样，要实现这种历史性的变革都是以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最民主的活动为前提的。

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认为伟大的社会通向社会主义伟大变革的各阶段都应当是两国大多数人民群众自由决定的结果。

两党决心在各自国家里，以社会主义社会中维护和扩大两国人民过去所获得大众民主自由，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示威游行和结社自由、舆论和文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私生活的不可侵犯性、罢工权利、工会独立于国家和任何政党、政党政治活动自由，包括反对党的活动自由。

两党代表强调指出，尽管两国条件各不相同，都要通过工人阶级的团结，把各阶层和民主党派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结成最广泛的联盟，与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垄断资本家和跨国公司作斗争。

争取社会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以避免一场可怕的毁灭性战争。面对帝国主义强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反对国际缓和，英国和法国共产党声明坚决为集体安全、和平共处、裁军、缩减军备和国际合作而采取行动。¹两党准备为解散军事集团而努力。

这场斗争同样是与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不可分割的。美国垄断资本对法国和英国经济施加越来越重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利用跨国公司的活动提供的方便来施加这种压力。两国的独立和行动自由，与跨国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属于美国的跨国公司，日益加强控制，以及在小小的欧洲、国内推行垄断资本家的一体化的计划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任何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委员会或者“欧

洲”议会都不应对各国人民管理自己事务作出自己的选择进行干涉。

法国和英国共产党断然拒绝帝国主义者把和平共处解释为维持现状，阶级斗争和解放斗争的终结。这种说法。两党强烈抗议美国和西欧领导人对我们大陆上的各国人民行使主权选择自己政府进行干涉。而对法国和英国大资本家的抛弃国家的政策，两党声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两党谈到了忠于国际主义、各党平等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和团结一致，决心为了共同的目标、为了工人阶级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继续合作。

两党重申为了以一个劳动者的欧洲，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欧洲代替垄断资本的欧洲，与欧洲其它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和所有的进步力量共同行动的愿望。

巴黎 1976年5月19日

（译自法国《国际研究》杂志第88—89期。庄建明译，葛智强校）

贝林格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发言(全文)

(一九七六年七月)

说这次会议是在一个充满着未知数和危险，但又可以进行积极的革新的阶段时召开的。在世界范围和欧洲范围内都不存在共产党国际的组织形式，也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存在。说会议是独立的平等的，主张应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说欧洲各国积极参加并以独特的首创精神来丰富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总进程是重要的。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任务是要寻求西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说各党之间的团结应建立在承认每个党自主地制定和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国内国际政治路线以及严格尊重权利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有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的基础上。发言正式使用“欧洲共产主义”一词。

说要摆脱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办法是要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力量的谅解为基础的新的政治领导。

文内标题是编者加的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也想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表示我们代表团的衷心感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给予了我们大家亲切的接待和卓越地组织了我们的工作，而且也因为他们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起了特别有效的作用。

我们怀着友好的感情向在这里代表全欧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同志们致敬，我们在这一如此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场合同大家会晤感到高兴。

人们对我们的会议寄以很大的注意和期待。千百万共产党人、劳动者、民主人士都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们都知道，这次会议对我们大陆和平的巩固和该大洲各国人民的合作事业将作出积极的贡献，而这一事业又不仅仅是我们的事业。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报纸和新闻界以很大的兴趣注视着这次会议，这说明在欧洲和世界生活的现阶段召开这样的会议有着怎样的政治重要性。现阶段是一个微妙的阶段，充满着未知数和危险，但又可以进行伟大的积极的革新的阶段。

显然，也有某些批评家，他们曾企图对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决定会晤这件事煽动不合。为什么对这件事要大惊小怪呢？难道由各种倾向的政党发起的这类会议没有时间召开吗？

此外我们的会议不是共产党国际组织的会议。这种组织在世界范围和欧洲范围都不存在，也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存在。我们的会晤是独立的、平等的各党间的一次自由会晤，它不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党下达指示和进行约束。重要的是，讨论应该是开诚布公的。在讨论过程中，每个党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各种问题上，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各自的立场是不同的，而这不仅仅由每个党所处的客观条件不同所致。当然，正如从起草委员会的结论中所看到的，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也是重要的。

我们党对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感到高兴。

这次会议的筹备是漫长而艰难的，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在这里闭口不谈这一点是无用的。从中可得到一些值得考虑的积极的教益和批评性的意见。例如，我们仍然认为，如果象我们党和其它党所建议的那样，从打算召开会议之际开始就决定各国共

产党的这次会议在不制定文件的情况下也可以举行，那么会议的筹备就会少用些时间，就会更富有成效。此外，在过去所有的预备性会晤中，应把讨论从欧洲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中产生的问题放在首位。我们认为，我们对这样或那样提法的讨论拖得太久了。在我们看来，现有的经验应使我们知道，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的目前状况要求放弃已经过时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与会各党的同志们是否赞成这一看法。但是，我们想诚心诚意地告诉你们，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一点。

谈起草文件应遵从的三项条件

我们在指出上述情况的同时，并不打算否认起草文件工作结果的积极方面。全部起草工作是民主地进行的。从方法上说，最积极的方面是，承认只有按照如下三项条件才能起草文件：一是文件应局限于一些特定问题；二是应得到所有与会党的赞同；三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硬要约制——即使间接地也不应当——每个党在其国内国际路线和改革理论制订方面的完全独立。

文件内容显然没有反映各党的特殊立场。我们自己本来会对文件的一些地方有不同的写法。然而，我们并非没有看到文件所采纳的许多观点的重要意义，从许多方面来说甚至是革新的意义。

谈欧洲缓和

为进一步促进欧洲大陆的缓和而努力，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意愿。一年前，在赫尔辛基，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都肯定了前几年在建立欧洲和平与安全的道路上取得的成果，并就应当作为缓和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冷战的阴暗时期已经过去。冷战曾多次威胁要把世界抛进一场新的冲突之中，并且如此消极地影响了各国内务、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下几个因素使冷战被克服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顽强努力同美国和西方世界各国确立的最现实的倾向相汇合；反对冷战的能力；各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和胜利；各国人民在和平之中生活的强烈愿望。包括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内的不结盟国家过去和现在也都对在欧洲和世界上建立日益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需要继续开展反对那些反动势力的斗争。这些反动势力仍在以各种方式阻挠或破坏缓和进程，或者企图使缓和容许在各国内部保持旧的社会、政治均势。各国人民有无可置疑的权利来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和自己的政府组成方式。例如，我们就在进行斗争以便使意大利人民在我国参加的国际联盟的范围内，能够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治领导。

我们认为，推进缓和的主要道路是在保障共同安全，不单方面改变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战略均势的情况下，发展合作，裁减军备，以便逐步达到取消集团。

在我看来，苏美关系的发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问题。但是，欧洲各国积极参加并以自己独特的首创精神来丰富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总进程也同样重要的。

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可能性是巨大的，而且尚未充分加以利用。这种合作不仅是为了扩大它们之间经济和贸易交流，而且是为了解决一些共同问题，如保护环境和艺术财富，开展反对污染空气和水的斗争，发掘和利用新的能源，防治最为流行的危险的疾病，进行科学研究。为达到上述目的，各种思想、文化流派和人员在欧洲和全世界进行更广泛、更自由的交流是重要的。一个在缓和与合作道路上日益勇敢前进的欧洲将能

够对解决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作出巨大贡献。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乃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该秩序也应有助于克服作为当今世界形势特点的那种可怕的、难以接受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的不平衡。

说国际主义是每个共产党的根本特点

国际主义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根本特点。这意味着它们在本国和国际范围开展活动时，感到自己就是为争取社会和政治解放、民族独立、和平与全人类的进步而斗争的各国劳动者和人民的全部行动的参加者和主角。而今，这个行动完全超出了各国共产党的范畴，涉及具有各种思想信仰的全体政治、社会力量。这一如此广泛和差异的运动的主要倾向，是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努力寻求今天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一过渡要经历千百种困难和障碍，还要通过一个不排斥出现停滞、甚至错误的某种情况的过程。这种倾向的一些标志在欧洲以外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各大洲的人民和国家，一旦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为自己的发展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途径。其中有许多国家和人民公开倾向选择各种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反映出每一个国家本身的传统和特点，更加确认劳动阶级的积极参加，它就会更加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日本和西欧，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也更加强烈。今天不仅工人阶级向往社会主义，其它劳动阶层、广大青年、妇女和知识分子也向往社会主义。

在旧的沙皇俄国，共产党人通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首先打破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锁链，从而不仅为苏联人民而且也为全人类开拓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条先前从未想过的道

路，是在特殊的国内国际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开拓和经历的。所以艰苦、困难，甚至错误也就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而出现了。

继这一伟大胜利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工人运动却未取得胜利，而是有过一些不幸的失败。在一些国家，首先是意大利，黑暗的反动制度建立起来了。整个欧洲，随后以至全世界都陷入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之中。

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这一整个时期欧洲历史上的重大高度。事实是，在战胜纳粹法西斯暴行之后，由于一系列的客观与主观情况，西欧最先进的工人运动实质上都停步不前了。不能在这里对那些主客观的情况加以分析了，肯定冷战是一个根本障碍。

谈寻求西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今天，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以及在资本主义越来越显然没有能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作出积极回答的情况下，重新提出的任务不仅是思考至今已实现的社会主义经验，而是寻求西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虽然在这国或那国使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未显示出它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东欧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样板也不符合西方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广大工人及人民群众的方向。

我们的一些敌对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和将来到处都是一样的。这是不真实的，连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从中产生的社会也不是这样。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建设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经验。合乎逻辑的是能够也应当还会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经验，其中包括一些新的经验。这种新经验将产生于



资本主义发展已达到顶点，又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以及劳动者的特殊组织形式和政治表现形式的国家。

在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争取、保卫和发展民主而斗争的主角。我们为争取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肯定个人和集体自由的价值并予以保障；肯定并保障国家世俗的而非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国家作为民主纽带的原则；肯定并保障多党制和政府多数轮流的可能性；肯定并保障工会自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文化、艺术、科学自由。在经济方面，通过民主规划化保证生产的高度发展，这种规划化要利用公私企业的各种首创精神和管理形式的存在和积极作用，而公私企业都应当以满足人们和国家的巨大需要为目标。十分有意义的是，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他们自主的探讨，在有关实现社会主义所应走的道路，以及在本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方面得出了同我们类似的结论。这些相同的意见与共同的特点，在我们同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共同发表的声明中都有所表示。人们把这些新的探讨和结论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显然不是我们创造的，但是它如此广泛流传的事实本身都正好说明，人们对在西欧国家确定和实行社会主义意义的社会改造的新型解决办法的要求是何等深广。

今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强调指出实质性的一点：这种对新事物的探讨完全不是向统治集团让步，而是为建设性地确定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民主领导作用而斗争的最有效的方式。同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探讨和这一斗争必须同相信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的其他工人和人民力量，以及希望社会革新和进步的全体力量对话与谅解。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以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我国投身于团结事业之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并越来越看到相互了解和会晤的新的可能性也正在欧洲范围出现。我们

通过与一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欧洲一些国家的其他工人与民主力量进行的有益接触也可以直接证实这一点了。

至于我们，那将继续在多方面发挥我们欧洲的首创精神：在全欧洲范围为推进缓和与合作贡献力量；在西欧范围，寻求同其他左翼、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最广泛的汇合；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我们要为一体化进程取得民主性质并符合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作出我们的贡献。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同意大利民主力量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英勇斗争表示声援。

亲爱的同志们，

在为筹备这次会议而进行的讨论过程中，有可能在有关我们各党之间关系方面达成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和准确的提法，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谈建立各党之间团结的基础

我们各党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承认每一个党都自主地制订和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国内国际政治路线这个基础之上，建立在严格尊重权利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在变革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这个基础之上。

尊重这些原则同我们所强烈感到的如下需要并不矛盾，即：需要就有关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展开更广泛的、不拘形式的讨论。比如说，下面一件事实我们认为就是显而易见的：在马克思主义造诣方面的发展，并未同当代世界现实的重大变化、同社会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经验以及政治实践并驾齐驱。我们往往只限于使用一些千篇一律的提法，热衷于引经据典，或是给任何与自己不同的立场武断地扣上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的修正主义的帽子。

真正的情况是：犹如不可能有一个领导党或领导国一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也要依靠各党和个人作出多种多样的贡献。正是根据我们伟大的导师的做法，应当号召采取批判精神，促进改革制订和实践上的不断革新，以便考虑现实历史过程的发展。

我们的意思是，尊重不干涉原则不能排除，除了对国际生活和工人运动生活的具体事件之外，对别国党的理论观点或政治立场也有判断的自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虽然一贯强调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成就，但对某些事件和情况（如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对有关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等更为一般性的问题，也曾多次提出批评性的看法。

其他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同志们，曾经明确地或间接地在他们讲话中或文章中，对我们的一些涉及到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中的重要问题如多元化问题的方针和信念，采取了批评性的立场。我们虽然不同意这些批评性看法，但认为提出这些看法是正当合理的。我们甚至希望，工人运动当中能就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当然，讨论要本着友好和理解的精神，但也要采取最自由最坦率的方式。这种自由的思想交锋也可以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间。

说意当前形势仍是相当微妙、前途捉摸不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本来想详细地向你们介绍意大利形势最近的发展状况。意大利形势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引起欧洲和世界的很大关注。但是，我们就我们各自发言的时间达成的协议，使我不得不简略地谈一谈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主要情况。

六月二十日的政治选举是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众所周知，最大的新特点就是我们党的跃进，取得了一千二百六十二万张选票，从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点四，从而超过了曾被认为是特优成绩的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地区行政选举的结果。

这一选举胜利是我们党不断积极地参加工人和人民斗争的结果，是争取民主、文明进步、社会公平、和平和各国人民团结的大规模、往往是激烈的群众性斗争的结果。这一选举胜利意味着对我们的团结政策，对我们不断努力提出并推进解决人民群众、社会和国家的一切问题的建设性办法的拥护和支持。同时，这一胜利也是我们使我们党的建设具有的那种性质所导致的结果：即我们党是一个群众党，它拥有深刻的民主生活，能够不断更新，特别是能够执行政策，不局限于搞宣传。我们的力量和威信的一个基本来源就在于：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党员一直在努力制订和推进完全符合我国特点、符合我国人民自由和进步愿望的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我们也习惯于以批判的现实主义态度来看待意大利整个局势和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及缺点。

我们的局势一直是相当微妙的。诚然，今天存在着新的可能性、但也许有许多未知数，使我国的前途捉摸不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继续为争取我们认为是最合适的、使意大利摆脱当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解决办法而斗争和工作。劳动阶级和全国人民要求走向一个以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民主力量的谅解为基础的新的政治领导。

我们深信，如果意大利能够通过这条民主团结道路克服自己的危机，这将不仅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参加那些意大利所属的国际联盟和机构的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一个革新了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意大利，也将能够保证对欧洲

和世界建立推进缓和和各国人民合作的国际关系作出更积极更持久的贡献。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坦率地、同时也是本着兄弟般的精神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要再次表示对参加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满意，这次会议肯定要成为一个对我们大陆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事件。

（摘自《参考资料》1976年7月8日下午版）

卡里略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全文）

（一九七六年七月）

说只有承认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或方式的多样化才能解决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要求捍卫各党的平等权利和有主权的独立以及不干涉别国党内政和自由选择不同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说共产党人中不存在任何领导中心，不存在任何强迫就范的国际纪律。说现今威胁和平的最大危险是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说美国正公开地干涉欧洲各国的内部事务，干涉意大选和西班牙内政；他要求国内各党派达成协议以组成使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力量集团。

同志们：

欧洲公共舆论继续关注这次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有的人说，我们正跟着在场的最强大的党的指挥棒转；另外一些人则说，在目前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我们是不可能达成谅解的并说共产党发生了危机；许多人甚至祝贺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出现分歧，并把这说成是共产党力量削弱的预兆。与此相反，却有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开始把这些分歧视为共产党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表现，并把它视为在我们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政治理论不断丰富的证明。

实际上，我们共产党人是在斗争和受迫害的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当然，这些条件只能同原始的天主教徒所遭受的处境

相比较：这些教徒被投给野兽吃掉，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投进火坑烧死，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自由的信仰、信念和象征，直到冲破社会对他们的层层包围。我们度过了类似的痛苦处境。在许多国家中我们共产党人还未摆脱这种处境。我们这些党战胜了或正在战胜的那些痛苦，以及我们经历的那种地狱般的阶段，使我们的队伍中产生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社会主义与迷信牺牲和听天由命溶合在一起：好象我们同我们过去的殉教者和现在的预言家们有了一种新教。多年来，—莫斯科——使我们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的地方——好象成了我们的罗马。我们一直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我们的圣诞节，并一直把它视为我们的童年时期。今天，我们已经成熟了。共产党人在许多国家中掌握了政权。在另外一些国家中，我们共产党人已成为一支不可估量的力量，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胜利就是最近和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我们正在抛弃某些宗教信仰，我们的政治理论的科学内容已超过了某种信仰和封建迷信。的确，我们没有失掉勇气，更没有丧失为冒斗争风险，甚至做出个人牺牲的坚强革命意志。我们已有能力摆脱地狱、重见光明和要求掌握政权——在那些还未掌权的地方——的力量。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也就是说，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已经成熟。我们相信，必要的社会主义觉悟正在成为世袭财产——不仅继承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性，而且也继承了劳工和文化以及非常广泛社会阶层的力量。社会主义正在作为国家的发展和获得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正在消除穷、富之间障碍——的办法不断地出现在每个国家中，因此，如果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想把过去的牺牲当成资本并继续扛起解放的大旗，那我们就应该越来越成为我们各国人民渴望解放的旗手。

显然，这些问题是在我们共产党人中产生的争论或分歧。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认真的和公开的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

承认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或方式的多样化，这些争论或分歧才能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我们起草的和我们要通过的这个文件就是向承认现实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进步。目前，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现实之中，即我们都要求捍卫每个党的平等权利和有主权的独立，以及不干涉别党内部事务和自由选择不同道路去争取进步社会的过渡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此同时，我们也从根本上重申我们的思想，就是说，“在自己国家中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每个党对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所担负的责任要同各国工人和所有进步运动以及争取自由、加强独立性、争取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各国人民的相互声援结合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共产党人无疑不存在任何领导中心，不存在任何强迫我们就范的国际纪律，使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亲密关系。我们不会同意恢复过去那个时代的国际主义结构和概念。我们之所以坚持这种主张，并不是要强调我们的显而易见的民族特点，而是为了回击那些顽固的反对我们的反动势力，他们以莫须有的“国际纪律”为借口，企图在我们这些国家的舆论面前诋毁我们的民族性，而我们党如果采取某种按照常规和无动于衷的立场，就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我们的会议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目标：在欧洲加强有利于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的潮流。今天，这是我们各国的广大社会政治力量超越种种差别和特点而追求的共同目标。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不分国界和意识形态的特点，把手伸向这些力量，邀请他们同心协力，实现这一崇高目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想成为人民利益的唯一捍卫者，我们不想掩盖和抹杀其他力量的作用，我们维护我们的独立性，也尊重其他力量的独立性，我们提倡团结和谅解的目的，在涉及欧洲和全人类的命运时，任何历史偏见，任何狭隘的党派利益都不能压倒现在和未来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的切身利益。

世界和平是今天最宝贵的财富。科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世界变小了。我们必须使政治和思想观点适应于我们面临的这种现实：现今威胁和平的最大的危险是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它往往利用世界这里和那里存在的矛盾，鼓动侵略和局部战争，把世界划分为军事集团，在这样和那样的国家保留外国基地和开展军备竞赛，致使大量财富被吞没，而大批人则死于贫困。

在这方面，赫尔辛基会议可以说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和平、安全和合作关系的一个巨大进步。不言而喻，我们要为人民掌握会议协议而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的一个现实是：由于民主的缺陷和群众不能清楚地看到国务活动家签署的文件和他们日常活动之间的一致性，“人民群众”和国务活动家之间有巨大的距离。一些很好的最庄严的文件常常就是这样失效的。

例如，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国王的西班牙政府首相阿里亚斯·纳瓦罗也签署了严肃规定尊重人权的赫尔辛基协定，甚至同一些国家的重要人士一起照了相。但是，这并没能阻碍他平静地签署一些死刑刑法，也没能妨碍他继续把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人抓进监狱，甚至公开地践踏已经得到他正式签字的人权法，当然，这事情并不妨碍出席赫尔辛基会议的许多政府保持或打算同阿里亚斯先生改善关系。赫尔辛基协定的签字国美国正在公开地干涉欧洲各国的内部事务。在意大利大选中它就是这样干的，目前正通过它驻马德里大使干涉西班牙内政，这位大使正向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让共产党继续处于非法地位。另外，西德总理施密特先生最近散布一种“有限主权”论，用类似的话说，就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与他的政府有关的事情。显然，所有这方面的言行都是与赫尔辛基协定的实质相矛盾的，并且会大大削弱对这协定价值的可信任性。

实际上，为了使赫尔辛基协定获得真正的重要意义，必需为战胜军事集团、拆除外国军事基地、把包括地中海在内的各个地

区变成无核区与和平区、为真正和完全尊重人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而进行斗争。当然，对这种复杂和尖锐的斗争必需采取十分明确和十分具体的措施。

应当说，关于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关于不制造这类新式武器，也就是说，关于保持恐怖均衡的某些谈判无疑是有益的。很多年来，大多数与此不直接有关的国家的人民都对此表示直接关切。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支和平力量，如果没有它们，三十年来就不可能不发生世界大战，目前的危机就很容易导致又一场不幸的冲突。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实行一条更有活力的政策，更直接地在人民面前提出撤出在外国（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和基地，提出解散两个现存的军事集团，提出真正充分地保障人权的建议，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这种响亮、明确和诚恳的政治建议，那末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动员和团结民主与和平力量。

在我们行将通过的文件中包括一系列的目标，要实现它们不仅要依靠共产党人，而且还要依靠欧洲所有民主与和平力量。是致这些力量的一份公开文件。我们想强调指出这个文件中保卫自由的内容。有时我们听到别人以轻视的口吻谈论“形式上”的自由。我们在法西斯统治下四十年来的遭遇，使我们懂得了这些自由的真正价值，应该尽力保护它们。这些自由不是资产阶级的成果。是平民，是人民群众为得到这些自由作出了贡献。按照任何观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我们都不同意取消自由的主张。

对于我们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斗争的共产党人来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同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党人、激进党人和其他有民主倾向的各届人士达成协议，以组成一个能

反对极权主义潮流，能使国家制度越来越民主化，能对帝国主义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问题提出进步的解决办法和使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条件不断成熟的人民力量集团。

最近，外界在谈论“欧洲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十分遗憾的，并不存在什么欧洲共产主义。但是，显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开展阶级斗争的。这一斗争把我们引向与其他国家不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式。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今天在我们这些国家，正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劳工和文化力量的领导方式将不是独裁的，而是尊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不搞一党制，在任何时候都完全尊重普选的结果。我们的希望是这一进程通过和平的渠道进行。由人民群众广泛和不断地参加。但是我们并不排除，如果在选举中被击败的一小撮反动派要发动政变威胁民主自由，就必须用武力来捍卫民主自由。我们运动的这一不同方式必须被永远地接受下来，必须拒绝任何反对这一方式的图谋。只要谁也不把自己的观念当作教条，只要尊重各政党的特点和立场，只要我们对所处的时代发生的变化保持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态度；分歧就不会把我们引向歧途。

基本文件着重指出，必须同当代还存在着的法西斯主义残余作斗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法西斯主义非常直接地影响着西班牙，西班牙目前继承了佛朗哥主义，处在君主制统治下。

的确，在近几个月，西班牙已开始改革，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以及各民主力量已勇敢地冲出来了。但是，阿里亚斯和弗拉加、伊里瓦尔内的政府却用暴力镇压给予回击，并集中对付共产党人。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四名成员：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和卢西奥·洛巴托已被抓进监狱。我们要求你们给予他们四人和所有被关进监狱的民主党人有效的和坚定不移的声援。争取全部赦免政治犯和流亡者

以及反对国王的警察局继续进行迫害的斗争需要你们联合起来声援。

继承佛朗哥主义的政权已制订一项计划，企图在“改革”的幌子下继续维持独裁统治。在通过的结社法中明确地排挤共产党，不给它合法地位……这是企图降服最动摇不定的人和分裂主张民主的反对派。在同一项计划中规定，在今年秋季举行一次事实上无任何民主保障的公民投票，实际上，其结果内政部已经做出：赞成民主反对派观点的占百分之二十、赞成极右派的占百分之十、赞成政府计划的占百分之七十。计划中还提出明年演一场大选喜剧，在选举中决定增加六十名温和的反对派成员以便乔装打扮，为此使政府保住三百人。如果用这种方式，即表面上的自由装点门面，那么实际上仍是原班人马、同样的寡头政治和对西班牙仍施行象四十年暴政那样的独裁统治。

集结了多数反对派的组织“民主协调”强烈谴责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文件中规定的这些计划。我们民主力量将坚决进行斗争，直到西班牙实现真正的民主为止。数十万罢工者和示威者每天都发出这样呼吁。我们的党以坚定的立场参加这场困难的斗争，因为这场斗争是正义的和民主团结的一贯政策。我们将掀起一场运动，以便在短期间和仍处于非法地位之中使我们的党员数目达到三十万人。工人阶级、大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向我们保证，他们相信和支持我们。

我们认为，我们对和平、安全、合作和欧洲社会进步事业的最大贡献是我们为使西班牙尽可能提前变成一个民主的西班牙而进行的斗争。

一个民主的西班牙将是建设一个各国人民自治、能够在为和平而斗争中发挥自己作用、能够有助于各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民主化的欧洲中的积极因素。

（摘自《参考资料》1976年7月8日下午版）

马歇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 的发言（全文）

一九七六年七月

说缓和已经确立，法共要为加强缓和和裁军作出贡献。

说象这次会议这样的会议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应寻求能深刻、坦率和直接讨论当前重大问题的新形式的会晤；法共要遵循一条独特的独立道路，不容许以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名义，损害其反对大资本政权，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利益的任何作法。说其独立性丝毫不损害国际主义声援的活力。

说要建立一个同自由不可分割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共要以不同于已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变革的人民所遵循的道路，即民主和和平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对有机会同欧洲其它共产党交换我们的意见感到荣幸。

我们的发言将只谈九个问题

危 机①

我们党在指导其行动方面，是从对现在影响着我国的危机作

①小标题是《人道报》加的。

的明确分析和估计出发的。

这场危机严重地打击了工人阶级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这场危机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处于匮乏，不安全和为明天发愁的难以解决的困难境地。它也阻止了国家的发展和减弱了法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场经济情况的危机，也不是一场象一九二九年那样的急剧的周期性萧条。我们也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简单的恶化。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具有特殊性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它不单单是经济的危机，它无一例外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影响着垄断资本和国家合为一体的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身和甚至统治机器。它发现大资本的各种政治组织和政治代表都无法解决对国家提出的任何问题。诚然，大垄断资产阶级还拥有一些我们不能低估的手段，以保证它的有害的制度得以生存，然而，它不可能使国家摆脱这场危机，因为正是那个拥有一切经济和政治统治手段的极少数人阶层对整个国家生活进行的专横统治，是这场危机的根源。

因此，今后在法国，民主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将在变革社会的问题上进行一场伟大的斗争，而我们党对于在群众中提出这个问题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社会主义和自由不可分割

我们认为，提在法国阶级斗争日程上的问题，就是必须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目的在于通过大垄断组织的国有化，使国家能掌握它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保证劳动者能参加包括政府在内的国家各级领导和管理工作。

在阶级斗争日程上的问题，就是我国人民要取得新的自由与权利，劳动者将根据这些自由权利以开展他们的斗争，使政治力

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并迫使大资产阶级后退和归于失败。

因此，我们向我国工人阶级、劳动者和人民建议行动起来，以争取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争取不断民主化，争取民主化“到底”，即是说直到社会主义。

我们为之而斗争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极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将建立在大生产和交换手段的所有权归社会所有的基础上，建立在以工人阶级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人民政权的基础上。

它之所以是极民主的，不仅仅因为它将消灭剥削，从而确保劳动者具有享有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也因为它将保证、发展和扩大我国人民已取得的各种自由，诸如思想和言论自由、创作和出版自由、示威游行、集会和结社自由，国内外人员交往的自由，宗教和罢工自由。同时，这些自由也包括尊重普选（以及它所包含的民主替换办法的可能性），尊重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各政党存在和活动的权利，尊重工会的独立和自由活动，尊重司法独立或拒绝任何官方哲学。最后，这些自由也指扩大劳动者在企业中的权利、区域和地方集体在行使它们的权力方面的自治权。我国的社会主义应该同维护、光大和发扬我国人民经过长期顽强斗争而获得的民主成果一致起来。

这就是我们希望为我国建立的和我们认为能够建立的、同自由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符合我们为之斗争的社会主义法律的政权的现实，所以我党二十二大才决定放弃它。

因此，在确定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认真地考虑了我国的现实，我国本身的条件、传统。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这一切。总之，我们的这一切使我们考虑以不同于已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变革的人民所遵循的道路的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将是具有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民主变革，社会主义本身只能是我国人民广大多数的多数人运动的事业。现代国际主义的经验表明：这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正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人民运动的基础，我们才从今天起在努力巩固左翼联盟的同时，致力于保持这一联盟走在共同纲领的正确道路上，并围绕左翼联盟实现受大资本统治之害的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联盟。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考虑到了组成我们人民的各社会阶层的不同处境，也考虑到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和宗教派别。我们既不想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也不想在明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垄断，而是要——这是很不同的——起社会和人类进步的先锋作用。

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民主的和和平的道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指望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人物会突然放弃权力呢？是否意味着它会自动离开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呢？不是？我们对劳动人民说：为了使我国的民主变革胜利，为了满足你们急迫的要求，为了使人尊重普选的裁决和挫败反动派借助于非法手段与暴力的企图，必须进行斗争。要进行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一系列不懈的斗争，呼吁结成广泛联盟进行团结一致的群众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

这样行动的同时，我们意识到了要起我们的先锋作用。出于要正确发挥这一作用的考虑，我们要注意生活的动向，要表现出创造精神，经常阐明我们的政策、理论、行动方法。如果害怕作这种说明，使我们思想僵化，这就会推迟已成熟的、符合劳动人民需要的社会变革的时间。

我们感兴趣地看到，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其他共产党除了它们象我们一样重视的处境不同外，都认为要应付一些基本上共同的问题，它们给予这些问题以相似的答案，并确定了具

有出于同样的民主考虑这种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前景。我们把这些看作是我们在世界这个地区的斗争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缓 和

在确定我们行动的目标和方法时，我们不仅是从估计我国的形势出发。我们还要依靠对国际环境的分析。

正象我们在二十二大进过的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已建立了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它再不允许帝国主义为所欲为了。”

在世界范围和在欧洲，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工业和金融大资本统治制度——的削弱是一个主要的事实。

整个这个制度深刻地受到危机的影响。它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了。相反，在社会发展中从此起决定性作用的各个伟大力量，在不无视真正的问题和处境不同的情况下前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它们的实力不断发展，它们采取了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的主动行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和民主力量也是如此，它们进行的阶级斗争发展了，它们在反对剥削和贫困、争取福利和民主自由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就。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如此，它摧毁了殖民制度最后的残余，并提出充分行使主权和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结果是：正象尼克松两年前对美国说的那样，对整个帝国主义来说，“它能做的事情是有限度的。”

特别是资本主义列强不得不承认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军事冲突，结局已变得不肯定了，它们不得不要走向与这些国家发展各种和平关系。在不到二十年以前，“和平共处”这个词本身曾被谴责为共产主义的邪说，而现在和平共处诸原则已被资本主义国家正式接受了。这些原则是许多协定的基础，例如是美国和苏联之间、法国和苏联之间的协定的基础。这些原则也是赫尔辛

基最后文件的基础，这个会议为组织欧洲的和平、安全和合作打开了新的前景。

因此，例如当德斯坦对法国人说，现在的世界是“严酷的”、“我们的人民生活在“危险的”国际环境中、在现存秩序中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起“不平衡”的危险、并由此导致一场灾难时，他就是在蓄意欺骗法国人。对于法国反动与保守的老右派的典型代表德斯坦来说，这样作只是为了把我国人民引向不在我国实现必要的社会改革的歧途。

事实是，新的事态已经确立：缓和。事实是，欧洲各国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有了终于享有牢固的和平、走上裁军道路和生活在安全之中的可能性。

和平共处意味着顽强的斗争

无论如何，这样的和平共处不能与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现状相混同，也不能与世界瓜分为由最强大的国家所统治的势力范围的情况相混同。相反，我们号召法国劳动者们从世界当前新的力量对比中，从作为欧洲形势的特点的缓和中找到对他们争取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战斗结局满怀信心的补充理由。

我们认为，基本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并不为此而对完成这一和平的转折抱有幻想。

如果我可以说的话，我要说，在现实地估计今天欧洲达到的安全程度方面，我们处于特别好的作估计的位置。德斯坦的国际政策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它证明帝国主义并不打算自愿承担它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个政策就是：制止、甚至敌视缓和，继续和加快进行军备竞赛，对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各国民众施加压力、干涉和进攻，加强西方国家的集团政策，包括在军事方面的政策。

德斯坦要把我们武装力量纳入同西德帝国主义国防军站在一边的、在社会主义国家边界上的所谓“前沿战斗”战略中去的决定，就是这项不幸方针的最新证据。

这样一项政策含有部分的冒险主义，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向法国人揭露了这一政策。它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不论帝国主义的意愿如何，它都不再能指望——象在三十年代那样——从战争中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此外，也不能从求助于法西斯主义中找到。

这样一项政策的唯一的——但却是严重的——结果，一方面就是把沉重的军事负担压在我国人民身上，促使群众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就是这种政策会把我国重新纳入美国战略，会严重损害我们的独立，并重新看到法国在各方面接受美帝国主义的要求。

这项方针是由于法国大资产阶级为了使人民群众接受其反社会、反民主的政策所遇到的越来越大的困难造成的。

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干涉各国人民事务，一些严重冲突继续在世界各地进行着。

我们认为，各西方帝国主义的态度包含着一项给人的重要教训：不进行顽强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缓和就不会有新的进展。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合作的现状与现存的和未被利用的可能性相比较，也使我们得出了同一结论。我们党要为另一项法国政策、即和平、安全和广泛合作的政策而坚决地采取行动，从而为这场斗争作出贡献。这项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说——应是加强缓和，并本着得到同样安全的精神裁减军备。它也应当是一项采取有助于超越、继而解散对抗集团的主动行动的政策。只要这种前景尚未实现，尊重它的联盟的法国便仍将是大西洋公约的成员。法国也将表现出它要走上对不管什么军事一政治集团独立的道路的愿望。它将依照这项方针参加国际谈判。

但我们党在组织法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对大资本和它的

政权的反动政策、争取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同时，相信它也就尤其对争取缓和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我们是团结者

当我们把帝国主义——美国、西德或其它——说成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削弱、迫使退却和打击的敌人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决不反对任何人民、任何国家。我们希望法国今天和明天在权利平等和互利的唯一基础上，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我们的敌人、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一个反对各国民众的、服务于几个金融和工业集团的现行政策。我们的敌人，就是致力于这一勾当和一心维护旧剥削制度、不惜使绝大多数人受苦、危害各国人民安全、独立与和平的政治人物。

在这方面，深为遗憾的是，一些社会民主领导人自己也实行了一条难以与此相区别的政策。因为人们看到他们在这危机高潮中利用他们的影响来使危机的重担重新落在劳动群众身上，并培植反共产主义。然而，一切都表明，阶级合作的道路不会使社会民主有什么伟大的前途。至于我们，正如我们已说的，我们还是认为，西欧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的现状不利于争取这个地区全体工人、民主和人民力量。因此，我们将耐心地为实现劳动者的利益所要求的和解而继续努力。

尽管意识形态信念不同，我们还是关心我们与代表天主教人民群众的力量之间的谅解、很好的协商以及联合行动有所发展。在大资本的政策引起的危机损害着我们所共有的文明的某些价值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具有了新的意义、更丰富的内容、更明显的重要性。

我们忠于我们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我们多么忠于这些原则，我们也就是多么开明的人、多么注

重团结的团结者。

独立和国际声援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历史时期，是以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为标志的。要是共产主义运动不发生变化，那会是不可理解的。

正象我所说过的那样，我们正遵循着一条独特的、独立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更一般地说，我们的党独立自主地确定它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方法，同时从已经搞过的实验——积极的或消极的——中吸取教训，而又不把任何实验作为样板。

同时，我们的党努力保持与所有民主和人民力量的友好、兄弟与合作关系，而这些力量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与和平、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而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党与其它共产党之间自然存在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我们把这些党看成是为争取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本国的先锋队。

在此方面，我们应该说，我们认为象这次会议这样的一些会议，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既然今后已绝对不可能给我们所有这些党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所以看来寻求一些更生动、更灵活和更有效的集体会晤的新形式才是适宜的，这种会晤使人们能深刻、坦率地和直接地讨论当前这样或那样的重大问题，并且不总是以通过一个文件作为结束。

此外，和平共处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是从争取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这个正确的思想出发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则要尽力从速结束垄断资本主义，因为这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一些党控制着很大一部分国家的手段，它们同另一些党倾全力去打倒的政权保持合作关系（这是一个重大成就）。这是正常的，没有任何矛盾。但我们也不能容许以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

名义损害我们进行的反对大资本政权、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利益的任何作法。我们不知道有比我们对我们工人阶级和人民所承担的义务更崇高的义务了。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越向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就越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给社会主义塑造的形象就越是和我们大家有关，即使这个形象每次都具有一些民族特色也罢。所以，我们怀着很好地为这种共同的理想服务的信念，坦率地表明了我们对于我们觉得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背离了这种形象的作法的看法。这丝毫不否认我们对那些已把本国引导到社会主义、从而完成了丰功伟绩的党的友谊。

更普遍地讲，我们作判断和采取行动的独立性，丝毫不损害我们的国际主义声援的活力。

我们认为，这种声援具有普遍性质。

它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

它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古巴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它适用于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变成了帝国主义众矢之的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它适用于在苏丹、伊朗、印度尼西亚、智利、乌拉圭或巴西的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工会会员、民主人士。

它适用于为自身独立而斗争的吉布提人民和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撒哈拉人民。

在这些日子里，它特别适用于黎巴嫩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适用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摘自《参考资料》1976年7月4日下午版）

西共、法共、意共 三党联合声明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至三日，西共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和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在马德里进行了会谈。乔治·马歇和恩里科·贝林格应圣·卡里略的邀请，向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其它民主党派重申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为争取民主和建设一个自由的西班牙在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本着这种精神，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深信西班牙人民将全面恢复民主。在今天来说，民主的基本准则是共产党和所有民主力量的合法化，这对于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是必不可少的。两党表示将与在西班牙为争取释放所有政治犯，挫败旨在阻挠西班牙走向民主的法西斯挑衅和罪恶而斗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继葡萄牙和希腊之后，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崩溃，是欧洲形势的一个重要和积极的变化。

西班牙民主的进步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人民的特别关注。

目前，三国正面临着一场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各个领域的全面危机。这次危机要求对社会发展需要找出新的解决方法。尽管三国的条件各不相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准备为进步和复兴政策作出贡献的各派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必须实现广泛的协调一致以积极地渡过危机，挫败反动逆流，进步和复兴的政策要求劳动者及其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应当时刻捍卫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还主张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强烈要求发展民主，向社会主义迈进。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三国共产党准备和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一起尊重、保证和发展集体和个人的各种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公民在国内外的出入自由，工会自由，工会的独立和罢工权利，私生活的不可侵犯，尊重普选制和多数派民主轮换执政，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各种哲学思潮和见解的自由，文学艺术自由，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

这种在民主和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应当体现在三党各自完全自主地制订的政策方针中。

三党还将在各党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尊重在自由选择符合各国情况的、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的基础上，发展国际主义团结和友谊。

在马德里会晤期间，三党还重申了为促进缓和与和平共处，促进真正的裁军，推动各国全面实施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各项规定，积极举行贝尔格莱德会晤，使欧洲摆脱分裂成互相敌对的军事集团，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作出努力的重要性。

三党设想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没有军事基地也没有军备竞赛的欧洲和地中海各沿岸国家和平合作的前景。

西班牙共产党人和所有民主力量为之而斗争的自由西班牙将是欧洲民主、进步与和平的重要因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社会党和基督教力量以及各种民主力量之间虽然观点和传统各不相同，但是进行对话和寻求共同之处的全面谅解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最近几年中，西班牙的自由事业已成了共同行动的阵地，西班牙业已走上民主复兴的道路，今天三国共产党在西班牙的首都号召所有爱好民主和进

步的力量团结起来。

马德里 1977年3月3日

(译自法国《国际研究》杂志第88—89期。庄建明译
葛智强校)

贝林格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 论述（摘录）

针对这一虚假的选择（指施特劳斯所提出的口号“要么就是自由，要么就是社会主义”——译注），我们以我们反对保守主义和任何专制主义的斗争，以我们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来回答，目的就是要在民主和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并通过社会主义充分实现一切自由。这就是法意两国共产党人为本国和西欧提出的路线。这就是西班牙同志的路线……。

（贝林格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巴黎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载六月四日《团结报》）

因此，新道路不能是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但也不能是东欧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所走的道路，这些国家在劳动阶级登上舞台时的历史特点是：经济和工业落后，缺乏牢固的民主传统。

……不论如何，这种政治样板是不能运用于其特点是经济发达和具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的西方国家……。

……有些人想使共产党人难堪，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条既不是社会民主党道路、同时又不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道路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否切实可行？也就是说，这条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否行得通，是否有成功的可能？

我们要反问一句。也就是我们要说：

为什么这种前景不应是可能的呢？为什么非要亦步亦趋地模仿条件和我们所处的国家完全不同的一些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可

呢？真理恰恰是相反的情况。即：只有我们走上不同于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们才能切实可行地在我们这些国家，在意大利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贝林格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六日米兰群众大会上的竞选讲话，载六月七日《团结报》）

十分有意义的是，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他们自主的探讨，在有关实现社会主义所应走的道路，以及在本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方面得出了同我们类似的结论。这是相同的意見与共同的特点，在我们同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共同发表的声明中都有所表示。人们把这些新的探讨和结论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显然不是我们创造的，但是它如此广泛流传的事实本身，却正好说明，人们对于在西欧国家确定和实行社会主义意义的社会改造的新型解决办法的要求，是何等深广。

（贝林格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欧洲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载七月一日《团结报》）

充分具备这样的意识；即：我们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充分发扬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同保卫和发展一切民主自由二者之间的新的有成效的联系，以上这些就是西欧各国共产党自主地进行的探讨的主要因素。这条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路线，可以使西欧工人运动（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进程重新形成，而这对于使民主和社会主义前景在欧洲占优势是必不可少的。

（意共领导机构成员特里维利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罗马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讲话，载十一月八日《团结报》）

当然，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指西欧——译注），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点，每个党有自己的历史，但是，有意义的是：西、法、意这三个大党，各自在自主条件下，已经对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了一致的估价。正是把这种一致称作为“欧洲共产主义”。

（贝林格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意法西三党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载三月四日《团结报》）

我们意共和西欧共产党，除了有任务对迄今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判断以外，特别要负起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西方革命”，证明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一切公民、文化和宗教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不是什么地区的闭关自守，而是一种历史性的世界观，一种真正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在启示着今天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那种思想运动。

当然，在世界上这片地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点，每个党也有自己的历史，但有意义的是：象西、法、意这样的共产党，虽然无意建立什么有组织的中心，却在各自享有自主的条件下，已经对有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得出一致的估计。人们正是给这种一致起名曰“欧洲共产主义”。

同样有意义的是面对着震撼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标志着旧的政治思想路线、旧的经济社会方针、旧的政府形式的破产——，在工人和人民运动的其他部分，人们正在寻求新的道路，以便在民主中建立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就促使也有利于共产党、社会党以及其他具有不同倾向的人民民主力量之间进行对话、接近，甚至采取某些合作形式”。

（贝林格一九七七年九月在《团结报》节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九月十九日《团结报》）

我们党发展了、而且部分地革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政治主张，它是严肃认真地、持续不断地这样做的，而不是心血来潮，深化了和明确了自己对于通过民主道路争取社会主义以及建立一个以一切自由（宗教、公民、政治自由）和政治议会民主、多党制、按照多数原则轮流执政这一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

……意大利共产党人赋予西欧各国工人运动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即：通过独特的道路，采取独特的方式，即民主的道路和方式，同俄国及其他国家过去所做的不同的道路和方式，向社会主义前进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要考虑到每个国家和欧洲的先进的工业发展，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的丰富多样，议会民主、宗教、文化传统。……

由此可见，如果把“欧洲共产主义”理解为新的领导中心，或新的有组织的国际中心，或某些西欧共产党的超国家的中心的话，那末，这个词汇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上述中心并不存在，我们也不打算建立这样的中心。况且，在西欧，客观情况、政治组成、传统，从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来看，也是不同的。但是，某些西欧共产党的一些主要共同点，是逐渐显示、表现出来了，而当人们谈起“欧洲共产主义”的时候，指的正是这种现象。

（贝林格在一九七八年一月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载一月二十七日《团结报》）

我们确信，在今天我们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多种政党、多种工会、多种社会组织和机构民主地得到确认和发挥。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那个东西的实质，正在于这种信念，而不在于并不存在的、谁也不想建立的一些组织。

（贝林格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意共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三月六日《团结报》）

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反对苏美的运动。它是从如下的必要性产生出来的一个运动，即：必须在每个国家采取和遵循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而这条道路肯定是不同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的。……这一点可以解释何以苏联报刊时常表现猜疑。同样也可以解释我们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何以促使美国往往施加某些压力。

（贝林格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巴塞罗那同卡里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载五月三十日《团结报》）

……我们一向十分坦率地承认，我们同法共之间在某些欧洲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即使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有关前景问题的许多重要一致点。但是，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欧洲天民党、社会党和社民党范围内存在的分歧要大得多；只不过这些力量掩盖和佯作不知这些分歧罢了。这便是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贝林格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载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意共《团结报》）

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使命是：使自己成为建立一个民主、进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体欧洲的推动力和领导者。为此，我们（意法）两党的合作，它们在欧洲范围为争取实现一切工人、左翼、民主力量最广泛的一致和谅解而奋斗的能力，就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这样做，就会有助于确立和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抉择，有助于确立和发展这样的共同信念：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应当沿着与别国目前已经试验过的不同的新道路来进行，应当在尊重一切个人和集体自由——政治、文化、宗教自由——的条件下，使民主得以充分发扬。

当然，在我们两党之间，对于有关欧洲政策的重大问题，如

共同体扩大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我们赞成这种扩大），或关于欧洲议会的权力（我们认为应当加强这种权力），是存在着分歧和不同方针的，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各国天民党、社会党、社民党都力图以笼统的共同纲领来掩饰它们之间在有关欧洲议会权力、共同体各方面政策内容、扩大共同体以及其他问题上存在的深刻差异（例如西德社民党和英国工党之间的分歧就是）。我们的做法则不同：我们过去从未掩饰过、现在也不掩饰各国共产党之间在有关共同体问题上存在的差异，而是公开讲出这种差异，与此同时，说明在哪些问题上相反却存在着一致性。你们和我们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光明磊落和政治上老实的行为。

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而且这是主要之点，即：西欧工人运动面临着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任务，这就是要寻求向社会主义前进、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们认为，民主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我们认为，在现时代，西欧向社会主义前进必将为缓和的发展，为工人运动同发展中人民和国家、首先是同地中海沿岸和非洲人民与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盟关系作出重要贡献。这必将制止住欧洲的没落，还它以在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首要作用，并将确保社会主义作为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彻底确立而获得新的发展。我们具有共同的愿望，使地中海变为和平之海，从而使有关欧洲安全的赫尔辛基会议所指出的缓和进程进一步向前发展。

（贝林格在马赛同马歇联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载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意共《团结报》）

我不认为有什么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当然，在这个共产党和那个共产党之间有观点的不同，正如在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

间也有观点的不同一样。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未想到过什么完全一致。更未想到过建立什么有组织的中心。欧洲共产主义的特点在于这样一种相似性：即努力在西欧各国通过政治民主、多元化、尊重和扩大自由来达到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信奉欧洲共产主义的各党之间是意见一致的。而且我还认为，不久还会有其他行动来进一步推动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制订政策和共同工作。

（贝林格答意《全景》周刊记者问，载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全景》周刊）

“欧洲共产主义”是欧洲共产党人、特别是意、西、法三国共产党人之间团结的新因素。当然，我们也是有差异的，而且我们不象其他人；首先是天民党人和社会党人那样，作出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完全一致的假象。但是，共同点和一致点是很多的，也是重要的。我们是在相互尊重自主的条件下工作的。但是，欧洲共产主义虽然并不打算成为什么清一色的现实，但在其主要和决定性的特征上则是生气勃勃、充满生命力的。在所有这些主要和决定性的特征当中，首要的就是在政治民主、政治与公民自由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变革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意、法、西三国共产党人都承认和证实了的。我们正是愿意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在拒绝脱离各个共产党的现实的任何模式的基础上，扩大我们这些国家工人运动的联盟，并作为共产党欢迎同欧洲现有的社会民主党力量和基督教力量达成最富有成果的谅解。在我们这个大陆转入进攻的保守势力呈现威胁的时刻，这一谅解就更为有益和必要了。

（贝林格在罗马同卡里略联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载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意共《团结报》）

卡里略谈今日革命 的马克思主义^①

我不想就所有问题，而只就某些主要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我想谈谈第十四个议题，即我党列为革命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流言蜚语和种种责难满天飞，说我们“抛弃”了马列主义，今天，这个问题也为我党和我们大家所关注。

确实，我们不能老是重复马列主义的传统形式。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伟大的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开端，也不是要否定马列主义的最重要部分，它们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抛弃教条，发挥伟大的创造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搞个人迷信，不迷信教条和其他什么……

然而，我认为，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相信我们的政治实践，相信已经成为往事的一切，而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是什么，多年来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实践表明，在反法西斯胜利后的三十多年以来，所有西欧共产党，包括我们党在内，在政治实践中接受了一条民主的道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条件下，我们放弃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原则，放弃了“占领冬宫”的思想。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作的一切，彻底改变了革命的进步的力

① 本文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1978年4月在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量与保守的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

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

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观点的否定，我们所处的世界革命过程是以伟大的战争和晚些时候的革命开始的，然而，这意味着接受了下列思想，即在一个根据宪法用民主形式进行社会改革道路的民主制度中，暴力不仅不是合理的，而且正如全部民主实践表明的那样，也不是现实的道路。它是、而且今后也将是专政、独裁以及其他用暴力手段扼杀社会改革和社会复兴的政治组织所采用的形式。

我们的议题包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列宁用以反对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把今天仍有价值的问题都列入我们的议题中，因为历史还未超越出列宁主义的范围。

然而，我们认为，再也不能象斯大林时代那样，说“列宁主义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了。而这种概念在世界上只有在帝国主义一种统治制度的时代是适用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唯有苏联例外：在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市场而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革命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一跃而为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政党。

我认为，在评价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重要的是要看到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战略首先建立在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思想上。

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

今天，由于使用原子武器，因而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就

连最贪婪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也不再认为世界战争是瓜分世界权力的方法。今天，战争即意味着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自杀。当今的战争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阶级斗争以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两个阶级的消亡而告终。

但除此之外，我们不但不会再处于瓜分殖民地和市场的境况（当然，这并非意味疯狂的统治集团不会卷进自杀的旋涡），而且，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殖民地相继独立，新独立的国家日益增多，这种非殖民化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得到发展。石油和其他原料价格上涨，生产国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造成我们面临的危机的原因）给危机打上了新的长期性特征（这是我们应予以研究的），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

我认为，不但西班牙共产党，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部历史都感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全部理论，马列主义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的发展——原子能只是其中之一——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形势、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列宁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这里，我想顺便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可能有的同志要问，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列宁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目前连苏联共产党也抛弃了列宁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点，提出了“全民国家”的理论，而且认为在共产主义形成之前都是如此。

可以就这些变化是否正确开展讨论，但绝不能说，那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是错误的。

二 政党的新概念

很明显，列宁主义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关于党的概念，这里

说的政党不是指群众政党，而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的政党，列宁有关政党的概念在当时的条件和情况下是正确的。我相信，不管谁，只要他读过《怎么办？》和《退一步，进两步》，在目前情况下无需更多解释，都会得出如下结论：这种政党并非什么新型政党，它是“我们”和西欧其他共产党所坚持创立的、而且某些共产党已经建立了的群众党。

同样，我也认为，受当时的共产国际的严格纪律约束的集中式的国际政党，是列宁主义思想原则的另一组成部分。不是我们首先提出：共产党发展了，列宁主义的这一思想原则就过时了。而是苏联共产党首先倡议，于一九四三年解散了共产国际，是苏联共产党在解散共产国际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在列宁主义的概念中，无产阶级政党才是革命先锋队的思想也十分重要。我要问你们：如果我们远离十月革命，远离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和农民政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呢？历史上实现的任何一次革命——我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根据这种思想、这一原则取得胜利的。古巴革命就不是由“先锋队”，由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而是由“七·二六”运动，这个具有人民党性质的革命党，但不是马列主义政党取得的。该小组在夺得了政权后才创建了共产党。再看看目前非洲的革命变革吧，非洲革命变革的动力也不是共产党，而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些民族解放运动不同于列宁的先锋队原则。

多种多样的甚至相反的情况

同志们，我认为，与南斯拉夫的特殊情况相反，所有由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的经验都与列宁设想的情况很不相同。

同样，我们在当今世界所碰到的造成了共产党内和革命运动

内很大混乱的各种情况与列宁的设想也完全两样。

中苏，这两个皆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而两党之间也论战不休），是当代的又一起类似现象。

这就是说，马列主义的定义今天已掩盖了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政策和立场。确实，历史已摒弃了很大一部分，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列宁主义学说。我们、不仅我们而且其他西欧共产党都不再运用列宁主义的总原则来筹划自己的战略。

显然，在我们多年来的政治斗争和实践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摒弃了列宁主义的具体原则。

同志们，这并非意味着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向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压力屈服了。我认为，我们非但没有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和宣传，而且我们还在为迅速改革，为结束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在另外的条件和情况下追随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斗争的光荣时代所开创的榜样。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恢复列宁的模式——这正是他所赞许和推荐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就象列宁在反对考茨基和第二国际时的情形一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打破了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界限。如果问我们，为什么成立共产党又不称之为马列党。回答很简单：过去就有过不叫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而它正是列宁的政党。我重复一遍，这里谈不上什么抛弃，我们不抛弃任何东西，我们在努力研究、寻找使工人阶级迅速执政，使生产力和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方法。我们将继续唾弃并谴责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传统，同时认为，为了反对第二国际的背叛和投降，共产党人进行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的分裂是有道理的。如果谁必须对这一时期进行自我批评，那便是社会民主

党人，如不进行自我批评，则很难使我们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象他们中的某些人所自称的那样。

我们还认为，我们是这个世界革命进程——在另外的时间和条件下——的继承者，这个世界革命进程的开端是巴黎公社和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我们将继续声援正在进行的或已经开展起来的革命解放斗争；我们将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自然，这样说是冒风险的，因为我们党已经成了群众党，我们党内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有许多等同于充满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新政策的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有总是抱着“左派”教条的同志；同样，也可能还有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同意社会民主党——我说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同志，他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有时也流露出微弱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当一个政党处在变革时期，就象我们创建的党一样，当它成为群众党时，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我还认为，如果就这些问题展开创造性的积极讨论，无疑必将丰富和巩固我们的党。

西方革命最需要工人运动的团结

首先，我想说，我同意下列提议，即第十五个议题应该阐述政党是干什么的等具体问题。但在这里，我不多谈了，因为我们在宣言纲领中已经明确阐述过了。但是，我们在进行这种所谓变革时，则需要对此加以肯定和坚持。

我们不愿创立的——我相信，也是在座的所不希望的——是社会民主党。我们将创立一个有能力掌握政权的伟大的群众党、民主党。但是，我们的党同时又是战斗的、进攻性的政党，它知道，如果国家一旦出现了复日，党就必须以铁的纪律，用专政时代的方法参加战斗，就象在这种条件下一个革命党应该作的那样；而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也未作过和不能作到

的，它们“为和平不为战争”服务。

在询问了这次讨论会的有关问题后，我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似乎马列主义这个术语已成为我党仍然保留的“革命的过去”与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之间的唯一联系，如果取消这种联系和术语则会中断马列主义与我党革命的过去之间的联系。

我担心，党内不理解我党政策的某些天真的同志在思想上会这么想。如果他们有这种想法，就必须把问题搞清楚：这不是政党定义词义变化了，在说明这种变化时，要着重解释我党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因为这些同志对我党贯彻的路线不理解。

我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

我还想就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同意同列宁决裂问题再说几句。

我向马克思学习，主要是通过列宁。我读过许多作者的著作，但读得最多的还是列宁的，列宁是我的主要理论家。我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我党的一系列政策作出了贡献，也是受了列宁著作的鼓舞。在向列宁学习时，我不是阅读他的这条或那条原理，而是研究他打破经典，抛弃与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有冲突的公式化原则的勇气和才干，而列宁在作这一切的时候是当时的第二国际的最高权威。

民族和解政策与列宁毫无共同之处，列宁是谴责这一政策的，他当时谴责这一政策也是正确的。这种谴责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于一九五六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当我们同多洛雷斯一道前往莫斯科向苏联同志解释民族和解政策时，他们竟找不到一个俄文词来表达这一概念，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这个词是受谴责的。

我认为，民族和解政策与列宁当时解释并捍卫的原则是完全

背道而驰的。当然，列宁时代的民族和解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恢 复 团 结

同志们，问题是这一斗争的目的。这里说的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认为这个真理便是：社会民主党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不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基本思想和传统方式——也进行不了任何革命。任何革命也实现不了！我不相信，有谁可以肯定地说，在上述条件下存在着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同志们，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为了使我们能在上述国家进行社会民主党所不愿进行的革命，我们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努力创造的。这个革命，按照旧的马列主义原则也是不能实现的，难道这一切的证明还不充分吗？

同志们，在我还是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时，我就反对第二国际。梅尔乔、加列戈、卡索尔拉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和我从第二国际中拉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当时，连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一直都象我十八岁时那样反对第二国际。当共产党沿着第二国际的道路发展时，我断定我所作的一切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同时共产党还必须坚持佩得罗·阿迪亚卡刚才说过的、无庸争议的真理，这就是：如果我们想在西方进行革命，我们就必须恢复工人运动的团结。如果不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实现西方的工人阶级的团结，革命就绝不能取得成功。这里我不仅是在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期间的工人运动，而且也是指工力量和进步力量的广泛运动，它们是社会的革命力量，在这些革命力量中，工人阶级仍然是——由于其阶级状况——最关心革命的。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已意识到这一斗争是困难的，但许多残酷的尖锐形势的目睹者。如果说俄国的十月是残酷的话，那么目前的情况就更复杂。我们党在改革初期遇到的冲突还要复杂得多。但是，我们都过来了，而专政的情况就更糟了。

我十分信赖我党政治上的成熟性，我也完全可以保证，如果我们能把问题阐释得好，我们的党是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

（摘自《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79年第12期。文兵译）

“欧洲共产主义”的历史概论

[意]塞尔焦·塞格雷①

欧洲共产主义实质上何所指呢？我接受伯德斯基教授关于把这次介绍分成两个部分的要求：认为应当分析两个现象，第一是关于充分符合西方几个大的民主国家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社会类型和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的专门探讨的起源问题，第二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的情况，即若干西欧共产党如何通过自主的钻研而认识到西欧国家特有的、并且被人们认为它们特有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使它们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而且还认识到这种一致性的政治意义。

意大利现实的一个表现

关于第一部分，我打算谈的基本问题是那些成为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来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的政治理论探讨的特点，即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探讨和分析——我以后将提到他基本内容——不能够脱离意大利共产主义的经历的因素，这个因素可以归结到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政治、理论的重要探讨，在许多方面也是社会学的探讨；这个因素使得意大利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

但是，如果不考虑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只提这一点还是不够

① 意共中央委员、意共中央欧洲共同体问题部长。——译注

的。今天在国际政治界、报纸、文章、著作中，在关于意大利的研究中，人们大谈“意大利的事例”，意大利历史的特点，而且我认为，在象乌尔比诺这样的城市提到这种特点，也绝不是不合适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是经历过漫长和巨大的苦难的。我们是属于最后实现民族统一的一个国家，但我们也是一个经历过公社、共和国、文艺复兴历史等伟大阶段的国家，在它的历史中，虽然经历过教皇派和国王派的冲突，但也经历过一个可以被称为新人文主义的探索阶段（只要想一想抵抗运动这个团结一致的伟大阶段就够了），这是越来越要被记载下来的，今天这是各种政治的社会力量，各种巨大的文化力量越来越要在上面较量的场地。

我们的这个历史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欧洲共产主义这个现象的根源正好在意大利。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我国历史的其他方面。我们是一个没有原料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是建立在进口原料、对原料进行加工，出口成品的基础上的。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的历史上，发生过数以百万计人口外流的悲惨经历，因此它客观上始终不得不在自身的生活、本国人民的生计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和生计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的联系并相互影响。这个国家在越过民族主义狂热的蒙昧阶段以后，客观上始终对世界重大问题采取开放的态度。

但意大利还有一个特点我要提一下，这个特点表现在如下的事实：我国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几个大流派，各自根据本身的自主性和出自本身的理论、知识和文化的渊源，都始终采取一种可以称为具有国际主义特点的态度。意大利共产党是按照自己的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党也是按照自己的传统（想一想意大利社会党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面采取了和所有其他欧洲社会党不同的态度，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以及天主教运动——象天主教民主党所表现的那样，都采取了这种态度。我认为，几个月以前，

即在三月间，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闭幕时，扎卡尼尼阁下在他的闭幕词中要求天主教民主党尽到国际主义的职责和具有国际主义的眼光，这不是偶然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该党生活中和历史上一个新词，但如果人们考虑到：我国天主教运动在历史上不得不遵循，特别是近年来的历史上遵循了天主教会对当代世界采取的重大的开放态度，那么这个词并不令人惊奇，梵蒂冈第二次主教会议和教皇有关研究当代世界的几个重要圣谕——例如保罗第六的《地球上的和平》和《人民的进步》——就是这种开放态度的主要证明。

现实中的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这些年来所作的下述努力也是从对上述种种因素的考虑而形成的，这个努力就是要对制定意大利的对外政策作出贡献，这项对外政策应成为民族统一的因素，而不再象四分五裂的冷战年代那样，成为使我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发生从上到下的分裂的因素；这个努力也要通过修改意共自己先前对一些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态度来实现。我认为，这不仅对我国是一个新的事件，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也是一个新的事件。一个国家有一项基于各种民主政治力量一致同意的对外政策，这个因素对于为了使得这项对外政策成为一个能够保证和维护国内政治进程的自由辩论的因素来说，也赋予这项对外政策以特殊的潜力。对于意大利来说，和民族统一以来的整个时期（也许除了抵抗运动的短暂时期以外）比较，这是一件新的事件，也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考虑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及其意大利根源。而且还应看一看和考虑欧洲共产主义这一现象的起源。

这个现象并不是今天才产生，也不是随着这个词的创造而产生，而是在这三十年来的意大利历史中，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

和较量中，在制定党的政策中产生的。这个党今天在意大利是这个西欧现象的主角。这个现象和这个探讨是沿着两方面的问题发展的。第一方面是关于对意大利社会的考察，亦即对我国为向社会主义前进而应遵循的道路的考察。第二方面是对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国家的经验的分析和批判性的考虑。这是逐渐形成和日益发展的。同这些研究一起进行的还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对政党性质的考虑——我认为这里应提到葛兰西关于党是“新君王”和党在文明社会和政治社会中的地位的观点——以及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方式的考虑。

六月底在柏林召开的最近一次欧洲共产党会议把我们党——以及和我们党一起的其他党——所提出的、不可放弃的下述要求作为前提（在会议将近两年的漫长筹备中也是引起交锋的因素），这无疑不是偶然的。这个要求就是，如果想搞出文件，那么文件的草拟就应当依据协商一致的方法，并在各共产党之间的生活中关系中采取新的原则。与此同时，我们坚持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同样不可放弃的要求，即如果想搞出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就应当不仅承认各党在制定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路线方面充分独立自主，而且也应承认各党在制定自己的理论方面完全自主。

这几周来，人们广泛地指出，柏林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怎么没有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样的概念。这是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党（以及同我们一起的其他党）拒绝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观点说成是一种与世隔绝的东西，说成是一种只需在各国不同情况中加以运用的至高无上的理论。相反，我们党捍卫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观点。我们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人的思想，从而包括一个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方面的思想，都决不是到了马克思或列宁就停滞不前了。同样地，在我们看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词，表达了一种有限的、自

行缩小的概念。因为这个词没有考虑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在争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社会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克服那些困扰着人类的巨大的不平衡和重大问题的斗争中，国际主义的义务不仅可以并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力量，而且可以并应当属于不同社会成分的力量，属于那些被召唤来对建立这个新国际社会作出不可代替的思想和倡议方面的贡献的各种政治、哲学、文化的力量与派别。

人们也广泛地提到，这几周来，正象在柏林会议一样，国际上出现了这种欧洲共产主义的现象。这不仅是由于贝林格的发言中使用了这个词（这也还只是名词问题），而且还由于意共书记提出寻求西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问题的那种说法。他说：“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虽然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中实现着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某种改善，但没有表现出能够真正克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东欧国家中所遵循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并不符合西方国家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特有的条件和趋向”。排除掉这两极，问题过去是，现在也是，寻求能够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而且也能够在民主和自由中建立多元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道路。这就是意大利共产党早就在考虑的问题。

葛兰西的渊源

当人们现在考虑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并强调意大利共产党人对于探讨和确立这项政策所做的贡献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国《世界报》前几天的一篇社论，人们还可以想到上百篇其他文章和研究），就更加承认，应当向很远的过去去寻找这个现象的根源，这些根源既深深地扎在安东尼奥·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的探讨中，也深深地扎在意共从我国历史的那次根本的决定性抉择

——即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的民主抉择——以来的三十年间所奉行的具体政策中。

这个抉择在当时不仅是对希腊道路以及它所造成的悲惨事件的拒绝，而且，我要说，也是对不久以前在葡萄牙提出的进退维谷的难题的先验的拒绝，因为当时该国共产党人以我们所不同意的态度坚持说抉择是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抉择。如果我们在一九四四——四五年这样提出意大利的问题，那么我们无疑不会有社会主义，或许我们也不会有法西斯主义，但我们很可能在短期或中期内有一个专制政权以及同共和国宪法——它是我国几支大的政治力量会商的成果——所设想迥然不同的社会。当意大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根本抉择时，那时还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的可能，而当时在东欧国家的发展中无疑是决定性的那个因素也还没有爆发——这一点在历史上还没有得到研究和深入的阐明——这个因素就是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之间在东欧国家新社会的性质上发生的冲突。

季米特洛夫当时把人民民主制度看成同在苏联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单纯变种迥然不同的东西，而他所面对的则是斯大林的苏联领导权的如下压力，要按照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类型来塑造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并使苏联的社会主义类型成为样板（这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的理由），而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特别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已经意识到（除了在一定的时刻也可能出现的那种过程以外）这样的事实：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进程所要求的已经不是重复而是寻求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也就是说确信，事情已经不是要有一种普遍有效的总规律（即使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加以不同的运用），而是每一个国家要制定自己的道路，它要不同于其他国家所遵循的道路，而且要充分符合这一个国家的性质，符合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

如果我们今天回顾共产党人对制定共和国宪法所作的努力和对起草宪法所作的贡献，如果我们把召开制宪议会的伟大时刻看成是各种政治力量会晤的时刻（请允许我离开正题来谈一谈下述政治方面的一件事情，即当安德雷奥蒂总理最近在作他的纲领声明时想追溯一下历史，而被他提到的正是那个从全国观点来看确是一个可喜的时刻的制宪会议的活动，这无疑不是偶然的事），那么这种制宪的努力和这种贡献，如果首先不是那种认为我们这个意大利应当确立自己的自主和独立的表现，寻求自己的新民主发展的道路的信念，那是什么呢？而意大利共产党人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所搞的“新型的党”，如果不也是这种自主的表现，那又是什么呢？

陶里亚蒂的提法

一九五六年——这一年在战后这段时间里，由于二十大、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无疑是共产党生活中最四分五裂的一年——陶里亚蒂使用了一些提法（我指的是他在一九五六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些提法今天看来——至少是其核心部分——象是这个欧洲共产主义现象的起源因素。陶里亚蒂当时说：“我们所取得的这些经验，我们引进来的这些新的东西，如果说还不能成为其他党的指南的话，至少也是它们研究的东西”。陶里亚蒂始终十分注意避免任何自满自足的现象。面对着那个四分五裂的时刻，他以这些话，以这句“如果还不是指南”的话，使意大利的这个经验具有国际意义。事实上他随即补充说，“意大利的这个事实是国际工人社会主义运动中某些新的东西”。

人们今天还日益注意地继续讨论和思考的，难道不是“这个意大利事实”吗？在那篇讲话里，意共书记把意大利共产党人遵

循的路线同希腊共产党人的路线进行对照，从中得出：“经验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几个月以后，即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他在波伦亚进一步阐明这个思想，指出“我们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主要关心不要让来自国外的政治路线强加于我们，而要制定一条独特的本国的政治路线”。

又是陶里亚蒂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对《团结报》发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谈话中强调，“我们所走的道路，法国同志们所走的道路，同大约十年来在东欧掌权的那些党的道路实际上没有多少共同点”。在一九五六年，面对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面对着东欧存在的社会困难，意大利共产党人除了从政治理论上要求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以外还第一次全面地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些因素（即从一条意大利道路的发展，直到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合在一起，在这二十年来，同开展关于西欧的谈论一道，就成了决定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发展的因素。

由于时间短促，不容许我提到所有的因素和所有的事实，诸如陶里亚蒂对《新议论》杂志发表的那个基本的谈话，这次谈话谈到了制定这种观点和批判性思考整个过程的特点。又是陶里亚蒂在他的另一次谈话中，即在《再生》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的文章中，他谈到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给予我们的教训（他在对《新议论》杂志的谈话中已经着重强调过，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和个人迷信是某种同“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判断标准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使用了一种说法，我们从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到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后来对于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受干涉所采取的态度的前提。

陶里亚蒂在匈牙利事件时写道：“正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了进行批评和纠正的必要性。苏联同志只能同意这些批评和纠正，况且，在和他们不同的国家里进行批评和纠正，不属于他们

的职责。如果他们反对这样做，那就错了，我们要公开向他们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新的自主发展只能加强这些国家，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包括苏联在内”。

随后的自主制定政策

据我看来，正是沿着这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经验逐渐的启发，对东欧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类型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开始了对欧洲共产主义现象的研究。这是一种在十分艰难困苦当中形成的现 象。面对着今天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法国共产党人之间，在我们各自的国家中以及更普遍地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的社会主义类型上，存在着一致的立场，为什么不回想一下，譬如说，在一九五六年，当召开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向这个重大问题开门的代表大会——时，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加罗第发表了一篇强硬的论战文章。实际上指责结构改革战略只不过是改良主义的战略，以及陶里亚蒂在《再生》上所作的强硬答复呢？

当时双方的立场相距很远。如果说，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取得很多进展，而且在若干很基本的问题上现在存在一致的立场，那么其所以能够取得进展，仅仅是因为对这个现象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自主的制定，而这种自主的制定在其发展的一定时刻、逐步造成了趋于一致的观点，这些观点正是使得在民主道路和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问题上的相似看法得以形成和获得活力的。

我想在这里提到一些文件中的一篇，在我们看来，这些文件是这个欧洲共产主义的起源（虽然生活和历史无疑不是仅仅由文件造成）。这是一九六三年十月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

件，其中写道：“对于取得和行使政权的新道路的探讨，今天对于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对建立新的权力集团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进行积极的对话，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并指出，在西欧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不仅要保证面包和工作，而且还要能保证另一种生产发展进度，着手搞经济规划化，在这种规划化中，个人的主动性获得它的地位并得到推动，通过保障一种政治自主和自由，促进对文化的自由探讨和不断的思想对照的广泛制度来领导社会。只有从现在起朝着这个方向行动，并且胸怀这个前景，才能充分符合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趋势，并能够争取和团结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大多数。过去由于宗派主义观点不了解这些需要，产生了太多的害处。现在是从事实中吸取教训的时候了。现在是考虑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导致工人运动遭到挫折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局限性的时候了”。

沿着这方面的研讨，还出现了陶里亚蒂逝世前于一九六四年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这个报告专门谈国际问题和当时正在开展的同中国共产党立场的论战。陶里亚蒂用了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不仅同政治情况有联系，而且也表达了他对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和政治思想家的整个活动的考虑，他这样说：“我们在研究和努力运用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方面给予很大注意的问题无疑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民主与和平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问题”。他还补充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法西斯失败并争取到民主政体之后立即尝试给予正确回答的；我们当时意识到，落在我们身上的任务是，要在和其他已经争取到政权的国家迥然不同的条件下，开展我们的行动。”他还说：“因此我们党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印记和特有的目标，这些目标在我们最近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取得了理论上的充分论证和越来越确切的提法。”

他继续谈到西欧：“在争取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

而斗争的时候……我们打算以新的方式来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问题。我们感到，在这个组织的各种形式中，需要有一种明显的民主内容，需要避免别的地方曾发生过的错误、闭塞和歪曲；不排斥已经实现的民主成果，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斗争方式，从而承认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多元制的存在与合作。这种合作在其他地方曾是一种例外，而在我们的这种观点中，则正在变成常规”。他还补充说：“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以不可分割的方式把社会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联系起来，而且我们从今天起就给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在那次会议上，他还强调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一直是伴随着这个探讨的，这就是不仅努力加强国内和国际政治抉择方面的自主和独立（“每个党应拥有充分的自主和主权”），而且努力推进理论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不要限于重复老一套，而要在探讨符合意大利现实，以及推而广之，符合西欧现实的解决办法的道路上前进。正是这个主题占据了陶里亚蒂的最后一篇著作《雅尔塔备忘录》的很大部分。

新的答案

这条笼统和粗略概括的道路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新的事实——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新事实并不意味着抛弃民族道路，去走一种西欧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意味着正是通过民族道路的自主开拓，几个大的共产党才在关于本国，以及更普遍地说，在这一部分欧洲，社会主义应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问题上逐渐取得一致。这种一致是发生在对所有的左派、首先是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但也包括具有天主教思想的流派之间建立更广泛关系的探讨中。其目的是确定所有这样一些力量之间的联合问题，这些力量愿意通过社会的深刻变革，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目前危机和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给予积极的解答。

因此，这些是新的解答，与此一起的，还有克服西欧工人运动分裂这一伟大的目标，对我们来说，这个答案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为争取向社会主义前进而斗争。我要使用路易吉·隆哥（他当时是意共总书记）于一九六九年在向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用过的说法。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应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主义，充满民主的灵活性，并建立在人民的赞同和群众直接的积极参与，国家的世俗性质和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基础上”。即是说，“一种非集中的、非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宗教自由，文化、科学和艺术的自由，新闻、言论和思想交流的自由，以及存在党派和社会组织的多元制，这些组织遵守一种关于各种立场——哪怕是对立的——的自由民主的辩论的作法，使得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成为和迄今所知道的经验有着质的不同，并且充分符合传统和我国人民的愿望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条路线得到坚持不渝的遵循和发展。一九七六年六月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柏林会议上，贝林格明确地重申了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概念。他说：“在意大利，我们为争取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而斗争，这种社会主义的基础是肯定个人和集体自由的价值以及保障自由，国家的世俗的非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民主的灵活性；政党多元制和政府多数派更迭的可能性；工会自主，宗教自由，言论、文化、艺术和科学的自由。在经济方面，要通过民主规划化来保证生产的高度发展；这种民主规划依靠各种形式的（无论是公营的还是私营）主动性和经营管理的存在和积极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和全国集体的重大需要”。

他又补充说：“西欧其他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它们的自主探讨。对于为达到社会主义应采取的道路和在它们的国家应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得出了类似的看法，这是很有意义

的。”紧接着又指出“对于这些新型的研讨和探索，有些人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显然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但是它这样广泛地流传，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希望西欧国家中在把社会朝社会主义方向变革方面采取的新型解决方法得以确立和取得进展的愿望是多么深切和广泛。”

政治上的一致

在这里值得提一提在我们欧洲的这一部分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事实的这些观点的一致。去年意共和西班牙共产党（大家现在都承认这个党要在明天的民主西班牙产生的影响）的共同声明宣称：“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是从现实中产生的，其前提是这样的信念：在我们两个国家，只有通过民主的发展和充分实施，才能确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确认个人和集体自由的价值和对自由的保证，国家的世俗性原则，国家的民主灵活性，自由辩论中的政党多元制，工会自主，宗教自由，言论、文化、艺术和科学自由”。

在另外一次更近的声明中，即去年十一月同法国共产党一起发表的声明中宣称：“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提出的作为他们国家的前景的向社会主义的进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应当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中实现。社会主义将购成民主和自由的更高阶段，是更完备的民主。在这个时期内，所有的自由都应得到保障和加以发展（这些自由既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也是这个世纪内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伟大人民斗争的成果）；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个人在国内和国外流动的自由，私人生活不容侵犯、宗教自由，各种思潮和各种哲学、文化和艺术观点的全部自由，也是如此。”

这个声明还说：“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宣布赞成政党多元制，自由形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及多数派和少数派民主更迭的可能性，国家的世俗性和民主地行使其职能，司法独立。他们同样地宣布主张工会自由活动和自主。他们认为，发展企业中的民主，使劳动者能够以有效的权利参加企业管理并拥有广泛的决定权，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国家的民主的权力下放应赋予大区和地方权力机构拥有更加重要的职能，这些大区和地方权力机构在行使它们的权力方面应拥有广泛的自主。”

在最近同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制定的文件中也有类似的声明，这些是意共三十年来所完成的探索和研讨的渠道中已有的声明。西欧其他共产党无疑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但这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强调了下述事实的政治意义，即在以上提到的党之间，除了西欧各个国家情况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以外，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世界这一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是什么样的和不应是什么样的共同信念。

所产生的问题

同这个主题有联系，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些问题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久以前提出的。我将把它们综合为几个大的问题提出来：第一个问题：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是否也意味着是一种能够达到克服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欧洲所发生的历史性大分裂的手段？从前景来看，这无疑是根本点之一。这种分裂的克服可以成为整个工人运动的一种思想力量。这种探讨和努力也许会日益明显地表明今后几年内欧洲形势发展的特点。

这里实质上出现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是分开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

间的关系问题（如现实主义地来看，目前这个问题只涉及这些党当中的几个党）。第二个问题是贝林格一些时候以前曾经提出的下述任务，即“弥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的失败而造成的历史性的不平衡”（一九七一年筹备意共十二大〔译者按：原文如此，疑系十三大，因十二大已于一九六九年召开了的讲话），借用贝林格最近在柏林会议的讲话中使用过的说法来说就是，这个任务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因为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最先进的工人运动由于一系列的客观情况和主观情况，整个说来基本上不得不停滞不前。”

他还补充说：“今天，面对着新的国际形势，以及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日益明显地无能提出积极的对策，人们重新提出下述任务，即不仅考虑迄今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而且寻求欧洲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里接着就是我已经在前面提到的那一段话：“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虽然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中实现着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某种改善，但没有表现出能够真正克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东欧国家中所遵循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并不符合西方国家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特有的条件和趋向”。

因此，我们就是从这两个情况出发的，而这就重新提出什么样的道路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这不是新问题，我要提出阿门多拉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再生》周刊上一篇众所周知的文章。“在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它在哪一个国家都没能变革资本主义）同苏联所走的道路（它导致资本主义被摧毁，并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革命和正在变革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而取得了进展，但苏联的革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那个时刻——一九一七年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发生的）之间，我们应当寻求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将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历史所创造的具体条件下，在我们争取和平共处斗争的

时代向社会主义前进，这就是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这个根本问题，答案不可能是提出一个“共产主义样板”（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一个“欧洲共产主义样板”）去反对其他党的经验或样板，而是应该在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具有天主教思想的力量就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和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积极的回答进行分析、批评和自我批评性的思考、提出建议、倡议、采取行动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共同努力中去寻求答案。共同的努力不应触犯哪一个力量的自主，而应该使它们全体不仅对照和确定自己的社会主义概念，从而朝这个方向推进它们的斗争，而且更深入地参与世界这一部分目前开展的关于先进工业社会的现在和将来，如何维护和推进民主，如何实现参与管理和争取支持等问题的大辩论。

贝林格在我已经提到的筹备意共十二大的讲话中还强调：“如果我们善于完成这样的任务，那将对欧洲和世界政治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将对理论和文化的发展，对将向人类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形象本身，以及特别是对新的几代人产生同样巨大的影响。”当我们说“我们”，我们的意思不仅指我们共产党人，我们的意思是指我们和一切被召唤来对这些问题和这些疑难作出回答的其他进步力量和先进的民主力量。

意共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不同政见

被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同政见现象所持的态度，更一般地讲，那些以某种方式赞成欧洲共产主义现象的党的政治理论成就，同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于这些社会中所发生的非同小可的问题如何作出回答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呢？

我没有多少困难地承认，不同政见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是政

治、理论和文化的辩证关系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政治、理论和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种基本推动力。然而承认不同政见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赞同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任何立场。

“不同政见”并不是一种清一色的现象，有人持不同政见是因为想要人们前进，而有的人，从不同政见的立场出发，是想要人们倒退。应该严格和严肃地对任何一种立场的实质提出判断，而且还应以可以使我们能够看到事物的真实运动（因而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的眼光去作判断，而不是依靠不正确的静止的解释。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采取辩白的态度，也绝不是照搬那种“君王信啥教，百姓就信啥教”的习尚，而是意味着对史实的各种因素有真正的理解。

这里就产生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问题。在象我们这样越来越小、越来越相互联系的世界里，这个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问题是每天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现象逃避不了这个问题。相反，从许多方面来看，它肯定了这个问题。否则，人们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即这个现象虽然还处在政治理论上的探讨阶段，还不是具体的现实（这是从下述意义上说的，即这种关于在我们西欧的天空下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和不应当是什么样的政治理论观点，迄今在我们西欧的那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具体化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已经变成一个实在的政治现象，它引起了不安、论战、反应和争执（只要想一想福特、基辛格、史密特和其他人最近采取的整个立场就够了）以及共产党之间的理论和政治辩论。

一方面，他们怀着敌意和不安来看待这个（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因为他们意识到，由于它的态度和它能够发动的力量，它拥有必需的潜力来使西欧——或者至少是一些西欧国家——脱离目前的条件或静止状态。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象我们在意大利所发表的和用来论述我们的政策的那些言论，以及我们和

象西班牙或法国等其他共产党一起发表的言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听起来，象是能够激励革新力量，甚至激励那些反对现存的那种政治文化组织的势力的。为什么不看到这一点呢？有时候在东欧共产党中产生或表现出不安，为什么觉得奇怪呢？

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思想在传播，即使是赫尔辛基会议所支持的关于更多的人员和思想交流的要求迄今没有取得所希望的结果，它们也在它们所产生的现实之外传播和起作用，而由于它们在传播和起作用，在东欧也就引起新的政治理论问题。问题是怎样对待它们。这个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它对我们说来是基本的东西——并不是从抽象的妄想而是从具体的需要中诞生的。我们想用这个现象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来解决那折磨着我们国家和整个西欧的危机。它不仅是对欧洲的现在而且对其过去，对五十年来的教训进行思考的产物。这个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是什么样的呢？当一九二九年大危机发生时，在意大利已经有了法西斯主义。然后纳粹主义很快就在德国得势。法国人民阵线这个引人注意的、从某些方面看来是振奋人心的新经验，为时短暂。西班牙内战正象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结束了。接着不久就是一九三九年。不是在左边，而是在右边，即在民主制度的摧毁中，找到了那次危机的对策。

今天，面对着一次危机，这个危机由于各国内部和国际上的种种原因，无疑是和上次不同，但其深度并不亚于上一次，工人运动和整个民主力量面前提出的大问题，就是防止危机在保守的、反动的、专制的解决办法中找到它的出路。当时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美国和罗斯福的新政。今天，在欧洲，存在着新的条件，不同的可能性。正是从对这些条件和这些可能性的思考中诞生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现象。它的挑战在于它有能力对已经笼罩和正在笼罩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道义的危机提出新的民主的解决办法，这个危机是更普遍的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因素。这个

欧洲共产主义现象被召唤来承担的任务就是，善于对社会重大问题提出积极的对策，从而善于进行活动和创造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的前提，加强广大劳动群众在民主革新、西欧进步以及在建立西欧和全世界、首先是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关系中，承担决定性职责的能力。

（译自《欧洲共产主义 令谁害怕？》文集，意大利古阿拉尔第出版社1977年版。《共运资料选译》1981年第2期。
韩瑞定译）

列宁、列宁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

〔意〕卢契亚诺·格鲁皮①

近几个月来就列宁主义展开的讨论当中，首先缺少的一点，就是任何讨论都总要具备的一个先决条件，即：对所讨论的对象要下定义，哪怕是暂时的定义也好。

列宁主义是什么

那么，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应当指出：列宁主义是一回事，列宁则是另一回事。当讨论列宁主义时，似应明确一点：我们所指的是在列宁逝世后才开始的那种对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建设。列宁在世时，这个字眼，在本世纪初，曾被列宁的敌人使用过，显然是从反面的意义来使用的。

列宁逝世后，季诺维也夫是第一个从正面意义使用这个字眼的人：“列宁死了，但列宁主义活着！”（见《列宁著作汇编》）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列宁主义是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上教导的总汇，至少起初是如此。后来，特别是经过斯大林之手，列宁主义则变为列宁教导的“真谛”，是不容改变的“真谛”。这就是一九二四年四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授的众所周

① 格鲁皮现为意中央委员，陶里亚蒂学院院长。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知的那些论点，当时，他已经就“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同托洛茨基展开辩论了。在辩论中，双方都引证列宁，求助于他的权威；双方都确信，自己是列宁最忠实的解释人，是列宁最坚定的继承者。

由于有关列宁主义的尽人皆知的说法，是历史上、也是实践中得到确认的那种说法，即斯大林在他从一九二四年以来的全部著作中以及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一名著中向我们提供的说法，因而应当指出，当人们谈到列宁主义时，实际上谈的是斯大林，只是间接地谈到列宁。在斯大林向我们提供的关于列宁的解释中，肯定不是没有对列宁思想的精辟见解，不是没有对列宁的实践中一些主要内容的理解，但列宁思想和实践中的许多东西还是被简单化、公式化了，因而遭到歪曲。人们利用列宁的那些最有助于当时政治斗争的东西，把列宁思想的整个丰富内容撇开不谈。举例来说，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例。人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了这样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①众所周知，这是列宁的提法。但还应当指出，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中这个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因素，特别是在最酷烈的一九一八年内战时期。但是同一年（而后则愈来愈甚），列宁却提出需要给使用暴力作出法制规定，此后更加强调这一点。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强调指出，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使用暴力，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②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一九二〇年以后），就可以看出，当任务主要不再是革命的突破，而是建设和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10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版第351页。

领导苏维埃国家时，他的注意力就从暴力转向领导、组织、教育等方面的能力。但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却看不到我们所谈的这些，虽然当时已处于领导任务和教育任务更加繁重的阶段。到一九二四年还强调暴力究竟用意何在？这到底预示着什么？人们是很可以一目了然的。

为了另举一例，应当考虑斯大林是如何说明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的。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在于有能力识别、孤立和击败主要敌人（例如，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沙皇），把“主要的打击方向”指向支持主要敌人的中间力量（例如，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指向自由资产阶级）。①但从列宁那里，是很难找到上述策略思想的。例如，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准备阶段，以及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过程中，列宁并未排除同自由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一般说，列宁认为，主要敌人和主要打击方向是一致的，即使规定要批评和打击中间力量。但是，从斯大林向我们提供的关于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的说法，就很能理解何以后来提出有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以上是为了说明，应当把列宁和列宁主义区别开来，列宁主义是后来的理论和实践建设，应当就其本身来加以研究。党和工会的关系也是如此。当列宁一九二一年向我们指出，工会是共产党和群众间的“纽带”时，②他 是以此来反对托洛茨基要把工会变为国家所属组织的建议的（一九一九年，列宁曾支持这个建议），并且确认工会对国家自主。因此，到了一九二二年，他又不提“纽带”的思想了，而把工会对经济计划和企业领导享有的自主强调得更加厉害，因为“在各企业劳动条件的问题上”，有可能造成“工人群众利益同管理国营企业的经理人员……利益的某些对立”。③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133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版第5页。

③ 见《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版第157页。

但是，斯大林却抓住“纽带”思想不放，把这一思想提到原则高度，并且僵硬地划分工人阶级各种组织的等级，正如他僵硬地规定党的领导作用一样。①

当人们说应当把列宁和列宁主义区别开来时（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这也就是说，硬要把列宁的思想和行动禁锢在一个定义之中，是危险的和不正当的。一旦要想从列宁如此错综复杂的活动和思想中汲取他的精华，“实质”，那就必然要产生“列宁主义”，就必然要对他的思想作出教条式的、贫乏的、歪曲的解释。

然而，我认为，对照一下斯大林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如下经典定义，是无法规避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②

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全部”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列宁主义的定义，是司空见惯了。

情况并非如此：斯大林所说的并不是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而是“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③然而，不能否认，通过斯大林，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很大部分都缩小到列宁身上的这种倾向，后来得到了发展，而随着三十年代，又把列宁的丰富思想建树缩小为斯大林所作的简单化解释。且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来说，甚至把卢森堡那样的贡献也排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之外；并且，无视这样的事实：列宁创立他的帝国主义论，不仅利用了他所广泛引证的作者的成果（如希法亭，没有这些作者，就形成不了他的帝国主义论），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23页。

② 同上书，第63—6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62页。

而且还利用了他未提名的一些作者（例如布哈林）的成果。因此，在列宁的理论建树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的“发现”，而勿宁说是他以新的锐利目光洞察出资本主义垄断性发展的政治后果的能力。

然而，斯大林的主义使我们面对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任何人都没有象列宁那样，善于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中看出它的政治后果，不论是就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的性质所作的判断也罢，不论是就第二国际各党所作的判断也罢，也不论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过程中对俄国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持的态度也罢，都是如此。

如果认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在于它无力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那么，就应当承认斯大林对列宁本身的意义所作的判断是有效的。列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正统理论”的简单“复活者”；列宁并不仅仅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具体实际的人，就其善于认识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斗争提出的任务一点来说，就其因此而对社会民主党所作的批判来说，他是一个有国际价值的人，甚至是一个在当时具有最大国际价值的革命领导人。

但是，斯大林在提出这一看法时，却把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简单化和贫乏化了。斯大林把第二国际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它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加以公式化和歪曲。他写道：“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①应当指出，不能把第二国际的历史降低为机会主义的历史。必须看到，社会党国际的中间立场曾对列宁起过深刻影响，尽管列宁已经同它决裂。斯大林一九三一年写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一封信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4页。

中所写的如下一段话，是错误的：“每个布尔什维克……都知道还在大战以前很久，大约从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起，当俄国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出现左派的时候，列宁就一方面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社会主义者实行了决裂、分裂的路线”。①恰恰相反，实际情况是：列宁曾经认为，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而且可以在第二国际内部胜利地进行。他确实未能象卢森堡那样敏锐地看出，机会主义倾向触及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是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刻，他才觉察到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范”作用成为问题的那些情况。但也只是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贷款时，他才认为在第二国际内部胜利地反对机会主义的一切可能性都完结了，从而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

众所周知，《怎么办？》一书提出的党的观念曾得到考茨基的多大帮助，它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信仰考茨基的威望。列宁提出他自己对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战略路线，把这条路线同考茨基对这条路线所作的解释进行比较。当在党的观念问题上，考茨基站到孟什维克一边（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时，列宁是倾向于缩小对立的，并且认为，这一对立是由于《新报》社长对俄国情况了解不多。总之，列宁是致力于使布尔什维克能在第二国际中有完全合法的地位的。一九一四年决裂以后，在国家问题上也展开了论战，当时，俄国面临的已是一场要走苏维埃道路而不是要在议会制度内斗争的道路的革命。即使《国家与革命》抨击决裂前那段时期的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主张，列宁的态度也是如此。

以上并不是说，列宁作为第二国际成员，从一开始就来同它

①《斯大林全集》第13卷，中文版第78页。

划清界限，因为列宁始终是置身于实证进化论以外的，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特别重视有关经济社会形成的概念，并从中为研究俄国特殊性，特别是为他制订关于党的观念得出了结论。正因如此，根据以下还要提出的看法，我认为，今天对列宁进行思考，就应当对照一下斯大林所下的关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定义。列宁从一九一四年以来的形象，正是从这一水平上刻划出来的。他的立场成为工人运动必经的十字路口。要把列宁贬低为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卓越领袖，看不到他的事业的国际规模和国际意义，看来是办不到的。

但是，斯大林强调他所指的列宁主义，更多的是如下一点，而不是列宁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即：“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关于十月革命的典范性问题

这就把注意力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他由此得出的结论，转到俄国革命上来，转到工人阶级如何在俄国革命中建立自己的政权上来，并把俄国革命，甚至把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形式，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一九二四年，共产党人当中，谁也不曾怀疑俄国革命的标准价值，至少就其实质内容来说是如此。甚至拿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来说，也是这样。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本身也并未看到，它自己提出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就是指出一个超出苏联道路范围之外的革命过程。

因此，对列宁的思考就意味着对俄国革命的思考，就意味着把俄国革命的典范性质当作问题。但是，首先必然抛开这样一种论调：即把俄国革命看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常现象，而不是工

人运动在一个其特点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是经济结构完全落后的国家中应走的主要道路。当然，必须理解这种落后性，而且不应忘记：在俄国，特别是在彼得格勒，确实存在着某些欧洲最大、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中心，以及具有特殊素养的工人核心。但就整个国家来说，则有大批小农和贫农，他们是文盲或半文盲，从事着原始的农业劳动。

如果认为，俄国革命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否定。那就陷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公式化解释了。人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认定，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它将会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开始；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又指出，一些革命中心地区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国家。德国就是这种情况，《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在那里，为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开辟道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成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也是这种情况：在那里，农民运动后来彻底改变了欧洲范围的力量对比，为西方工人运动开辟新的可能性。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固然认定，资本主义越发达，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就越成熟，然而，他们却没有把经济发展机械地搬到政治上来，而是在一些特定时刻，为了权衡革命的可能性，他们重视政治上的种种矛盾的错综复杂性，并给予这些矛盾以最大的注意力。

第二国际的人们，从实证进化论出发，公式化地解释马克思思想，从而否认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说，俄国之所以能够进行革命，那是因为那里种种矛盾的错综复杂性已达到最大限度，这些矛盾随帝国主义的发展而激化了。因此，俄国革命否定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简单化解释。我们的意思勿宁说是这样的，即：俄国革命表明：种种矛盾的交织如何在政治上提供了爆发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超出了马克思所能作到的预见，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之一。

但是，俄国革命虽然不是处于工人运动范畴之外，今天却应看到，它并不能具备共产党人长期赋予它的那种典范性质。

我们懂得，这对于今天人们认为列宁的教导具有的价值，即认为它是俄国革命的主要决定性指南，起着直接影响。关于俄国革命的典范性，最好暂且提一下列宁自己的意见。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说，“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前，我们总是说，苏维埃是最适合于俄国的机关。当时我们还不能断言苏维埃也同样适合于西方，但生活表明并不是这样的。”^①

起初，布尔什维克对他们领导的革命的价值还是“谦虚”的，他们认为，这个革命纯粹是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是在欧洲范围内迅速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开端。如果俄国革命不能迅速地得到更先进的国家、首先是德国的革命支援，他们就排除苏维埃政权有存在下去的任何可能。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一书中谈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我所说的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件具有国际性，或者说，这些事件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应该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这样的国际意义”。但接着他马上指出，“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仅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当然是极大的错误。”^②

肯定不能说，列宁当时就已经预见到后来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巨大差异性，尤其是他在一九二〇年还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国家将会比较迅速地展开这一预见进行论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列宁逝世以后，各国共产党把俄国革命奉为“样板”，略于改动，加以运用，从而把这一点变为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至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版第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版第1页。

于列宁，他则是这样断言的：俄国经验的典范价值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当“将来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这种价值就不存在了。那时，“俄国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很快就会又成为落后的国家，而不再是模范的国家了”。①

随着历史的发展，一方面，十月革命的潜力已经成熟，它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它作为中国革命，作为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的决定性榜样的能力也已经成熟。非洲则是另一种情况，非洲转向苏联则是最近发生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说，非洲转向苏联，是把它看成一个强国，而不是转向这个强国所据以产生的那个革命。但另一方面，苏联所能代表的那种启发作用也表现在其局限性。人们已经看清，这个革命过程指出的道路不是别国所能遵循的，从这个革命过程中诞生的政权不能作为样板。甚至出现这样的现象：十月革命的启发能力，特别是从十月革命中诞生的政权的启发能力，对欧洲要比对其他大陆为小，尽管俄国革命同欧洲的联系要比同其他大陆的联系更为密切得多。实际上，十月革命是从欧洲工人运动当中，从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意识，从它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组织中产生出来的。十月革命是俄国欧洲化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但是，十月革命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在其所建立的政权中，没有信守它的欧洲前提，因为它脱离了欧洲运动据以行动的民主根基，脱离了欧洲运动从一产生起就历史地加以拥护人权和公民权利。

如果说，谈到列宁确实意味着首先谈到十月革命，那么，十月革命以及它所建立的政权的局限性，也就是列宁的局限性。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一方面，列宁处于事态发展，影响之下、对于这些事态发展，他是起着决定性领导作用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页。

的，但他又仅仅能部分地加以控制，正如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主角一样；而另一方面，列宁又凌驾于这些事态发展之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赋予革命以一项革命本身不能胜任的使命，他描绘出一个政治制度的轮廓，而这个政治制度后来并未付诸实施。我认为，列宁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者，但又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这是从如下含意来说的，即：十月革命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革命，但它又是欧洲最落后国家进行的。十月革命想超过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而它又是在一个尚未取得英法两国革命、欧洲民主自由革命的成果的国家中进行的。十月革命为上述矛盾所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上述矛盾所驾驭。列宁本人也是这样。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下述事实就说明这种情况：列宁曾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仅仅是应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并应该援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个革命的开端，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单枪匹马是无法支撑下去的。但是在他在世的最后两年，他才提出即使革命未扩展到欧洲、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也能支持下去的问题（这时他瞩望于东方、印度和中国了）。

关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这样一本书，就是这样解释的。这本书一贯被看成是有关国家学说的教科书。但它同样也是有关国家消亡问题的教科书。这本书是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这样说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立即开始消亡”。这并不是说国家立即不存在了，而是说，它的某些职能，即军队、警察、官僚机构等职能，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这是空想么？可以肯定，这是对领导一个具有高度工业水平的国家的复杂性的低估（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这样一种社会），是把领导社会的机构问题简单化了。但在阅读《国家与革命》时，应当看到，列宁当时在十月革命前夕，是把

俄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范围之内。无论如何，把社会的全部国家化的思想说成是列宁的思想，这就意味着把同列宁所要的和所想的恰恰相反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列宁身上也并非没有可能为国家取代社会这样一种制度开拓道路的立场。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写道，“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①后来，正是他的思想中的这个方面在现实中付诸实施。但一般说，在列宁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及其在社会中的职能逐步消失的思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作为千百万劳动者积极参加社会和国家的领导，才是可能的。在社会主义中，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不是缩小了，而相反是具体化了，成为对绝大多数人民的真正民主，也是真正的政治自由。“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②

因此，不能说，在列宁看来，为民主而斗争，就仅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条件的价值。在列宁思想中，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民主的，并把民主变为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

但工人阶级进行的拥护议会制的斗争，则仅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在列宁看来，议会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和阶级局限所据以表现的形式。正如社会主义民主超脱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局限一样，社会主义民主也要超脱资产阶级民主的体制。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中文版第34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中文版第70页。

在列宁看来，在苏维埃民主中超脱议会民主，很快就不再是俄国的经验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它已具有了标准价值，实际上，后来的历史经验却相反表明，在有巩固的政治民主的国家中，议会制的价值正在于它那保障行使民主自由的根本结构。然而，我不认为，人们能从原则上反对这种对具体的历史真实性的认识，即意识到：列宁是拒绝把民主亦即行使人民主权同民主在历史上所采取的形式二者等同起来。但是，民主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它据以表现的体制形式的更广泛的现实，始终是历史的一种现实。议会制就是这样；但还应当说，苏维埃制度也是这样。列宁本身存在的矛盾正是从这里暴露出来了。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最大限度的扩展，是文明社会逐步具备国家的职能，是国家逐步被吸收到社会中去，而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把他那个在一个孤立无援、被内战洗劫、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付诸实施。正是在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中进行政治上最先进的革命。因此，他才不得不使经济领导集中化，确立企业领导人的独裁以及企业对国家部门的依附。总之，他建立了一个集中化的垂直的领导和权力体系。他是自觉地在这种矛盾中行动的。他甚至努力不去解决这种矛盾，因为人们已经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先进的水平。“劳动群众举行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有如春潮泛滥，冲破一切堤岸，汹涌澎湃。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与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与劳动时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的精神结合起来。”^①但是，把这两种需要调和起来，是否办得到呢？

关于苏维埃制度

列宁是如何在革命以前理解苏维埃政权的，我们可以从他在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中文版第249页。

一九一七年九月的讲话中找到这方面的明显迹象，当时，科尼洛夫将军试图发动反动政变已经失败，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基层实现了团结，这就造成了一种更为开放的局面。

“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斗争并通过实践来考验它们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①因此，也就是多党制、各党轮流执政，哪怕仅仅是指苏维埃的那些政党也罢。但是，革命以后，列宁却把民主集中制准则从党硬搬到国家方面来，就是说，他否认组织反对派的权利。

凡是浏览列宁在十月以后不久的著作和言论的人，都总会看到为这种矛盾所苦的一个人的形象：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扩展民主，调动广大劳动群众自觉和积极地参与经济、社会和国家的领导，而另一方面，国家的客观条件又要求实行一种集中的民主领导。“我们并不反对让工人来领导；但是我们说，解决问题时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我们不能等待。国家被破坏得这样厉害，灾难现时已经达到这样严重的地步，——饥寒交迫，普遍贫困，以致使国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是关系到整个工农政权、苏维埃俄国生死存亡的问题。”^②

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意识到：苏维埃政权远不是应有的那样，即不是服从于理想的模式，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③当列宁提出如下论点时，他是击中矛盾的要害了：“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版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中文版第394—39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版第7页。

关。”①

当列宁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必要性、但也强调不可能短期间克服官僚主义，指出国家机器实质上仍是过去那样时，问题就出来了：列宁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即“打碎”国家机器，是否已经达到。而正是苏联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按字面上意义来接受“打碎”这个动词的含意，把它看成眼前的事，并把它同起义行动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并非如此。“打碎”国家是要通过民主发展的过程，要通过群众觉悟文化提高的过程，通过制度的变革过程，而这个过程不可能是短暂的。但问题仍然是：苏联革命是否从沙皇那里学来了、并保存了沙皇对国家和社会的集中化和官僚式的领导，尽管体制和阶级内容有所不同。列宁并没有解决苏维埃政权在那些年代所面临的矛盾。他明确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不能发挥自己固有的民主潜力，象在更发达的国家相反可以做到的那样。当苏维埃政权在如火如荼的内战中采取了一些限制政治自由的措施（如取消敌对性报纸）时，列宁却深谋远虑地指出，这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不是主要的东西，更不是示范性的东西；这是专政的俄国样式，是俄国的落后性和重重困难所造成的。

关于全面评价列宁

我认为，应当全面地评价列宁，应当根据他所处的矛盾，从他的全部复杂性来评价他。他的功绩正在于竭尽所能使这一矛盾得不到解决。列宁身后，矛盾得到了解决，而我们知道这是怎样解决的。早在列宁领导时已经具备的那些苏维埃政权的特点，得到了发展，但国家建设过程已经丧失了列宁一直重视的那种民主。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版第156页。

因此，我觉得，判断列宁不能同判断俄国革命分开，但也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列宁的形象超过俄国革命的界限。

对列宁的思考，也是对俄国革命的思考，这还有一个原因。十月革命使国际工人运动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自己力量并不强大的地方，“获得通过”，取得了政权，而在象德国那样工人阶级力量雄厚的据点，道路却被堵塞了。

俄国革命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又一证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投降行为而彰明昭著了。

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范围内活动，他们早从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二和〇三年在布鲁塞尔和伦敦）起就开始建立一个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比较是“新型的党”。一九一二年的布拉格会议，实际上已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一四年列宁对第二国际的批评，对准备十月革命来说是一个主要条件。一九一七年，在尚未实现议会民主这一目标之前，通过结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尽管这个阶段还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的），确立了苏维埃的广泛基层民主，布尔什维克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争取改良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也是列宁同意的。这个批评是针对社会党人致力于在议会制内的活动进行的，而这一点列宁也是同意的。这个批评是针对第二国际没有发现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而在资本主义和民族之间建立的新关系（资产阶级不再能在欧洲进行民族战争了）。第二国际不明白，无产阶级何以不能支持资产阶级以民族名义进行的一场战争（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践踏民族实体）。总之，第二国际不明白，这就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它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工人在议会制内进行的正确而必要的斗争，逐渐丧失了政治自主性，丧失了建立一个取代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权的

能力。

按列宁的说法，第二国际逐渐丧失了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的认识，愈来愈想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中更换阶级。列宁的说法恰恰是这个意思，如果深刻地理解这个说法、而不是肤浅地加以理解，即认为，“打碎”似乎就意味着武装革命，资产阶级国家一切机构似乎都应当加以“打碎”的话。列宁并未这样想过，而在《布尔什维克能够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文同《国家与革命》是同时写成的）中，列宁也确实认定：资产阶级国家的技术行政机器不应打碎，公营经济部门也不应打碎。列宁告诉我们，革命的取代不仅是取代政府，把新的力量输送到国家机器里去，而且是深刻地重新调整国家的存在方式，哪些应当“打碎”，哪些应当保留（要改造国家，使之同社会具有一系列新的关系）。

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比较，以考茨基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在于：他们认为，主要问题应当是保卫马克思论点的有效性。

但是，必须懂得，伯恩斯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不容拖延的问题。当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在议会民主制范围内开展，工人运动由于民主体制和民主自由而变得强大起来，争取改良的斗争具有新的重要意义时，马克思的观点就相应发展，使这个思想达到新任务和新的斗争可能性的水平上。事实是：第二国际并未适当地考虑伯恩斯坦提出的种种问题，却为修正主义在实践中渗透开辟了道路，为完全属于伯恩斯坦的那个观点，即通过改良和选举胜利乃至取得百分之五十一选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过渡，开辟了道路，伯恩斯坦的错误主要倒不在于他否认中等阶层无产阶级化或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而在于他没有看到（当时谁也没有看到）：随着垄断集团的形成，资本主义同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国家的阶级性也更突出了，尽管被民主的扩

大所掩盖，阶级斗争变得更尖锐，甚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爆发。

关于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大利社会党的变迁，特别是在它的发展阶段，是有典范意义的。这一变迁是典型的意大利式的，因为正如我们统一国家的历史带有的标记一样，它的标记是南方问题。意大利社会党当时没有看到，乔列蒂的“改良”政策并不是改革，而只是让步和与改革不同的政治方针，这种政策是以损害南方来加以推行的，从而把工人阶级束缚在保护主义的立场上，因而，意大利社会党在这个时候使工人运动依然处于屈从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地位。未能在关键问题上动摇资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利用南方的落后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而恰恰是在社会党失败的地方，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如在农民问题上，他们打破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布尔什维克的自主性是从反对派地位产生的，在他们以正确的方式掌握了农民问题时，这种自主性就变为领导权。

一九一七年以后，工人阶级面临两种经验。一是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这是一个失败的经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意大利、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那样；一是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我们可以理解，各国社会党的左派（他们是一九一四年以后因反对第二国际向战争投降的立场而出现的）是怎样选择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的。

但是，应当指出，共产党人固然在第三国际年代中成为“骨干”，但他们在苏联革命指出的道路上并未能前进多少。在他们能够前进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实际上不同的道路，即“人民阵线”道路（他们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重新以更为接近列宁在一九二二年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有关问

题的提法，而不是接近第三国际后来提出的日益公式化和宗派主义的提法，来理解同社会党的关系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

在西欧国家，工人运动通过反法西斯解放战争，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既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今天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那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意大利是通过解放战争开始的。欧杰尼奥·库里埃尔^①就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他曾断定：把一个历史地完成了的革命过程当作模式，是历史性错误的原则。他反对象俄国革命那样的速决式革命发展，而提出意大利可以进行细水长流的、循序渐进式的革命变革。这样，库里埃尔就相当接近于葛兰西了，虽然他并不认识葛兰西，葛兰西曾对我们谈到“阵地战”^②。但是，必须指出，陶里亚蒂在一九四七年佛罗伦萨全国组织会议上曾指出寻找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必要性，但这一指示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不论是党还是陶里亚蒂本人，直到一九五六年举行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才意识到应当走一条新的道路，即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第三条道路”吸收了社会民主党经验中的一些要素，如在民主中斗争和为民主而斗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给予争取改革的行动以广泛的重视。这种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联系，正是列宁的观点，正是从一九五六年起，这个观点就被更加明确地恢复了，并且超越了“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把列宁本人的思想和行动中这一主要方面抹煞了。但是，在意大利道路的观点中，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保卫并加强议会制的斗争二者之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战士。

② 指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机构已十分完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应逐一地夺取敌人的阵地和堡垒，进行“阵地战”，而不是象东方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不完善的国家，用进攻性革命方法夺取政权，进行“运动战”。

间的关系，是不同于列宁的有关看法的。

因此，陶里亚蒂才说，“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则是列宁……他们断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机器应当由工人阶级来打碎和摧毁，代之以无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立场今天是否仍然完全有效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肯定可以走不仅在民主场上、而且也利用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时，显然我们是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从而纠正这一立场的某些东西。”^①

第八次代表大会纲领声明中肯定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和民主地形成多数和少数、反对派权利等原则。

正是从列宁所确定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出发，超越了列宁，确定了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和作为资产阶级历史性成果的民主体制二者之间的新关系。工人运动在民主体制内进行的、为争取巩固和发展这些民主体制并同人民和社会建立不同关系的这一斗争，不属于争取民主的工人斗争，而是要使议会民主制变为社会主义的议会民主制。总之，要使民主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就不仅要依靠作为从民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领导力量的社会阶级，而且也要依靠从民主制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体制，使它得到巩固，并同直接民主形式、或是确切些说，同权力下放的、基层的民主形式联系起来。

但是，我们如今所处的情况，同列宁当时所处的情况比较，是一种新的历史情况。我们不再是处于议会民主作为资产阶级领导权成果、因而也就是“民主共和制度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的历史阶段了。^② 我们所处的情况是：资产阶级

① 陶里亚蒂在1956年6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② 见《列宁全集》第25卷，中文版第380页。

愈来愈难于在民主范围内行使自己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则通过反法西斯解放斗争，变为争取民主的斗争的领导力量，正如在以后的年代，工人阶级曾保卫共和国宪法和议会制一样。因此，工人阶级和民主体制、工人阶级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同社会民主党的距离也正体现在如下一点：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民主向另一种类型的民主过渡，不是从议会民主制向苏维埃民主制过渡，而是使争取议会民主制的斗争有了新的阶级标志，议会民主制在一个反对官僚集中制的国家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在这个国家中，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国家权力下放的形式，如大区、地方自治机构等，可以向前发展，而且也正在向前发展。不仅如此，还可以说，通过权力下放的基层民主制形式（如工厂委员会、街道委员会、学校委员会等），人们就走向克服议会议会主义，即是说，走向克服那种赋予脱离社会的团体以代表性的代表委任制，并使公民逐步地对国家和社会领导实行经常性的直接参与。

从上述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是沿着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行动了，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历史上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大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制度。过去早已提出的一个问题得到了新的启示：“这样就产生了劳动阶级在一个并未改变其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的国家中取得权力地位的可能性问题，因而也就是：是否可能为争取从内部逐步改变（国家的）这一性质而斗争。”①

这个疑问重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典型论点。列宁、俄国革命曾给这个疑问以否定的回答。但这个疑问是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对如何领导从内部改变民主国家的阶级性的过程抱有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重新提出来的。因此，也就是说，这个变革过程触及比社会民主党当时考虑的更为广泛、更为复杂

① 约里亚蒂《雅尔塔备忘录》

得多的社会政治关系。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所依靠的是无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加，是生产力的发展使之成为必要的那些改革，是夺取议会多数。而对我们说来，变革过程则是指社会政治力量的新的集结，这一集结因为要进行如下斗争才成为可能：这一斗争把改革的目标同改变政权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统治权力集团的矛盾臻于成熟，分化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为一个劳动阶级能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新的权力集团创造条件。^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新的力量取得国家政权，并使国家组织依然同现在一模一样，而且还要发展国家的民主体制，克服政权的集权、官僚和专制形式。这就意味着对整个国家组织实行变革。

“打碎”国家机器的论点并未抛弃，而是在一个不同的过程中运用这个观点。

陶里亚蒂在《雅尔塔备忘录》中提出的疑问，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建立新的权力集团的前景，今天开始得到肯定的回答，因为旧的权力集团已经垮台了，尽管不是彻底垮台，这个旧集团的特点是：通过中间政府和中左政府形式，以天主教民主党为集团的轴心，在天主教民主党周围，建立一个持久地敌视共产党、把它排除在国家政府领导工作的联盟体系之外。但是，陶里亚蒂所说的新的权力集团还没有成立。然而，能够导致这一目标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因此，在我们的观点中，注意力是放在实际力量对比、群众力量的集结方面。我们认为，在意大利当前形势下，由于意大利所处的国际地位，保守势力有可能被击败，变革经济社会结构和国家组织的过程有可能发展，只要能在变革纲领的周围，把大多数社会政治力量集结起来。根据这种必要性，社会党所提出的“左翼代替”^② 一方面似乎是把紧急状态同过渡二者截然分开，

① 见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指社会党同共产党等左翼党联合执政，代替天民党的统治。

仿佛向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过渡的必要性，并未从当前的危机形势中找到依据；另一方面，看来还是同社会民主党那种要利用议会多数夺取政权的观点有联系。这种立场似乎忘记：议会以及它所支持的政府，首先要从它在全国所代表的实际力量，而不是从议会多数的合法性中找到享有实际权力的可能性。

不否认社会主义民主过渡和民主建设的可能性，就不能对反对派的权利、自由和民主地形成多数和少数的权利提出异议。但是，也应当懂得，各党轮流执政，根据它只不过是在一个实质上原封不动的社会政治制度范围内对一条政治路线提出异议，还是对社会和政权结构本身提出异议，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要切实变革社会，那就应当把自由观点所确认的法律保证，同超出自由民主制以外的观念联结在一起。这就是说，工人运动在尊重组织反对派的权利、尊重保证的同时，应善于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有能力持久存在下去并对现实施加影响的联盟体系，要依靠广泛民主支持来确保自己，并在民主中行动。

我已经提到今天同列宁时期比较，对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提法有历史的不同。我认为，列宁有能力抓住这一问题在他的国家中据以提出的独特方式、典型的俄国方式，这种能力是列宁天才的一个最高表现，是告诉我们应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来思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融合在指导行动之中的一个内容最丰富的教导。我认为，可以说，列宁是在最不能重复的问题上给了我们最多的教益。当时，他是通过对沙皇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进行调查来抓住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在俄国据以提出的特殊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是马克思确定的规律。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向我们介绍的、被列宁称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从高度的科学抽象中概括出来的模式。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上升到资本主义俄国发展的特殊方式。列宁在他一八九〇年时期的研究当中，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同俄

国当时存在的土地关系和农村公社发生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列宁从中得到结论：工人阶级的首要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斗争。但列宁也从这个问题上，从地主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三者的关系，从工业资本主义和农村经济的关系，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是在沙皇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得到了沙皇的帮助），得出这样的信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不能彻底发展的，因此，也就不能为工人运动提供广泛而先进的斗争场地。因此，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和工人阶级为发展民主革命而实行领导权，就不谋而合了。同社会民主党据以开展自己活动的，在欧洲历史地确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比较，这是一种民主和无产阶级之间、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崭新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为俄国指出这种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关系，对在意大利历史条件下考虑这种关系的人们来说，是有特殊令人感兴趣的东西的。

葛兰西的工人阶级领导权思想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过程中提出这种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关系的看法，使他也以新的方式提出同农民关系问题。俄国资产阶级是无力同农民取得联系、把农业经济和农村的社会组织放到地主贵族所确定的范围之外的。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主要作用也就体现在这里，体现在有能力去农村领导真正的民主革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这个革命是在工人阶级领导权之下进行的，正因为有这个领导权，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就以完全独特的方式，超出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以外。这时，人们就可以明白，列宁何以从最初几年就强调“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在法

国，在法国不同于在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在我国”。^①可见，这种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式，在列宁身上，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这时，人们就可以理解，列宁是怎样才能断定如下一点的，即：“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②

葛兰西正是从列宁对工人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问题采取的立场，得出他的领导权思想，而且这个思想在三十年代共产国际的有关工人阶级在诸如西班牙、日本这些提出民主革命目标的国家中的作用的事件中是广泛采用的。但是，葛兰西把领导权思想特别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列宁联系起来，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说服、取得支持占居优势。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葛兰西考虑的是西方，西方同东方不一样，在西方，国家并不是一切，文明社会也不是“首屈一指和固定不变”的，在国家和文明社会之间要有“正确的平衡”。葛兰西虽然从列宁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思想出发，实际上则是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新战略的需要。

应当指出，葛兰西提出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这个领导权是由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但需要由整个工人阶级在其所有组织机构中加以贯彻（如工厂委员会，葛兰西从未否定工厂委员会的经验）。出发点不是什么领导权理论，而是对历史地形成各种领导权的具体分析，特别是要考虑一下意大利过去怎样以及为什么在温和派的领导权之下建立统一国家。根据这一点，葛兰西对意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87—188页。

② 同上书，第187页。

大利民主革命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并历史地具体地确定了工人阶级的特殊任务，特别是在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悲地未能解决的南方问题上。在南方问题上，过去建立了资产阶级领导权，现在则应当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

我认为，无论是列宁还是葛兰西，都没有把领导权思想同多元化思想联系起来。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不想停留在天主教社会学和美国社会学固有的多元化理论范畴之内，不想用多元化来为现有经济社会制度辩护，掩盖这个制度内行使的领导权，或勿宁说是掩盖这个制度内十分集中的经济力量所行使的权力，如果我们不想使多元化掩盖当前经济制度对意大利社会化的多元化所作的根本限制，而希望它始终是民主的多元化，那么就应当规定要对经济政治结构实行深刻变革，使多元化成为真正的多元化。我们看不出，除工人阶级以外，还有哪个力量能在我国领导这个过程（应当指出，按葛兰西的观点，领导权意味着政治文化领导、争取民意支持）。

关于列宁有关党的学说

回过头来谈列宁。为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个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得到彻底发展，需要有一个自觉的强大领导因素，需要有引导和控制自发过程的巨大能力（俄国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资产阶级的发展是有限的，资产阶级是在沙皇辖治下发展起来的，而大批落后农民则占居优势）。总之，需要有主观能动性发挥强大作用。这一点对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适用的，对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就更加适用。鉴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究竟哪一种革命是成熟了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对这一点没有怀疑。在革命前夕，列宁给革命指出的是民主目标，而且仅仅是民主目标。如果说，一九一七年

的革命开始以后，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当中第一个和独一无二地断言：二月开始的革命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和告终，不转到下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上去，二月革命本身提出的民主目标就无法达到，这肯定不是由于对俄国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看法发生变化，而是由于一种政治见解所致，即认为：在苏维埃内部占居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要继续战争，就继续站在英法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一边，从而无力解决俄国问题。其中首要的根本问题就是给农民以土地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同外国金融资本决裂，因而就必须实现反对帝国主义性质的和平。

既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英法帝国主义有联系，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在工农民主专政范围内继续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结盟，而是应当转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上去。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性质的和平，给农民以土地。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政治估计就压倒了经济关系的估计（后一种估计打破了第二国际固有的那种经济决定论和进化论思想的观点和方法）。但如果列宁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平庸、公式化的解释，那么对马克思也作了大胆革新。这种革新就表现在使主观能动作用、党的作用超出了马克思所能预见的界限以外。对政治主动性的认识，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

这就是列宁的雅各宾主义。但究竟是什么样的雅各宾主义呢？不是作为抽象的理论主义的雅各宾主义，而是作为彻底的革命意志的雅各宾主义，它把革命的主观意识对历史过程的作用提到最高度。这种主观能动性不是无视客观因素的，因为列宁确实十分清楚，立即着手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才为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了社会目标，即：给农民以土地，把托拉斯和

银行改归国有，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这些都是民主目标，它们打击一些决定性部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通过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倒是有过抽象理性主义意义上的雅各宾主义因素，而这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就被列宁发现并给予批评。）

只有把列宁关于党的观念放到这个历史现实中去，把这个观念同上述任务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估价列宁的党的观念。只有了解革命主体的统一意志和组织性是对俄国一盘散沙的状况的必要回答，并从中找出原因，才能正确地估计这个观念。罗莎·卢森堡曾对列宁的党的观念提出过异议，她是从另一种现实、即德国的现实出发的，这些异议的错误在于对自发性有某种纵容。

必须反对广泛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列宁关于党的观念仅仅放到一份文件中去。即使《怎么办？》一书是列宁思想的最高表现，列宁实际上也很快就纠正了这份文件中的某些过激论点，列宁的党的观念是随形势发展而逐渐演进的。

列宁在一九〇七年指出：“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把这篇文章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我们党在发展中早已度过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①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状况呢？指的是极为艰巨的地下状态，是在引导自发过程方面、在使工人阶级不致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和一般说在完成政治任务过程中处于屈从资产阶级的地位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因此，该文极其有力地指出要反对自发主义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运动，贬低了自发性的价值。

列宁承认上述一点，他在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时曾说，如果经济主义者把棍子的一头弄弯，他就要从另一头把棍子扳直。这样，在谈到《怎么办？》一书中有关“职业

^① 见《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版第84页。

革命家的党”才是理想的党这一论点时，列宁指出：这种“夸大其词”对于当时在地下状态成立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党是必要的。“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说明这一思想”，那么，人们就不会理解“职业革命家”的必要性。^①

但我们还是谈一下《怎么办？》一书的中心内容吧。书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工人斗争的自发局限性，这些工人斗争仍然处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内，只限于提出一些因发起这些斗争的劳动者的处境密切相关的经济要求。所提出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工人阶级摆脱从属资产阶级、听任资产阶级去进行政治斗争的立场；如何使工人运动摆脱帮会主义的局限性，超出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以外，把它放到“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②工人如何才能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如何才能懂得自己不再仅仅是某个工种的一分子，而首先是一个有责任承担起领导和变革社会这一政治使命的社会阶级的一分子呢？列宁赋予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他回答问题时指出的方法。知识分子是首先制订革命理论的，这是事实。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切社会关系要有全面看法的阶级觉悟不是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而是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的，那么党就绝不是在这个工人阶级以外的，而是作为工人阶级最有觉悟的部分和有机部分，成为革命理论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要素。这样，就不存在什么知识分子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问题，而是要求知识分子同工人在党内水乳交融，抛弃任何“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态度。另外，列宁关于来自“外部”的革命理论的说法，当时是为了论战而使用的，因而对党的诞生可以适

① 见《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版第85页。

② 《列宁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351页。

用，但当党已经成立时，这种说法就肯定不能适用了。实际上，列宁后来曾写道“正确的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密切联系真正群众运动和真正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①

如果说，党在列宁看来，是置身于实践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而且它不是专横地置身于这个过程，而是认识到这个过程的客观情况，那么就不难明白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重新估价主观意识，要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大贡献同葛兰西对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唯物论所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但由此也可以明白：一个为自己提出领导工人阶级夺取领导权的工人阶级的党，如果在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社会中、在国家的民主体制和文明社会的组织当中展开活动，就应当是一个和列宁设想的党不大相同的党。我们通过葛兰西，但也通过对葛兰西的大胆革新，建立了陶里亚蒂的“新型党”，这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这种群众性是列宁和葛兰西都拒绝考虑的。之所以是群众性的党，因为它同社会具有更为广泛得多的、无所不包的关系，并且有完全有组织的民主生活。但是，新型党保持、甚至突出列宁关于党的观念中的那种革命主观意识的作用。革命主观意识不是要记录历史过程，而是要对这个过程施加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造成这个过程。

在结束上述简要的看法时，我觉得还应提出一点：应当避免总结列宁究竟有哪些东西是活着的，哪些则已经是死了的。这种做法总是虚假的文字游戏。就列宁这个问题来说，这样做就等于以另一种方式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如果考虑列宁的全部思想和行动，把它同历史情况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就可以从列宁那里学到东西。应当根据列宁当时面临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所不得不做出的回答来考虑列宁。现在应做的是：继续创立我们的政治观点，创立我们的革命理论和文化，把我们的文化据以产生的丰富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版第7页。

多采的全部经验批判地、系统地加以融会贯通。我们的思想不能是凭着兴趣爱好拾拣别人的牙慧。这样做，就只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中的东西，而不去选择别人的东西，只选择列宁的东西，而不去选择别人的东西。对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人也这样做。问题是要把各种各样的金属加以熔化（请原谅我的譬喻不那么恰当），以便使新的熔合物能变得紧密坚固。问题在于要继续直接根据我们面临的情况，批判地创立包含着长期而丰富的经验的我们自己的思想。

（原载《马克思主义评论》1978年第5期。

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12期）

欧洲共产主义现状： 它的政治与理论的主要特征^①

〔西班牙〕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我首先谈这个题目的政治含义，其次谈它的历史渊源，第三谈几个理论问题，第四谈它的国际方面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呢？据我看，它是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新流派。共产主义运动已不存在铁板一块的情况，出现了另外一些流派，例如中国派。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共产主义就是这种流派之一。它不仅是一种思潮，而且已经成为欧洲的一股政治力量，对本大陆西部各国的命运起着一定的影响。其次，它是有关发达的工业国的社会改革的一种新战略，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一种新看法。次共主张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在充分尊重政治自由、人权、工会自由、宗教信仰与文化自由等自由权利的情况下，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这种改革还应通过普选来完成。这显然意味着如果一个要搞社会主义的联合政府在选举中失利，那它就得下台。据我看，这种事情的確是很可能发生的；很可能出现困难局面，这个要搞社会主义的联合政府也很可能犯错误。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官方的思想。我们主张多元论，包括多党参与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的思想。例如，就西班牙而言，据我看，没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信天

① 这篇论文，系作者于1978年5月22日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一次有关欧洲共产主义的讨论会上的发言。

主教的党派团体的合作，要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多元的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将继续下去，各党仍可自由活动，各种思想意识仍可自由争鸣。

我们所设想的经济改革，将建立在公营成分与主要由中小企业构成的私营成分并存的基础上。这不是竞选策略，因为从经济上说，需要有这类中小企业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没有这种私营企业，就不能有效地提供某些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因此而降低。因此，我们主张这种共存。但是，社会主义改造要取消一小撮控制银行与金融系统的寡头对经济的控制。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扩大和发展，民主不独要在政治领域实行，而且要扩展到社会与经济生活领域。我们认为，实行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公民们通过选举和议会，在他们的工作单位与居住地区，在城镇事务与国家事务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要实在得多。

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保证经常实行民主，而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制度在不少情况下采取过对人民实行恐怖镇压的法西斯形式。人们可以说，法西斯形式是例外情况；但是，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实际有趋向于集中，趋向于扩大上层官僚机构与政府部门的权力而缩小民选机构的权力的倾向。我们所追求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将更加真正地实行民主，国家政权将比较分散，而且除了采取代议制民主、选举、议会等形式之外，还要在企业、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等等之内推广直接民主的形式，使得每个公民能日益直接参与作出影响他自己生活的决定。我们追求着一种可以称之为自治的生活，寻找着自治的形式。

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共产主义究竟是否存在。即令是很重要的欧共党的某些党员，例如阿门多拉，都说没有什么欧洲共产主义而只有民族现象，也就是说只有西共、意共、法共的立场，而没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既然法国、意大利、

日本或西班牙的政治形势迥然不同，那么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所有欧共党执行一样的政策，那就错了。这些党之所以彼此不同，不仅由于它们所面临的形势不同，而且还由于它们在思想方面也不一样。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一个新现象，而既然出现了新现象，那它就得有个新名称。这种普遍的现象是，这些党，还有其他一些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过去总认为必须遵循俄国的榜样，只有暴力革命才是可行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唯一可能采取的国家形式。现在，它们放弃了基于这种思想而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教条的理解，转而奉行我在上面阐述过的那种思想。因此，西欧各主要的党，还有日本党，彼此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有共同的思想，因为日本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而日共就是扎根于这个社会中间的。

我现在转到谈谈这个题目的历史方面的某些问题。欧洲共产主义来自何处，它又是怎么出现了的呢？把欧洲共产主义说成似乎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突然发现了民主的好处，那是不对的。让我们来简略地回顾一下建立共产党的历史原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社会党国际的各党之间的国际联系中断了。当时，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头一次在俄国实现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这个榜样对当时欧洲的某些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与革命团体，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但是，必须强调指出，俄国革命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唯一的一次革命。德国也发生了革命。德国皇帝被打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镇压了斯巴达克同盟的起义。在这段时期，特别是按照罗莎·卢森堡的想法，德国有可能发生一种不同于俄国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镇压了这一革命，它宁愿建立魏玛共和国，从而带来了已为我们所熟知的灾难性的后果。那段时期的一切冲突，都有助于使工人运动、青年等的最激进部分倾向于追随俄国的榜样。俄国榜样实质上并不能沿用来对西方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落后国家的非常特殊的基础之上的。不久，由于出现了蜕化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变成了宗派主义的机构。在这些机构中，真理只能从上面来，莫斯科成了类似麦加的圣地，风行铁板一块的纪律，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了教条，丧失了它作为科学方法的基本特征。当时，苏联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它们对苏联首先进行军事干涉，然后进行经济封锁，这种客观形势便利并加速了上述过程的发展。被围困的堡垒的心理状态促进了斯大林主义的蜕化。尽管如此，西方要执行一项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与由斯大林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教条之间，几乎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矛盾。我们现在不能深入研讨这种矛盾的历史，但是可以提一提一个名字，葛兰西的名字，作为理论发展的范例。他虽然处于这一发展过程当中，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西欧的现实作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以后，苏联对付希特勒的威胁的外交方面的利益，显然是采取人民阵线政策的幕后原因。但是，工人和人民群众也强烈要求达成反法西斯的团结。在这段时期中，某些共产党表达了群众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支持这种要求的旗手。这是共产国际历史上一个饶有兴趣的时代，我在此想稍许离题，来就英国外交大臣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剑桥发表的一篇讲演说几句话。我想，对历史具有一般兴趣的人士，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等，对这类事情进行严肃的辩论，那是很有好处的；可是，要进行严肃的辩论，那就不能把历史过分简单化，尤其不能窜改历史。戴维·欧文博士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人民阵线的政策：

“我们倒要问问，共产党对民主和投票箱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总书记在提出人民阵线的政策时说：‘同志们，你们想必记得攻克特洛伊城的古老故事……我们革命工人，应该采用同样的策略而不要

有所顾忌。”欧文博士接下去还说，“欧洲共产主义究竟是为了实行独裁和极权主义而造出的一匹当代的特洛伊木马呢，还是有了实质性的改变……”^①

唔，我认为谈历史的时候，摘引某些原话是一椿十分重要的事情，而这里摘引季米特洛夫的话却摘引错了（我不是要在这里维护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的这段话，所指的是一些法西斯国家的群众团体，指的是“希特勒青年团”，“Kraft durch Freude”（“欢乐的力量”团），意大利的Dopolavoro（工人俱乐部），和他们的合作团体与工会。他这才谈到特洛伊木马，说“革命工人应该采取同样的策略而不要有所顾忌”。然后，在欧文博士的讲话稿里断了句加上了引号的地方，季米特洛夫还接着说，“……要以我们的法西斯敌人用来对付我们的同样策略来对付他们”。^②这就是说，欧文的引语是不确切的。季米特洛夫说的是打入法西斯组织内部的策略，就象我们西班牙人不得不在佛朗哥的官方工会等组织里干的那种事情。这同民主或投票箱的问题是不相干的。

一般来说，我认为不能以这种摩尼教的方式来理解人民阵线政策。人们之所以对人民阵线政策感兴趣，是因为这个政策开始使得某些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立场发生了问题。就西班牙来说，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人士和资产阶级党派，在政府里进行了合作，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今天依然从这段经历中找出用以制定我们的政策的思想。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掩盖我们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比如迫害托洛茨基分子之类。但是，不能把这件事写下来就完事，而要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研究。

① 戴维·欧文博士1977年11月18日在剑桥大学学生俱乐部纪念休·安德森集会上的讲话。

② 《季米特洛夫选集》（西班牙文）索非亚，1977年版，第10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某些共产党参加了建立在反对希特勒对西欧的占领的基础上的联合政府，它们又开始有了新颖的思想。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把这个过程打断了，因为情报局之所以建立，就是为了要制止这种新颖思想的出现，或者说这至少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以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一召开，神话便结束了，某些共产党从此就开始自己思想，并在某些问题上同苏共意见不一致。我们西班牙人过不久不仅看出了把错误都归之于“个人迷信”的论点的不彻底，而且我要说还看出了这个论点的错误。不久，人们就看清楚了（我想陶里亚蒂是最先强调这一点的），问题不是出在“个人迷信”上，而是苏联的整个政治制度乃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反民主的独裁制度，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里，他们把镇压作为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斯大林主义的基础，就是对国家的迷信，利用国家来作为对居民进行官僚主义的压制的机构。这种认识促使各党程度不同地进行自我批评，并精心搞出来一套新的想法。

如果要问：“欧洲共产主义是什么时候起步的？”我认为是一九六八年。一九六八年，至少有三件事情凑到一起了。首先，巴黎的五月风暴戳穿了“新资本主义”能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幻想。它标志着西方社会中新的革命因素的出现，说明需要对各国共产党直到当时还不能理解，乃至没有认识的这些问题，加以新鲜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其次，出现了布拉格之春，它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新的关系的探索。举例来说，我们和西欧其他的共产党人，就曾经满怀热情地关注这次经历。第三件事情就是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提出：各国共产党需要独立自主，不受苏联支配，需要对苏联这一重大的政治行动进行谴责。这件事情对广大的共产党人来说，当然是一次很大的震动；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虽然遭受了灾难，这件事情却也帮助了各国共产党人，使他们得以克服对苏联抱有的

根深蒂固而盲目的敬佩之情。

这就是我们要摒弃苏联模式，要对苏联经验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的起因，是我们认为西方各党应该提出另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与建议，而不沿袭苏联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心思想的由来。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改变并不是由某些理论家或党的领导人作出的，这是成千成万在初期阶段深受苏联模式影响，认为它是唯一可遵循的榜样的人在思想上的改变。欧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由许多国家里大批的人不同程度地参与的过程。例如，在我们党于马德里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有成千成万的人参与了讨论、投票等事项。这是一场有许许多多的人参与在态度上的真正改变。

现在，我们可以从历史方面转到谈谈理论问题了。人们有时提问，欧洲共产主义是不是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勃兰特总理在评论欧洲共产主义时，也问他们为什么不改变名称，自称社会党人呢？欧共是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吗？据我们看，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因为几近一百年之内，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曾经执政，有时执政时间很长，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改变，也没有哪块地方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是，我们不希望这么继续下去。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在管理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则提供了取代他们这种态度的现实的出路。老的共产主义，如果准许我用这样的术语的话，是一种思想上的出路，而不是现实的出路。特别是我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能为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工人运动分裂时还没有出现的某些新问题提供答案。我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能提供克服一九一九年的分裂、创造各个方面可以共同活动的条件的途径。在这种多元的条件下，人人都能保持他自己的面貌，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朝西欧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造的目标前进。

在过去不存在而现在对欧洲共产主义至关重要的新问题当中，我要着重指出三个问题。首先，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今天客观上同另外的时期不同了。社会的结构已经改变了。今天，在工业国内，工资收入者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技师、科学家、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发生了质变。他们现在一般靠工资为生，不仅在经济上而且由于从事创造性工作而同垄断资本有矛盾（当然经济矛盾也是存在的）。因此，他们今天日益成为同工人阶级一道朝社会主义前进的积极的力量。因此，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认为，朝社会主义前进的战略性的联盟，已经不是列宁所规定的工农联盟了；这个联盟我们称之为劳动力量与文化力量联盟，它基本上包括工人、农民、科技与专业的知识分子。此外，中小企业现在也同垄断资本的统治发生了矛盾。甚至公私企业的行政人员，也日益同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的态度不一致。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人赞同社会主义抉择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了。

今天，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也与以往不同了。生产力的增长提出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因此，今天说朝社会主义前进，就不只是说要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是还要解决诸如妇女解放之类的问题，要使妇女在工作、文化、社会生活、家庭、性生活等方面享有真正的平等。它应该解决使文化与教育在社会上享有新的地位的问题，以及生态平衡与城市规划等问题。一句话，新的社会需要产生了，随之而来的新的群众运动，现在也同工人运动一样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客观需要。由此我们还可以断定，在民主的条件下，可以把人们争取过来，也就是说，可以为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创造出占据思想优势的广大领域。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问题。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批评，特别是受到了曼德尔等人的批评。他们的意见大致

是，民主的进军一定会为国家机器所破坏。可是，要彻底弄懂这个问题，那就得看看马克思的国家观与列宁的国家观是否有重大的不同之处。当然，他们的看法有共同的方面，他们都认为国家是统治机构，是我青年时代曾在伦敦随之学习的哈罗德·拉斯基称之为最高强制权力的东西。列宁只看到了国家的这一方面，但马克思却有着完备得多的国家理论，还有葛兰西也是如此，他们还考虑到了国家所具有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仲裁任务。列宁的观点导致采取打碎国家机器并在国家机器之外建立新政权的战略，这也就是双重政权的理论，要打碎一个政权机构，另建一个新的政权机构。但是，欧洲共产主义面临的是不同的现实。今天的国家已经同原来的国家不一样了；它干预经济生活，它的内部有成千成万的文职人员，他们是技师、科学家和工人，倾向于建立自己的工会。甚至对军队问题也得重新考虑；我们应该看到，军队在什么意义上越来越采取科学的态度了，军队同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又是什么关系。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这种建立在纪律基础上的暴力工具对民主的危险性。但是，我们认为，列宁的理论不适用于拿来去考虑这些新倾向，理解这种新的现实。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和葛兰西那里去。我们研究他们的著作，就会看到有可能改造国家，使国家民主化，并能在国家外部与内部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要朝社会主义前进，就得同时努力使国家的最民主的部分与民选机构担当起决定性的任务，使保卫自由权利和争取分散国家权力的斗争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党的问题。我们西班牙人亲历了共产党的多次变化。首先，我们曾经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对我们来说，获得合法地位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因为我们党成立后的五十八年中，约有五十年是非法的（甚至在佛朗哥独裁之前，就有过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以及共和国的一段反动时期）。因此，我们真正是在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在试图建立一个新型的

党，一个群众性的党，一个能够使人信服的民主的党，因而也就能够成为在向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进军中的主角——同其他主角一道前进的一个主角。我要着重强调我们的多元论的立场；为此我们就需要有充分民主的党内生活。还在我们党取得合法地位整整一年之前，我们党就废除了党的基层小组的制度。我们党上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都以选票表达出来，而讨论也是公开的。党内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潮流。我们今天完成了一件就西班牙情况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党内有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这已经成了正常现象，甚至党的领导机构中，执行委员会中，也有知名的天主教人士。我本人不是天主教徒，但是天主教徒象我现在一样，有权代表西班牙共产党讲话。我们通过代表大会决议，保留了民主集中制，就是说全党必须遵守经过多数通过的决议，经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构代表党，以党的名义发言。（有时候我们觉得，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仿佛是莫里哀的喜剧中儒尔丹先生^①的情况似的，他说话时满口散文而不自觉。很多政党采用民主集中制，或者甚至不那么民主的集中制而不提它。）有一个关于派别的问题。我们又是通过代表大会决议决定，成立派别不是开展思想交锋与辩论的积极办法、不是发扬党内民主的积极办法，因为有派别就使讨论牵涉到一帮帮的人。我们容许在报刊上自由讨论，但不容许成立派别，因为成立派别就是党分裂成几个党的开始，我们认为这不利于党内民主生活。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消除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关于这一点我们作过一次很有趣的修正。我们原来在党纲草案里写上西班牙共产党已经清除了斯大林主义，但经过修正之后，我们说我们已经基本上清除了斯大林主义，今后还要继续清除。很清楚，人们是不能一朝一夕就改变事物的。我们作出了决定：我们党不是一个列宁主

① 莫里哀的喜剧《贵人迷》中的主角。这个一心想当封建贵人的资产者找人代他写封情书，才悟出自己说的表示爱情的话就是散文。——译者。

义的党，列宁主义不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我们决定把我们党规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革命的党。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尊敬列宁，正象我们非常尊敬其他例如卢森堡、托洛茨基、毛、葛兰西等革命家一样。但是，我们的战略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战略。列宁的理论大都受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情况了。因此，我们在提纲中说，我们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反官僚主义的精神实质。西班牙共产党拒绝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教条主义的解释，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非教条的性质。西班牙共产党将不断作出努力来加强理论修养，以便跟得上社会的客观的变化，吸收科学的新发展和革命实践的经验，并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现在，我来谈谈共产党当前在西班牙所起的作用。我想，大家一致认为，它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一九七七年六月大选中，我们只得了百分之九点五的选票。当时，我们刚刚取得合法地位，还受到四十年来把我们描绘成罪犯，或者跟罪犯差不离的反共宣传的严重影响。我个人在农业省莱昂省竞选；我得说，在某些农村里，最使人们惊奇的是发现我居然是个正常的人。这是头一件使人感到惊奇的事。以后，在阿斯图里亚斯和阿利坎特这两个重要省份的部分选举中，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我们党是唯一增加了选票的党：我们在阿斯图里亚斯从六万票增到了八百七千票，在阿利坎特得了七千票。与此同时，社会党丧失了选票，使人感到惊奇的是，社会党虽然是反对党，但仍丧失了一半以上的选票。我们得票的份额，在阿斯图里亚斯升到了百分之二十三，在阿利坎特升到了百分之十六。当然，弃权的比率很高，这使得事情复杂化；我们也受了影响。尽管如此，共产党在弃权比率很高的时期增加了选票，那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已经举行了比过去正常得多的自由选举，我们在选举中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我们的力量。西班牙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项民主协商的政策，要集中

各方意见以便在广泛协议的基础上通过一部宪法；我们认为，共产党在我的报告所勾画的思想的基础上，将能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

最后，我就某些国际问题说几句话。我们赞成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我们认为防务一体化的问题也应在考虑之列。我们认为，为了掌握今天仍处于大垄断集团控制之下的欧洲，西欧民主的左翼工人运动应该团结起来。我们支持一个联合的西欧，它既不从属于苏联也不从属于美国，但又同这两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它同中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合作并保持良好关系（我们认为，第三世界问题是未来的国际关系中主要问题之一）。这个联合的欧洲能够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独立因素，因而有助于改变两极化的形势，改变目前由两个超级大国决定许多事务而可能造成非常危险的冲突的局面的形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共产主义作出了明确的政治选择：它要的是一个超乎目前分裂成两个军事集团的欧洲。

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者由于有两个原因而受到苏联的攻击：第一，由于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态度，我们是反对维持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现状的。第二，我们之所以受到攻击，还由于我们代表了一种我认为可能无愧于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或者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轮廓。他们进行攻击，也许是由于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波及于西欧之外的缘故。我们也受到美国的攻击，特别表现在卡特政府宣称反对欧共党可能参加政府的态度上。我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美帝国主义的老看法，它总自以为有权利干涉欧洲的事务；但是，所有左翼和民主的力量应该拒不认可这样的一种局面。

我们这么受到攻击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我们感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工会运动、宗教界、青年组织等，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趣在与日俱增。当前欧洲的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的

危机；这也是政治和思想的危机。欧洲共产主义能成为西欧革新的因素之一。当前的危机的解决办法，不可能是回到以前的局面。欧洲共产主义所提供的思想和建议，有助于开辟道路，通往更自由、更具有社会正义的未来制度。

（译自《欧洲共产主义探索》，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81年版里查德·金德斯利编。吴名祺译）

欧洲共产主义的特征

[法]让·卡纳帕

让·卡纳帕，法共政治局委员，法共中央对外关系负责人。本文系作者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对全国政治学基金会国际研究中心《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组研究人员的讲话。文章扼要地阐述了法共对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概念的理解并概括指出其基本特征。现摘译如下：

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提法正得到人们的赞许，这表明西方共产党的作用、行动和种种建议最近几年引起了人们特殊的兴趣。同时，这个提法明显的不准确，反映了某些观察家在确切评价这些党在政策和思想方面出现的新情况遇到了困难。

大家知道，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并不来源于我们，而是一些新闻记者创造的，试图借以形象地报导总的现实，更明确地说，即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共产党的立场和当前斗争的现实。这个现实还没有完成、结束和停止。它必定在将来会更加明确，更加充实。

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呢？姑且作如下概述：尽管它们各自国情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西欧、日本，甚至美洲大陆（墨西哥）某些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认为，它们共同面临着一些要作出一致回答的基本问题，并要确立一个深深打上同样关心民主的印记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前景。

让我们更清楚地勾画出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特征，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欧洲共产主义模式”正如别的模式一样，并不是

本来就存在着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提出什么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相反，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一系列共产党都已作出了各种努力，制定一些独特的，创造性的政策，以切合本国的情况和需要。正是这些努力导致了创造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在我看来，这个词仅仅表明这些独自的努力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一场全面、持久的危机

一、象西方世界其他国家那样，法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持久的危机。

这场危机沉重地打击着全体劳动者，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这既不是一时的危机，也不是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也不是共产党人习惯上称之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简单加剧，而是一场特殊的危机，全面的危机。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无一例外，涉及到现阶段资本主义——垄断与国家合为一体的统治机构——社会结构本身。对于由此而提出的种种问题，大资产阶级的一切政党不能作出持久有力的解决。它们不能使国家摆脱危机，因为这场危机的根源，正是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杠杆并以私利为唯一原则来利用这个杠杆的一小撮寡头势力，对整个国家生活实行的霸权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变革社会的问题就伴随着新的力量的产生提了出来。

作为斗争中心的民主

二、唯有深刻的民主改革才是这场危机的积极出路，因为它能使国家自己掌握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保证劳动者参与国家各级事务（包括政府）的领导。民主已成为为争取社会变革而进行

的阶级搏斗与革命斗争的主要阵地。

社会民主：必须坚决地反对当前社会的种种不平等。首先要反对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不仅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反而要承受越来越沉重的牺牲这种根本的不平等。当然，也要消除由此而产生的其它不平等：在享受文化与娱乐上的不平等，建立在性别或年龄上的不平等，学校隔离，等等。

经济民主：重大的经济资料不得再为少数特权者所私有，而要为社会本身所占有（形式可以多样：国有化，市镇或地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等等）。同时，劳动者必须参与经济决定，尤其是参与企业领导和制定计划。

政治民主：摆在日程上的问题是取得新的自由和新的权利，劳动者据此可以发展他们的斗争，改变政治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他们自身，迫使他们的敌人大资产阶级后退和失败。

我们认为，即使反动派被击败，发扬民主也不应中断，而应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继续下去。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将具有深刻的民主性，这不仅因为对于劳动者来说，它意味着剥削的结束，而且还因为它将保证、发扬和扩大我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一切自由。这就是思想和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公民在国内外通行自由，宗教自由，罢工权，尊重普选（它具有民主轮流执政的可能性），尊重一切政党存在和活动权，尊重工会独立和自由活动权，尊重司法独立，拒绝任何官方哲学，扩大劳动者在企业中的权利。我们曾经在我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我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活——应当捍卫、扩大和发展我国人民经过顽强斗争所获得的民主成果。

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不能反映我们所争取的社会主义法国政权的现实，所以我们党决定不再把它列入我们的目标之中。

这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一条和平的道路。我们并不因此而指望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人物突然让位。为了争取民主变革的胜利，为了使人们尊重普选的裁决，必须进行斗争，进行一系列坚韧不拔的群众斗争。

民主变革、社会主义本身只能是大多数人的，广泛多数的人民运动的事业。这中间要通过一项广泛的人民联盟的政策来实现。这个联盟要把各种不同状况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思想运动、思想流派考虑在内。

当然，实行这种政策要认真考虑各国的现实。这样说甚至也还不够分量：因为可以说这些政策是从各国的现实中产生的。因此，这些政策具有明显的多样性。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

三、欧洲共产主义的第三个特征：与社会主义国家迄今沿用的经验的区别。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并对世界范围反帝斗争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尽管如此，事实上，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的概念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民主的概念是有分歧的。其所以出现这种分歧，是由于我们有时看到这些国家对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损害，过于频繁地用新闻检查和镇压来取代思想斗争，劳动者和公民不能充分民主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领导。在我们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成分。人们可能会对我们说，归根结蒂，这种分歧涉及到我们对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的理解。产生分歧的事实越多，就越会提出这个问题。

探索独特的道路就会象人们到处听到的那样一定要出现“分裂”吗？我们不这样认为。不管怎样，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

我们不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理解为宗教关系。我们只是认为，这种探索反映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多样性的愿望，意志。况且这种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了，因为在中国和古巴，在贝尔格莱德和布拉格，社会主义的现实确实是不同的。

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就证实和突出了这种多样性。它赋予欧洲共产主义以特定的因素，其根源就在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民主传统和民主成果以及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斗争经验。这个经验包含了从过去——不管是每个党自己的过去还是别的党的过去——得出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和罪恶就属于这种过去。

我们确信，这种多样性只会丰富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

今日共产主义运动

四、欧洲共产主义最后一个特征就在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也是对国际主义的新的探讨。

大家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十月革命之后，各国共产党组成为一个国际。这个组织的功绩是打破了阶级合作，促进了革命政党在全世界的发展。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国际采取了集中统一的组织形式。通过的一些决定对于被视为各国“支部”的成员党具有约束力。

国际的解散（一九四三年）意味着共产党人的这种形式的国际联合丧失了它存在的理由。它证实了从前就已经出现了的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党切实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是它发展、壮大和成功的一个条件。

可是，从一九四七年起，共产党情报局又窃取了特权，继续维持共产国际的集中观念，从而推迟了这一演变。

此外，国际的活动，后来共产党情报局直至一九五六年解散为止的活动，无不打上苏共的实践和观念的烙印，因为这个党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尔后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大国。这一切都发生在以斯大林为领导的时代，带来了斯大林主义所引起的一切后果。

后来所发生的变化促使各个党走向一种新型的关系，越来越被理解为自由与自愿的合作，严格尊重每个党的主权。

诚然，在后来的二十年期间，各个党还是竭力——特别是通过国际会议——来确定一些共同的目标，制定一条共同的总路线。柏林会议就是这些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表明了各国共产党为和平和裁军具体采取行动的共同意志，同时，也表现出各个党立场的重大不同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这种会晤形式不再适应当前的要求了。

所以，我们努力寻求党与党之间关系的更生动的，更有效的形式，其目标在我们看来应当是相互承认所遵循的经 验，为和平，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进行合作，相互声援。

这种相互声援是我们斗争的经常措施。为此，我们宁愿要国际主义团结这个提法而不愿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提法。许多党把无条件地支持苏共的政策说成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这样的定义显然含糊不清，我们不能接受。此外，在我们看来，正确的作法是不要用字面狭隘的术语来限制反帝联盟和新的团结的可能性。

共产主义运动显然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后来曾进行过公开的辩论。有些党对此感到忧虑。相反，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为了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既然存在分歧，就必须承认。分歧的存在不应当妨碍正常关系。相反地，我们认为只有辩论清楚才可能有良好的合作。辩论——只要不是攻讦谩骂和革出教门，而是以负责精神进行——只会使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更卓有

成效。

※ ※ ※

欧洲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中心（也不是地区性的中心）。党与党之间这种形式的关系无可挽回地过时了。今天，每个党完全可以自主地进行自己的政治选择。我们注意到，某些党的方针的一致是来源于平等的，但又是完全自主的思考。

因此，欧洲共产主义不会成为什么论坛，经常对别的党指手划脚。这同我们党所恪守的每个党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限制搞欧洲共产主义那几个党在国际上相互声援的范围。

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共同的政治路线。每个党都深深扎根于本国的现实，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情况出发确定自己的战略。这就很自然地在它们之间会出现差别，甚至出现公认的和进行辩论的分歧。

总之，欧洲共产主义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变种。社会民主党丝毫不触动大资本的统治，不给危机提供真正的解决办法，旨在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欧洲共产主义的方案则完全相反，它确定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和革命的道路，通过集体占有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通过建立工人阶级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人民政权，通过空前地发扬民主达到激进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它无论如何不会混同于改良主义，混同于阶级合作的政策。

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在我们看来，今天已经具有积极的、进攻性的意义：它反映了劳动者渴望自由的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这个词才被采用了。

（摘译自法国《国际研究》第88—89期
吕殿祥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昨天和今天

〔法〕让·卡纳帕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改变着世界面貌的时代，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人们站在足够的高度来看一下以快慢不等的速度接踵而来、沿着一条带有很多锯齿形起伏的曲线而发生的事件过程，那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总的看法：一个伟大的革命进程方兴未艾，劳动者的解放、民主，各国人民的独立、社会主义与和平不断从旧的剥削、压迫和战争制度那里夺得地盘。参加这一进程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其数量比半个世纪前更多。在这些力量中，各国共产党起着先锋队作用。

共产党人嘛，一八四八年，他们人数很少，而今天全世界已有六千多万。当时，他们的声音只是在西欧少数几个国家里听到，而今天则响彻全世界。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类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连篇累牍的谎言、残酷的镇压都无法加以阻拦。今天已有九十多共产党，其影响和人数以不同的速度不断增长。这些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具有空前变革力量的最为普遍的思想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的基础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诞生及其存在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标志这一学说特点的国际主义。

认为国际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感情附带物，只是出于感情的声援的表示，这是完全错误的。国际主义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它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际主义建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得出的如下看法的基础之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从根本上说都有着同样的境遇，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相同的剥削。世界性分工的发展，使他们的处境更具有普遍性。

马克思非常有远见地指出，这种分工越发展，“历史就越演变成一部世界史。以至于，假如英国有人发明一部机器，而这部机器可以夺走印度和中国成千上万劳动者的饭碗，打乱这些帝国的整个存在形式，那么这种发明就成为世界史的一个事实”。
(未核对原文——译者)

各国劳动者的共同处境使他们在对付资本主义方面也有着共同利益。资本主义是一种同样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与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活动越来越不受边界的限制，以至于采取“多国的”、“跨国的”形式。此外，不只有共同利益：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都在起着一个共同的历史作用，即在改造社会、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动力作用和先锋作用。

对这一点，马克思用他在研究初期所特有的哲学语言作了如下的概括：“因此，无产阶级只能在世界史的范畴中存在，正如作为其行动的共产主义，除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外，绝不能以其他形式存在”。(未核对原文——译者)

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斗争之间的客观联系，创造了他们相互积极声援的条件。这种客观联系还呼吁和要求在各国工人阶级之间、进而在各国劳动者之间实行相互声援，更呼吁和要求他们的政治先锋队——各国共产党相互声援。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社会主义奠定科学基础的同时，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国际主义性质赋予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含

义，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网。这些委员会同美国宪章派、德国的共产主义团体、巴黎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小组建立了联系。在一八四七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改称“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决定抛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老口号，而代之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人们可以看到这一改变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结束语而写入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这个新口号具有阶级内容，它成为对国际声援的呼吁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这样诞生了。

各国共产党是在极其多样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某些党已经执政，领导着本国的事务，绝大多数的党还在同仍然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阶级敌人进行搏斗。在后一类党中，有些是群众性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影响作用；有些虽然在本国工人运动中有实际影响，但在议会中还没有席位；还有一些则被迫处于地下。然而，这还远未尽述它们处境的多样性。例如古巴、波兰和中国，它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以及它们的民族和历史的传统显然是极为不同的。即使在相邻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外，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别。比如，法国的宪法并不闪耀着民主性，因此法共要求修改那些允许滥用个人权力的条款；而在法西斯垮台后通过的意大利宪法，则带有对民主的发展十分有利的方面，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为使宪法得到贯彻和遵守而斗争。人们还可以列举大量的例子。

广泛的多样性

从历史形成的这一不可缩小的处境的多样性，产生了另一个同样的多样性，即斗争条件、战略与策略、具体目标与相应的任务的多样性。这不是坏事，这是各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人们有

时仍低估事物的这一方面。例如，有一系列的共产党在其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国家里进行斗争。然而，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垄断资本的统治形式以及垄断资本同国家的关系是相同的。在这方面，法国、美国和英国情况的差别是很大的。试图从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抽象分析出发来为这些党制定一条共同的战略，势必只能搞出一个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处方，这种一般化的东西是无法采用的。如果试图通过从有关党的政治路线之间找出“平均数”的办法来制定一条共同战略，那就更糟糕：这完全是胡来，并不存在自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存在一项自在的反垄断政策。应由每个党来研究本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从中得出具体的、因而是适合本国情况的独特政策。在政策实行的过程中，在一些共产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点，这是另一回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普遍性使它们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带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有人说，每个共产党都应“考虑到”本国人民特殊的民族传统。但这样说，还很不够。每个共产党都渗透着（而且应该渗透着）本国人民的传统、思维习惯、存在与行动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因为实际上，党是本国人民中的一员。而且这一点应该在它的整个活动中表现出来。这是党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外国成功带来的鼓舞所不能代替的，即使外国的成功显然对它的斗争有帮助。概括地说，每个共产党必须在本国的现实中寻求具体的方法，来解决它所进行的维护劳动者利益、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提出的种种问题。

由此而产生的多样性是各国共产党扎根于本国民族现实之中的标志，也是它们能够同生活的运动密切结合在一起、能够考虑到社会演变的标志。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以与另一个社会相同的步伐前进，而且在同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下的社会，不管是资本

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有加深的趋势。甚至有理由认为，由于这些客观原因，与我们敌人所谓共产党人要搞划一的无稽之谈相反，与某些共产党谈论“铁板一块”的好处的讲话相反，这种多样性必将不断发展。这种前景不会令人不安，它是合乎情理的。铁板一块是教条主义、思想停滞的酵母。列宁有一个更为丰富的思想，他预言即使在民族国界线消失的时代（还相当遥远），“被视为精神生活、思潮、愿望和思想差别的丰富和多样化的人类差异仍将会不断地加剧。”（未核对原文——译者）

我们不认为，只要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时“考虑到”本国条件，就可以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了。自然，普遍规律是存在的，但其数量有限。例如，不建立大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工人阶级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劳动人民不掌握政权，就不能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如，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党、即革命党为实现联盟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就没有工人和民主力量的联盟。这些规律是很有普遍性的。它们的普遍性是抽象的产物，它们不可能先于经验，而是概括了多种形式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历史相对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们不可能在工人的、民主的和革命的斗争的具体现实之外独立存在；另一方面，经验越是多样和丰富，这些规律的内容就越是具有相对性，就越有新的规律补充进来或替代旧的规律。

规律和模式

人们经常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看到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历史规律、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同自然规律（它们也被贬低为一些处方）等同起来；如果你把水银加热，它就膨胀……由此产生进行分析和政治探讨的某种方法，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思想停滞，而开创和

探索新的斗争道路（基于对具体的和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尽可能精确、细致的分析）是一个共产党极其重要的品质。换句话说，运用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即使“考虑到”具体条件，也不能代替战略。更不能把现在极为丰富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宝库贬低为某一个党的经验，那些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教益置于特殊地位的人就有这种倾向。这次革命是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现实和改变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强大力量。这个事实本身导致出现了完全新的条件，使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如今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提出来。毫无疑问，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超越本国范围的意义。然而，这些基本特点并没有超出我刚才提到的规律，因此，在一个象我国这样的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上，教益甚少。此外，人们曾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特点也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是其中一例：我们不再认为它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规律，我们甚至把它从我们的前景中排除了。

大概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个别经验的关系问题上的那种机械的、说到底是教条主义的观点，使某些人去训教他人，更确切地说是把一个特定的经验封为模式，而不是从经验中吸取教益。诚然，大家原则上肯定不存在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模式，也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模式，大家都喜欢反复地这么说。然而，宣传这种模式的倾向依然是十分厉害的。自然，随之而来的是指责那些不把这种或那种个别经验当作模式、因而不按照这个模式办事的党的政策和思想。自以为有经验模式的那个党想以其他党的导师自居。这种态度正是共运中产生困难的一个原因。

总之，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个运动看来还没有很好地接受、或者坦率地说还没有以容忍的态度接受多样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已风靡于共运内部。

至于我们，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近几年来，我们制定、明

确和充实了一项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略。这项战略完全切合于我国及我国劳动人民的条件、需要和传统。这种创造性的努力，不仅任何力量都无法使我们放弃，相反地我们还要继续下去。然而，我们并不想把我们得出的结论强加给其他任何共产党。例如，我们在二十二大上决定在我们的目标中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并未因此而否认它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曾是必要的，同时指出，如果其他一些党今天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明天对它们的国家是有用的，那就由他们自己决定。如果美国或哥斯达黎加共产党要在自己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是它们和它们人民自己的事。我们丝毫没有输出我们政策的意图。

分歧问题

共产党之间被承认和接受的差异不应成为分歧的理由。差异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形成的纷繁的现实。它们丰富着共同的经验、共同的政治和思想财富。

这些差异只是提出一个相当容易解决的问题，即很好地理解这个党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目标、这样的政策。这就要求互相之间深刻的了解，要有谅解精神，要相信每个国家的共产党最清楚为了保卫本国劳动者的利益和取得胜利应该做些什么。

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的指南。例如，意共战略（历史性妥协）同法共战略（争取民主变革的左翼联盟）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两党的分歧。

事实上，分歧是另一回事。分歧是指在共同关心的问题——政治问题、或原则问题、甚至理想问题上——观点的对立。

这些分歧有程度上的差别。比如我们同西班牙共产党在西班牙参加共同市场问题上存在政治性的分歧：西共赞成，而我们则反对西班牙在目前状况下参加。我们是从国家角度来看待这一问

题的：西班牙的参加将会大大加剧我国农民、尤其是西南部农民以及我国工业中好几个部门的困难。不过，这个看法并不因此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深信，西班牙的参加也会给它的农民和工人带来更多的困难，带来与法国劳动者所遭受的同样困难。九国政府主要出于政治原因支持西班牙加入西欧小集团这一事实，是我们反对的另一个理由。解决我们同西班牙同志间分歧的办法无疑在于我们两国和共同市场的政策转变为民主的、反垄断的政策。

某些分歧属于另一种性质。它们也不涉及一时的政治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斗争原则的某些方面。

社会主义与自由

正象我们过去所说，我们不同意损害言论、思想和创作自由的镇压措施。当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司空见惯的做法一露头时，我们就与之进行斗争。那么我们怎能容忍它们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呢？乔治·马歇在二十二大上指出：“我们不能容忍以人的幸福为目标的，我们号召全体劳动者为之而战斗的共产主义理想，被不公正的和没有道理的行为所玷污。这种不公正的行为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当这种行为发生在一个其人民牢固地、最终地团结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事业周围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容忍。”

我们不同意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让发表与共产党或国家、甚至社会主义本身的政治相对立的思想。如果有些思想确实是错误的和有害的，那当然要加以反对，但是要通过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方法，而不是通过镇压。这也是不犯错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人们很容易把一种仅仅是不常见的、但并不因此而不带真理性的思想和行

动认为是错误的、危险的。而讨论能够保证避免发生此类判断错误。苏共和其他一些党却并不这样看。它们主要是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保卫社会主义——诚然，保卫社会主义是必要的。这样就导致它们经常地以限制、强迫、镇压来代替思想争论，在我们看来，即使援引他们本国的法律也不能为此辩解。

人们不能以不干涉原则来反对我们所作的批评。理由很简单：我们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也是我们的事情。在捷克，一个扒手应判一个月还是三个月的徒刑，这确实是捷克当局的内部事务。但当社会主义捷克的法庭传讯那些运用请愿权反对基于政治原因的解雇的人时，这就关系到我们、关系到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斗争了。当审讯一些未使用炸弹也未动刀子、而仅仅散发传单的“持不同政见者”、“对现状不满者”时，当限制文艺自由时，这不仅有损于捷克或苏联，也有损于社会主义本身。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我们的态度，并且是公开表示我们的态度，以便使我国劳动者对我们自己斗争的意义和目标明白无误。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来谈谈当代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问题。

我前面说过，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任何组织形式的消失，各国共产党的独立得到加强。各个党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方式。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把本国劳动者争取到斗争中来的能力的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条件。

这种独立同时要求权利平等。不再存在运动的“中心”，因此也不会再有“领导党”和附属党。任何党都不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摄政。每个党都应该尊重其他党，尊重其他党自己产生

的领导，尽管可能存在分歧和由此而引起的争论是激烈的。不言而喻，任何企图干涉一个党的内部事务，对一个党的决议施加影响、或者鼓动分裂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

那末人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阐明这些原则，意味着我们现在要转向自我独立、闭关自守、对我们任务中的国际主义方面漠不关心了呢？这不是我们的立场。

当然，再没有比我们对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所承担的职责更高的职责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决反对有时可以听到的一种说法，即：各国共产党应该使争取本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服从于世界斗争的利益。那么，由谁来确定这个至高无上的利益呢？正确的说法应是与此相反，即我们要为法国劳动者早日掌握国家事务的领导权而斗争，这样，我们才能履行我们主要的国际主义义务。事实上，这样做才最有效地符合世界一切反帝力量的利益。更确切地说，我们认为我们致力于使我党成为一个对舆论能起深刻影响、对政权和反动派来说不可忽视的伟大的群众性的党，这才是我们首要的国际主义义务，才是我们对世界各国劳动者和民主力量以及所有反对新殖民主义、争取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力量所从事的斗争的最好贡献。此外，这也是为有效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声援任务的一个条件。

二十二大指出，事实上“我们现在和将来都积极声援各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和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斗争。兄弟般的关系把我们首先与各国共产党团结在一起。”乔治·马歇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补充，清楚地说明了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变化：长时期内，把各国共产党习惯称作共产主义运动的“支队”，而乔治·马歇却指出，正是各国共产党集合在一起，才组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各国党的处境和政治路线的极大多样性，现在不可能制定——哪怕是集体地制定——一项对所有党都适用的共同战略。

国际主义声援

我已说过，我党二十二大强调指出了我们斗争的这个方面。我们欣然履行着这个义务。我们对各方面进行声援，不论是阿尔及利亚，还是智利、马达加斯加、乌拉圭、伊朗、印度尼西亚，不论是土耳其的共产党人，还是受到施密特的禁止任公职法迫害的德国民主人士、巴勒斯坦人、美国的“威尔明顿十人案”。我党所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几乎是它的天性。它不仅通过发表政治主张，还通过每天的行动表现出来。国际主义事实上不能说说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采用了国际主义声援的提法（在柏林会议筹备会上使用过），而不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众所周知，我们既不信教，也不搞文字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词对我们来说既不是魔术，也不是妖术。只不过在我们看来，一些党所下的定义使这个词含糊不清，这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按它们的解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是无条件地维护苏联所作的一切和在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几十年中，全力以赴地声援面临世界反动派严重威胁的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曾是我们从未疏忽的义务。我们的声援是如此的彻底、如此地充满信任，以至于我们曾支持过一些事后证明是犯罪的行为。庆幸的是苏联今天不再是一个被包围的堡垒，尽管帝国主义对它的敌视仍在。因此，国际主义现在就要求对世界各地一切为和平、社会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都给予同样的声援。

运动中的争论

大家看到，在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某些党对此感到不安。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是，要明确地认识到国际

形势的演变、经验和生活都给了共产主义运动以深刻的影响，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必然发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必须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

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关系混淆不清，甚至几乎把两者等同起来。因此，弄清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就更是必要的。大家知道，我们不愿让社会主义的法国也出现这种情况，但这并不是我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状况尤其在和平共处的时代会提出新的、复杂的问题。人们可以用下面的话来阐述这些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正确地认为，时间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尽一切努力，争取尽早地结束垄断政权，因为这符合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前者使用国家手段，同后者全力反对的政权保持合作关系（这是一个可观的成就），这是正常的，原则上不存在任何矛盾。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同意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与“稳定”为由而采取损害我们所进行的反对大资本政权，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任何做法。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一种和平、缓和与谅解外交的必要性和约束力。但我们不能使自己的判断、立场和斗争——不仅为争取民主变革，还为争取使法国实行另一种对外政策——从属于这种必要性和约束力。

毫无疑问，当代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新特点还未完全形成。对此，我们也没有现成的、完善的答案。我们只是在最近一个时期致力于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得出一些想法，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开展我们的国际活动。我们并没有把这一方面或其他任何方面已揭示出来的真理据为己有的奢望。我们既然认为讨论是有益和必要的，我们当然同意大家对我们的思想和立场进行讨论。

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等待讨论和实践来弄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将继续进行为人们所了解的频繁的国际活

动。我们将最大限度地保持、深化和发展我们同各国共产党、以及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民主和人民力量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样，我们将继续努力，同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同天主教人民群众的代表力量进行接触，在可能情况下，搞联合行动。即使由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目前的表现，“还不能这样做，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条原则路线，我们不会放弃它。正如我党总书记在柏林会议上所说，‘只要我们忠于我们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建筑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就是开放的人，就是团结者’。

在这个问题上，在指导我们在法国进行斗争的思想同指导我们国际活动的思想之间并不存在鸿沟。

以上就是我们对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想法。

（译自《法国共产党人与欧洲》1978年6月第2期）

论欧洲共产主义^①

〔法〕雅克·德尼

问：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即使不是共产党人创造的，但此后是被共产党人所采用的。你能否说明一下你们党是如何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你党是如何给欧洲共产主义下定义的？

雅克·德尼：欧洲共产主义这词无疑反映了客观事实和新的情况，创造这个词的人显然并非出自无私。而如果他们认为这会给我们制造困难，那他们就错了。

就我们来说，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咬文嚼字的人。我们抓住了本质的东西。关键不在于这个词的确当不确当（提出的问题不涉及到所有欧洲共产党，也不仅仅涉及到欧洲各共产党）。关键是它形象地突出了一种政治活动中的吻合一致。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

一些党之间，如我们党和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英国党之间的会谈后发表的许多文件，对我们来说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马歇—贝林格声明所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

总之，对新的问题，要有新的回答，这种问题和答案都是很多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些特定的党，特定的人民和特定的国

^①本文是对法共中委雅克·德尼的一篇采访记，收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ischer Verlag》袖珍丛书最近出版的《欧洲共产主义之实情、分析和采访》里。

家。他们首先要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即全面深刻、持久的危机，我重复说一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影响到国家生活中经济的、货币的、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种危机危及了目前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本身。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与垄断资本融合在一个共同的统治机构里，对广大人民实行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压迫。受到冲击的是这个制度，提出的就是改变社会的问题。

在保护大资本受害者的切身利益的日常行动中，在旨在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而进行的改革机构的斗争中；在制订本质上是民主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在我党期望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真正民主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人们发现了这种共同一致的回答。

在这方面不应该掩盖考虑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原因之一，这就是鉴于现有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及它们中某些国家里长期缺少自由。

总之，我们行动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有内在联系。法国的劳动者正在从事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他们就是这样来理解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他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与我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自由、民主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认为不要就这个词进行争论，这个词目前似乎正使那些为了损害共产党人而创造这个词的人感到为难。对我们来说，正好相反，这个词使我们能深入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在和将来有益的丰富的思想。

问：欧洲共产主义口号要求各共产党采取统一的战略战术，你们拒绝这样一种解释，你们强调各党的特点，我同意你们的看

法，那你能否举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各党之间的不同点吗？

雅克·德尼：不可能设想各个不同的共产党之间采取统一的战略战术，我刚才谈到，在许多共产党中存在着许多一致的东西，人们对此只能感到高兴，各国共产党作为集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小分队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看法也就是这些共同点中的一个。

对我们来说，我们党就是紧密地联系了国家现状，大胆而创造性地制定适合客观现实的政策，才确保了为民族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所存在的那种重在组织上夺取集中的领导权不同，长期来没有共产国际的组织了。

我们党和西欧各共产党以致世界上其他共产党的关系，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团结和互相尊重各自的主权的基础上的。他们中的某些党不承认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对这些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影响我们良好关系的迹象。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把欧洲共产主义作为我党和其他党的关系准则的问题。

各党间的一致与分歧

我们不是为了进入另一种国际（即使是地区性的国际！）而走出一种国际的，我们各党努力于交换情报和意见，进行双边有时多边的会谈，在各党希望并有可能采取共同行动时就采取共同的行动。一九七四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布鲁塞尔大会就是一例。为了保卫世界这个地区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利益，这次会议作出许多创举，反对危机，以及反对应当对危机负责的大资本。

你要我给你举出我们各党之间不同点的具体例子，不同点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十分自然。我们斗争所处的情况不同，因此各

党所作的回答必然是不同的。联盟政策就是一例，我们各党都十分重视团结和联合所有人民力量，重视国内各民主党派之间建立持久的，真诚的，坚强的合作，重视领导国家事务，具体地说，各党对其进行活动所处的社会情况作出自主的分析，不同的政治斗争条件导致在某些重要方面采取极其不同的政策。

另一个例子——这里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分歧——关于欧洲一体化方面。今年三月马德里会晤时，我们曾经提起过。和西班牙同志不同，我党反对西班牙在目前情况下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此外同样反对希腊和葡萄牙加入）。当我们一旦考虑到了处于危机中的法国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将成为这种扩大的首批牺牲者），怎么可能作其它考虑呢？

同时，这种分歧证明了我们各党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问：在我看来，你们党同意的政治民主——包括资产阶级根本的自由和权力——是欧洲共产主义改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的理论，是什么经验促使你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从前共产党人把政治民主仅仅当作一种“形式”。

雅克·德尼：一九七六年在我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着重说明，我们打算把民主自由作为我们想在法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尺，并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斗争手段。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战略的中心，根本的选择，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长远深刻的考虑。在制订这条路线中，在国际和国内，一九六八年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年，这一年五一六月强大的人民运动初次强烈地表达了要求改革的深切愿望，它远远超出工人阶级的范围。之后，尽管政府多次更迭，可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尤其在吉斯卡尔政权成立后，反而更严重了。

危机的根源是：广大法国人民的劳动果实被少数享有特权的

人侵吞挥霍，他们秘密决定一切，决定政府委员会，决定内阁，搞国家干涉主义、专制主义、官僚作风，一句话国家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十年来法国的政治辩论围绕着民主问题展开的原因，因为不管人们从那个角度反复考虑国内的各种问题，总只有这种解决方法。

首先，社会民主，就是说公正对待那些整天操劳，应该象人那样生活的人，在工作、收入、居住、受教育方面享有更大的平等。

其次，经济民主，就是说国家支配的主要财富，劳动者有权决定与自己有关的问题。

最后，政治民主，就是说保护和扩大集体与个人的自由，保护我国人民与之相连的民主生活方式，不断创造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新的方式。

丰 富 的 遗 产

自然，我们的努力将写进我国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百年来的斗争史中，长期来法国工人阶级在这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阶级取得了一些民主权利，他们知道这些权利所付出的代价，因而更关心民主权利。

因为，事实上，我们以前只知道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只要一谈到权利自由，那就是压迫的自由，我们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平等。相反，目前取得的任何一种自由无不都是斗争的结果，我国劳动人民从经验中知道，自由上所取得的每个进展都是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个支持，因而面对经常企图损害这些自由并指责或抽掉民主内容的大资本家，保卫和扩大这种自由就应该是一个经常关心的问题。面对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法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创造了人民阵线，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继承了这个民主传统。一九四六年莫里斯·多列士

在接见《泰晤士报》记者时说，法国共产党人应该走一条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同的道路，即民主的道路。

民主的新步骤

然而，近年来我们谈起一种新的步骤，我们对法国社会及我国阶级斗争教训的深刻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民主变革与社会主义本身只能是我国广大人民的事业，新近的国际经验（包括智利和葡萄牙的经验）表明这是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因而我们就为团结金融和工业封建主义所有受害者，反对统治国家的狭隘等級制，争取民主变革而斗争，以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给这种狭隘的等级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新的历史资料说明：在法国构成劳动人民的各种社会力量，他们主要利益的一致性，可以为争取大多数人民群众从事改造社会的事业提供史无前例的可能性。

我们的研究也考虑到斯大林主义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

所有这一切都更加促使我们发展我党政策的民族特点，确定独特的前景。

一九六八年后，我们的“争取先进的民主，争取社会主义法国”的宣言，一九七一年我们提出的《改变航向》的纲领，（其中的建议在一九七二年被左翼《共同施政纲领》所采纳）一九七三年乔治·马歇写的《民主的挑战》一书。我党公布的（这在法国的政治力量中还是首创）《自由宣言》草案，最后特别是一九七六年把民主作为推动法国前进的动力的我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这个进程。

我们为争取法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在机构的各方面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而斗争。民主的这种不断扩大不断前进将使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一种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为之而斗争的

社会主义将建立在生产的主要手段属于社会本身所有的基础上，和劳动人民政治权利的基础之上。它将消灭剥削，确保劳动人民自由的基本条件，它将保证劳动人民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对整个社会管理；即自治，这是民主的另一种说法，它将保证并扩大我国人民已取得的各种自由：思想、言论、创作、出版、游行、集会、结社的自由；个人在国内外往来的自由；信仰宗教的自由；罢工的权利；尊重普选，包括民主更替的可能性；政党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权利，包括反对党；司法独立；拒绝一切官方哲学，拒绝搞极权制和个人权力。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我们为具有“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问：政治民主的突出标记就是公民有权通过投票罢免政府，你们党在失败后准备转为反对派，许多西方甚至东方的观察家很难相信：这可能意味着由高级社会变成低级社会。

雅克·德尼：我们对轮换执政的理解与我们对我国多党制的理解是一致的。

是的，我们考虑到组成我国人民的社会阶层，他们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宗教、政治派别、思想倾向也不相同。我们既不希望在民主运动中，也不希望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任何垄断，而与之相反，希望在人类和社会进步中起先锋队作用。因而我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我们想建立的社会中，承认多党制，承认反对党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权利。

尊 重 普 选

我们也曾说过，在建设新社会的每一个阶段中，赞同普选是继续已经开始的改革的条件，一切党派应该尊重它的裁判，多数派或反对派各政治组织和派别，按比例进行选择（今天的情况还

不是这样)将保证各派与其真正影响相称的代表性。确保少数派别权利的实质内容。任何政党不能统治国家，不能把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我们提出这样的保证是出于我们深信 我国 的工人阶级，我国人民。我们深信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会从我们的保证和行动的对照中证明我们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使每个劳动者，每个公民成为民主社会和明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参加者，会在各阶段中，不断加强对我们措施的支持。

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尊重普选的结果，不管这种结果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没有广大法国人民支持想在法国从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有人不顾人民的死活，甚至反对他们，是不能为人民谋求幸福的。

影响更替的原因何在?

应该看到影响民主更替的原因来自它方。来自我们的政敌，来自那些侈谈自由却污蔑我们的人。不仅不公正的法律，而且还有一种见不得人的选区划分法，他们剥夺了劳动人民的合法代表性，而且吉斯卡尔政权在选举接近结束时不愿作出尊重选民的意志的保证。他使尽一切阴谋活动和讹诈，企图避免所谓民主力量胜利的“危险”。如果这一切还不奏效，那么就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把现制度粉刷一下，窒息人民的希望，大资本家用各种手段为替自己效劳的政治力量提供各种手段，而且一旦失败还用破坏经济来加以威胁，一旦民主对他们不利，这些人就矢口不谈民主。

如果说法国存在进步的传统，那么它同样也具有《凡尔赛》传统，这种传统曾经借助俾斯麦镇压过巴黎公社。它的继承人企图寻求国外援助，美国的当权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当权者(由施密特总理开始)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军们毛遂自荐地粗暴

干涉纯属法国人民的事务，（他们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断然拒绝这种干涉，我们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表达了我国千百万同胞深切的感情。这样做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人民的裁决。

问：欧洲共产党人拒绝接受，说他们党“社会民主化”的评论，然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奥拉弗·巴尔莫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Rinascita》报记者谈话中谈到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他指出在发展社会和政治民主后，他的党将在第三阶段努力发展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民主将永远是不完全的，没有保证的。巴尔莫谈到他的党将放弃传统的社会民主的模式，同时还将抛弃斯大林的经验，想寻找一条广大群众参加政治和经济决策的道路。关于该党的对外关系，巴尔莫指出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政府和他的党和为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假如象巴尔莫那样解释民主社会主义，那么他的看法能不能充分反映你党的观点？你看有什么不同之处？

雅克·德尼：我们内部存在的深刻和长期的分歧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每一个对话和谅解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和将来的这种愿望要求阐明和尊重不同的观点，要求赤诚相见。你提到那次接见记者的谈话，提到经济民主问题（主要的），并不使我惊奇，一场选举失败结束了他那四十四年权力试验，才能使他知道瑞典式的社会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统治基础，政权重新转到右翼手中丝毫没能改变生产关系，垄断资本家的实力甚至比以前更集中，他们在许多国家里的扩张得到了政府的帮助。此外，我们注意到奥拉弗·巴尔莫处在反对党地位时所允诺的改革，不去触动少数财政寡头的实力根基并不是低估这些改革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改革与我们的《改变航向》宣言以及一九七二年左派共同纲领上所提出的改革相似，这些改革应由任期五年的民主政府一上任

就在法国开始实行。

社会民主党的总结

事实上，由于不想提出新的政治办法，不想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任何进步的条件），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到要未管理大资本家的具体事务，要未导致工人和民主运动的失败。社会民主党绝对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考虑和资本主义决裂，不管它有过多长时期统治地位，或正占统治地位，还是处于绝对多数都是如此。这充分表明一切社会党人是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就在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甘愿充当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帮手，自吹不致激起比保守党提出勒紧裤带的计划所能激起的更为激烈的反抗。法国劳动者由此得出的经验使大多数人在政治和工会活动方面选择了政治斗争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它必须是社会主义，又是民主的！

社会主义的条件

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表示着改变政权的阶级性，我们曾经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劳动者和他们的代表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参加领导社会是个关键问题。我们所谈的生产与交换资料的所有制，意味着发展各种方式的社会所有制：国有化的、集体的、市省专区的，同时还要尊重小私有制。我们所说的劳动人民的政权，劳动人民指的是工人阶级及其周围所有创造财富的人，即城乡各种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者。法国共产党人为了使民主社会主义早日胜利竭尽一切努力。为了对民主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已经改造自己，为了更好地为工人阶级和法

国人民服务，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无疑他们还将继续改造自己。法国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对我国工人阶级来说，我们党内没有巴特·高台斯贝格（注：巴特·高台斯贝格在一九五九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放弃一切阶级斗争〔NDLR〕）。

问：法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党的理论有了许多改变，其中包括成为先锋队及政权方面的概念：分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尽可能取得各种社会和政权力量的广泛同情，这种理论成功的可能性在西方，在东方却认为是很小的，他们或明或暗地表示出这种意见：反对结构改革的社会反抗力量十分强大，如果共产党想要实现他们的理想，最终还得求助于暴力手段，就是说求助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你是怎样看待这个意见的？

雅克·德尼：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适应我党政策的实际情况，大会作了根本选择，我国应该根据民主手段特别是普选的方法表达出来的绝大部分人民意愿通向社会主义。我们不怕选举时多党制，不怕意识形态的较量，不怕行动上相互竞争，也不怕辩论。我们采取这条路线，是基于对当今实际情况的要求进行深刻分析：民主与最大程度参与负责是我们时代的强烈的要求。这是经济、社会、人道的需要。我们从今天我国阶级斗争的条件出发，考虑到我国及我们时代的现实，吸取了历史的和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你的问题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不能有两种策略。为了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改造，在我国除了我们选择的道路外，没有其它可能道路。

困 难 的 实 质

这不意味着我们低估了各种危险，但我们没有在你谈到的所

谓“社会抵抗”中发现什么危险，进入新社会使那些受偏见、不信任、谎言的影响而与我们疏远的人得到好处，他们会从中得出结论（对许多生活在我们同志管理的城市里的法国人来说这已是事实）。一旦发生问题，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告诉有关的人，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这种做法使我们有力量，也是明天我们的力量所在。不，危险可能到来，在谈到政权更迭或法国和国际大资产阶级的态度时，我谈到过这种危险性。在这方面我们决没有任何幻想，大资产阶级不会甘心情愿放弃他们的统治，他们时刻表明，要用一切手段保持或重新取得他们的特权，但是我们不会用少数人的一些活动，或用一些会导致孤立和失败的办法去避免这一危险，相反，我们只能用坚持不懈的斗争，在每个阶段团结广大群众和劳动人民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采取广泛的行动来提防这种危险，我们依靠关心民主变革的人（他们是多数），努力团结人民群众——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国人民的团结，这种团结的轴心是左翼联盟，人民团结得越紧，就越能成为多数，大资本家和为他们服务的反动政治势力越孤立，他们想求助于非法手段，求助于破坏和暴力的可能性越小。我们没有消极防御的思想，我们相信力量，相信我们理想的吸引力，相信人民运动的强大威力，这个时代不是专制思想支配一切的时代，而是世界变革的时代，是欧洲法西斯制度崩溃的时代，是我们日益向往真正的民主、向往人民力量的联合、向往进步、向往社会主义的时代，这也就是欧洲共产主义。

问：许多西方观察家——其中有些认真对待你党变化的人——看到你们党内政治意愿的形成与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你们同意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你们党的民主是受民主集中制制约的，你们党不容许党内有不同集团和派别的活动！这不

是矛盾吗？

雅克·德尼：把政党和社会作比较，这就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社会是一个客观的集团，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不是选择的结果，而党则是一个自愿参加的组织，加入党是由个人决定的。事实上，我们争取建立的社会主义，它考虑到社会成员的各种倾向、信仰、意见。为了实现这个政治计划，法国的工人阶级、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创造了共产党这一工具，共产党有科学理论，有经受得起考验的组织原则，党内民主集中制适用于党内生活。党团结那些自愿加入的男女，他们在党内讨论如何更好地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他们内部的争论不是把寻求分歧作为目标，而是共同探讨采取的尽可能完善的政策。党员通过争论达到一致的信念，是在群众中和企业中进行有效活动的条件。

参 加 和 作 用

人们发现两方面的活动丰富了我们党内的生活：全体党员经常参加制定政策的活动，其高潮是党的代表大会作出战略决策；同时，讨论结束后，一旦作出决议（少数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有权保留其看法），全体党员无例外地执行这些决议。民主集中制也就是无记名投票选举领导，共产党人指定那些他们认为最有能力执行已确定的路线的同志担任各级领导。同时期望他们不辜负这种信任，在会议确定的路线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创造性的活动，因为每届代表大会确定的指导原则都是适用于没有做过的事情。例如在今年五月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国防与裁军问题，决定维持法国的核武器。相反，正象迪韦尔热教授指出的那样，派别和倾向会削弱每个党员的作用，这是确实的，这最终会导致过道里的结帮，形成旨在篡夺领导权的小集团，象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党内的情况那样。而且这样做，还会助长言行不一。一

个政党应该给予和可能给予的唯一保证就是它的行动。

归根结蒂，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保证，它向共产党人保证：民主决定的政策将得到全党的尊重。它向我国人民保证：法国共产党说到那里做到那里。我国工人阶级庆幸有了这样一个政党，决定加强它，共产党的队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大着。几年中，它的成员由四十万增加到六十万，企业中的支部由五千个增加到一万个。

问：你们党曾多次批评苏联政府国内政策的某些做法（例如不同政见者的问题）和对国际主义的理解及其相应的行动（例如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你们党是如何对待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的？为什么你们党没有学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那样，象许多西方政治家要求和期望的那样与苏联共产党断绝关系？作为确实彻底民主的象征？

雅克·德尼：我党独立自主地确定它的政策与目标，它从全世界的实际经验中吸取教训，但不把任何一个党作为自己的模特儿。同时法国共产党努力与所有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民和民主力量保持友好兄弟的合作关系。

合 作 的 形 成

我们极其关心与全世界各共产党的关系，我们明确地、自由地与它们团结在一起，因为它们是共产党，在国际上是利害一致的。我们愿意在适合目前阶段的新形式下，加强这种合作。当前革命运动日益的多样化，我们没有把这种多样化看作是消极的因素，而是把它看作对革命运动的一种充实。我们认为这种合作的主要原则是：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互不干涉。这些原则显然适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包括你提到的苏联党）的关系。关

于这一点我愿说，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它们的共产党在近代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起到古巴人民越南人民的胜利，他们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给帝国主义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劳动人民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他们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保持了我们独立见解，我们不隐瞒我们的不同点与分歧。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用会否定我们理想的办法去达到我们的理想。而对损害社会主义的做法，我们明确提出批评，这样做确实有点新鲜，然而那也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至于你提到的所关心的问题，应当承认这一点。法国共产党对参与谴责南斯拉夫一事表示遗憾，它拒绝——不管分歧多么严重——任何集体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它主张和各种意见十分不同的力量合作，法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主张开除更不主张与之断绝关系的党。

问：在西欧占优势的看法是：苏联依仗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实际上企图使欧洲“芬兰化”，他们长期追求的目标是把西欧置于他的影响之下，有人还说西欧共产党在主要点上是支持苏联对西欧的外交政策的，至少在西欧陷入与苏联冲突时他们不会站在西方一边。你的党是如何看待苏联对西欧的作用的？假如，由于苏联的压力东西方发生新的冲突时（例如在关于缔结柏林协议问题上）你们的党可能如何行动？

雅克·德尼：我想从根本上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不同意超级大国应该统治世界和欧洲的说法。对我们来说和平共处决不意味着保持社会和政治现状。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我们要求全面实施会议决议的各项内容（安全、裁军、合作、人权），我们欢呼承认各国人民，在他们需要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其政治制度的神圣权利。

我们要和平，同时要社会主义。我们希望在军事和政治局势缓和方面有所前进，我可以说，我们对此特别感兴趣，过去的革命都是在战争和武装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现在我们提出处于世界和平条件下的革命策略。不能认为我们会考虑把改造法国社会的斗争从属于任何外国利益、外交、或“世界均势”。

我们拒绝屈服于集团政治

你知道我们虽然支持法国参加大西洋联盟，但我们仍然反对集团政治，今天这种集团政治是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和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我们要求法国致力于越过和同时解散现存的集团，致力于建立一种以集体安全这也是法兰西传统的观念为基础的新关系，同时法国应当向苏联和其它参加华沙条约的国家建议缔结一项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条约，要知道这方面我国是落后的。

我们的建议是对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面对各种威胁，面对不管什么地方来的侵略，我们不愿看到单方面削弱法国的力量，削弱法国的国防力量。

我们对外政策的中心思想是：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有利于推动裁军、建立没有歧视的最广泛的国际合作的首创精神。

我们希望法国不要跟在某个个人后头。我们揭露吉斯卡尔政权，因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建立欧洲持久和平的具体建议，我们支持这方面的一切倡议，不管是谁提出来的。至于问到我们对侵略的态度，我对你提出这个问题感到高兴；因为在法国人们避免向我们提出此类问题。

事实上，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于“左翼最高级会谈”前夕的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一次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电视谈话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如果照某些人的荒谬假设，

法国将遭到苏联的侵略时，那么我们将站在保卫祖国领土的前列。而你们呢，假如法国遭到美国或德国侵略时你能同样保证站在第一线吗？”社会党总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法国共产党是唯一对法国人民负责的政党。

问：最近苏联的报刊公开批评欧洲政策的理论，——它被欧洲共产主义一些领导人发展了。面对西欧的一体化你党的立场如何？面对美国和苏联，欧洲共同体应起什么作用？

雅克·德尼：我们主张一千个劳动者的欧洲，一个人民的欧洲。我们不仅不想损害把我国与其它西欧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上的密切关系，——因为自给自足的观念对我们是陌生的——我们还要给这种合作指明一个符合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新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关键也还是民主，欧洲建设目前所缺少的，就是劳动者的发言权。今天没有人会怀疑：欧洲经济共同体廿年来的结果揭穿了经济和谐增长，增加福利，增进人民之间友谊等漂亮的诺言。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的经济情况是一幅被各种矛盾撕碎了的资本主义图画，在那儿人民群众为危机付出了代价：六百万人失业，普遍的通货膨胀，甚至使共同体肌体内的自由也受到损害。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欧洲是一个垄断资本的欧洲，跨国公司的欧洲。这就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人埋怨人民群众不愿参加的根源。应该改变这种方针。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谴责经济的封建性，让符合劳动者愿望的政策占压倒优势，同时还意味着要进行一场斗争，民主地改造欧洲经济共同体。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欧洲？

象其它有关国家的人民一样，我国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建立在平等、主权、相互尊重选择各自政策的自由——在我们看来这是

主要的——的基础上各国联合起来的欧洲，是一个从大资本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欧洲；是一个民主的欧洲，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欧洲，这个欧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欧洲，这就要求挫败企图把欧洲变成美国的大西洋帝国附庸的计划，这个欧洲应该是一个能为缓和裁军作出贡献的和平的欧洲，这个欧洲应该是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合作，同时向全世界开放的欧洲。我们打算和所有赞同这种愿望的人共同努力建立这样一个欧洲。经过这样改造的共同体具有每个成员国的强烈特点，无疑能对某个国家表示出——不是为此建立一个新的集团——自己的独立意志。无疑能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一个和平和广泛合作的因素。所以我看不出我们和你提到的大国存在对抗关系，而是友好关系。我们设想的这样的欧洲可以摆脱监护，可以和美国苏联以及希望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

问：西欧的保守势力打着“自由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帜准备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参加欧洲的选举。另一方面，欧洲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直到有影响的开明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诸如对政治经济民主的估价上，以及继续执行缓和政策方面有着一些共同点。你们党是如何看待这种发展的？特别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作用是如何估价的？

雅克·德尼：“自由或者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在一九七六年选举运动中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是根据一种排斥异己，仇恨别人，掩饰右翼敌人，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政策提出来的，现在又指责社会主义理想本身，这种做法在法国已是传统的习惯了。

欧 洲 选 举

把选举扩大到欧洲，引起了人们的不安，用政治术语来说我

们刚才提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股力量，将会越来越显得重要。

然而，欧洲选举（能否如期举行，还不能肯定），并不是为了加强欧洲右翼力量的团结而由社会党筹备的，恰恰相反，是由三个超国家组织的头头分别各自召集基督教民主党人，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经常在选举的事务和政治准备方面进行磋商，宣布作出了《公平交易》的决定。

欧洲经济共同体社会党联盟主席W·Drosher就这样宣称过。他还和威利·勃兰特一起于今年六月提出了由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起草的共同纲领计划。他还准备打击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幽灵”，他宣称：“即使进行直接选举，也不能和欧洲共产党人合作。”你提出的问题给了我一个谈谈社会民主党作用的机会，社会民主党对决心推动欧洲社会进步、民主、缓和的各种力量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带头反对共产主义，给工人的施加压力破坏团结，使大资本家的统治无限存在下去，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出路。

我们希望的合作

我们对此感到惋惜，我们经常利用一切机会谈到这一点，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是光明正大的人，是善于团结人的人。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和进步力量没有把他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缺陷，有待弥补。然而联合的愿望应该是相互的，应该结束那种落在生活后面的态度。我们仍然准备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行动，交换看法，进行接触，就象我们和社会民主党所做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既没有欧洲机构，也没有国际纪律，也没有统治党。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为自由、为合作和平而行动起来。不管任何情况，法

国共产党届时准备参加欧洲选举，今年夏天我们挫败了那抛弃吉斯卡尔政权的计划，把保证我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条文写入我国法律，在这方面我们经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的代表也能表现出我们一贯建设性的精神，证明我们参加议会代表的积极性。

（选自《“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辑。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等编译）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提纲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通过）

意共的方针和总目标

一、欧洲和世界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一）为了使意大利变成一个建立在政治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意共正依据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路线，为争取深刻革新国家，拯救并发展民主而斗争。同时使和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欧洲和世界上取得进展，意共也在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世界形势充满触目惊心的危险，但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也出现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上述目标就变得越来越现实和紧迫了。冲击着意大利社会的深刻危机也要求进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彻底的民主改革。

（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正在扩大和加剧。继苏联十月的革命性决裂之后，由于在各大洲的许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世界结构发生了变化，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声势浩大的解放运动使世界结构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斗争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妇女群众的觉醒在当代现实的重要事件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她们要求摆脱世世代代的奴役，获得

完全的解放。

但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所有那些眼着自己的特权和统治地位遭到打击或威胁的势力的抵抗和反扑也是很激烈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信仰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理想的国家和力量中，也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影响到全人类进程的分裂与冲突。

(三)世界正面临着一些引人注目的问题和选择。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进步与和平的力量迄今已经能够使一次新的世界性冲突得以避免。然而在许多地方军事冲突正在进行或者可能爆发。全人类正生活在那种持续不断的、造成闻所未闻的浪费资源的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之中。一场毁灭人类生存条件的原子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几十个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最发达地区同广大的落后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与文明条件上的差距却惊人地、急剧地扩大。广大的不发达地区的特点是贫困、饥饿、以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令人可怕的不平衡。

在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的现阶段，经济发展导致了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阻碍着把科学技术真正非凡的成果完全用于进步的目标，甚至使它背离这一目标，并且包含着一种不可挽回地破坏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危险。

在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尽管一部分劳动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但是诸如失业、在社会上受排挤、暴力、犯罪、吸毒等现象在加剧。生活更加非人道化。恢复野蛮状态的危险迫在眉睫。

(四)拯救人类和人类的进步要求肯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与合作这一根本原则。这首先就要求发展缓和，通过和平的与谈判的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冲突，继续进行裁军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间的谈判。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在这方面，具有不同思想和政治信仰的国家、人民、运动、政党和派别可以而且应当进行会晤与合作。

在这一个营垒中，在这一场斗争中，工人运动的作用以及它面对当代世界触目惊心的问题，能否重新确立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和平、正义与自由这一理想和目标的有效性是决定性的。

(五) 意共推动并决心为确立不仅局限于共产党之间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和义务作出贡献。今天，实际上世界革命的进程包括前进中的相当广泛而又各不相同的解放运动和流派。这些力量的团结和共同努力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在承认解放运动与建设新社会是通过反映不同的文明、文化、历史和经验特点的道路和解决办法得以发展的基础之上，才能出现国际主义的新观点与实践。这种多样化和特殊性不应该被看成是坏事，相反，应该看成是力量之所在，是为着丰富并加强整个争取和平、民主、各国人民独立与社会进步运动的杠杆。不可能有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样板，不可能有意识形态的正统讲坛，也不可能有排他性的政治领导中心。走向接近与合作的必要进程必须在尊重各国、各党和各种运动的自主与独立的情况下进行；必须是在各种经验与提法之间进行批判性的、自由的、建设性的对比中进行。

(六) 西欧是争取一个建立在和平、正义和各国人民之间合作基础之上的新的世界格局这一斗争的焦点。只有当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政治、工会和群众性的组织以及一切民主力量善于合作并团结起来去实现保卫和促进民主、和平、各国人民的独立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这些伟大目标的时候，西欧才能够阻止属于自己最优秀传统的文化与文明作用的衰退，才能获得一种有利于全人类的新的积极的作用。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工人和进步力量牢记这一任务，他们可以并且能够为进行符合世界这一地区的每个国家及整个地域的传统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

十月革命和在俄国以及随后在其他国家建设新社会的意义就在于历史性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推进了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个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国家今天在世界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他们的贡献。

同时，这一伟大的历史经验也表现了它本身的局限性，矛盾和错误，这一切都影响到每个国家的国内、经济与政治生活、特别是有关民主的问题。这些局限性、矛盾和错误也影响到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限制了社会主义理想在全世界的吸引力。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和所遵循的模式不适用于象西欧这样一些国家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民主党，特别是那些领导过或正在领导着某些欧洲国家的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尽管它们使劳动阶级在经济、社会条件方面实现了重要的进步，但它们仍然没有使社会脱离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国家中，那种同样也是由于殖民主义剥削才成为可能的发展方式也达到了危机的地步。这种发展方式遭到打击，而这种打击来自原来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人民的觉醒及其解放运动。此外，面对着当前的危机，这种发展方式也没有表现出它能保证解决诸如广大男女群众和青年的工作、正当权利、解放和参与管理等重大问题。还有一点，即许多社会民主党仍然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反共局限性，尽管其手法不一样。在一些国家中，政府实际行动中的歧视性法律及不民主态度概渊源于此。比较普遍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中的许多人不能够理解必须克服令人痛心的人类分裂状况的全部意义。社会民主党阵营正在发生分化：有一股势力在继续走那条拒绝从实质上改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保持工人运动分裂状态的道路，而其他力量则甚至通过自我批评性的思考开始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和寻求代表劳工运动的全

部力量的会晤等问题。

(七)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一切进步的革命力量，即先进的民主力量、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党的、共产党的和天主教的力量，已经或者逐步在进行批判性的重新思考。他们之间存在着为了人类，为了欧洲，为了意大利而进行建设性对话和谅解的新可能性。

共同的历史性任务是为西欧的进步和革新，并走向社会主义改造开辟新的道路。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力量和那些努力寻求深刻革新道路的基督教与天主教界力量之间可以实现有重大意义的对话。必须采用一种既符合民族特点和当代条件，又符合象今天西欧这样一些建立在民主议会制度之上的工业发达国家所共有的特征和基本要求的解决办法。

因此问题是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经验的情况下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但是这一进程也有别于十月革命之后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进程。我们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关系到欧洲的第三条道路。这里涉及到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社会特点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西欧的历史中，在成为其特点的为政治、文化和宗教自由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特别是在工人运动所进行的并取得胜利的民主、自由与社会进步的伟大斗争中有其深刻的根本源。

西欧工人运动沿着这条道路就可以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的斗争，为建立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确立和平与合作的新的国际格局作出进一步的重要贡献，从而也就为现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发展作出进一步的重要贡献。

近年来，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思考同西欧以及象日本这样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自主的、逐步进行的思考是相吻合的。尽管这些党开展活动的历史环境及遵循的方针都不一样，但是却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即争取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应该在充分的扩

大民主和一切自由之中进行。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选择。

意共不想把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同其它国家和其它大陆的共产党和革命的进步力量相对立的运动，或者妄图给人们指出一种普遍有效的解决办法的运动。世界解放运动的现实就是多中心的。欧洲共产主义要为社会主义理想在欧洲和全世界的确立与发展的整个进程作出独特的贡献。欧洲共产主义尤其应当能够在促使西欧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而不再是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占优势，从而为确立一个基于平等、正义团结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

二、民主和社会主义

(八) 我们社会中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深刻危机使得在意大利进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变成必要而现实的了，以共产党为中枢神经的工人运动的力量及其壮大又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

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战略和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观点近年来在国家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在葛兰西和陶里亚蒂有关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的研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根源。

承认并肯定政治民主的价值是工人运动早在反对法西斯斗争与抵抗运动中取得的牢固成果。

在意大利正是统治阶级造成了民主自由的毁灭。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在为把国家从法西斯所造成的灾难之中拯救出来的斗争中，是把民主、团结和国家独立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的。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先锋与主角的作用。解放后，共产党是创造共和国、制定宪法的力量之一。

这三十年来，共产党也执行了一条始终不渝地维护民主制

度，在劳动者和农民群众中组织并发展民主生活，为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尊重并实施宪法而斗争的路线。意共是在下述情况下执行这一政策的，即不断地寻求与意社会党、其他民主力量，世俗的和天主教的力量的团结；即使作为反对派而进行斗争时，意共也还是不断地寻求同天民党本身取得各种可能的一致，以避免合乎宪法的民主局面的破裂。

(九)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要求并维护在体制上保障自由的制度，这既是因为公民的政治自由对人类共存来说是一个十分宝贵的历史性成就，又是因为民主制度是发展旨在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阶级斗争最有利的基础。因此，政治上的民主就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甚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体制的最高形式。同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革对于使民主权利变得完全名副其实是不可缺少的，这就需要消灭阶级剥削与不平等，确保所有人都能维护自己的人格，逐步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使人与社会得到完全的解放。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使相互关联的民主生活的基础日益支离破碎，使人们不仅不能支配自己劳动的产品，而且也不能掌握本身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统治阶级利用一切手段来阻挠工人运动和劳动阶级参加领导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机构就失灵了，就有名存实亡的危险，就失去了威信，有时甚至摇摇欲坠。

摆脱阶级剥削，维护民主权利和扩大民主不是一些互相对立的要求，而是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的。

(十)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须通过经济的民主规划来确保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目标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群众的政治斗争来实现的。为了实现这一规划，必须有一个民主政权，其特点是整个劳动者运动的参加和大多数公民的赞同。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准则，不需要把生产资料全部国

有化。将来也应该存在着经济的公营部门和私人主动性能够得以发挥的部门。民主政权要确定主要的发展目标，通过与不同社会力量和不同民主中心的对话来制定一个计划，以此作为所有公营与私人实业家的明确的指针。在进行改革时，政权应该考虑到经济进程的客观要求来规划和引导经济的发展。特别要支持公营和私人的主动性，公私双方要实现计划规定的目标为企业及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作出贡献。

自由结合的自耕农所有制，手工业，中小工业甚至服务性行业中的私人积极性都将有特别的作用。合作社和各种联营形式的发展将成为一个根本性的因素，这种发展应该伴随着技术和生产组织的进步，因而也就是生产率的提高。

从实质上说，民主规划的总目标应该是使集体的总利益，使进步、正义和团结的原则与理想占优势。

在这种以社会主义精神变革社会的进程的观点中，必须有一个相互关联的经济制度。该制度要保证把规划与市场，把公营积极性与私人积极性，把国家、地方、企业的经济协调与劳动者参加确定并监督生产进程的方针结合起来。

(十一)节约政策是社会变革和文明与文化进步的工具，今天则成为争取有计划发展的条件。为此，一个具有很强领导能力的、建立在比简单多数更为广泛的赞同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权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清除障碍，战胜经济和金融寡头的抵抗，战胜形形色色持阶级合作立场的人以及寄生性阶层和集团的抵抗。

在完成这一任务中，工人阶级的中心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对头，这不仅是由于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而且也是由于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以及它在意大利生活中所赢得的地位及其政治影响。没有最广泛的城乡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团结，没有广泛的联盟营垒，就不可能实施这

种领导权。这种联盟应该建立在具体利益的一致以及着手解决意大利社会重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必要性这一基础之上。这就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工人阶级同农民、南部人民群众、知识分子、辛勤的中等阶层之间的联盟路线。今天北部和南部在业工人阶级同广大青年、妇女群众以及由于社会的发展方式及危机而有可能遭到排斥的其他人民阶层之间的联盟具有特殊的现实性和重要性。

实行革新方针必然会引起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不仅是国内的，而且是国外的资本主义势力发生冲突。正象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工人和民主运动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抵抗，甚至强烈的反对，直至破坏民主制度，搞暗杀、恐怖行动、形形色色的不同政治的运动，公开的或潜在的政变企图。但是，今天的条件由于绝大多数人民积极赞同民主机构，由于经济结构的改革以及劳动群众的斗争已经使得侵犯和打击民主制度的企图能够被击败和被制止。

因此，政府通过全部宪法保障所采取的，受到工人、劳动者和人民力量广泛赞同的决定而采取的行动，就应该预示着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是有效的，坚定的。这一战略要求在文化、思想、道德、习惯等方面为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而斗争。

(十二) 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如下观点的有效性，即生产方式及由此而确立并发生作用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冲突是制度、司法和政治组织以及思想、方针的基础。但是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依赖关系而是辩证的相互关联。

政党是同特定的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又不是纯粹机械地反映这种利益。在意大利的现实中，政党是组织民主的基本工具，虽然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即使社会的经济基础得到了改造并且消除了划分为对抗性阶级的现象，不同的利益，仍然会继

续存在，各种思想、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针与传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由此就产生了如下的可能性：即使在对社会进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革新事业中，在建设和领导一个新社会的事业中，存在着许多政党并发挥作用是可能的，这些政党轮流执政也是可能的。

工人阶级在战胜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可以并且应该通过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不同政党与派别之间的合作和谅解来实现；可以并且应该在一种民主制度的局面下实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立宪党都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那些不愿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反对这种改造的党也享有充分的权利，当然它们始终要遵守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

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应该保障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会组织的自由与自主。

(十三)这种多党制的观点不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今天的突然发现。它是思想和政治的长期成熟的结果。多党制的观点是这样一种文化和经验的成果：它使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摆脱了机械的、教条的歧路，在对意大利的现实进行分析并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树发生富有战果的关系中，发展了从拉布里奥拉(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一八四三—一九〇四)，意大利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译注。)到葛兰西、到陶里亚蒂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观点也是数十年来工人和人民群众通过意共的重要贡献所进行的民主斗争的成果。

根据这种观点，结构变革是基本的条件。但仅仅这一点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全部准则，不能解决人们的所有问题，也不能使人们多方面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经济结构变革本身尽管是基本的，但它自己也是人们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才能与决心的历史性产物。

在这个基础上，意共重申自己在有关文化、艺术、科学自由问题上原则的政治立场。在一个真正世俗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中，这种自由应得到充分的保障。

（十四）发展我们党有关宗教的政治理论立场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今天和明天来说，意共都肯定尊重宗教与一切宗教自由的原则，肯定维护宗教和平的中心作用，以便保证民主的共存与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团结的政策。

为了使人类文明免于遭受核战争，促进人类的正义和进步，意大利共产党人曾经并正在为寻求同基督教与天主教界达成一致而不懈努力。意大利共产党人重申必须同那些有社会、文化和思想革新要求和倾向的天主教运动与力量进行对话、相互承认各自的准则，以及进行会晤。

经验表明，面对着当代世界引人注目的现实，天主教的意识可能成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促进力量。

这种政治立场是有理论根据的，因为注意到宗教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现实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克服了那种认为知识的扩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思想、方针和意识的彻底改变的观点。

（十五）在意共内部，团结、正义、博爱、自由和民主的目标与理想（这也将是新社会的目标与理想）影响着并且必定影响到党内生活、道德素质和习惯。我们早就抛弃了把共产党当成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化身”的观点。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党是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党首先要成为工人阶级和一切人民阶层直接的组织上的体现，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和斗争的党，要成为一种改造社会并能自觉起执政作用的自主力量。在一种多党制的局面中，党应该依然是国家的一部分，而不能同国家混为一谈。这种富有成果的观点正是陶里亚蒂一九四四年行动的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民主道路和新型

的党也出自这一观点。

共产党和它思想传统之间存在的关系与一个民主国家和各种不同思想、文化派别之间所应当有的关系不可能是同一个类型的。

事实上，世俗的、非宗教的民主国家并不把任何特定的思想、意识或宗教派别变成国立的。今天在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宪法是一个民主国家历史的、司法的和思想的团结基础的原则。

意共早就肯定并在其章程中规定了自己的世俗原则，规定了参加意共以政治纲领为基础。

但是共产党是把这样一种思想和文化传统作为自己明确的依据的，即从历史上来看，这一传统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应该在同意大利和世界文化中最活跃的派别，同现代思想、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发挥及阐述进行不断的、富有成果的比较中向前发展。

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是一个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早就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提法表现不出我们理论和思想宝库的整个丰富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以及列宁和工人运动其他理论家与领袖们的思想（其中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特殊贡献是突出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时的根本源泉，是进行调查的手段，是制定方针的基础，但是这些方针应该加以运用、批判地进行检验，并且通过与现实、经验和其它思想派别进行比较来加以革新。从这种意义上讲，党章中也必须写上这一宝库的丰富性，以及认识并深入研究这一宝库的必要性，同时取消党章第五条中有局限性的提法。

(十六)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同这样一个党的目标是相符合的，这个党要通过群众斗争及其组织来改变社会和国家的阶级基础及

其阶级特征，这个党意识到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力量就在于他们的组织和团结。意大利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历史考验中逐步发展和革新了这种方法，而这一方法使意共对一个有着民主团结的国内生活的国家肩负起了自己的义务。

但是也必须通过适当的组织上的变动去迈出新的前进步伐。

党的人民性和群众性，党要干预国内现实的一切矛盾的必要性，党在社会上和组织机构中任务的多样性，这一切都要求在党的生活中把民主因素和团结因素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正因为如此，在党内应该日益发扬深刻的群众性民主、自由讨论的传统、批评的传统以及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的主动性。与此同时，¹应该加强团结和建设性的精神，不谋私利，同志间关系要光明磊落，拒绝派别的方式。派别会造成分裂。以至最后毁掉党的生命，妨碍并打破党的有效的民主辩证关系。

三、团结政策

(十七)对于意共来说，团结政策具有战略抉择的价值。这条路线并不仅是在为把意大利从法西斯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过程中国家生活的一个非常时期的决定，而是为了在意大利建立一种进步的新民主和为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长远前景的关键。这一方针的基础在于理解我国的历史、估量处于交锋之中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现实力量。无论是在创建共和国的阶段，还是当反法西斯民族团结破裂后，在长期致力于为抵制并反对歧视工人力量和我们党的观点及政策的行动及斗争中，意共都有一贯忠于这种团结的精神与要求。意共可以把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场斗争(包括反对脱离立宪轨道的企图的斗争)视为自己的历史功绩，同时把宪法以及实施宪法的革新计划作为工人运动的盾牌与武器。

我们的团结政策的基本因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意大利社会党的团结关系以及寻求同信仰天主教的人民进步力量的对话与

谅解。历史性妥协的提法就体现了这条路线。

(十八)今天危机的严峻现实和政局的触目惊心使得团结政策有了新的理由和力量。最近十年来，这种团结的要求、不管是在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运动、斗争与觉悟中，还是在政治关系中，逐步变成了对付危机和革新国家的基本条件。这一进程导致了冷战时期老的分裂状况的消除，虽然还是不彻底的。这一进程也有助于反对新的对立和正面冲突的企图。工人运动的政治影响和作用逐渐增长。最有意义的事实是共产党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的进展。这一进展使左派在地方和大区行政机构中的执政地位得到了，把劳动阶级带到了直接参加领导国家的门槛前。

意大利政治斗争之所以具有新的、复杂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种特点是：出现了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可能性，但同时又存在着一种特别是针对着意共和旨在堵塞实施革新纲领道路的广泛而尖锐的反扑。

六月二十日之后，尽管由于一些抵制，特别是天民党的抵制而未能组成包括意共和意社会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还是形成了团结与合作的新形式，并且在民主力量之间确定了共同的任务。

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可能来拯救民主制度，对付恐怖主义破坏性的进攻与讹诈。而这种进攻与讹诈的顶峰就是绑架和杀害莫罗议员。在这个基础上，也有可能来积极地解决共和国总统府的严重的危机，挫败迫在眉睫的经济和金融虚脱的威胁，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为国家的规划政策和公民的文化生活创造一些条件。

但是我国的危机远未解决，这也是由于欧洲和世界当前形势的影响。但这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十年中那种政治方针和那类政府领导所造成危害的影响，这也是由于政治前景始终不稳定。一方面是特权势力的抵制和天民党的一些重要集团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危害劳工运动的团结和国家团结的行会

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倾向的加剧，这一切都阻碍始终如一地执行节约、正义和改革的政策。

现在出现了一些有可能为专制蜕化准备土壤的分裂和混乱的倾向与现象。

因此，我国的局势正处在关键时刻。民主团结政策面临着决定性的考验。必须前进，反对保守派的抵制及行会主义势力，保证坚决维护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给团结的主动性以推动和鼓励，以便根据革新与改革路线及时解决我国的问题。为此，必须使团结政策在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更深地扎根，并使之变成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力量；意共重申，如果民主团结的政策不通过消除各种歧视的残余而找到充分的和恰当的表现形式，包括让意共参加政府，那么就不可能真正摆脱危机造成的触目惊心的窘境，也就不可能有组织地进行改造社会与国家所必需的和深入的工作。

为了争取这种在劳动阶级参加领导国家的基础上革新意大利的前景，意共正在并且应当更加坚定地努力。这一前景可能包含着新的、艰巨的斗争因素。但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行动的场合，都必须肯定团结路线，都必须在总的方针和具体建议中突出意共是一种执政的力量。

第一章 国际形势

一、当代的重大矛盾

(十九) 在国际形势中，导致四分五裂局面的多种矛盾在积聚，日益增多。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无法解决由于其自身的发展在一个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在世界上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在当前阶段，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发展所产生的有害结果以及七十年代积累过程和投资活动大幅度减缓所造成的影响显露出来了。

在许多国家，失业再度成为尖锐问题，不平衡加剧，不安和解体现象正在发展。

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开创的种种可能，同为数众多的人及所有国家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尖锐。要求人类解放的潮流和新旧形式的压迫，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更加扩大。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拥有为自己创造一个进步和自由未来的办法，然而，倒退和威胁的危险笼罩着人类命运本身。至今，对于当代人类的这场活剧所作的回答，甚至整个工人运动的回答都显得同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不相适应。出现了为重新确立并实现和平、自由、平等这些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需要。因此，意大利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产生了关于走向并建设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条新道路的想法。

(二十) 人类生活在日益增长的军费重担之下。至今，安全仍靠力量均势来保障。据统计，每年世界上约有四百万亿里拉用于军费开支上。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由北约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负担，美国和苏联约负担一半。而其他国家也在增加它们自己的军事费用。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杀伤力越来越大的武器制造出来了，最近竟然决定进行制造中子弹的准备。这一切不仅为今后造成可怕的危险，而且就在今，由于资金的浪费已经使得饥馑、不发达、过较为象样的人的生活这些令人痛苦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二十一) 有十三亿人生活在每人平均年收入七万里拉的国家之中。有六亿人经常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下。与此同时，在工业化国家，生产力有着整个人类历史上最迅速和最大幅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靠牺牲落后国家积累起财富的。这些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短而是扩大了。

贫穷使人口问题更加严重。在工业化国家里人口增长明显地

减缓，而在最贫穷地区，人口增长变得无法控制，使不平衡更为严重。今天世界人口约为四十亿，按照当前增长率计算，二〇〇〇年时世界人口将翻一番。过去和现在，大量动力和原料资源因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多国公司的政策而遭掠夺白白浪费掉了。这种统治和政策使最强大的国家以廉价获得原料供应。一种能源危机已经出现。对于新能源的研究工作则由于垄断资本企业控制着现有资源的分配和改造而为它们所限制。

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则是以多方面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得到发展的。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第一次出现了发生无可挽回的变化的危险，从而形成了“生物圈”遭受破坏的威胁。

这种种害处在过去和现在都使得许多人把精力集中在因发展而造成的危险上。他们常常是本着一种谴责工业化、技术和科学本身的思想建议对发展进行限制。

科学与知识在社会上的发展和普及能够也必须远远超过当前水平。科学和知识必须真正为全人类服务。今天科学研究的许多部门还利用得不够或不好。这是由于那些掌握着对知识及其发展的利用的国家或政治军事集团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有着巨大可能在使所有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但这种可能性首先就同特权这种旧有逻辑所主宰的强大利益结合体发生冲突。

(二十二)争取使人获得解放的思想、运动和斗争所走过的道路是极不寻常的。老一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阶级、性别的剥削和统治显得难以忍受并且越来越无法忍受了。然而这并不意味它们就甘愿退出阵地。新的统治形式出现了。但是，矛盾的出现和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是禁止不住的。

反对多少世纪以来对妇女的压迫的那种妇女觉醒在扩大，这是具有决定意义和新的事物。工业社会的形成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为妇女解放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加给

妇女的那种最古老的屈从地位，即对男人的屈从，也以新的形式同阶级压迫一起延续下来，工人运动自从它诞生时起就以最高的表现形式认识到这个问题。工人运动为妇女解放、为妇女参加工作，受教育和参加政治生活而斗争。但是这还不够，正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的，尽管那里在解放妇女群众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今天，妇女问题所具有的新的规模反映出妇女体验得更为尖锐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涉及生活的全部组织现状。工人运动应当把争取妇女彻底解放的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

二、世界经济趋势

（二十三）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并不象一九二九年那样表现为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而是一种持续的不稳定和不安定的局面。发展阶段越来越短，衰退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经常。比前三十年要高得多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到处都顽固地存在。

当前经济阶段的特点，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平衡发生危机，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强国——美国，借此确立它对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霸权的种种关系和机构发生危机。

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早已不存在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加强。在货币的种种表面现象掩盖下，国际分工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是在它们同原料生产国之间，贸易率和力量对比改变了；石油和能源危机产生了种种后果。混乱和紧张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关系的特点。

工人群众和工会在发达国家赢得了更大的谈判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不发达国家有了觉醒。这就首先要求欧洲国家在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方面有根本的改变。在这些国家里，以不加区别地和畸形地提高个人消费为基础的发展已不能持续下去，而依靠仅由劳动阶级付出代价的办法来对付危机也行不通了。也是

由于这种看法，产生了执行一条节约路线，平均负担必要的牺牲，更合理地使用资源来确定一种新的更高的福利思想和应予实现的文明目标的要求，以便有一个更为协调的交往生活并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更为自由的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日益需要国家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以及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使得一个基本矛盾更加尖锐。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过程社会化与大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对经济实行社会监督的要求与现有管理经济政治权力形式之间的矛盾。

(二十四) 生产形式发展本身使得国际一体化进程成为必要并且开始进行。多国公司也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然而，资本主义国家间却没有一个对付危机的共同战略。就在资本主义地区内部，不平衡发展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化。

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裂痕和不平衡在增加。这些裂痕间国家所起作用的严重危机因素交织在一起。近三十年来，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职能扩大了许多。这种扩大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消费品的积累和扩大以及社会的积累和扩大的进程。开支增加了，但是收入没有按比例增加（“税收危机”）。为了对付危机，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和技术的效力在降低。

重大的利益迫切要求强行提出种种摆脱危机的道路。这些道路不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根本改变。而想要做到这点，除非使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付出代价并且冒着专制主义复旧的危险。这就是在本国和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

(二十五) 尽管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为改变贸易率作了努力，但危机在严重地影响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试图找到一条统一的行动路线。这既是因为所掌握的能源和资源不同，也是

出于更为普遍的政治动机。

这些国家当中有些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在为争取一种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而斗争。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本地资产阶级同垄断资本的联盟指望进入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去。从而出现了使阶级冲突尖锐化的新的剥削形式。

资本主义大国在制止贸易率朝向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利方面变化上基本是一致的，正象迄今为止“南北”谈判和会议的消极情况所表明的。

(二十六)世界经济危机在具有社会主义方针经济的那些国家里也有表现，尽管性质有所不同。苏联和经互会的欧洲国家有了较高水平的工业化和发展(但差别显著)。它们实现并且保持了充分就业，良好的社会服务，教育大大普及，文化和科学的许多方面也大大普及。军备竞赛所造成的日益增加的费用使它们负担沉重并且妨碍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在六十年代实行了试图在国与国之间采用不同形式的经济核算制一类办法的改革，但计划化和企业间的正确关系问题仍未解决。大的经济部门间的严重不平衡依然存在，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技术落后。这一切也造成了社会的紧张局面。

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也由于进入国外市场的艰难，资本主义危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上，也反映出来了。

至于中国，在革命成功继而取得重大成果之后，近些年来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这也是由于激烈的内部政治斗争和错误方针造成的。它今天提出了在寻求工业最先进国家的合作之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要求。

在所有遵循社会主义方针的国家中，日益增长的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即提高生产率和效率的要求，在充分展开的争论中提了出来。从而使计划化概念和方法问题、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全体生产者和公民参与在经济、社会和

政治生活方面作出决定的问题更强烈地提了出来。

三、国际政治关系

(二十七)近年来，国际局势的缓和进程有积极结果，但目前出现了令人担心的停顿并有产生危机的危险。

越南人民的胜利结束了野蛮的侵略并使缓和有了新希望。在欧洲，缔结赫尔辛基条约确立了欧洲大陆的和平关系并且使之更为坚实。

然而，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恶化因素，首先是在两个最大的强国——美国和苏联之间。为了能够在和平中走向新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谅解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是不充分的)，不这样，整个国际局势将会越来越糟，就象目前正在发生的那样。苏联和中国之间严重对立的持续看来是危险的。在新独立的和有社会主义愿望的国家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甚至军事的冲突。中国同越南和越南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也引起了严重的警觉。

不论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各强国间的竞争和对立都在加剧。出现了日益增长的获取战略基地的趋向。这种趋向由于其前景而令人担忧。这样的局势也在不结盟国家之间造成分裂。

(二十八)由于在越南的失败以及这次失败对美国国内的影响而形成的严重政治危机，在美国新政府的国际政策上出现了可观的变化和矛盾的倾向。在思想方面和在世界一些地区，它同苏联的对立更为突出。它对于一些国家(其中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仍在进行公开干预。不论是在公共舆论中，还是在国会和政府内部，都有另外一些倾向在反对这些倾向。这些倾向通过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反对在国外进行新的军事干预表现出来。从而总的出现了一种以迟疑不决和动摇为特点的政策，而这种政策趋于脱离旧日更为僵硬的框框而以较为灵活的方式起作用。

按照一条单一路线把整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重新统一起

来的思想（三边委员会）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继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德与日本进一步强大起来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更为公开的辩证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中等资本主义强国。这些国家想要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如在巴西或伊朗，树立其压倒优势地位。

（二十九）在“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和国家在充分确保其政治与经济独立方面的困难依然存在并且常常是更加严重了。

为了保持旧宗主国对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的统治，新殖民主义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正因如此，解放进程具有着动乱并且有时是流血的性质。

种族主义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但在许多国家中，它不论是作为思想形态还是作为具体政治实践都还没有被完全战胜。然而反对一切顽固存在的形形色色种族主义，特别是南非、罗德西亚和纳米比亚的那种最离奇的种族主义的斗争具有了巨大规模。反动的专政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皮诺切特的血腥独裁政权仍在智利持续下去。象伊朗和尼加拉瓜政权那样的一些政权的特点是犯罪与屠杀。美国政府对待这些事实的态度使其自称为人权保护者的托辞令人不能置信。

但是，在这些国家内这并没有能够制止人民为自由进行斗争。在许多地方，情况的特点是大规模群众行动和公开反叛。甚至在选举方面也取得了成就，如在巴西，到处有了进行民主斗争的可能和空隙。

不结盟国家的运动遭受了十分艰巨的考验，它在保卫和平与寻求一个建立在更为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方面过去和现在都起重要作用。

经过这样一种历尽磨难和障碍重重的过程，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正在出现。在世界各地区，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种种原因，中等强国在不断增多，虽然它们还是以各种方式同最强

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联系在一起。同实质上是两极的世界相比，一个多个中心的和有着各式各样的极的世界趋于显现出来。

四、西欧形势

(三十) 西欧这个地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曾经是世界 的 中心，而在短短几十年后，失去了它几世纪以来的压倒优势地位。西欧国家肩负着重大责任。在由于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所发生的危机而变得十分混乱的世界上，由于从美国到苏联，到中国所建立的种种新的力量中心，今天的西欧在政治上并且也部分地在经济上，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西欧国家仍然保持它们的重要地位，但它们不能起自己的自主作用。听从美国的支配以及欧洲大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分裂都对西欧产生重大影响。

(三十一) 西欧国家的生产发展和财富积累(这在过去由于殖民地剥削，在现在则由于新殖民主义的存在而得到保证)使得一部分欧洲居民有着高消费水平。但是当前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和各国人民与新的国家的进步使这些条件成为问题。

于是欧洲国家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即：不顾旧日流血冲突的影响，寻求多国团结在一起的形式以便通过新的合作关系加强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在开始时(五十年代)是符合其促进新的经济发展任务的，也是符合美国为大西洋联盟打下一个经济基础的利益的。

在冷战时期，欧洲组织的种种企图所具有的反苏作用很清楚。然而，一体化进程显示出由于新的生产规模和经济规模而造成的客观发展因素，此外，这些年来，在欧洲资本主义集团中，对于需要同欧洲的另一部分积极发展关系和执行对美国更为独立自主的政策(为了缓和并且为了西欧的利益)，也逐渐出现一种日益增长的认识。

(三十二) 近年来，民主和左派力量在西欧有了巨大的进

展。在希腊和葡萄牙政权垮台之后，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法西斯残余佛朗哥政权被消灭了。在不少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逐渐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和左派热潮。反动与保守势力对这种热潮进行了强大的反攻。至今这种反攻仍在全面展开，妄图阻止欧洲工人和民主运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历史性危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特别是斯特劳斯的那个党）、英国保守党人、法国温和派人士、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最保守势力在方针上的一致使得保守势力复辟的威胁日益严重。这种保守与专制势力集团不仅能够在旧的统治阶层中找到基础，而且也能够在中间阶层，甚至在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中找到基础。这些阶层为现有生活条件将成问题这种危险所吓倒。他们没有充分认识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和深刻性。大张旗鼓地丑化革新理想和革新纲领的宣传搞乱了他们的思想。这样一种保守倾向将会加剧社会矛盾，把危机的重担转嫁给劳动群众。

五、争取实行和平政策

（三十三）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仍是民主力量和全人类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缓和进程今天重新得到充分的和生气勃勃的发展。应当坚决地反对任何朝向冷战那种对峙局面，十字军精神和低估核战争危险的倒退。必须施加压力以便由所有有关国家进行谈判，首先为局面最为紧张和危险的地区（从中东和非洲以及亚洲的某些地区开始）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出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在一个决心为和平而斗争的广泛力量阵线的发动下掀起极大规模的群众性倡议和斗争，缓和与和平共处政策就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各种解放运动、各个政党、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虽然思想倾向不同，都可以并且应当参加这个极为广大的阵线并且成为主角。意大利需要并且能够沿着卓有成绩的传统道路离开各

种争取和平与裁军的群众性运动和倡议。有着不同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的各种力量汇集在这种运动和倡议之中。

缓和与和平共处的进程要求关于裁减和监督军备以及关于集体安全的谈判有所进展。必须保证联合国的充分职能。必须制止当前的军备竞赛并扭转趋势。今天的主要目标是积极完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制止当前的核扩散，裁减原子军备，禁止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任何新的大规模摧毁性武器以及均衡地裁减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在欧洲，均势问题是指为两个集团的军事力量规定出限额并且规定出对等地减少军事义务的期限和阶段。控制常规武器的生产和出售，日益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

自从工人运动产生之日起开始，裁军就是它的理想的组成部分和决定性部分。使这个斗争重新活跃起来，使它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统一行动的中心，是今天的一个主要任务。这个斗争标志着每支社会与政治力量适应当代人类首要需要的能力。实际上，认为可以无止境地在恐怖均势下生活是错误的。相反，今天军备确实已经使得这个世界生活在一种非人的恐惧条件下。

(三十四)过去和现在，共产党人都是主张在作出明确的和相互的安全保证基础上逐步消除欧洲分裂为两个对立军事集团的局面。在世界上和在欧洲，当前和平还在以实力均势为后盾，只有避免单方面破坏现有均势（这种作法非但无助于缓和进程反而会使它复杂化），才可能实现消除分裂局面的进程。因此，意大利有必要留在大西洋联盟内。大西洋联盟必须本着纯属防御性的目的，在它建立时所规定的明确地理范围内进行活动。意大利在北约组织内部不应当放弃自由地和负责地发挥其自主的积极作用和进行斗争，反对那些极端主义和侵略性立场。

六. 争取国际经济的新秩序

(三十五)争取和平、争取国际合作和争取实行和平共处政

策的基本要素越来越是包括在经济方面也争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行动。在世界市场上确立以互利和权利平等为基础的新“准则”是长期的任务和行动。一个各国人民、各个政党和各个国家的阵线对于这点也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做不到的事情。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结盟运动、各劳动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政治界、文化界和科学界许多人士都对此极为关切。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类型国家对于这种争取建立一个国际经济秩序的进程的贡献是主要的。

在这种前景下，在认识人类各种问题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方面向世界上所有国家提出了紧迫的问题。首先，在资源和能源的使用上需要一条普遍的反浪费斗争的路线。还需要在所有国家之间就原料价格、工业生产价格、工艺技术价格进行统一谈判以便彻底改革世界贸易和修改关税和贸易协定。此外，制订一个世界食品规划是必不可少的，这也要通过很好利用国际发展农业基金所提供的新的干预手段。

今天，所有各国，不问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如何，在协调一致和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并制订出共存条款这样的目标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这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出现取决于缓和与裁军的进程和在各国间造成一种新的信任气氛。这种秩序也取决于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各国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演变。

不依靠各个不同地区（经济和货币地区）之间的配合（而这是符合一种希望在国际关系中有更大民主的要求的），就不能充分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七、欧洲经济共同体

（三十六）在欧洲共同体内，需要走出当前的局面。必须把共同体改造成一个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机构。为了更好地着手解

决货币问题、资金周转问题、工业改造问题、能源问题、农业问题、生态学问题、科学研究问题，需要有一个任期多年的政权。意共过去为建立一个经过民主改造的欧洲共同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准备继续为此作出贡献。议会应当拥有必要的采取主动行动，制定政治方针和监督执行机关的权力。如果同各国议会建立起积极关系，还将会加强共同体机关的民主化。沿着经济与政治统一的道路前进并在尊重各个国家自己的联盟之下，欧洲经济共同体应当确立其既对美国又对苏联实行友好政策的自主作用。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应当有一个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始终一贯的政策。西欧有着巨大的经济与文化潜力。它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机床制造工业的产品、成套设备、公路桥梁建设和先进 技术 资料。西欧可以立即提供技术、教育、卫生援助。这样的合作路线自然要求不仅不进行军事干预而且也不采用任何其他形式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相反地，应当执行一个以放弃旧的压制和统治作风为基础的主张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政策。

要想使争取建立统一的欧洲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就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工人阶级积极提出政治创议并且同共同体机构积极建立关系。没有工人阶级及其几个政党坚定地参加进去，就决不可能建立人民和劳动者的欧洲，而只能听任资本家集团和跨国公司为所欲为。

欧洲左派的困难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欧洲统一前景而造成的。不论在某些共产党内还是在社会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内，对于建立一个确有权力的欧洲组织的种种激烈反对意见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尽管各有各的动机。在欧洲左派运动的方针中不仅缺乏对当前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的认识，而且更缺乏对世界危机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的认识。

欧洲需要工人阶级确立一个不单是为了维持并部分地改善现有条件，而且也是要改造社会结构的方针以便同世界上的各种进

步力量建立积极关系并在欧洲本土实行一种不同的和更高质量的生活。

(三十七) 意共把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看成是共同体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时刻。迄今为止，欧洲共同体仍是由上面建立的一个组织。每个国家都力求在那些造成瘫痪局面的斗争中，不仅维护其特殊的民族立场，而且更维护局部的狭隘利益。事实上，常常不顾并损害那些最弱小的国家的利益。在共同体内树立了那些最强大的国家的权威。意大利常常不得不退让，特别是在土地政策和大区政策方面。

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具有旧中央集权国家的种种特征的超国家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多国家的新政权。这个政权可以本着各国人民进行真正合作的精神，依靠其民主结构和民主方法进行工作。

初次选举不是按照共同的选举法进行，而是按照各自自己的选举法进行，并且是按照不能保证弱小力量的充分代表数的方法进行。新议会的任务之一就应当是通过一个对整个共同体地区有效的欧洲选举法。

在选举前夕组成了一些欧洲党，这些党企图在所有各国都提出一个共同的纲领并且采用共同的标志。这种活动纯属宣传性质，但它所掩盖不住的是：在种种原则性声明的背后，每个组织（社会党人、天主教民主党人和保守党人）的内部在共同体的那些具体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同其他成员国的共产党人之间也有分歧，不过这没有妨碍西欧几个大的共产党在根本性大问题上，特别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方面，制订出共同的立场。

意共赞成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共同体。它们的参加应当成为全面修改共同体政策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总方针的时机。

一个有劳动者和人民意愿的支持，拥有一个民主的政权的统

二的欧洲可能为解决世界危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在这个革新欧洲的时代，意大利共产党人将一如既往致力于民主力量的最广泛的团结。企图把各国内部现有的政治分歧机械地搬到欧洲方面是毫无意义的。

更为直接地代表着欧洲工人运动的形形色色的欧洲左派如果善于消除旧的分歧并且与此同时朝向同其他民主力量，特别是同天主教运动最先进部分的合作开放，就将能够在建设欧洲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八、意大利的对外政策

(三十八)由于各民主党派在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我国在世界上的行动方针这些根本性问题上的汇合正在逐步形成，意大利的对外政策可能并且应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便成为一个缓和、和平共处和合作的政策。共产党人重申他们的决定不是权宜之计并且要求各民主党派为了形成一个促进全国团结而不是分裂民主政治力量的对外政策作出贡献。在大西洋联盟和共同体义务范围内，意大利可能并且应当清楚地确认它在选择国内政策方面的自主权，也就是在共和国宪法范围内意大利人有权使能够让意大利摆脱危机并且保证意大利实现民主和进步中的安定的那些政治、经济和社会抉择占上风。

意大利可能并且应当在维护我国安全下特别致力于在欧洲推进缓和政策，使所有签字国实施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全部条款并且寻求能够限制军备竞赛的那种谅解，使有监督、有计划的裁军进程开始。

在中东，意大利应当行动起来争取按照联合国原则和决议实现公正的和平。这种和平将能够确认中东地区所有各国和各国民的权利，包括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其国家资格的权利在内；争取通过谈判和参照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的原则消灭非洲的战争温

床；争取在南部非洲取消种族隔离主义政权和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确认那些国家的独立和自主以及那些国家居民的政治与公民自由。这就要求意大利在所有国际会议上进行斗争并且它本身应遵守禁止向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武器的规定。

为消除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实行并且扩大同新独立国家的合作，支持争取自身解放的各国人民，这些都是意大利的根本利益。

意大利可以并且应当不断进行活动争取消除地中海区域的紧张局势，争取按照赫尔辛基会议的规定使缓和与安全进程扩大到该区域，争取在地中海沿岸所有各国间建立合作关系。

需要保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负责意大利国际关系的各种机构之间的一种更为全面的配合。

(三十九)依照全国移民会议的精神，必须为维护和确认在国外的意大利劳动者的利益和权利作出特殊的努力。

共产党人要求我国政府把移民问题作为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对待。因此，共产党人反对天民党的许多人士和其他政治力量的方针，他们企图不让侨民参加同他们有关的一些事业（如领事委员会、救济金、学校）的管理并把他们排除在争取侨民问题获得民主解决的斗争之外。

至于将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意共要求这个议会执行符合欧洲经济共同体曾经一再承担，但各民族国家几乎总是推卸的那些义务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点是稳定就业，通过一个侨民劳动者章程。这个章程要求各届政府确认并且保护侨民劳动者的平等公民权、政治权和组织工会权。

第二章 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各种 进步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合作

(四十)当代世界的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使得一切民主与和平力量的合作特别是共产党力量和社会党力量之间的合作，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和进步运动之间的合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这就要求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许多时候以来，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概念和实践的必要性就已明显。这种必要性产生于历史进程本身。在历史进程中，受到十月革命的激励或促进，伟大的解放潮流在世界上出现。在各个大陆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中，在有着极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遗产、国家形式、国际地位的国家中，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经验得到了实现，现在仍在实现的过程之中。在另外一些曾经长期遭受压迫的国家中，一个强大的民族觉醒运动展开了。

这个进程使得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样的进程是在一个个国家单位范围内进行的，旧日传统对这些国家有着深重的影响。民族觉醒本身在过去和现在都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愤激。在比较强大和比较弱小国家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企图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这不单单是严重的国家争端重新出现的根源，在这种关系中也表现出新的矛盾。事实表明，不能对组织社会提出唯一的模式，由一个代表在全世界代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是做不到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越发展，国与国之间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越是显得不能接受。

应当勇敢地和目光远大地摆脱国与国之间从旧日关系中以及从过时的国际主义概念中承袭下来的那些框框，应当推进国际局势缓和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最严重的危机并且在那些经

过本世纪伟大的社会和民族解放进程而诞生的和正在诞生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之间建立起平等合作与友好关系。不作这种努力，矛盾和冲突将会进一步恶化。

(四十一)任何人都不能够无视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在世界上的影响。没有一种政治力量，不论它持什么观点，能够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具有进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力量不能想象能通过敌视上述国家和对其发动敌对宣传运动来促进他们自己为之进行斗争的事业的发展。自然，一种友好与谅解的态度要求进行辩论和批判性研究。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在他们斗争的不同阶段都曾经从那些国家得到有效的支持，常常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支持。他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抱着希望和同情心来看待那些国家和它们在国内和社会上的成果的，把它们看成是阶级结构正在发生彻底变化的社会。

这些社会所走过的道路是积极经验、痛苦和错误的宝库。对此，每支解放力量都应当加以考虑以便懂得（客观地和批判地）它的特点、可能性、矛盾和局限性。

(四十二)早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在大部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唤起了巨大希望。这是一种正当的期待，因为它对斯大林领导的时代的蜕化变质和犯下的罪行所作的谴责；对在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的教条主义僵化所作的批评；以及承认各个革命进程历史性地日益不同并且承认应当懂得、尊重并鼓励这些具有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特性的革命进程。

早在一九六四年陶里亚蒂就曾经通过他的雅尔塔备忘录告诫说，人们在二十大的道路上不会是始终如一地和勇敢地前进。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预中断了那个国家对于一条民族民主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讨并且在进行了这种干预的那些国家内部也产生了消极后果。

然而，之所以没有在二十大道路上前进是有个原因的。那次

苏共代表大会没有追溯历史情况来从中找出使它所揭露的种种悲惨事件得以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没有把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来讨论。

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开始的那个进程的高昂代价是由于进行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时所处的客观条件所致，但同时也是由于经济、政治提法和方针上的缺点和错误，由于诸如严格集中的规划、全部经济国有化、农村实现集体化的方式和时间、把党同国家等同起来这样一些抉择所致。这对阶级之间关系、政治关系、国家一些机构的性质都有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群众文化提高、社会主义革命所内含的民主前提；一方面是妨碍展开一种充分民主的生活，妨碍行使某些基本自由和权利，妨碍劳动者充分参与管理的那些组织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式持续下去，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一个严重的矛盾，这个矛盾长期存在下去。

这一矛盾是因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在西欧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种主张应当从列宁思想或者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去寻找首要原因的论点是荒谬的。这一矛盾也是因不理解理论阐述同具体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即使是列宁的理论与政治著作，自然也应当给以严格的批判性研究以便从中掌握其局限性。但列宁仍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他的教导对于进行变革现实的调研和工作仍是重要的。

苏联所实行的计划化、国家、党、共产党同国家关系的模式基本上已成为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不应当低估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甚至是基本的差异）。看不到这些差异将是错误的，而过去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这些差异的客观基础，正如当初对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作的初次独特的尝试时那样。之所以探索新的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和探索组成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理想所固有的民主和自由要求的社会的组织形

式，也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差异。

(四十三)今天在世界上，正是由于革命思想和革命进程的发展，解放力量的广度和密度较共产党地区更大。各国共产党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因此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前提首先就是实行平等准则。

在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更广泛地讲，正如在工人运动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上一样），应当养成一种严格尊重每个党的独立自主的习惯。应当排除对各党的内部生活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这不应妨碍交流经验，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严厉的批评。讨论应当是坦率的开诚布公的，但光明正大，尊重别的党，愿意理解别的党提出的道理和愿意消除分歧并且积极地解决问题。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自己宣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应当遵守国际法原则，遵守联合国组织宪章并从而严格地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和自主。

从扰乱当代人类的那些大问题出发，革命力量之间可以出现种种形式的汇合，并且更进一步，可以出现种种形式的合作与团结。然而不仅是共产党人或者革命力量关心这些问题，也不仅是工人运动关心这些问题，更加广泛得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阵线也关心这些问题。

提高所有各国工人群众对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的认识以及这些利益是同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对立的认识永远是必要的。但是今天则应当超越这个概念以便实现虽然不属于工人运动，却在致力于和平，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那些力量的谅解等合作。

(四十四)在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概念下，应当对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给予特别的注意。意共过去和现在，甚至在国际上都是致力于促进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交

流思想和汇合的。

通过批判性交流，开始一个消除历史分歧并把西欧工人运动重新统一起来的进程的条件今天依然存在。

西方几个共产党通过欧洲共产主义所采取的那条路线使这种可能性更为显著。欧洲共产主义也反映出对于西欧国家劳动者的有组织运动因西欧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它们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国际化而面临的共同任务的一种认识。欧洲共产主义是一整套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政策和理论主张，它已经为那些认识到当代世界的根本性危机并且不愿意放弃争取为人类创造出一个进步命运的人们看作是个新的希望。

第三章 意大利社会的危机

一、危机的广度和特点

(四十五)意大利的社会和政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处于长期紧张状态之中。这一危机的特点和表现，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使得全部公众舆论并不总是能够看清楚它的所有各个方面，并且使得人们在截然相反的看法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倾向于简单地否定这场危机的存在，一会儿又强调危机的种种现象，大肆渲染危机的严重性。

意大利的危机（脱离整个国际形势就无法理解）有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独特的和更为危险的方面。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我们看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巨大浪费，生产基地趋于缩小，南方问题仍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南方的不平衡趋于加剧，各种现象都更为严重。这场危机也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意大利社会经济的那种发展造成的后果。危机使得国家的长期管理不当现象更加严重，这是由于天民党与

某些社会阶层的特殊联系，由于天民党所特有的寄生性和任用私人，由于实行公共干预经济生活所采用的方式造成的。

天民党撕毁了团结与革新公约，这给政治上带来决定性影响。而共和国和共和国宪法是从这一团结与革新公约产生的。三十年的反共歧视使所有民主和政治关系走了样，也包庇了国家的管理不当和腐化堕落现象。

工人、人民和民主运动力量使得旧的准则发生危机，古老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遭到抛弃。在意大利社会的各部分，一种新的，更加坦率的社会和公民觉悟出现了。一种渴望解放的要求出现，尽管有错误和颓废情绪。新的自由权利和公民权利得到确认。对于一种新生活的向往极为普遍。这一切与经济权利的集中，与利用强大的群众性宣传通讯工具来左右意见和生活习惯的情况相对立。保守集团的抗拒过去和现在都是极为强大的。而工人、人民和民主运动的行动还不能够避免错误，还不能够使新的准则，新型的和更为高级的生活方式，新的组织社会方式作为普遍事实得到确认。

危机也波及道德领域，这里也出现逆转的危险，特别是青年一代中的一部分人，他们发生了混乱。暴力思想和行为危险地扎下了根，腐化堕落，甚至吸毒的现象不胜枚举。

(四十六)离开意大利形势所特有的根本政治条件就不能够理解危机的种种现象。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之后，对共产党的歧视遭到挫折，并且开始了遭到阻挠的民主团结进程。人们对这一民主团结进程发起反攻，旨在阻止革新法律和条例的通过。更广义来讲，旨在阻止工人运动掌握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煽动和利用五花八门，甚至行帮主义、反对政党、反对国家的倾向和现象。由于这一切，使得形势的消极面更加严重，造成一种朝不保夕，不安全，对于今后十分捉摸不定的气氛。

意大利就这样生活在一个极其危急的阶段。恐怖主义的进攻

是这一阶段最严重、最危险的现象。从喷泉广场事件至今已十年，而许多持纳粹法西斯立场的集团至今仍在活动。所谓“红色”恐怖主义的政治思想根源性质不同。它们是属于各种理论和各种思潮的、变形的、狂热的思想和立场，是从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主义到天主教的思想和立场。恐怖主义使公众舆论向右转，而且企图对群众参加具有我国民主制度根本特点的政治生活进行打击。恐怖主义想要推翻意大利民主：因而无论如何它总是为反动派的反攻所利用。

因此，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形势紧迫。

(四十七)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整个形势也是十分矛盾的。从一九七三年以来，意大利经济的发展速度减慢了（这也是由于一九七五年的衰退），实质上与欧洲其它国家的速度迟缓是一样。但是，在危机中，出现了生产机器在工艺技术和组织上的现代化；同时，也出现了生产方式分散的种种蜕化现象，而这些蜕化现象是建立在使用黑劳动力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是以使用无工会保护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为基础的。在一些部门，中、小型工业表现出它们有很大的革新和扩大自己活动的能力。而相反，一些公共的和私人大企业的危机危险地加剧了。

尽管存在着通货膨胀，但工会斗争和左翼政治活动稳定并提高了工人工资和雇员退休金的实际购买力：这个成果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是独一无二的。有着一份以上工资或薪金劳动者的家庭的数字很高。私人消费仍相当高，尽管畸形现象依然存在。但是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观点看，我国现实的特点仍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特别是北方和南方之间以及南方内部的巨大差别。

生产基础仍不足以保证解决我国的根本问题。结构现状，即使是在我国最工业化地区的结构现状，就使意大利经济在新的国际分工下处于落后状态，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使我国面临国内不平

衡加剧的危险，也面临把我国排斥在外的危险。（指一些工业部门、研究部门和设计部门）从一九六四年起，积累率与其它欧洲国家的相比，就已大大降低。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出现局部的生产复苏之后，我国积累率比其它国家降低得更为明显。国内产品固定投资的毛值百分比从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下降到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十九点九，一九七七年为百分之十七。通货膨胀率比其它国家显然要高得多，而且有再度升高的危险。公共财政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更加紊乱，尽管这些国家的情况也是严重的。我们非常高的出口额受到国际经济情况的威胁。农业不能生产足够的产品来限制和控制我国在农产品和食品方面的进口：在这方面，贸易收支上的赤字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农村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差距扩大了。在“内地”不仅仅在山区，整块整块地区衰败的现象已十分严重。所有这些现象首先是使南方的恶劣情况和前景更加恶化的情况下解决的，现在仍有这一趋势，于是又一次出现人口大批外流。

在社会和阶级结构中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相应作用没有增加：工人阶级的严重差别日益扩大（在大工业就业者和其它企业就业者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工业各部门就业者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间等等）。从事农业的人口更少了，尽管与那些大发展的年头相比，农业人口的减少率要低些。妇女就业率仍然很低。服务行业的劳动人口增加了。老年人口的百分比明显增加了。在农业和工业中、中小实业家阶层加强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特点是，生产、商业，自由职业阶层越来越扩大。特别是在南方，在各个公共干预中心的周围日益出现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汇集。这一切就使社会各阶层划分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越来越绝望的期待就业，期待进入社会的被排斥阶层的影响增长了。除传统上被排斥阶层外，又加上了新的被排斥阶层。（青年人中间、妇女中间）在他们中间，

这种现象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危机加剧和恶化了这一情况：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希望进入直接的生产部门或者是一些为生产服务的行业。经济衰退，黑劳动力，劳动力市场所特有的严重不平衡和分裂现象一直在扩大。

在北方和中部许多地区，工业和城市拥挤现象正在增加。在南方（特别是在某些地区和在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失业问题达到爆炸性程度。同时，在意大利许多地区开始出现外国劳动力。

分配混乱问题尖锐了。意大利仍是在分配方面最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这甚至在劳动界内部也造成了社会矛盾和不公平。

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是脆弱的，严重的，充满了未知数。

（四十八）正象在意大利所表明的那样，国家越来越广泛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是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但是我们的国家有它独特的一面：首先，因为国家异常广泛地直接参与组织经济；其次因为国家的许多“福利”措施是民主和人民压力的结果。今天这个国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这也因为天民党和它的历届政府的政策使它的任用私人和行帮主义现象更加严重。国家财政似乎受到干扰，而且有时情况非常严重。使意大利变成一个工业国的迅猛变革，日益增长的混乱、失调、没有任何严肃的民主与改革规划政策，所有这些使旧的平衡处于危机之中。

一些重大的机构改革和规划法律使大区拥有新的权利和职能；同时大区更多地参与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开始了革新国家阶段，尽管这些改革和法律还不能使各个不同机构的关系，或是介入社会的方式发生决定性变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集中的官僚主义反对，由于地方政府机构全面改革的缓慢，这一缓慢进程给

有关大区的机构和作用也带来了缺陷。市镇影响不断增加，这在证明自治政策有效的同时，证明市镇结构不能胜任新的职能和职责。

公共开支增长和税收不敷用之间的差距（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病）在意大利急剧扩大。而与此同时，相对来讲社会服务和集体消费以及国家税收仍然是低的。一些主要的公共事业（公共管理，学校，司法等等）不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中一些公共事业处于困境，这不是公务人员的责任。

民主制度的机能也存在危机成份。以各有不同的方式成为公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最具体、最实在的形式的各民主政党在它们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遇到了困难和问题，这是由于特别是在大的中心城市出现的客观变化，也是由于民主政党本身行动的局限性。反动的、冒险主义势力企图利用这一情况，他们想方设法煽动舆论反对这些政党和制度。议会（尽管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之后表现出丰富的充沛活力）感到其结构和条例不适用。

二、民主的增长和新的矛盾

（四十九）意大利危机的特点也是与形势的特点相联系的。毫无疑问，从民主的观点和劳动者所获得的社会和物质成果观点看，意大利的形势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要先进。三十年来，意大利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进行了伟大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是先进的。最近十年，群众运动有了广泛的发展，尽管并不是总是找到保证进行持久、有效的斗争的政治表达方式和组织形式。新的社会阶层被卷了进来。尽管出现了严重的反民主的蜕变现象，甚至宣传和采用行动队暴力，但是意大利的民主增长了，并且在极为广泛的人民阶层中扎下了根。出现了明显的向左转。许多伟大的争取文明和自由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人们沿着抵抗运动和宪法运动所开辟的道路

前进。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工人、人民和学生斗争的伟大时期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并且标志着一个长期的民主动员，政治矛盾和进行争取变革社会斗争的阶段开始了，这有助于使新的力量，包括大批妇女和女青年参加进来。

意共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也是通过意共，从抵抗运动以来一贯推行的政治路线和它并非不加批判地参加群众斗争而作出的。在意大利，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不象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斗争仅限于青年学生，而是在持久的工人斗争中得到了最重要的体现。这是因为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有一个强大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有着社会主义方向的队伍。更具体地讲，有一个欢迎新事物，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民主建设和社会变革的共产党。

工人和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带来了新的、艰巨的问题。争取到了一些重要的法律，但是使这些法律付诸实施是很困难的。决定性的伟大成果（如劳动者权利章程）要求以另一种方式组织生产活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工资和定额方面的成就，也包括自由、民主进展和改革方面的成就）要求改变经济政策和政治领导，而这些经济政策和政治领导的改变一直遭到统治阶级和天民党内不少人的阻挠。没有以必要的规模和方式实行这些改变是产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十）危机给意大利社会带来了破坏性影响，人民内部的矛盾产生或者增加了。最为严重的是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工人阶级与其它社会阶层（中等生产阶层、知识分子、受排挤的一代人和受排挤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恶化。危险在于，在就业工人阶级中，对待民主问题，国家和南方问题的关心，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是代表国家总的进步利益的责任感减少了。

最严重的分裂危险和矛盾危险，首先是在南北关系上。由于近三十年来经济畸形发展而更加恶化的南方问题，今天已经到了

极其严重的程度。但这不仅仅涉及经济方面。今天南北分裂的危险更为严重和普遍。危险在于在南方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阶层中一种反工人，反工会的倾向发展起来，一种认为不再可能用民主斗争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的信念发展起来。天民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以及反动的、冒牌的南方势力已经在利用这一切。

危机使妇女各方面的条件恶化了。妇女的劳动问题也是这样，妇女或者被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去，或者只能处于一种从属的和无保障的地位，其它问题从社会服务行业到家庭以及男女关系这些最普遍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些矛盾可能找不到积极出路，朝向整个社会进行民主变革的出路。

在这种危机中，青年群众的要求和国家生产基础十分有限，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会变得更加尖锐和严重。尽管青年人的这些要求中有一些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反映，这些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已成为一种严重的堕落。危机的持续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力和知识分子力量的被排斥和浪费形成了一个危险：由青年人组成的巨大的民主革新潜力消沉了，失散了，在一场绝望的暴力反抗现象中解体了，或者又普遍对政治斗争失去信心了。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具体危险就是一部分青年人背离民主制度以及一部分青年人背离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和文化。

在最近一个时期，数量有很大增长的知识分子阶层本身，他们今天普遍感到不安，他们看到他们社会地位的不稳定。他们的业务和知识能力并不总是得到重视。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受到制约，并且有被大经济集团和一些政党利用的危险。

更为普遍的是，由于一些严重的蛊惑人心的立场支持和煽动，在整个社会出现了形形色色行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这也引起了一些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最终这些矛盾和冲突可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受损。在这种局面下，虽然大区与大区之间有别，也出现了地方主义、自治和本位主义的倾向，而对此是应

该弄清前因后果的。必须坚定地执行一个绝对尊重和保护地方特点以及文化和方言传统的政策。需要看到其积极因素，即：针对大文化企业的操纵所作的反应，但也要看到那些经济和社会集团的行动可能会导致的危险，他们指望破坏统一计划和从全国出发看待问题的主张。

(五十一)保守势力的反攻旨在对各种社会势力施加影响，利用危机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和不信任，利用危机所引起的个人方面的消沉和不合理现象，利用对迅速改变情况所寄予的希望的破灭。

保守势力的反攻企图利用恐怖主义的影响使公众舆论向右转。他们企图加强一切行会主义和分化瓦解的趋势，企图利用各式各样的本位主义。爆发了一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攻势并且宣扬资本主义和在意大利从未出现过的自我调节市场的能力。宣扬旧的经济发展形式，而这一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式是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空想地，危险地坚持要恢复旧的发展形式。

反攻也涉及机构和政治方面：它从揭露民主制度不起作用以及发生危机的一些实际现象出发，提出了在不必大动机构的情况下，实现保守势力复辟的设想。它企图利用那些正确的，不可放弃的关于保障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要求，来煽动那些破坏国家机构并最终将取消一切保障的自由主义立场。它企图利用群众对一些基本服务的严重缺乏和在民主发展中仍存在的堕落现象的反应来散布反对民主制度的情绪，妄图利用怀旧情绪，取消重大的民主成果（在司法、学校和社会服务方面）。

(五十二)这些年来，成为民主力量和劳动群众斗争特点的意大利民主力量的增长，和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和进展，以及在意大利人民群众参加公众生活的程度比所有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都高，这些就保证可以战胜保守势力的反攻，并且保证国家沿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明和道德变革的道路前进。

我们从关于危机的这些看法而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必须首先为下述任务工作，即：把人民群众团结在一个社会革新与变革方案周围，反对分裂倾向和分化瓦解倾向。

第四章 争取摆脱危机

一、工人阶级的联盟

(五十三)人们能够并且应该通过带有民主、经济、社会、文明性质的深刻变革使意大利社会摆脱危机：首先要依靠意大利人民的伟大民主活力和近年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企图倒退的妄想——倒退到旧的经济发展形式、旧的集权国家和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工人和人民斗争以前的局面中去——只能加剧所有的社会矛盾和弊病。

近些年来，意共为这种变革政策而斗争并努力在各个方面推进这个政策。它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详细的建议，如“中期方案”中所包括的那些。

要想使这一革新政策得到支持和推进，就必须有以工人阶级和南方人民群众、妇女群众、青年一代、城市和农村的中等生产阶层、知识分子的联盟为基础的一个社会力量的广泛阵线。为了使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必须在工人阶级内部增进政治思想上的团结，这一团结充分体现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充分体现了我国正在经历的历史阶段。为此，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必须在政治和文化上作出新的努力。

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首先是妇女群众——表达了希望以不同方式组织社会的要求，而这也是以社会和集体办法解决广大群众共同的需要为基础的。例如，关于解决为产期和婴儿服务的办法。工人运动应在争取建立新的社会文明组织和新的道德标准方面发挥作用。

准方面提高自己的斗争能力，目的是要获得最人道的，最友好的生活方式。非常明显，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努力争取建立男女共同负责的家庭，争取建立一个通过各种渠道来解决妇女群众的重大问题的社会。同样明确的是，应当努力解决失业和更一般地说是青年的前景的严重问题。

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于技术员、工业部门的职员、知识分子劳动者和公共事业的雇员所作的努力和所采取的行动应当更为有力。对于城乡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的中等阶层（农民、手工业者、小店老板、中小工业家）应当重新大力进行政治和思想工作。今天，在工人运动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工人运动内部也存在不少错误和不理解。在我国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必须突出这些阶层的地位以及他们今天在意大利民主中所起的作用。整顿意大利社会和使意大利社会现代化的行动注定要失败，这一行动没有涉及中等阶层的大部分人，甚至使一些相对优越的地位受到威胁。

对意大利社会进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变革以便使意大利社会摆脱危机的动力是极为广泛的。条件是必须战胜行帮主义和解体倾向，必须依据一条明确的变革路线，弄清每个人的作用和义务。

必须为之进行斗争的那条变革路线是艰巨的、复杂的。一切工人力量、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都应该为制定和阐明这一变革路线贡献自己的力量。意共指出这条路线的一些基本要点。

二、节约的规划化

（五十四）在意共看来，节约首先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这种选择与世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与人类所面对的戏剧性问题相联系。节约措施是意共作为实行革新政策的手段提出的：为的是改变广大群众的生活条件，使生活变得更加人道，更加文明，更

加自由；为的是限制由于政府的作风而造成的铺张浪费；为的是按照一个明确的规划改变工作方式和经济机构的社会目的，改革投资方针、生产和公共开支的方针以及消费的数量；为的是对同与这些相联系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以及意大利社会各部分的作用施加影响。

不大大改变对资源的利用，不把大批资金从消费转到投资方面，不使应该付税的人付税，没有将会改变某些生活习惯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新风尚，就不可能保障广大青年的生产就业，就不可能保证妇女有同等的工作权利，就不可能使南方有机地进入国民经济新的发展中去。紧缩措施是解决社会最贫困的那部分人的问题，着手解决就业方面的重大问题，保障社会越来越平等和争取确立新的个人准则和社会准则的唯一道路。我们所提出的节约措施并不是要想搞贫穷，也不是要倒退到古代生活方式中去。节约措施是满足——在可动用资源的范围内，通过最合理的使用——个人和集体的根本要求，反对各种畸形消费，浪费资源和宣扬错误准则。

(五十五) 制订能够把为国家的巨大需要进行积累的进程规定出来的民主规划和发扬政治民主，这种民主由于首先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可以促使越来越广泛的公民参加政治社会生活，这是我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它是民主变革进程的重要方面，它的内容已含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目的是保证所有人都有象样的工作，实现确保每个人的现代文明生活的基本条件的一种收入分配办法和社会秩序；逐步消除最严重的、不能容忍的产生于各种根源的不平等，最严重的剥削方式和被排挤出工作岗位的现象。

规划并不一定带来经济中公共成分的扩大，带来的是，使公共成分的作用直接与准备实现的变革和发展的大目标联系起来。规划应实际确定民主国家在制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目标时的集中作用和国家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优先地位。必须使国家和国家

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作用朝向制订一个通晓情况的变革社会方案方向发展，以使资源的使用更加符合至今仍被牺牲掉的人民需要，更有利于国家更大问题的解决。

这并不意味对规划持中央集权制和官僚主义观点。而是确立规划和市场之间的正确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国家不应该代替企业主。企业必须对其在活动和财务上的决定担负责任和风险。要想在规划和冲天干劲以及高度革新精神这些目标上取得更大成效，这点是重要的。市场上可以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需要，针对这些需要，就应该实行规划上的决定，优先考虑涉及社会和公民的重大要求。民主公共权力机关的任务是把各种倾向综合成为一个革新方案，在这一方案基础上进行干预，为我国的发展指出方向。

最近通过的一些法律是为了实行一项规划政策：关于国家预算制度和大区核算制度的改革，关于工业、农业、建筑业的改组（十年计划），关于交通运输（铁路计划）。必须通过特殊干预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以使中小工业企业以及手工业和合作社企业能够加强他们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市镇、山区居民点、省、大区都应该在为公众要求和满足基本社会需要制订规划方面进行具体的工作。这样就把那些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出路的要求变成有组织的要求了。这种要求可以对市场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生产活动有新的方向和新的发展。

特别是应当千方百计地帮助推广合作社和联合企业经验，这一经验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有其根基，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这一经验是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这方面，有必要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对国家投资的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势在必行。财政和银行制度也应调整（首先是中期和长期贷款）。对公共行政机关和普遍地对所有政府经济机构的改革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不进行这种改革，任何想要改变公共

开支的内容和投资及社会服务费用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

(五十六) 规划的中心任务——首先在这方面是与欧洲整体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对我国生产机构进行改组，这种改组考虑到新的国际分工并对解决重大的国家问题至关重要。另外，规划应把逐渐改变劳动质量(鼓励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和系统地保护健康)改变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通过以新的办法组织集体服务事业，通过学校与劳动之间新的联系制度和通过更快的科技发展)作为其明确目标。必须着手改变生产和劳力的组织方式，这也是为了达到高生产率。必须逐渐消灭使劳动力市场分裂为受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和黑劳动力市场的现象。这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极大的不平等，主要是损害妇女劳动群众。应该在对整个劳动力市场进行民主管理之下，研究新的灵活的劳动时间表。

规划政策的着重点是着手解决南方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未来的民主和社会秩序。必须避免象过去多年那样(天民党及其政府所造成的)仍然带有次要的和临时的性质。这就要求一项变革和发展农业的新政策；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业化进程；要求大大改变国家投资的政策；要求建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新关系。也必须在一个严肃的、广泛的有关公共事业发展高质量的，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部类活动的规划。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要替代发展生产基础的政策，而是要与之紧密联系起来。

在农业方面，规划应涉及(也要通过大区、省、市镇间的协会，山区居民点)农村生活条件的各个方面和地区与环境方面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用技术和文化水平都不错的青年力量。规划也应该采用一项新的研究政策。使许许多多农场恢复生产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农场由于商场的作用和以救济为主的措施的流行正趋于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首要目标是提供一切可

能改造和扩充农场的机会，甚至通过合作化和组成联合企业的办法。重新开发一部分未开垦的和荒废的土地是必要的。农业应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重大作用。

为了扩大生产基础，规划政策应该把有控制地、协调地发展能源的具体计划包括在内，并且应该把完整的交通运输政策包括在内。

三、就业问题

(五十七) 就业政策的目标是稳定(通过接受青年和他们的合作社)农业就业水平，增加南方工业的就业人数，增加在先进的服务行业、旅游业、社会服务业和某些公共行政部门中的就业人数。要想达到这些目标就要对生产基础进行大规模改造，并对服务行业和公共行政部门的活动进行改革和组织。这将要求实行一项建立在民主管理劳动者就业和他们必要的、大规模的迁移基础上的积极劳动政策。

有助于青年的一项临时就业政策(尤其是通过普及使学生可以得到劳动培训并用部分时间进行劳动的那种合同)将会促使今天的失业队伍掌握实际工作能力，并且通过这条道路促使他们逐步走向固定工作的形式。这一政策应基于利用所有的组织形式，应基于支持广大青年群众结社，这种支持是通过他们的联盟组织和统一工会而进行的，以便制定青年就业的方案。

关于妇女就业问题，必须看到，在最近几年，妇女和女青年参加工作的机会日益增多：这一现象的深远根源在于社会、思想和文明风尚的改变。首先必须千方百计地保卫妇女已经获得的工作；为贯彻家庭劳动法律而斗争；强制遵守平等法律；为国家生产机构的改组和发展，为保障妇女在各个部门有工作而斗争。

四、劳动者和生产过程

(五十八) 这些年来，在工会制订政策与采取行动时，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革新这些普遍问题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工会对要实现的发展目标和民主制度及劳动者的总体利益给予重视的范围内，作出了限制增加工资的自主决定。此外，任何规划都意味着实行一种收入分配政策，这一政策是靠利用对它有影响的一切手段（工资、税收、信贷和公共开支政策）而实现的。因此工会下述做法是正确的：为争取一个切实保证在南部扩大生产基础和增加就业的规划而斗争，并且认为不顾十年来在工资方面所实现的大跃进和按物价指数调整工资这一办法所体现的保障，要求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工资，而不顾这同经济政策是否相容和经济政策应予优先考虑的倾向是错误的、危险的。

另一方面，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和力量对税收制度进行妥善修改并通过市政的合作和参加来反对偷税漏税。必须进行有力的干预克服分配混乱的现象，实行议会调查委员会最后的统一指示。分配的现状，特别是在公共事业部门是难以维持下去了。这种状况也是造成社会紧张的那些严重现象的原因。实现公正的目标是任何一种愿从合理利用资源出发的收入分配政策及经济政策取得成功的条件。

民主规划应提出的发展和正义目标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必须考虑降低通货膨胀率这种绝对的重点需要，防止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升。对于每项政策，都应当很好地考虑经济和金融方面如何适应。也是为了这一目标，应该严肃地对待减少公共财政赤字的问题。

(五十九) 对于民主规划政策来说，劳动者参与对生产进程（在工厂内外）作出决定十分重要，这也有助于振兴积累过程。必须进一步扩大并明确工会已经争取到的企业一级与大区

一级了解投资及就业情况的权利。尤其必要的是使工会组织能够同企业主协会与大区一起讨论劳动力的调动、生产下放和家庭劳动的管理、专业培训，以及更为普遍地讨论各生产部门的投资政策，并对这些作出决定。

在工厂中，政党过问有关总体利益的一切问题（从维护民主问题开始）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对诸如能够使政治力量、工会力量、企业领导力量及技术力量就发展生产问题进行磋商的生产会议这样一类活动作出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立法方面，必须对社会的“预算制度”实行改革，以便保证预算非常清楚，对一切有关项目都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并了解确实情况。必须保证这些参与方式（特别是通过工会谈判而确定的参与方式）同民主规划的密切关系。劳动者参加决定经济政策是规划进程的基本组成部分。制定这一规划的初级场所不能不是代表大会，最后则是议会。为此，意共希望在体制方面也能规定工会参加制定有关规划总方针的方式及场所，从而把它在企业及大区的参与经验同代表大会的最高决定永久地联系起来。

五、争取改革国家和维护民主秩序

（六十） 实行规划政策就要求建设一个能够激发并接受公民最大限度的参与和监督，同时又切实地引导社会发展的国家。改革国家是实行任何规划政策和使公共民主政权具有新效率的必由之路。

对国家进行改革就应该根据宪法的规定最坚定地发展民主和正在进行的权力下放措施。这应该成为共和国牢固团结的基础。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了并且取得了象把立法权赋予大区这样重要的成就。但是这一进程由于集权制、官僚化和行会化倾向的继续存在，对此天民党由于其权力制度特别要负责任，由于反共偏见仍然存在，由于对我国民主生活日益严重的极权主义的威胁而

遭到阻挠。在国家和社会制度中存在的主要改革因素今天仍然同旧的国家结构并存。这些因素还不能形成坚实的制度。

意大利由于其团结和民主的特点而需要有个巩固的国家。同时也需要有个有效的执行机构。私利加上行政机关而构成的政府是不可能搞任何规划的，这个政府终将成为行会性质的支离破碎局面的化身。执行机关的改革意味着把行政机关的一些大部门集中在必须是精干的内阁中进行综合领导。国家应该象宪法所指出的那样完全以议会为中央，同时又有地方自治权力机关，首先是市镇和大区。这些权力机关应当能够根据宪法赋予的全部职能进行管理，在议会所规定的优先权和允许的权力范围内作出自主的决定。因此改革市镇和省的体制就具有原则意义，并且实际上是必要的和迫切的。这种改革也应该包括改组市镇。市镇应当（通过各种联合形式）担负起代表并管理本地区居民利益的总机构的职责。

大区应该把行政职能交给市镇，而只保留立法职能和就规划作出决定的职能；大区以全国性规划决定为基准点并有责任协助制订全国性规划。

意共重申它决心维护特别章程所规定的大区特权和权力。

此外，意共重申它努力保障、发展并充分尊重宪法所批准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六十一）共产党人根据不把文明社会的自由同国家生活对立起来的观点为争取扩大政治参与、充分保障个人自由而斗争。个人自由是维护和发展已经赢得的集体自由的前提。

基层民主的形式有了极大的发展。广大男女积极参加在工厂、街道、选区、学校、行政机构建立新的管理与咨询机构。他们通过政党及各种政治、工会、专业、文化、宗教、娱乐组织在有组织的、群众性民主方面取得了经验。但这些机构中的许多机构正经历着困难时刻：参与中心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往往既没

有相应扩大实际权力，也没有使群众组织和各党组织很好地适应新的现实；对于新机构同国家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基本职能的正确关系既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也没有有效地行使职责。这就有可能造成不信任、冷淡、行会主义的倒退、分裂倾向。

共产党人不把基层民主同代议制民主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在宪法的基本原则范围内可以大大地发挥群众进行管理和自治的能力，以帮助解决问题。这可以通过把各级参与配合并联系起来，并且从法律上阐明这种参与的代表性、职权与权力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修改某些由于局部任务而产生的民主机构的职能及作用，发展这些机构同整个自治体制、同立法会议及执行机关的关系。社会管理应该推动和提高而不是妨碍行政管理的效率。

国家改革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革新国家机构和官僚制。当前的落后状况是由于国家机构的历史形成，由于领导这种形成的阶级，由于在温和的领导下被吸收进来的旧官僚行政集团而造成的。这种落后状况也应由不久前的中右政府、中间政府和中左政府负责，它们使某些落后面越来越严重，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善助长了行会主义的倾向。必须在一切公共机关中来一个转折，以便使之具有更高专业水平和效能，使之民主化并具有道德水平。改革法律具有了革新因素，但国家机构基本上未动，必须克服这两者之间正在出现的矛盾。责任化、专业化、灵活化、民主化，这些是使国家能够适应规划任务而必须进行的改革目标。

（六十二）目前阶段，维护和保卫民主秩序，反对企图或正在打击公民公共生活和立宪国家的势力是首要目标。

首先是铲除恐怖主义，发现并打击肇事者及指使人。为此，重要的是国家的一切机构要严格执行法律。一切民主力量的义务是不断动员人民，使群众保持警惕，以制止对民主与共和国敌人的各种纵容及包庇行为。

从各方面看，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因此共产党员要首先致力于这一斗争，不断进行政治活动和最坚定、最不妥协的思想斗争。

为了维护民主，国家应该改革，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赋予国家机构以新的结构，加强治安部队和公安机关的行动效率。在这方面，应该迅速实施议会已经确定或正在讨论的有关司法管理、公安改革、情报工作、武装力量的法律和改革。

司法体制应予改革，要保障它的独立，加强它的结构。最后，应该进行并完成法典改革，使之适应宪法、宪法的准则及社会的民主发展。

六、学校、文化、广播电视

（六十三） 在学校和文化方面也十分需要、迫切地需要进行变革。

大批人上学这曾经并且是民主和文明的一个伟大成果，但是应该以改革政策支持学校的这种发展。由于天民党领导的历届政府的责任和短见，学校的这种发展因大部分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办校宗旨、机构以及文化、专业特点而受到束缚。

此外，由于大批青年进入中学和大学，也就是说由于专业水平、科学和劳动之间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在许多方面是困难和复杂的）而向全世界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意大利）要比其它地方表现得更为严重。

尽管教员及学生中最先进的分子作了努力和斗争，但是水平下降和一种普遍危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意大利青年及家庭。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如：青年失业和人口高度集中的现代工业城市生活条件所造成的一部分人被排斥和不适应这种生活，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既没有能力革新又纵容放荡行为。以致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危险的蜕化现象。

一种在科学和社会方面太落后、同生产部门脱节的学校再也行不通了。这种学校使人们抱着种种注定要破灭的希望；它对同样是失业的劳动力来说仅是个白白等待的地方。

共产党人应该为争取改革中学和大学而斗争。这种改革旨在确认教育、文化和科学所起的作用是平等、人类进步和解放，保证合格的工作能力、生产社会化的基本因素；共产党人要争取使学校能够创造和保证文化、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条件；这种发展促进国家的文明和生产。学校应成为这样一个场所：批判性地吸收基本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掌握认识的工具和方法，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受到作为人和公民的一种历史性的和科学的双重培养。

认真学习是为了自由。没有这种认真态度，不以新的勤奋态度学习在不断革新的知识内容，就不能消除歧视——阶级的、性别的、文化的歧视。意大利学校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减轻了这种歧视。

制止危机和衰退、乃至分崩离析因素的自发发展是工人阶级、劳动者、青年、妇女的切身利益。

应该捍卫并重新确认公立学校的作用，它是对新一代进行科学与文化教育的公共基本场所。

必须着手革新我们整个教学体制，从幼儿学校以及反对逃避义务教育的斗争出发，以便重新组织小学、中学，并最后通过高中和大学的改革。

经过半个多世纪，意大利议会正在取消那种把领导阶级的教育，下级干部的培养和广大群众的很不够的文化教育分开的旧式学校。这就要求除了有一种不被看作仅是通向高等学业桥梁的学校制度之外，还要迅速改革大学制度。这种改革应能保障教学和研究的自由，通过分科改组教学和研究，保障有充分的时间和不兼职，取消空衔教授，以保证整个大学制度有更高的效能，保证

学生和教员采取新的认真态度。

学校是一切政治力量的一个主要试金石。不严肃地看待对过去应负的责任就不可能拯救并革新学校。最大的困难来自多年形成的错综复杂社会主义和滥用私人关系网，形成了一整套本位主义。这种本位主义周期性地被煽动起来反对任何改革并且危险地施加压力，以便将支撑不下去的局面维持下去。工人运动和一切民主力量的任务是为整顿并革新学校与大学而斗争。

(六十四)在各个领域都享有文化研究及生产自由和自主权，这是应当通过不断斗争予以确立的准则。国家首先需要不断发展并充分利用知识财富。同时，必须作出巨大努力来普及知识和提高大众文化，以便提高群众的批判自觉性。这首先就意味着整顿、革新、改造公共文化机构，以便使这些机构不断成为解放人类的实际工具。

公共文化机构(不仅在学校方面)对于文化生活和组织文化来说，已具有决定意义：从提供情况到科学的研究；从文化财富的利用到演出。这一点同各种文化活动(团体的或个人的)的作用并不矛盾。社会的多元化从中表现出来。但是，在一个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没有公共干预，自由和多元化就不可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应该支持公共干预，但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才干、真正多元化的民主化进程。

文化机构生活以及作为形成社会风尚和社会关系前提的一整套机构的主角——知识分子——负有决定性使命。必须扭转一切企图把这些机构和知识分子当成从属性工具的思想。作为劳动者的知识分子恰恰在他们的专业中能够为发现并解决使社会动荡并要求变革社会的那些重大问题作决定性贡献。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使自由与进步的理想获得胜利来说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

对于改革政策来说，确认科学的价值和它作为进步力量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应该坚持这种态度来反对旨在把科学同其可

能被歪曲的用途混为一谈的种种曲解的试图，反对一再出现的灾难说立场。这些立场企图把发生危机和矛盾的责任归咎于科学的发展，或者相反，要反对那种幼稚的乐观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主张听任科学去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冲突以及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

只有明确地致力于发展科学的研究和以先进方式利用技术才谈得上改组工业、就业、发展新技术，提高投资质量、振兴农业，加强小工业以及获得综合性能能源。高质量的发展是以科学技术研究为先导的，是意大利社会发展方案的组成部分。研究应始终包括如下内容：解决已发现的、有采用价值的问题以及扩大知识并发现新的问题。今天必须使开支使用得当，更好地规定优先开支项目提高效能，改进培养和选拔研究人员的办法，改革意大利科学体系总的组织方式。

帮助充分利用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公营和私营工业中常常利用不善或根本没有利用的巨大人力及设备潜力。

(六十五)没有一种能够保障言论自由及各种意见多元存在的报道新闻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使新闻报道不是只能由少数出版及金融集团行使的权力，而是一种大家都关心的活动，使新闻报道摆脱会使其丧失社会作用的那些约束与限制并受到民主的监督。问题在于要大大减少迄今控制着报刊、出版社、广告市场的那些大集团的影响。它们使阅读及销售范围狭小，也造成了不同部门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根据这条斗争路线开展了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统一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开始。一九七五年的广播电视改革使意大利法律采用了新的原则，如尊重并提倡多元化、消息的客观性及全面性、允许公民使用公共新闻报道手段，保护新闻记者及在新闻报道部门工作的人有职业上的自主权。为了保证这一点，确认了在大区的参与下议会应起中央指导作用。

因此，从大家的民主与自由的利益看，至今公共广播电视台仍在排斥和歧视共产党的作法以及那些同改革所确立的新准则相冲突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容忍的。应该用最大的决心来同各种歪曲上述新准则的行为作斗争，不仅仅是通过坚定的批评与谴责，而且也要通过劳动者和民主力量的积极干预。

应该把有关出版、地方私营广播和电视、电影业的新条款补充到新闻法中去提交议会审核。有可能建立新闻报道体系的新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符合意大利宪法并且受到议会的保障。

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日益尖锐激烈。必须战胜带有保守性质的反对和抵制。这种反对与抵制也在政府多数中表现出来：他们进行阴险恶毒的攻击，旨在制止改革的进行，特别是阻止权力下放和建立以大区为基地的第三套广播电视台网，并且提出种种荒谬的建议，为在新闻报道中占统治地位的大集团在电视广播领域中开辟地盘。

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开展更有效的运动，实现民主力量的动员，为改革运动的统一与振兴作出贡献。

第五章 争取民主力量的团结和民主团结政府

一、团结战略的继续与发展

(六十六) 民主团结的政策是意共战略的基础。这一政策可以允许在多数派和政府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和多种多样的解决办法。团结战略同各种政治力量的多元化并不矛盾，它既不否定多元化，也不能被看成要把各个政党的历史特性淹没在混乱的、软弱无力的联合之中，这一战略更不会扼杀来自多元化社会不同观点的争论。相反，如果每个党都能坚持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建议，并使之产生影响，如果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竞赛性

的，如果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能自由地进行对话和斗争，如果每个党都能以最大的努力正确地、一贯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实现在彼此谅解和共同纲领基础上提出的那些目标而斗争，那么，团结就会是强有力的。

(六十七) 在由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解放斗争开始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工人阶级的政治团结以及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之间团结的必要性是我们政策的基本因素，今天仍然如此，而且更加明显。因为在意大利出现了发生政治转折的可能性。为了沿着一条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前进，在我国和西欧提出了一些有待探索并为之斗争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急待解决。

在劳动者前进并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能否共同确定一系列政治的、社会的权利要求与纲领性立场，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这些要求和纲领性立场先是在抵抗运动斗争中、随后又在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三十年的过程中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伟大标志点。

这种团结纲领有着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对意大利工人运动在战后初期遭到失败的历史原因共同进行的令人痛心的思考。团结纲领产生于新的民主战略的探索。该战略的目标是粉碎反动阴谋，并把扩大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进展结合起来。这种能够克服传统差别，克服危机和严重的紧张局势的团结愿望具有伟大的意义，它不仅使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而且使工会运动和群众运动表现了自己独有的性质和特点。

就是这些特点使左派力量之间实现了广泛的团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与交换意见。右派力量非但没有拒绝战略的探索，而且还在理论观点方面丰富了这一战略的探索。

即使是在很困难的中左时期，团结的力量，特别是工会内的团结力量，成功地经受了艰巨的考验。那时曾出现过并且实行了一种分裂工人运动，孤立和排挤共产党的计划。我们不懈地强调

工人运动中团结关系的牢固性和持久性以及团结的理由和意义。即使在我们遭到十分激烈的反对时，我们也同样强调这一点。它促使社会党和天民党对中左的经验进行了批判性的考虑，推动了这两个党在近几年来对其方针政策进行革新和发展。

在我国当前历史的特殊情况下，说它特殊首先表现在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意共重申工人阶级政治团结的特殊意义，重申必须在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党在政治斗争中的团结，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就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就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与纲领进行公开的和正确的对话。因为两党都处在关键时刻。工人运动团结的政策是整个左派队伍在政治与选举方面必须前进的最有效的基础。

应当把团结的加强与发展看成是在讨论和研究中、在社会与政治的实践中、在同其它民主力量进行公开对话中一个必须实现的实际进程。通过民主团结的战略，左派的团结就会得到巩固和确立。

(六十八)至于天主教问题，现实的进程证明在这三十年中指导意共行动的总方针是正确的和有效的。这一方针体现在一系列重要的立场之中。这些立场表现了我国人民内心的感情和深切的愿望，在国家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天主教界的演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便于人们对付那些造成冲突，甚至会引起分裂的事件，比如关于离婚问题的公民投票。

天主教界目前正在重新组合，这是特别重要的，尤为突出的。在这次组合中，甚至出现了一种推动身为天主教徒的社会成员的更大前进的力量。这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的现象。这样的现象不是意大利仅有的，然而它在我国却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

无论如何，这一复杂的进程反映了人们反对社会混乱和败坏，要求安全和道德的愿望。由于普遍要求维护廉洁、正义和发

扬人的个性，这一进程变得更加突出。或者说这是一种这样的力量，它表现了一种要求革新的潜力，甚至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天主教组织，尤其是天主教的青年组织，对工人运动的改造事业持反对态度。这样一些运动也出现了，并在发展着。它们可能自称是调和派，但是它们使天主教界的一些人对中庸和保守传统特别感兴趣。

意共重申它们的信念：争取和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和民主国家，这个民主社会和民主国家要以社会主义式的解决办法为目标，逐步向前发展，这一切都能够也应该通过天主教界广大重要的成员的参加来进行。团结和谅解的战略认为：这样一种方针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即企图搞彻底分裂，在宗教或思想领域进行正面冲突和对于教会进行历史性报复的基础上来实现意大利的革新和进步、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与世俗化的进程。团结和谅解的战略过去现在都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它在政治和文化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在构成我国历史性事件的对抗性斗争中，武装了工人运动。

今天，天主教徒的思想蕴藏着进行变革的潜力，避免这一潜力被调和主义和保守派的禁锢所扼杀，这仍然是工人运动的一个任务。因此，必须使对话不要局限于一些偶然性的问题，而应扩大到当代重要的历史性问题。

在对待天主教民主党的问题上，意共也总是努力把对天民党政府的方针与实践的揭露与斗争同旨在促进天民党方针的改变和在政治上站到人民和进步力量一边来的行动结合起来。

(六十九) 我们重申这一愿望与这条路线在制定历史性妥协中的充分价值。意共希望通过最近几年所采取的方针和行动，肯定并强调革新和改造意大利社会这一伟大事业在今天的必要性与急迫性。出于这一种使意大利得以拯救与进步的需要，我们过去和现在均认为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跟随社会党、共产

党和天主教的广大群众必须团结一致，伟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必须在一条团结和共同负责的民主与民族路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裁军、国际合作的政策在欧洲和世界上得到执行，使以改革和改造社会与国家为伟大目标的共同义务在我国得到确认。

意共通过历史性妥协现实地、具体地指出了争取革新意大利的战略与方法。

绝不能把这条路线变成一个关于议会与政府解决办法的政治公式，或者使之僵化。根本一点是，承认并肯定团结的必要性和必须达成谅解，而这种谅解是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思想道德的改革，国家要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组织并行使职权为伟大目标的。重要的问题是，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要承担义务，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当然在这方面，他们要保持各自的自主与特色，进行公开对话，有完全的平等地位与权力，但是他们又都要努力维护总体利益，促进彼此的谅解和团结。这里不仅涉及到一条路线的实质，而且涉及到一种对社会政治生活、对争取民主复兴和发展以及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与方式的观点的实质。我们认为，从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说，这条道路和这种方式是最有效和最现实的。

二、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以后发生的政治事件

(七十) 意共重申六月二十日以后它所采取的总方针和选择是正确的。意共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勇于探索新的前进方式的道路。必须看到这一政治进程所遇到的客观困难、公开的和顽固的抵制、这一政治进程所遇到种种障碍，看到阻止这一进程、使其逻辑与革新目标枯竭、甚至用恐怖性的暴力破坏这一进程的那些反动攻势的分量。每前进一步都曾遇到猛烈的反对。同时，既由于某些多数派党的两面派作法，也由于我们的群众性活动的局限

性，这种前进步伐并非总是能吸引住广大群众的。因此，尽管进行了紧张的议会活动，但在采取决定的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全部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之间依然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不相称。另一方面，多数派政策的效能和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取措施的及时性，取决于领导政府的能力，取决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和国家机构活动中具体的与一贯的变革目标。在这点上，局限性、行动迟缓、自相矛盾、不可挽回的损失是严重的、十分明显的。

虽然这一政治进程是显著的和积极的，但面对紧急状况严重化，面对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仍然是落后了。迄今为止，国家生活和政府中及时的和实际的变化并没有使政治关系的发展和新多数派的形成得到足够的巩固，因为在多数派内部那些着眼于破坏意共同劳动群众和人民群众以及舆论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仍在兴风作浪。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削弱相互信任的关系，不利于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对严肃的团结路线的赞同与支持。

民主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处在决定性时刻。紧张局势、矛盾和困难已变得更加严重了。现在应当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如面对恐怖主义破坏民主国家的法制问题、进一步说明国家革新的路线问题、经济规划和改革问题等。在此情况下，也就会存在一些实际分歧和客观困难，而这些东西又都是不能低估的。麻烦、混乱甚至不信任的气氛已经逐步形成。

这种情况是问题之大及其严重性的标志，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抉择和决定的时刻。但是这种情况是各种民主力量的目标各不相同的标志，也是某些党打算把部分的利益和愿望置于共同努力以便积极地克服紧急状况的需要和义务之上的标志。

(七十一)一九七五年天民党曾经有过严重的危机。在此时期，意共的政策与斗争对反对分裂左派的那条路线给予了沉重的

打击。进一步说，正如天民党那类的政权组织和政治领导在意大利和国际上都遭到了沉重打击，同时天民党对社会的中间阶层以及舆论与国家机构某些温和派人士的影响削弱了。一些天主教的民主派对天民党持一种批判性的意见，甚至与它脱离关系。经过内部的激烈斗争和领导集团的部分更迭后，天民党企图以改变路线和进行“革新”来进行反击。

在天民党政治方针中有新的东西，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然而，它的对话与革新路线首先就是通过明显地保持模棱两可来推行的。

议会中的关系、其他民主力量的立场和我们的倡议，通过克服那些曾经认为或声称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逐渐地把天民党推向较为先进的立场，并促使天民党把对话政策发展为应急政策。天民党这一政策的严重局限性在于：它实质上是继续拒绝意共参加政府，对前途仍持暧昧与犹豫不决的态度。这当然不是一个思想分歧或历史性的不信任。对民主团结的路线持保留态度和拒绝作出明确表示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政策的内容与目的以及为了克服在经济方面的危机，但也包括政权组织的政治领导方面的危机而必须走的道路是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天民党企图回避一种挑战，即：改变发展方式，改变社会结构和政权的管理，因为这就会改造意大利社会进程中使天民党的面貌和现状及作用受到考验。由此而产生了对政治前景的暧昧态度，对自己的选择不给予明确说明的顽固企图和对应采取的解决办法的不同解释。这些暧昧态度再次给天民党内最保守的势力以活动余地，这些保守势力想破坏民族团结政策，并企图重新走那条冲突的道路。

问题不是用那些原则性的术语去展示一种或近或远的未来，说什么那时由于对民主有了“相同”看法，任何执政方式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问题是今天的抉择，即：付出全部力量以争取实现革新、严肃和正义以及结构改革的路线和纲领，彻底地、实际

地克服任何一种想维持各民主政党之间权利不平等的路线。因此，同天民党合作的前景仍然同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了使革新意大利社会的方针和实际愿望能在该党内得以确立。

(七十二) 社会党同意共的团结以及它们在政治和选举方面的共同进展，是意共团结战略的根本基点之一。

在目前的条件下，左派的进展以及取得在议会中的多数是一个根本目标，即使单靠这个多数还不能足以保证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

在此范围内，意共对社会党一贯肯定民主团结政策的有效性的作法，过去和现在都给予积极的评价。

最近，社会党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立场和行动以及加剧同意共的纠纷的企图引起了疑问、异议和批评性的看法，因为社会党这样作可能会损害整个左派并使政治转折的前景变得更为艰难。

正是因为共产党人深信左派团结的意义并寻求一个并非形式的假团结，所以他们感到必须使用坦率的说话方式。

社会党领导人提出一条被称为左翼替代的路线。但是，如果意大利右派的历史被解释为两种对立观点的分裂，人们就能理解左翼替代的目标怎么能够从这样一种看法中产生出来。如果否定或低估了纲领性建议、斗争和胜利的共同财富，其结果就会否认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谴责和反对歧视左派，对于要求现在必须在国家生活中来一个转折都是可靠的基础。

积极地、创造性地发展这一团结的经验，恰恰是战胜天民党内再次出现的保守派和温和派的严重抵抗，和促进天主教运动基本部分发生一种积极转变的根本条件。离开这一前景，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原谅天民党的抵抗，助长那种要求恢复已告失败的中左经验的欲望，而民主团结的政策就会失去生命力，就必然会变成一种偶然的权宜之计。

意共认为，思想和政治的对话应该并且能够更开诚布公、更

客观、更有效地开展起来，只要这种对话从共同的财富出发，从毫无保留地、直率地承认意共是伟大的民族民主力量这一现实出发，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已经在共同管理着国家的大部分（在大区和在地方机构）这一明显的事事实出发。意共愿意全力地、开诚布公地，但又不带偏见和歧视地参加这样的对话；意共意识到左派的团结不是一劳永逸的胜利，应当通过共同开展活动、斗争和批评性的对话来保护和发展这一胜利。这一胜利是使意大利摆脱危机并在将来沿着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造道路前进的根本因素。

（七十三）一九七五年以来发生的政治变化使中间的民主力量通过克服依附于传统立场而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意大利共和党在实行团结政策和促进人们考虑危机的严重性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探索新的布局和作用中（比如可以看到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与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共和党一起参加了许多地方政府），在经历了中左的反面经历和其他一些设想与路线失败之后，过去、现在都存在着保卫和发展团结的要求。民主团结的政策没有削弱自主和行动自由。面对意共从不希望有的两极分化的进程，民主团结政策反而给中间派政党提供了自主和行动自由的新的可能性。

在右派营垒中，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以来，出现过回潮，在一九七六年的选举中这种回潮已十分明显，因此也就出现了分裂。如果说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分裂对最近“国家民主党”的建立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影响的话，然而它却使“国家右派党”的每一前景都破灭了，使新法西斯党的地盘进一步缩小了，但同时也使热衷于恐怖主义的法西斯小分队在该党内能施加更大的压力了。

极左派营垒总的说来正处于危机之中。出现了一个分化、分裂和重新组合的进程，这一进程的关键问题就是对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团结政策所应持的态度。这个营垒中的一部分力量已经开

始对极端主义的目标和政策进行积极的思考。另外一些小组则激烈地反共，甚至全盘否定工人运动的整个传统。在那些最极端的小组中，正在出现一种同恐怖主义接触的令人担忧的现象，出现一种对颠覆性的观点和武装的暴力活动采取政治上的容忍并加以掩盖的倾向。甚至行会主义与不同政治性质的倾向与立场也出现了。

至于激进主义的现象，不应藐视他们那些正当的愿望和要求，有些甚至恰好是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愿望和要求。同时又必须明白，过去激进党的目标是破坏团结和合作的政策，特别是打击意共的主张，制造意共与社会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这一目标，激进党人同任何人，包括新法西斯分子，曾经有过一致的意见。

三、要求一个团结政府

（七十四）因此，团结政策取得了意义十分深远的重要发展。然而它也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抵制、反对和攻击，而其本身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性和严重困难。在多数派中，对这一政策的意义和目标的分歧和矛盾正在发展。搞分裂和使意共重新成为反对派的解决办法的设想，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却存在着并在起作用。

检验民主力量之间在纲领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谅解的有效性和持久性的标准首先是事实。意共参加议会多数并不是为了经历一段学习民主的时期，而是为了执行一项进行整顿、规划和改革的政策，这一政策要求严肃认真。因此也就需要各个民主政党坚持不懈地努力，需要巨大的社会与思想的压力，需要群众的赞同，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团结一致的为公精神。

意共把执行纲领放在第一位。这就意味着对整个共同义务在法律上予以迅速而正确的肯定。这就意味着政府、每个部长和多

数派的所有政党的方针和政治态度要始终如一，正大光明和相互配合。执行这一纲领意味着以革新精神，以行政机构办事公道的精神，以在同国家关系中公民人人平等的精神，以一种讲究实效的精神，在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领域致力于管理。

这一事业如果没有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参加、压力和行动，就不能前进。如果没有群众运动，落后的东西就会猛烈地袭来，这一事业就会瓦解，就会与各个政党脱节。在国内，这一行动也应该使广大群众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发生实际的变化为目标，因此也就是以改变国内的力量对比为目标。通过群众的政治方针和思想方针的改变的具体进程，必须彻底消除对共产党的歧视。

意共再次揭露这样一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根据这些论点，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的障碍似乎是我们关于民主的观点与天民党和其他一些党关于民主的观点的一致性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但是，各个党之间的联盟当然并不要求思想上或哲学上的“一致”，而是要求以宪法为共同的准绳，这种联盟要立足于纲领和政治路线之上。

这是一种推辞，这是一种借口。凡是真正认为存在着对抗、分裂和排斥这样一些历史弊病问题的人就不能不懂得，消除这一历史弊病最严肃和最可靠的方法是尽可能快地完成向有意共参加的民族团结政府的必要过渡。推迟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就会使团结政策和各民主力量的共同行动丧失生命力，甚至把这条路线置于危险之中。如果人们希望保证经济、社会和文明的革新与改革的行动能够得到积极的发展，那就必须通过整个工人运动力量参加政府，使团结路线也能在政府这个问题上得到充分的和明确的表现。

第六章 群众运动的问题与前景

一、政党与群众运动

(七十五) 民主制度可依靠多种多样的设计、组织和裁决中心来行使职权。这是意共关于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我们所要在意大利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的观点。只有公民最广泛地参加政治生活的社会领导，才能确保这一点的实现。依然存在着来自社会多元化（社会的、政治的多元化同样也有思想的、文化的多元化）的互相冲突的推动力，然而必须对这种推动力进行引导。以便争取国家的革新和进步。在此情况下，各政党的作用，也包括为消灭资本主义而斗争的那些政党的作用，都不能消灭社会上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倾向和动力。群众运动有自己的自主性。民主制度的任务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并根据大多数的愿望，进行政治上的联合和领导。

近几年来，意共曾多次阐明这一观点，这是我们的民主抉择的实质所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不仅意味着承认每一个群众运动的自主性和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小组和个人参加争取社会改造而斗争的价值，也意味着抛弃党的排它主义的任何形式。这一观点就是多元化的基点，意大利和西欧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各个政党的作用不会由于这一思想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实践而被削弱。特别是对那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党来说，这种思想更深刻地要求它们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及其要求出发去表达并组织政治变革的愿望，进行全面的政治总结，研究政治与文化发展的目标和价值，竭尽全力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因此，这些党绝不要去代替群众运动，而是要在组织

和群众运动方面具有更新更高的能力。

意共今天提出的目标是造成一种共同努力的局面，以便克服国家的危机，革新经济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文化与精神生活。只有通过论战和反对本位主义，反对任何行会的和救济会的落后形式和唯运动论之类的幻想，这种共同努力的局面才能出现。对于意共来说，这一切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它不是为对付紧急状态，而是因为意共认为广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不懈地为改造社会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这种共同的任务不能、也不应该使人们把多元化社会特有的相互矛盾的因素看成是病态的东西，而应该力争通过恰当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行动战胜关门主义以及行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进攻。

二、工会运动

(七十六)过去的十年是以工会运动的团结与自由的进程向前发展为标志的十年。这对意大利的民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在第一阶段的特点首先是基层民主的扩大。这种民主的扩大涉及到几十万干部和几百万劳动者。工会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地增长，甚至使劳动者的工会运动变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决定性力量。与西欧各国工会相比，特别与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相比，我国工会的作用越来越具有同它们大为不同的特色。统一的工会运动的自主性之根源及其必要性在于意大利有多种多样的工会运动，这些运动具有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属于好几个党。这些党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并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因此，意大利的工会运动日益扩大自己的职能和作用，逐渐在政治生活中担负起十分突出的新任务，并且越来越成为政治主角。同时也应当记住，意大利工会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即跟着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那一部分，从它出现起，就从未把自己的职能局限于单纯只同劳工进行协商。

意共为工会运动的团结和自主而斗争。意共早已摆脱了工会是“传动带”的理论和实践。意共认为，这些年来在工会的团结和工会自主方面取得的进步对于意大利民主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然，这一进程带来了一些新问题，甚至是困难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甚至是文化和思想性质的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一进程都会有危险。而且这一进程也曾发生过倒退。这些年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工会越来越能把有效地捍卫自己所代表的劳动者的利益同争取经济与民主改革的斗争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充分地行使自主权。

在已经出现的主要问题中有个关于工会运动同中央和地方政府、同议会和地方议会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与议会所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力和特权以及在民主制度中地方议会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努力去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意共重申它关于议会是意大利民主制度的中心环节的立场。工会就其性质而言，它并不起一般政治代表的作用，即使它可以用更恰当的形式对议会的行动表示自己的看法。

(七十七)当前工会运动的团结与自主的进程处在困难重重的时期。此外，工会团结与民主进步的敌人正在猖獗活动。同严重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客观矛盾使人们感到有一种压力，因为行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趋势在工会内部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担忧的。危机使这种趋势在意大利社会中，甚至在各阶层劳动者中有所发展。同时国家本身的不起作用和行政当局的所作所为也是对这种趋势的鼓励和支持。依附主义的现象又重新出现，这种现象搅乱和颠倒了工会运动内部的辩证关系，这种现象还企图利用工会运动为一种明显的政治目的和党的目的服务。虽然近几年来在权利要求的伟大斗争中，在争取实行规划化和改革的新经济政策的伟大斗争中，工人运动的分裂已经部分地解决了；虽然最近在南

方、就业、发展新方式等问题上也已经明确地作出抉择；但是今天围绕工会运动的作用与职能却又爆发了各种观点之间的论战。在工会问题上，两种不同观点之间出现了一种更加引人注目的紧张：一种是十分关注劳动者全面的和总的利益；一种认为应该把工会的任务局限于工资和合同方面。

意共重申自己在争取工会运动的团结与自主方面的义务。这一义务适用于今天，也适用于明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会自由和结社自由都应当得到保障。意共重申，它反对关于“单一工会”或“义务工会”的任何意见。意共强调它关于工会完全自主的观点，其中包括工会对行政当局的完全自主。

意共愿意为克服当前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工会运动的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工会要发挥一种新的作用，要使工会的主动精神和行动适合国家发展的总观点，并且也符合劳动阶级和广大的人民阶层的全面利益。为克服这些困难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它将会推进工会运动共同采取的根本方针（如对南方问题，就业问题）。

参加工会的共产党员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意共重申，它反对派别的长期存在，不管这些是如何伪装的。意共重申，它决心进行公开的论战，反对任何人打算在工会中保持带有政党色彩的派别并使之发挥作用的一切企图。共产党的工会工作者是政治战士，他们应该能参加政治活动。因此，意共希望通过在工会运动内部的讨论克服在执行不能兼职的问题上出现的某些过分的东西和错误。比如，禁止工厂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兼任市议员，或党的省委一级非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共产党的工会工作者应该在工会运动及其纪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便推进团结和自主的进程，保障工会内思想与文化的多元化，维护工会在进行抉择时的自主而不受外部干涉与利用。共产党的工会工作者在党内应当有进行讨论和阐述意见的场所，这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自

已经经验贡献给党及其政策这一目标出发的。

为了克服当前的这种局面，必须在工会内发展民主，这种民主标志着团结和自主进程的开始。但是，在这方面今天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甚至存在着危机性的因素。这首先涉及到工会领导机构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忽视劳动者参加工会生活和工会领导的征兆暴露得很明显。在工人代表委员会（它是在团结的进程急剧发展的前景中出现的）的生活与活动中也存在着一种令人担忧的因素。地区委员会也未能组织起来和普及开来。在工会联合进程迅猛发展的年月里出现的错误和缺点，现在仍然是严重的问题，对工会生活有着消极的影响；因为这些错误和缺点没有被及时地发现，也没有通过民主讨论和政治斗争加以克服。意共愿意竭尽全力为消除这种现象，为在各级工会扩大民主而作出自己的贡献。首先，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的成分和作为劳动者直接选择结果的工人代表委员会的成分之间的更为相称显得越来越必要了。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有待于通过在工会运动内和劳动者之间进行讨论来加以解决。

三、农民、合作社、中等阶层

（七十八）意共为农民运动的联合和自主所作出的努力是由来已久的，这种努力是建立在它对农民群众在民主斗争与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和工人阶级同农民群众结成同盟的必要性的独特看法的基础之上的。最近成立了农民组织筹建会，[“]成立了全国耕作者联合会，全国农民同盟和对分农联合会，还有意大利农民联盟的大部分人参加了全国耕作者联合会。意共认为必须看得更远一些，即：注意一项艰巨而必要的工作，以便使意大利农民建立自主的统一组织的建议能得到发展。

意共将为这一点得以实现而作出自己的贡献，意共相信这对于建立意大利所需要的农业也是必要的。农业合作和农业生产者

的联合经营对于建立统一的自主的农民运动有着它特别重要的作用。

合作运动的团结与自主应该有助于具体地、清楚地把合作企业制度的活动确立下来，争取实现涉及总利益的经济与社会目标（南方的发展、农业的复兴、就业的增加等等）。合作运动的团结和自主也应有助于确立一种满足文明生活的需要和组织文明生活的新方式。统一自主的合作运动将给作为占有和管理生产资料独特范例的合作化以促进。近几年来，合作社运动有了突出的发展，甚至是以新的形式和在新的基础上的发展。在我国有一个经过革新的合作运动，这不是一种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切政治力量从远大的前景出发应当认真加以考虑的现实。对于意共来说，发展合作社运动是深刻的民主改革战略的一部分。合作运动坚强有力并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它成为意大利生产制度的一个部门。对此，必须有一个恰当的政策。国家要为促进合作运动作出新努力，必须以在方法方面进行再也不能拖延的改革为出发点。

一些从事生产和商业的中等阶层在经济领域和在社会上的行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由于一种希望联合的认识逐步发展的结果。这一认识在工会方面，生产、职业与合作方面均逐渐表现出来了。意共的政策是关注整个中间阶层及其代表机构。这些机构往往是有群众组织的性质，而且无论如何都站在民主阵线方面，没有任何歧视。意共正在开展活动，以促进这个阶层的各种组织在经济和工会方面的谅解和团结的进程，而这种谅解和团结是建立在认清有待达到的目标这一基础之上的。

四、妇女运动

（七十九）妇女解放运动的团结与自主的意义是伟大的。这对意大利民主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改造来说是一种需要和促进。

即使根据其它一些国家的经验，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即为了使妇女从长期受压迫和被奴役的状况下获得解放，必须发动一场有组织的妇女的民主运动，这一运动能够在政治方面发挥自己的全部影响，因此而成为一种推动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而且也会促进文明、文化、风俗的变化。

意共认为，近几年来，意大利妇女新的觉悟水平的提高是十分重要的。意共强调指出，无数生气勃勃的运动的形成和具有相当悠久传统的运动的革新是怎样给意大利的民主和自由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又是怎样为那些意义重大的成就（离婚法、男女平等法、关于堕胎和就此可向医生请教的法律）和文化、风俗的深刻变革开辟了道路。

在这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某种短命的东西。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但是它在意大利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甚至是同我们民主组织的力量和朝气，同强大的工人运动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妇女觉悟的提高同妇女运动和女权运动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能起到的影响之间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这类运动还没有能够变成群众性的运动，它们之间的团结进程在软弱无力地发展。甚至可以说，这些困难也是社会危机对妇女所处条件发生影响的结果，是保守性宣传的结果，是某些党派玩弄政治手段的结果。最后，这些运动中的一部分拒绝同民主、政治和民主组织建立有益的关系，或者正在极其缓慢地恢复这种关系。民主力量、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人的错误和缺点对所有这一切也都是有影响的。妇女问题，她们的工作问题、母亲的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尚未在必要的程度上变成民主力量和工人运动制定纲领性计划和采取总的政治选择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政治、思想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关门主义往往是顽固不化的。

意共感到必须努力争取工人运动同妇女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盟。这一联盟应该在为摆脱危机和改革我们的社会

所作的努力中得到考验。应该把对社会进行深刻改革作为自己的目标，那时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妇女有新的条件和男女之间有与现在不同的关系。

五、青年运动

(八十)青年一代是近十年来政治斗争、社会斗争和为革新意大利社会所进行的斗争的主角之一。

新生的工人力量参加工会斗争是广泛的和富有战斗性的。青年为我们党的革新、为导致力量对比发生如此迅速和深刻变化的大规模政治斗争和竞选斗争作出了决定性贡献。青年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数之所以有巨大增长，这几年之所以出现了这些群众斗争和新的运动，其原因在于：“青年问题”是作为意大利危机的一个方面，甚至作为这一危机最复杂最棘手的一个方面产生的。

意大利所处困境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都从青年运动和青年斗争中，也从广大青年群众的意向中表现出来。从这里产生了积极的倾向，但也出现了一些涣散和倒退的迹象。今天，应当由意大利整个民主制度来给新一代的重大社会问题，给青年的疑问和思想探讨作出积极的回答。共产党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对我们党和工人运动来说，尤其是一个试金石。近几年来，我们党和工人运动了解了青年所表达的许许多多革新希望。在这一斗争中，由年轻一代所组织和进行的群众运动，社会、政治和思想斗争可以而且应当作出积极贡献。

每一代人都通过自己独特的经历成为政治斗争主角的这种思想，因此也就是承认青年运动和政治组织的自主性，同时要不断努力同青年人建立有效的辩证关系，这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策制定和历史的一部分。

特别是近几年来，意共从青年斗争和运动的发展中看到了丰富我国民主生活和扩大工人阶级在争取变革意大利社会的斗争中

的联盟的巨大可能性。

今天提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这些青年运动的失败与分裂，如何为这些运动自主的、积极的发展作出贡献，使它们成为年轻一代真正解放进程的主角。

今天，根据近几年来青年群众所取得的经验，必须在青年中进行一场坚决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既要反对把青年斗争同工人运动的行动对立起来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倾向，又要反对重蹈过去个人主义固步自封的做法和保守立场。必须击败任何暴力和不容异己的做法，要提倡青年之间的对话和团结，反对个人竞争精神，反对成帮结伙，在青年中制造分裂。这些现象无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活动的一些倾向的反映，即使有人把它们说成是一些新事物的征兆也罢。

这就是青年一代民主先锋队和共产主义青年当前面临的任务，其目的在于确保有可能扩大青年的民主参与和开展青年运动与斗争。

共产党人参加这场政治和思想斗争，其目标也正是要通过各种思想和立场的公开交锋，推进使青年更广泛地团结起来的前景，同时建立一个有能力影响广大青年群众并使他们成为主力军的有组织的民主运动。

六、新的结社形式

(八十一)近几年来，许多具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结社形式，不论是传统形式还是新形式，都取得了巨大的、迄今一直是蓬勃的发展。这是民主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证明。在倡导一些符合新要求和新需要的结社活动方面，共产党人并非总是善于站在最前列。这就表明，他们对物质的现实中和人们的觉悟中发生的变化注意不够。因此，应当在结社形式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无论是就业已存在的，或正在酝酿中的形式而言，即在学校中，在社会

服务行业等部门中的那些文化社团和职业社团，还是就那些已经表达或可能表达提高群众性文化水平的要求的新形式而言，都应如此。

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围绕学校问题和有关民主参与学校机构问题发展起来的结社进程问题。必须鼓励家长和学生的新的结社形式的成长，这种新的结社形式应有能力保障当选机构同自己选民之间具有新的关系，有能力开展争取改革和实行改革的运动，开展争取学校和社会之间建立新关系的运动。在教员中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存在工会组织的同时，还应有一个文化和职业性社团，这个社团应有能力组织现有力量进行工作，通过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教学能力，来致力于拯救和革新公立学校。

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大城市的生活中提出的尖锐问题，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则是由于南方严重条件提出的尖锐问题而产生的结社要求。在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中，广大群众愈来愈意识到带有一些比较新的现象的基本矛盾：这些现象关系到一种畸形发展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对大自然、对环境和对文化遗产产生的影响。正是由此推动人们——并且也应当由此推动人们——去采取一些有能力处理这一新的重大课题的会合、合作和结社形式。

第七章 党

一、党在新的政治阶段中的工作

(八十二)这些年来，党进行了伟大而艰巨的斗争。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在政治上和竞选上的进展标志着民主团结路线和革新意大利社会的要求得到成功，在地方政府和国家生活中确立了新的、更加广泛的领导责任。六月二十日前后，意共在维护

和巩固民主制度、人民生存、国家团结，反对颠覆及恐怖主义攻击的斗争中是一种决定性因素。意共是这样一种行动的主角，这种行动是为了对付并克服危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取得进一步有意义的成果，为使劳动者阶级通过团结政策来担负起责任及新的领导任务而作出贡献。在数千个市镇行政部门，在许多省、大区的行政部门中，共产党人积极地担负起新的，更加广泛的执政任务，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以及由于经济和金融危机而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困难。

一九七五年，特别是一九七六年选举后所造成政治形势使党面临着一个新的、艰巨的考验。这就是具体地在全国范围内检验谅解与民主合作路线；检验党在一种非常条件下，包括通过导致使党的责任不断增加、但又不是直接参加我国政府的特殊政治解决办法进行执政的才能。

党基本上以积极的方式回答了这些要求和完成了这些任务。党通过努力制定政治、规划方面的主张，通过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通过以显著的努力来利用并提高在公共生活以及党内生活中新的领导力量经受了复杂的、艰巨的考验。

面对着客观困难以及来自各方面反对团结政策，反对我们党的攻击——这是以阻塞六月二十日选举所开辟的道路为特点的名副其实的反扑，一些缺点和弱点也暴露出来了。这些缺点和弱点也还反映在部分地方选举的消极结果上，特别是在南方，反映在公民投票运动及党的组织发展所遇到的困难上。

造成缺点和弱点的原因首先是对新的斗争阶段、对这一阶段所带来的可能性及它所提出的要求理解不足。

此外，注意在政府机构中的工作，注意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同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目标与问题上推动广大群众团结运动的主动行动之间存在着差距。由此就产生了很难在斗争的一切阶段始终保持并巩固党同劳动人民不同阶层的关系；很难用有机

的方式通过在政府机构中的行动来巩固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和行动，很难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执政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在不同行动的领域及责任范围内力量配备不平衡，它们之间的协调也不够。

有时候团结政策贯彻的方式冲淡了党的形象和党的自主行动。对历史财富和政治路线的维护，反对来自不同方面大量的歪曲和攻击并不总是及时和坚决的。

在基层和省的代表大会上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及经验，以坦率的批判精神来估价上述缺点、局限以及其他涉及到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整个党组织的缺点与局限。

二、党的群众性和民主性

(八十三)争取巩固民主团结政策，实现劳动者阶级充分参加我国政府的斗争，要求意共根据“新的党”得以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观点进一步壮大起来。

在目前的条件下，面对着在国家生活中肩负起新的责任，必须重申意共作为实际的政治力量，作为劳动者先锋队群众性组织的特点。

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的四年中，党员人数进一步增加了：从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六十五万七千八百九十五人增加到了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七十九万零六百二十九人，这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妇女入党明显的增加。但是这一进程在一九七七年停顿了。而且在最后这一年中还略微有所倒退（差不多少了两万人）。其原因首先是吸收新党员的速度缓慢。

因此，一方面党的组织力量是巩固了；但另一方面也应该强调存在着困难。

选票和党员人数之间不平衡的比例在全国范围内一九七二年是五点七，而一九七六年则上升到了七点零，在一些大城市和某

些南方大区这种情况尤为厉害。

当然，选票和党员人数之间的较大差距说明这些年来对意共的赞同增加了，但是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它也表明要有一个总的，使党有相应的政治存在与组织力量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些人们不久前表现出赞同意共政策的地区和阶层。

党的力量在工人阶级和人民阶层中的联系和增长是根本性的。不管党同议会多数及政府相比占有什么地位，都应该特别注意同一般人保持密切的，经常的关系，努力积极活动，开展自主行动，以便发动并引导人民支持积极的、革新的抉择，反对保守派抵制的斗争。另外，党的群众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是人民更广泛的参加社会政治斗争，参与生活和作出民主努力的条件之一。

所以必须不断扩大吸收党员的工作，特别是在青年和妇女中，同时要努力工作使每一个基层委员会都能够充分肩负起群众性民主团结生活与主动行动中心作用。

为此，就应该：

1、增加基层委员会的数目，把人数多的分开；特别要在劳动场所建立新的基层委员会，不断地使基层委员会在企业内，在地区范围内变成支部，同不愿在基层发展我们组织的行为作公开斗争。

2、为确立一切民主党派在劳动场所存在与宣传的权利而斗争；大大提高意共在企业和部门中的组织，提高它们采取自主的政治、文化主动行动的水平，以及在政治斗争的重要问题——经济规划、民主生活的革新——上同在劳动者中存在的一切民主力量对话的能力，同过时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上的行会主义、企业主义的观点进行公开的论战。

3、加强地区基层委员会及劳动场所基层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经验、主动行动、干部），欢迎生产场所的党员在地区基层委员会中作出更广泛的，更持久的努力。

4、把基层委员会的工作划分为固定的委员会（例如：经济与劳动；民主机构与社会机构；妇女；学校和文化；通讯，报刊；宣传；组织与行政）。

5、发挥基层委员会全体大会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统一党员思想、发动党员的办法。

6、加强政治和文化培训活动，掀起宣传我们理想，社会与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工作高潮，充分调动一切同志的能力与才干。

（八十四）关于使党同一个日益灵活，但也受到解体作用影响的社会结合起来的需要，关于促进政治上的积极倡议和行动上的具体化和效果卓著的需要，关于把尽可能多的积极分子党员的工作和斗争组织起来的需要，关于把更多力量用于领导工作的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意味着应当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是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党组织，从基层委员会到党中央都参加辩论和作决定，参加政治路线的制订和贯彻。为此，必须大力朝向已经使党成为伟大的民主与统一的政治力量并且作为这样的力量进行活动的方向推进。这个方向就是使领导职能灵活有效和权力下放；就是在全国议会、大区议会和地方机关，在劳动界、妇女界和青年界发挥制订政策和作抉择方面的特殊要素；就是对经济和文化问题进行调研和提出方针；就是在支部、地方委员会、大区委员会和党中央的日常关系中使种种看法和经验得以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和普及。这种必要的扩大民主要求领导作出更大的努力，并且这也是党进行政治综合、在方向和行动上真正统一的基础。主要事实是，今天团结不仅应在政治立场方面、而且也应在复杂的和丰富的党内生活和党的组织方面、在制订政策和领导中心多样化方面以及在职能和责任的灵活性方面来实现。

今天，象我们正在做的这样：重申民主集中制方法的重要

性；意味着应对一些基本要求给予特殊注意。

首先应当促进政治辩论，交流看法与建议，使各级组织有更多机会和更大权力，不仅过问地方问题，而且也过问一些决议的制订和一些重大抉择。领导机关应该研究协商的结果和包括通过书面建议和文件所采取的立场。领导机关的意见应是有根据的，并且要把这些意见通知有关的人。

应当保证领导机关和执行机关之间的正确关系：避免执行机关（各级书记处、工作委员会机构等等）擅自行使不属于它们的职责，从而在实际上架空领导机关。相反，执行机关应当对领导机关为自己的工作负责。

应当不断地作出最大努力以求通过讨论实现团结，避免使分裂固定化或形式上的一致。在出现不同立场或对立立场时应当把建议提交表决；在需要明确地反映有时可能会出现的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决定和方针时更要这样作。

应当加强关于党内生活的报道，使共产党的报纸首先不断地报道共产党人的辩论、活动和斗争的全部丰富的、复杂的内 容。

三、党的机关与干部

（八十五）新的政治进程、社会格局发生的变化、推进团结与革新政策的需要，这些在过去和现在都提出了加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各方面的能力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制订政策水平问题、调整组织结构问题、扩大实行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机关需要对形成和统一党的政治意志的过程进行一种日益精心的和复杂的领导工作，并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这种过程得以按期完成。

在十四大以后的这几年中，中央委员会在六月十五日和二十日之后改变了的政治条件下，全面地肩负起指导和检验党的总路

线的职责，保证了党在政治上的统一。然而应当看到，由于局势的迅速演变和需要当即作出政治抉择，有时在保证中央委员会及其一些常务委员会的及时介入方面存在缺点和困难。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看来采取精简机构的措施是适时的。需要对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组成以及它同其他政治与工作领导机关的关系进行一次仔细研究。

领导机构积极地执行了制订政治立场的任务，介入了具有全国性重大意义的那些问题，尽管并不是总能够作到接连不断地在各方面，特别是在群众斗争和群众运动中推动并组织党的倡议和行动。

书记处在工作方面以及在更为直接介入政治方面的活动都是紧张的和接连不断的。因此有必要使其摆脱那些可以下放的职责和任务，以便更好地起到把党的活动同政治倡议协调起来的特殊作用。

更普遍地说，应当既解决领导机关的结构问题，也解决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以便对于党的全部活动和党的群众性政治倡议进行最大限度的集体研究，使之更有效地配合起来并得到更为及时的领导。

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大大改进工作机关的活动。需要考虑把一些工作委员会和工作部门合并成为一些大的部门，以避免人力的浪费，纠正极端的本位主义，并使这些部门得以进行更为及时和有效的工作。为了避免加重和混淆职责，需要更清楚地强调议会党团的责任。它们在立法工作上有自主的动议权，在同其他党派的议会党团关系上也是一样。议会党团应当加强同各级党组织和同选民的联系。同样，也应当保证大区、省和市镇议会党团的主动议权。

应当适当地进一步加强逐步建立起来的各种学习与研究机构（葛兰西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家改革中心、国际政策研

究中心），呼吁新的力量与之合作并且保证更多的党外资助。

（八十六）至于党的其他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应当更好地确定大区委员会、省委员会和中间机关（地区委员会和城市委员会）的职能和力量分配，以便更好地适应组织机构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促进权力下放的发展和党内民主生活的发扬，提高党激发并指导群众政治行动的能力。

在这方面应当充分实行党章的准则。它规定：大区委员会是“全国领导机构下放权力的机关并且是由大区组织民主地选出的机关”。

应重申省委员会的职能并且确定省委员会在组织上的灵活性，它们无须遵守公式主义的标准，而应考虑大区的不同实际情况和权力下放的进展。应当进一步扩大建立地区委员会和城市委员会的工作，这也是为了丰富和统一党的行动，促进新干部的培养并推动基层委员会的生活。

为了保证更为及时和有效的领导，必须着手减少省委员会成员人数，甚至采用其他的形式和办法以保证更多的领导同志在党的活动中、在各级组织中和在群众运动中参加作决定和政治领导。

监督机关所进行的工作是积极的。看来需要采用调整和精减措施以便加强监督机关的自主和有效的干预，不仅是为了改进共产党人作风和增进党内团结，也是为了通过共产党人在各级机构和公众生活中的模范行为来加强公民同各党民主制度的联系。

（八十七）近年来大量地和迅速地提拔一些青年领导人担负责任重大的工作。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作法。今天应当促使人们的认识成熟起来。认识今后在党的各级组织已存在巨大的领导潜力，这种领导潜力将经受考验，被挑选出来并且进一步得到提拔，从而也有利于更多地调动干部（从党的组织调到群众组织、民主和文化生活中心去，或者反之）。然而，这种作法并不是总能够保证必要的经验交流和保持同所有那些人民力量的政治联系。

的，而这些都是群众性政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党的各级领导集团内部实际存在的某些不平衡现象应予纠正。例如，在基层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中，党的社会成分和干部的社会成分基本上平衡，但在上级机关常常缺少这种平衡。更普遍的是，担任更高领导职务的工人干部和从事生产的干部的数字非常不充足，尽管近两年来有了某种积极的相反趋势。女党员和女党员积极分子的数字同领导机关的妇女干部数字间的不平衡长期存在，尽管有了某些改进。

因此，必须坚决地采取行动来保证（每次代表大会都制订出规划）广泛地和始终一贯地推行把合格的、同生产有联系的人提拔为领导干部的工作。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应当：

- 1、在各级组织中更多地依靠非脱产干部党员的工作。
- 2、在挑选和培养干部过程中注意领导职务所应具有的种种条件：党外威望和同劳动者的联系；工作能力和在各方面（在斗争和群众性行动方面，在各级组织的工作方面，在吸收党员和党员登记方面，在竞选运动方面，在散发党报方面、在文化、思想斗争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
- 3、制订出在各级组织提拔工人干部和妇女干部的政策，事先准备好必要的组织措施。

一项纠正现有的自发主义缺点并使党能够越来越胜任新的任务的有机的干部政策要求发展和加强文化和政治进修措施（学校、训练班），以及在党的所有领域、特别是在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党员中扩大采用这种措施。

四、共青团

（八十八）党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来革新和加强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近年来，青年共产主义者面对有时是戏剧性的、同青

年遭受排斥、失业、中学和大学危机相联系的一些现象。在青年中出现了一种激烈的和困难的政治思想对立，但总的说，出现了利用社会不安和青年思想和文化危机现象发动一次攻击的试图，其矛头指向工人运动和整个民主制度。

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为在这条战线上开展斗争和开展争取工作、革新学校、变革意大利社会的运动作出了贡献，但却没有能够克服其组织上的脆弱，也没有能够适当地扩大它同各不同阶层青年的联系。今天，为了发展我们党的联盟政策，为了有助于解决青年问题和对我国实行民主革新，建立一个群众性组织问题已作为基本需要迫切地提了出来。

正如上届共青团代表大会上重申的，要走的道路不能是使共青团成为一个人数有限组织或者干部组织，也不能是使共青团成为一个仅仅是党的青年附属组织。独立自主和群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当关心青年人所表达的要求、青年人的问题和忧虑，以便本着其特有的经验开展政治斗争和群众性斗争，把青年争取到革新我国和对意大利进行民主与社会主义变革的斗争方面来。

共青团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形式以及组织形式应当不同于党的。党在发展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方面的第一个革新目标应当是建立共青团地区小组，这是政治文化小组，是真正的民主社交生活场所，共青团员和非团群众可以在那里找到帮助和进行讨论的机会，找到参加斗争和开展文娱活动的机会。其次，应当克服这些年的迟缓，扩大共青团对社会生活各部分的影响，在每个劳动场所、学习地点、在我国的每个城市和大区，建立起青年劳动者、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有组织的结构。因此，共青团应当越来越是一个教育场所，培养青年一代以现代的和批判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场所，他们正在靠近革新斗争、靠近民主、靠近共青团的理想和政策。

最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应当加强大区、省委会和地区委

员会和小组的共青团领导集团的稳定性，采取包括把一些党的干部调往共青团的措施。

五、宣 传

(八十九)在把我们党的政策的基本抉择和结果变成群众性宣传方面，我们的全部宣传和引导活动以及进行这种活动的手段都仍然效率不高和不够及时。这些缺点反映出我们开展活动的方式是在看到与经济和社会斗争有关的问题以及与各党之间关系有关的问题的同时，仍然低估在政治文化斗争中利用群众性通讯手段形成舆论的重要性。

同近几年报道手段、尤其是广播电视这些手段的巨大发展相比，并且同其他力量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相比，不足之处就更为明显。

首先应当看到，公营和私营的群众性宣传通讯网并没有如实地、恰当地反映社会和民主的全部丰富的现实，而共产党人是这种现实的重大组成部分和体现。

因此，就需要重新掀起一个伟大的团结一致的运动以便获得一切保证，使公营广播电视台作出公正的报道并为集体服务，以保证在整个庞大的群众性宣传通讯网中党的声音占据一个更为合适的地位。

与此同时，也需要调整和革新我们党的工作方式和我们独立的宣传工具。

首先应当肯定并且进一步发扬《团结报》的这种特点，即，报道性的、指导性的、进行政治斗争的、有着灵活的大区和市镇新闻的、群众性的、全国性大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采取措施使用现代出版工艺技术。应当强调指出，党组织和党员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党员积极分子的推销散发我们的党报，特别要面向工厂、学校、南方。应当加强阅读《团结报》、《再生》周刊、《马

克思主义评论》、党的其他刊物和《未来城》，并且围绕共产党的报纸和出版物展开讨论和文化活动。

应当研究由于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法律而变得更加实际的支持建立带有民主和团结性质的地方报纸机关的可能性。

《团结报》节的作法近年在参加人数上获得巨大成功并且对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应当依据可能条件发扬这种作法，以便使最有效的和经过试验的活动继续下去。

对于我们党在宣传方面的新的发展阶段来说，坚决实行权力下放是必不可少的。应当保留传统形式：公开集会、报告会，海报、传单。但要革新它们的内容用词。而且应当提倡新的活动形式和报道形式。应当在我们党组织的宣传委员会里设立新闻局或处；应当建立收听小组；应当开展我们党在地方广播和利用《广播入门》节目方面的活动。

为此，应当使用和提高党内现有力量，也谋求有民主倾向的专家和专业中心的帮助，以便使涉及政治斗争重大问题的那些真正的引导运动和宣传运动连续不断并且影响广泛。

六、党的经费

(九十) 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实行对各党的公共资助是个民主成果。共产党人对这项成果和这一成果在公民投票中得到确认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他们旨在为确立公共生活道德和政治力量的真正独立自主创造重要条件。

然而，这并未取消象我们这样一个党的争取群众资助的任务。实际上，党员和劳动者的经济支持是保持党所独有的全国性、群众性、民主性、自主性特点的条件。

党员登记费和给报纸的捐款，在一九七四年为九十五亿里拉；一九七五年为一百一十五亿；一九七六年为一百六十五亿；一九七七年为二百二十八亿；一九七八年将超过三百八十亿。

由于这些成就，我们党的自筹经费（在意大利各种政治力量中独此一家）在一九七四年占意共收入决算百分之五十五点二；这一百分比不断增加，一九七七年为百分之六十五点六；预计在一九七八年决算中将会超过百分之七十二，从而使公共资助份额下降到下余的百分之二十八。

这些成就不仅对我们党的生活具有突出重大意义，而且对我国整个民主生活也具有突出重大意义。这个例子可以在政治斗争中促进反对公共生活中的蜕化堕落现象，以便巩固民主机构和保持它们的威望，并且巩固各种政治力量本身的作用和保持它们的威望。

但在自筹经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应当导致低估进一步增加我们党的收入以便完成新的任务和必要性。此外，在这方面也需要作出努力来扩大每个党员积极分子适合其能力的自愿捐助。这也是我们党的种种民主特点的一个基本的体现方式。

七、一个伟大的考验

（九十一）意共今天和今后都将经受十分艰巨的考验。在过去一年里，党内一部分人可能低估了我们党所走过的道路是激烈的。现在看得更加清楚了，共产党人把愿意为我国的政治、社会、道德革新而斗争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的任务是多么复杂和艰巨。广泛和深刻的危机所造成的困难，敌对阶级行动的影响和特点，国际上的阻挠都更加明显。必须有力地、坚决地回击对我们党的种种攻击和诽谤。而以单纯防御和畏缩不前的态度作出反应则是错误的。相反地，对于任务和困难的认识应当促进扩大社会政治联盟，促进力量对比不断发展，促进党的壮大和发展。代价是高的。这就要具体地确认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应当推进全国团结和民主团结的政策。为此，必须号召劳动者，妇女、青年、知识分子欢迎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即使是以矛

盾和变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种关于正义、自由和进步的要求。必须对在组织问题上的任何漠不关心的态度作出反应，反对并克服对组织群众活动必不可少的日常琐碎工作的卑视态度。

在当前和今后的伟大考验中将锻炼出新一代的党员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使党作为意大利民主和社会主义革新与变革的主角发展起来。

(译自意共《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组织》)

意大利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通过)

前　　言

意大利共产党组织那些本着抵抗运动的精神，为发展和巩固反法西斯的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自由，为把意大利改造成为一个基于政治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在欧洲和世界上实现社会主义与和平的理想而斗争的工人、劳动者、知识分子和公民。

意大利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成立。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人类开创了自由和解放的崭新的、振奋人心的前景，在全世界和在反对当时正在崛起的法西斯反动派的斗争中，起了动员作用和引起了思想上高度的紧张，在这种气氛中，党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富于战斗精神的积极分子的拥戴。

在党的历史上，即使面临着严重困难和处于非常艰苦的时刻，党都坚持了它的民族领导作用，它按照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提出的战略方针进行工作，依靠党员的牺牲，起先全力投身于促进人民和民族团结进行反法西斯暴政的漫长战斗，尔后又全力投身于反对纳粹压迫的解放战争和建立共和国的斗争。

在民族团结政策——它使解放后的重建工作得以开始——破裂之后，为了重新建立民主反法西斯的团结，为了捍卫抵抗运动的革新意义，为了实现宪法的原则和规定，为了维护民族独立、

和平、公民自由和工作权利，为了实行一项复兴南方的政策，共产党从未停止过战斗。根据这条路线，建成了一个群众的、阶级的、民主的、民族的和国际主义的大党，成为意大利和欧洲社会现实的不可取代的因素。

意大利共产党正在创建、维持和加强与工人阶级、新后代、妇女群众、土地劳动者、城市和农村的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社会进步力量的持久的政治关系与组织关系，并且在社会和政治同盟的一个广泛阵营中，同其他工人阶级的政党一起工作，以便在满足具体与合法利益的同时，表达和实现人民对于一个新社会的愿望，这个社会在自由、社会公正和群众参与管理中，朝着社会主义前进。

意大利共产党重申自己力量的非宗教性和理性的特点，人们参加党是以政治纲领为依据的，党坚持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形成和发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并从革新的思想和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历史性的促进。遵循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著作、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理论著作所开拓的批判研究的途径，依靠自己独特的阐述——这种阐述总是公开同现代思想的所有流派对话的——对于丰富这种思想做出了贡献。对于意大利共产党人来说，这些教导是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的依据和研究的工具，这些研究工具是要根据现实和经验批判地运用和革新的。

意大利共产党肯定下述一种社会观对于现实和社会主义前景是有效的，这种社会的基础是政党和团体的多元化，公共权力保障艺术创作、文化和科学的研究、新闻、各个少数民族和各种语言的权利的所有自由；党重申尊重宗教对生活的观点和尊重所有宗教自由的原则；党懂得：在当代的世界现实中，基督教的意识可以变成对于争取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热情的一种激励。

在国际上，意大利共产党为争取和平、缓和以及建立在自由

和各国平等基础上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而斗争，党制定它的完全独立于任何外界约束的政策所根据的原则是：支持工人运动的政党和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国家，支持为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与进步而斗争并拒绝任何外来干涉的各国人民，支持所有那些渴望建立欧洲和世界秩序的力量，这种秩序的基础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反对民族主义的狂热以及为了通过和平方式克服造成国际争端的社会和经济的深刻不平衡而进行合作。

意大利共产党在一个崭新的国际主义创举范围内——这一创举在反帝革命斗争发展的新阶段中，震撼着日益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在意大利和欧洲努力促进信仰社会主义的政党间的思想交流与合作，以及一切以工人和人民为基础的民主力量之间的一致，党相信，今天有条件开辟旨在克服历史分歧并重新统一工人运动的新的政治进程。

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自愿、民主和统一的政治组织，它按照党章所规定的准则、权利和义务行事。鉴于历史经验，意大利共产党反对派别活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调节党内生活。意大利共产党人在长期考验中遵循并检验了这种方法，根据政治斗争条件逐渐产生的变化而改革了它，这个方法使意大利共产党在指导广大群众，组织并领导他们的斗争中，能够承担起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建立起领导机构和党员间的持久联系，保障每个党员的权利，责成党员对制定和执行党的任务承担共同的责任。

党的一切组织和所有党员了解和遵守党章的规定，对于不断提高每个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提高党内民主生活的水平，对于巩固并增进劳动者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崇高理想和目标的拥护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章 党

第一条 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组织那些在共和国宪法范围内为巩固和发展反法西斯的民主制度，为进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争取各国民众的独立、缓和、和平以及国家间的合作而斗争的工人、劳动者、知识分子和公民。

第二条 入党

年满十八周岁、接受并努力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在党的一个组织中战斗的公民，不论其种族、哲学信仰和宗教信仰如何，均可参加意大利共产党。

入党申请应向工作场所或者居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提出，并应由一名党员或一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地方支部委员会委员介绍并保证申请者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忠实。

由有关基层大会批准，或者，由接受申请的指导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 准予入党的特殊情况

在其他党内曾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人申请入党，除通常的吸收程序外，应该征求省委的意见。如果是大区或国家的显要人物，则应征求大区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意见。

吸收以前曾被取消党员资格者重新入党，始终必须征求决定取消其党籍的那个组织的意见。

吸收曾被开除党籍的人重新入党，必须经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中央监委可根据情况委托省委或大区的监察机构提出意见。

第四条 移转组织关系

党员移居应该通知所在基层委员会和该基层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由该指导委员会负责告知其应迁往的基层委员会指导委员

会，并发给一份介绍文件。

第二章 共产主义青年

第五条 党和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参加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并且是党员的青年，根据两个组织章程的规定，享有参加两个组织的活动的全部权利。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同志，未满二十一周岁者在青年团内进行活动。

在争取民主地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一共同战略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建立合作关系，并在互相尊重自主权的情况下，在各自的领导机构中指派代表。

第三章 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党员的权利

每个党员有权：

- (1) 参加党的活动和决定，参加大会和参加在党的报刊上开展的讨论；
- (2) 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在制定党的纲领和战略方面表达并坚持自己思想和文化上的论据；
- (3) 自由地进行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活动；
- (4) 根据党章规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被选举参加党的领导机构，以及被委派出席党的各级代表大会；
- (5) 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对任何领导人和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提出自己的批评。对党的报刊和所有领导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机构应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
- (6) 及时了解对自己的活动和行为可能提出的批评和指

责，并在所在组织的全体会议上——即使不是在实行纪律措施的情况下——陈述自己的理由。领导机构的成员，在专门召开的会议上行使上述权利；

(7) 在退党时，阐明自己决定的理由，只有在退党者所在组织的书记设法弄清情况后，退党决定才可以被接受。

第七条 党员的义务

每一个党员应该：

(1) 出席会议并参加所在组织的工作，执行该组织的决定，遵循领导机构制定的方针进行政治生活方面的工作；

(2) 开展吸收党员的活动，宣传党的政策，维护党，反对对党的任何攻击；

(3) 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知识，深入研究意大利共产党和整个工人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思想财富；

(4) 每年更换党证，阅读、支持和销售党的报刊；

(5) 诚实地参加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本着团结的精神正确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坚持劳动者的下述理想：正义、自由与解放和战胜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文化压迫；

(6) 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同侵犯民主和违反党章规定的行作为斗争，不泄露党的机密；

(7) 按照自己的工作，在工会组织中进行战斗，争取最广泛地团结劳动者的力量。

党员应该尊重和维护他们所参加的群众团体的自主，为这些组织的民主性质而工作。

第四章 党内生活和党的民主

第八条 民主集中制

意大利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调节内部生活，以便保

障党在行动方针上必要的统一性，明确每个领导者所承担的责任，并使党员最广泛地参加政治选择和斗争，严格地保障他们的权利。

因此：

- (1) 所有领导机构都应按照党章所规定的准则和程序选举产生，并应实行集体领导；

- (2) 所有领导机构有义务向它们所领导的组织中的党员定期报告它们的活动；

- (3) 党的每一级组织和领导者个人有义务支持所有党员的活动，保持同基层的密切联系，促进最广泛的政治讨论，在一切组织中，保证每个共产党人发表对各项决定的意见；

- (4) 各组织根据党章所作的决定，对于各自所属全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全国性的机构所作的决定，对于全党具有约束力。如果一项决定为多数人所采纳，少数人应予以尊重；

- (5) 禁止派别活动，以保持党的统一，维护政治纪律。

第九条 党组织的活动

党的每个组织都有权利和义务在党的总政治路线范围内，主动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或与己有关的问题，并就所有国内、国际问题表态。

党的每个组织有义务执行各领导机构所作的决定和所制定的方针，开展吸收党员的工作和党员登记工作，促进新干部的培养。

政治行动的抉择和有关党同群众运动关系的方针，在党的组织范围内确定。

第十条 咨询性活动

人数较多的支部、基层委员会、省委员会、大区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及权力下放机构可以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以通报情况和方针，以及研究普遍的政治问题。

在上述情况下通过的指示具有咨询的性质。

第十一条 碰商与讨论的特定程序

中央委员会和各大区委员会或各省委员会认为一个问题具有特殊意义时，可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向同志个人询问，以取得特殊的帮助，或者进行党组织的磋商。

另外，上述组织可在党的报刊上开展公开的讨论。

在就这些讨论和磋商做出有关的最后决定之前，应向发起讨论和磋商的机关报告讨论和磋商的结果。

第十二条 讨论和决定的公开性

除了在各领导机构中讨论哪些同志应选为代表外，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通常是公开的。

支部和基层委员会的党员全体会议可以向公众公开。

有关的领导机构和监察机构有责任集体决定是否和如何公开所有其他讨论和决定的内容。

（译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组织》，意共联合出版社版）

欧洲和世界上争取和平 与社会主义的斗争^①

恩里科·贝林格

同志们：

我们这个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冲突、野蛮的迫害；然而，我们这个世纪也不能够被认为仅仅是一个经受灾难和浩劫的世纪。这也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和许多国家中，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联合斗争战胜并摧毁法西斯和野蛮的纳粹的世纪；在这一世纪中，人类在被压迫群众和人民的解放道路上完成了最伟大的革命决裂，取得了最伟大的发展与成果。

因此，我们是生活在以深刻矛盾为标志的时代。

一、这是一个劳动阶级继续并越来越广泛上升的世纪。

各大洲的广大群众都普遍认识到劳动者有自己的权利，并且都普遍有不再作他人、剥削阶级和统治集团所管理的生产过程的纯粹工具的愿望。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劳动者有权充分参加文化政治生活，有权充分参加社会和国家的领导。

这就是我们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被压迫人民在争取组成共同的组织和主权独立的国家、争取充分有效的自主、争取战胜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因此，这是一个结束干尽坏事的殖民主义的世纪。

在这个世纪，过去和现在都爆发了伟大的、势不可挡的妇女

① 这是贝林格在意共十五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摘要。

解放运动，这个运动蓬勃发展，取得愈来愈大的成就。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令人苦恼的青年问题，这个问题是动乱的根源。在意大利，在欧洲共同体其它各国，千百万青年在第一次寻找工作，他们经常陷于绝望。

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这些气势磅礴的现象，如果不是反映了一度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格局的危机和过时的话，那又反映了什么呢？事实上，劳动阶级的崛起、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桎梏，妇女摆脱她们世世代代所受的奴役，都是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固有的旧结构和旧原则不相容的。

就其整体来说，这些相互交错的解放运动以及这些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如果不是表明人类逐步地、不可阻挡地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过渡——这种过渡肯定是痛苦的、惊心动魄的，也不总是自觉的——又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吗？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相互交错的革命、进展和成果中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在其中正在实现和前进，同时社会主义本身也在不断丰富，并逐步显示其新的面貌。社会主义是一系列理想、观念和目的的总和，这些理想、观念和目的不是抽象的，而是来自具体的历史过程，来自人类的伟大解放运动，这些运动给人以启示和引导。

不仅如此，而且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就其最深刻的根本来说，马克思的观点通过伟大的解放运动和本世纪的革命发展而得到证实，证明自己基本上是有效的。当然，只有在如下情况下，上述看法才是符合实际的，即：不是违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过去反复的说明和告诫，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公式化和机械的解释；也不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变为固步自封、静止不动的哲学体系，变为意识形态的禁区，从而给马克思以最大的伤害，因为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是彻底批判和破除那种把意识形态看成一种脱离了实际历史过程，脱离了科学文化具体多样的发展的体系的观

点。

不错，任何一个能够客观看问题和有历史概念的人，都难以否认：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决裂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开创了崭新的形势。给了其他解放运动以新的极大的推动并为之开辟了道路。十月革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我们绝不想助长对“列宁主义”的无谓的论战和门户的对立。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想背弃或削弱我们党同十月革命、同列宁事业的历史性联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指出，俄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和列宁事业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是标志着人类开始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的世界现实和世界结构本身变化的一个决定性组成部分。

似乎是以符合历史性批判的精神和头脑来对待十月革命的时候了。我们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就象我们对待我们党的历史，对待一般工人运动的历史，对待其它的运动的历史和当代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和发展一样。

对列宁事业的批判性研究使我们既看到它的有效性，也发现它的局限性甚至错误。但是，对列宁事业进行认真的批判性研究，不应有任何的学究气和自以为是：不应陷入未卜先知的错误，尽管这种错误是广泛存在的，即不应把目前形势下固有的条件说成是在遥远的和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了，也不应把只有今天才有的经验和认识说成是那时就已经有了。

人们经常侈谈和争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失败究竟在哪里呢？或者更确切地说，列宁的实践和理论工作的失败究竟在哪里呢？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分析了他那个时代的突出的、决定性的现象：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占有殖民地和市场、为瓜分势力范围和剥削各国人民而斗争，亦即作为战争和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这确实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众所周知，正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这一观点使得列宁抓住并阐明了俄国革命进程、以革命手段打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锁链的深刻原因、历史必然性和对世界的普遍影响。这一革命决裂正好发生在那一环，也就是说，不是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最强的环节开始的，而是从它最薄弱的环节开始的；而俄国恰恰是最薄弱环节中的一个。当时，俄国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被专制制度所统治，带有封建时代残余的深刻烙印。

列宁作出果断的指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为结束俄国参战状态，甚至不惜牺牲正当民族利益而作出明确而严正的决定；能够体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特点的第一个行动是：颁布和平法令；苏联奉行坚定的和平政策直至几乎突然地遭到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侵略。所有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些事实具有带来和平和革命的伟大普遍意义。

我之所以简单地回顾这些事件，不仅是因为我们党的诞生及其在遥远的决定性年代里的历史同这些事件有联系，而且是因为这些事件曾给我们这个世纪打下了烙印。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听任别人发表这样的意见，特别是出自好心发表这样的意见，即：带来灾难和巨大悲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由于“相互对立的国家极权主义”或者是由于“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制度”引起的。似乎用这种说法一方面影射纳粹法西斯制度，另一方面则影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虽然绝不想减轻和缓和对斯大林领导的各个时期中甚至以离开常规形式出现的镇压事件、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和其它一些专制行为的揭露和谴责。但是，我们反对把苏联制度与法西斯制度相提并论的任何做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我们反对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责任归罪于苏联，因为这是捏造历史，相反，苏联是一贯慎重地、坚韧不拔地寻求和平的。

的确，西方大国模棱两可的态度、它们的妥协退让和狼狈为奸，部分地怂恿了纳粹法西斯的侵略。但是，本世纪对于文明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事实是：当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苏联与西方民主强国的团结时，人类才摆脱了纳粹的野蛮统治。这一事件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打乱了过去的一切平衡；它鼓舞并确立了各国寻求和实行一切民主力量之间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亦即共产党、社会党、世俗和天主教民主力量等各种背景和信仰的一切民主力量之间的团结，它给了这种团结以新的推动。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革命进程的第二个阶段，正是从这第二个阶段起，伟大的解放运动在世界上开始发展和壮大。

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消费文明”导致了部分不合理的消费制度，导致了消费和挥霍，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许多人的拮据和贫困，经济衰退和整片整片地区的 人口减少，掠夺性的开发自然资源；大片不发达地区和饥饿的继续存在，许多根本利益和价值被牺牲了，这就是学校、文化、保健、保存艺术财富、保护风景区、维护土地、环境和大自然。人口激增。如果不坚决地反对浪费，不继续寻找新的资源，那么，能源危机就有在今后几年变得极为严重的危险。

但是，尽管还面临着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世界上却仍在继续进行毁灭性的军备竞赛：一年达四百万亿里拉之距，这是一种损害人类聪明才智的资源浪费。

因此，我们的确面临人类社会的严重矛盾。

革命、民主、进步和革新力量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各国、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所进行的稳固变革和取得的成果；不再遭受奴役的各国人民和新兴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大的国际中心——政治上、精神上的中心——的存在、它们的意向和行动（它们都力图避免战争，促进发展）；可以肯定，所有

这些情况和成果都是我们和世界上进步力量据以前进的牢固起点。但是，总的来说，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人民群众和各民族迫切提出的种种重大问题作出一个有效的全面答复；正因如此，爆炸情况日益增多，暴力、矛盾和混乱的倾向和运动也在涌现。

有些地方，象在伊朗，曾企图沿着一条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来解决问题，而不去改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处的贫困和受奴役的条件，形势一触即发，最后发生了决裂。我们的希望是，在伊朗，那曾在推翻伊朗国王独裁的英勇卓绝的人民运动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力量，能把他们的差异撇在一边，作出坚决努力来克服过去遗留下来的极权主义和蒙昧主义成份，从而找到建立一个民主和现代化的新伊朗的道路。

在拉丁美洲也是这样，总的来讲，基本矛盾加剧，在这里也迟早会出现转折，选择新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来保障各国的社会进步、民族自主和民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和革新运动愈早得到加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愈早取得胜利，这些大陆为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作出的进一步贡献就会愈加重要。

三、因此，目前首先突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从历史上说，它们在为当代世界根本问题作出恰当的回答方面已经无能为力了。

当然，这场危机，这种削弱，这种无能为力绝不排除一部分占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力量重新企图用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以求维持现有的统治地位，甚至重新夺取其它一些统治地位。

同时，我们也不应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帝国主义势力内部出现的深刻矛盾和分歧。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表现出来的危机显然属于另一种性

质。这种质的差别绝不应被忽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今天的世界比过去更加统一得多了。

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奠定了同资本主义有质的差别的经济社会现实的基础。资本主义是以对抗阶级的存在和人剥削人为基础的制度。苏联的伟大的革命之后，在社会和人的生活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切实保障了人人享有工作、学习、文化、保健、休息的权利，人人有权在老年能过上受人尊重的、有保障的生活。苏联战胜和克服了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严重的经济社会落后，迅速达到了工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高水平，尽管犯有错误和强迫命令现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以部分地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有了类似的发展。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当然是不同的。不应低估这些差别。看不到这种差别是错误的，我们的提纲就指出了这一点，而过去的错误就是没有承认这些差别的客观基础，正象对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作的第一次独特的尝试那样，南共联盟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具有独特的基础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一般来说，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由于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历史原因，由于某些特定选择的错误，由于领导方法上的偏差，这些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本身表现出存在矛盾和危机因素的状况，这毕竟仍是事实。

我们认为，这些矛盾和危机的最普遍、最深刻的原因在于：革命进程还没有完成，不仅从量的意义来说，从它在世界上的发展来说是如此，而且从质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即是说，现在还没有以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发扬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世界的危机也是从这里产生的，再加上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和波及，付出骇人听闻代价的军备竞赛的重负。

四、今天，世界由于所有国家和全人类所共同的一些生死攸关的根本点而比过去更加统一了。此外，今天的世界由于互相

依存和相互影响的新的联系而变得更加统一了。在经济领域，在能源和空间的科学的研究和成果方面以及在医学方面，在具有新的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通讯方面；在习惯方面，都是如此。

世界之所以比过去更加统一，是因为今天，各种思想——哲学和政治流派、宗教信仰、兴趣和感觉方式、思想表达和艺术的倾向——拥有新的工具来跨过障碍，在最广泛的地区迅速传播。

我们认为，其所以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也是由于大部分人类都感到不安，因为，由于人类所取得的成果本身，人类看到科学技术进步和驾驭自然的可能性这一广阔无垠的天地展现在自己面前，而与此同时，人类又愈来愈难于看清自己正在沿着哪些道路前进、正在走向哪些出路；人类在制度的危机和新式摧毁性武器的前所未闻的威力面前，还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

和平是不能分割的。各国人民的发展和解放是不可分割的，人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

驾凌和压倒一切问题是维护和平和拯救人类的问题。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崭新内容。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一九五四年就已经清醒地看到它，指出它。之后，在一九六三年，陶里亚蒂在贝尔加莫主要向天主教世界发表的题为《人的命运》的讲话中，再次敲起警钟，并热情呼吁为和平和拯救人类而团结起来。

他说：“这样，我们看到可怕的吓人的‘新东西’：今天，人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仅仅杀害、摧毁别人。人现在能够杀害和消灭人类……人类历史发展到过去从未有过的规模……和平过去始终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好事，现在则不仅如此，变成了不同的东西变成一种必要，如果人不愿自我消灭的话……面对着遭受共同摧毁的具体威胁，对人类共性的认识就以新的力量喷薄而出。”

必须指出，对这一最高任务的认识在无数的男女群众当中，在

和平民主力量当中，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种认识在不同程度上指导了各个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它指导了苏联政府的政策，苏联政府一贯提出和平共处，冻结和减少军备的纲领；它指导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各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力量的政策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的政策；它也指导天主教力量和欧洲那些更一贯地信仰和平民主思想原则的基督教民主党派的政策。这样一个方针在天主教会中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谁不记得约翰二十三世的《人世和平》和保罗六世的《人类进步》①呢？

五、今天，世界的总危机也表现为缓和发生危机，这是由于紧张和冲突层出不穷，由于大国之间关系恶化，由于回到那种要把力量对比和武力行动的因素放在首位的国际关系概念中去，由于各阵营的各个地区和角逐场所对立和相峙。

所有这一切是相当危险的，使我们感到严重不安。

当然，也应当指出，在过去的年代乃至最近几年里，在缓和的道路上已取得了重大成果。比如，在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方面，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了协议。又如，在欧洲，召开了赫尔辛基会议。经济贸易往来和关系有了发展。

请允许我提一下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奥西莫条约。因为这个条约直接涉及到我们意大利人。这个条约可以被看作是根据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互利、和平合作和友好的原则正确解决邻国间争端问题的典范。

我们承认，最近一个时期，意大利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遵循这些原则的。这样一个民族的对外政策之所以成为可能和更为有力，是由于得到所有民主政党的广泛赞同。在这一基础上，意大利一方面确认对它所参加的大西洋联盟的支持。而同时又发展了同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各国其他地区的经济、

① 指梵蒂冈教皇约翰二十三和保罗六世生前发表的两个所谓“圣谕”——译者

贸易和文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也为发展同另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而进行了工作。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总的世界形势，我认为，指出某些严重的、危险的冲突怎样被遏制，尽管没有解决，但至少是部分地消除了这是正确的。实质上，当出现严重的、咄咄逼人的危机时，对于和平命运的深切忧虑看来就会重新在各大国和大部分国家的方针和决策中起作用和占上风。联合国继续负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重大的、严重的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助长对立的，会使我们看到相当危险的、耸人听闻的发展。

可以从印度支那最近事态的严重发展中看到这一切矛盾的因素。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按时间顺序来说，首先是在柬埔寨，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后建立的政权蜕变成了惨无人道的残暴政权，这就是波尔布特政权，这一政权可能是同“文化革命”时代的中国相联系的。反对越南的活动和对越南的压力来自柬埔寨。这是第一个实际情况。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要是及时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大的注意，更清楚地和及时地揭露柬埔寨建立的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好了。讲到这一点，我接受很多同志在代表大会会前讨论中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尽管——我要补充说——我们当时所掌握的情况很少且不可靠。

其次是越南对柬埔寨的干涉，支持柬埔寨那些反对波尔布特政权的力量。

强大的越南军队在柬埔寨的干涉重新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即：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绝对尊重任何国家的主权的义务。

然后是中国对越南的武装进攻，这一进攻是违背上述原则的，而且还出自要给予惩罚这种不能容许的意图。

我们曾公开指责中国对越南的武装进攻，我们也曾再次向越南人民表示我们的和我国人民的悠久而深厚的友好情谊。同时，我们也痛心地要求中国把它的军队撤回到本国边界以内，以此作为谈判和和平解决冲突的条件。

我们同时也提出这样一类要求：柬埔寨人民在完全独立、其主权不受任何限制的条件下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正当危机达到最紧张的时刻、焦虑不安的心情传遍世界的时候，从美国和日本出现节制和谨慎的迹象：从苏联传来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使气氛缓和的和平讲话，重新提出了缓和、裁减军备、和平共处和合作的战略和前景。

接着，中国决定撤军；中国和越南又决定开始谈判。这就在我们大家和世界面前又展现了希望。然而，困难、障碍和不少的疑问仍然存在。

我们出席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们，意共是一个具有近六十年的国际和国内斗争历史的共产党，我们是从本国历史中受到国际主义深刻教育的意大利人民的真正代表，我们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向中国和越南发出呼吁。希望你们能走了解、谅解和和平的道路。你们的谅解将为维护和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同样，今天我们也强烈希望中东能重新建立和平，这一和平应尊重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的正当愿望和权利。对于埃及和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我们重申这一要求，即：在这一决定性的地区，在没有最大国的独霸和竞争的条件下造成一个全面而持久的和平局面，以保障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家的完整和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六、印度支那危机以及世界上其它冲突和危机（从东南亚到非洲之角，从波斯湾到中东，从南非以及非洲的其它地区到拉丁美洲）的背景是人类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

的令人痛心的问题，另外一些是没有解决的新问题；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看不到一个以和平和合作的可靠性为基础的世界前景。

世界和平仍然首先寄托在恐怖平衡之上。而相反，当前必要和迫不及待的是：在不改变力量平衡的条件下，沿着冻结、然后则是销毁原子武器、核武器和中子武器的道路前进，沿着逐步地均衡裁减一切军备的道路前进。这样的进程需要有信任的关系和气氛。首先在美国和苏联两个最大国之间要有这种关系和气氛，实际上，这两个最大国继续担负着维护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合作以及提高世界不发达地区的最大责任。

但是，上述目标不能是这两个最大国独家的任务。同两个最大国一起，其它大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担负着主要职责。但是，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也都有权利和有责任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规定完全自主地参加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我们认为，“西欧国家”，西欧共同体，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具有特别重要和突出的作用；不结盟国家的作用也是这样。

由于一个以和平、合作、各国人民和国家的独立为基础的世界发展统一前景模糊不清，各大国之间和其它国家之间就重新出现对立，重新推行在各个地区竞争和抗衡的政策。这就给民族主义的蠢动和想要扩大相互对立的势力范围的企图提供机会。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现政府表现得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美国政府抛弃了它过去那种直接或间接的粗暴干涉的作法。例如前几年它在越南或智利所干的那样。但是，美国政府还没有放弃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内政施加不应有的压力。

至于人权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没有被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所忽视或轻视，绝对没有！

但是，应当指出，人权问题是美国政府片面地、别有用心地

煽动起来的卡特政府支持波斯国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况且，美国本身也存在着严重损害和侮辱基本人权的情况。

此外，如果把人权问题作为仅仅是针对苏联而进行的一种煽动提出来，那么这一问题同缓和与和平政策就相抵触了。这样做，也根本无助于社会主义各国和一切国家发展民主，发展民主是同缓和进程紧密相联的。

七、我们不想忽略多年来我们所有人都极为担心的严重问题：中苏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不能同总的世界形势隔裂开来。

从根本上说，有许多问题。在革命前的中国被迫处于旧统治阶级和殖民主义列强所造成的历史性经济落后和依附状况问题。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种发展不平衡不是能轻而易举克服的，即使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有中国人民在伟大的革命之后希望实现尽可能快的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国，在国际组织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问题。这种希望本身是合理而正当的。

目前出现的疑问涉及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将会奉行什么样的国际政策路线。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令人担心，而特别令人担心的是把苏联看成敌人、更糟的是看成主要敌人这一方针。这是非常错误的，不管造成和助长这一对立的客观原因可能是怎样的，这方或那方可能有怎样的错误。

但是，认为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必然是扰乱缓和与和平的因素，那也是错误的。相反，我们认为，中国能够而且也应该是为争取和平和人类普遍进步而努力的一支力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取决于中国本身。但是，也取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和政策。

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奉行旨在从反苏意义上玩弄中国这张牌，以加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这一政策是不负责任的、有害的。但与此同时，不承认中国有权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和发达的

国家，不管是谁，都是错误的。既然这一进程必将向前发展，大家就要为达到如下目的而贡献力量，即：让这个进程带动中国致力于和平与合作的政策。

八、为了克服缓和危机，应该明确而郑重地重申：没有理由能为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生活辩解。不能容许侵犯各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不管是为了支持反动政权，还是为了输出革命，为了给予惩罚性的教训，为了防止或多或少出于臆测的威胁。如果这一原则被破坏了，那么就会意味着今天世界会出现连锁反应，直至爆发全面战争。

其次，最大国和所有国家都应该认真地采取协调一致的行为以解决不发达地区问题。

事实上，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通过同心协力，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要么则是久而久之，成为紧张、冲突和战争的不可避免的起因。

在上述积极的努力中，应当把冻结和均衡裁减军备放在优先地位，并且优先使发达国家有义务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源用于不发达国家。

总之，和平战略应当以推动世界范围内为发展而合作的任务来充实内容。

我们正是从上述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振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需要的。我们很久以来就主张，新国际主义应当以承认各国共产党和各种革命进步力量的差异并完全尊重它们的自主为基础。但是，我们认为，向前迈进一步的时候到了，以便使一切革命、进步力量——共产党、社会党、世俗和基督教的民主力量、解放运动——都能努力制定能够导致共同行动的一个和平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路线和目标。

总之，如果说人类迫切需要出现一个转折，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崭新类型的国际主义合作。

九、西欧的作用是伟大的，它也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在国际局势紧张的近几个月里，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其它一些国家曾以负责的、平衡的态度行事。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西欧和欧洲共同体在关于和平、裁减军备以及不发达地区这些重大问题上尚未采取适当的行动。

西欧各国的反动保守势力都在跃跃欲试，它们力图扭转曾使许多欧洲国家在缓和过程中、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关系上起过积极作用的那些倾向。

危险是严重的：例如，可以设想，一旦佛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他的朋友们上台，会给整个欧洲和国际形势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作为意大利全国性的大党，工作重心是西欧，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是这一现实活生生的一部分，我们愿意为如下一点作出贡献，即：以建立在自由、民主和多元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为方向来变革这一现实。但是经常有人从许多方面误解我们对西方的这一选择。有人指望我们做出一种把当前西欧现实原封不动地加以接受的抉择，因此，也就是指望我们放弃为变革西欧现实而行动和斗争，而这些行动和斗争正是我们生存和工作的原因所在。这种指望现在和将来都要落空。有人指望我们采取闭关自守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也同样是错误的。我们选择欧洲是我们国际主义观点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已处在第一次通过直接普选来选举欧洲议会的前夕。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亿八千万欧洲人将一起投票选举共同的议会，从而将作出一个关系到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前途的抉择。我们将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目前，欧洲经济共同体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阻碍联合进程的严重对立是其活动的特点。

共同体各国有六百多万的失业者，特别是第一次寻找工作的

青年以及妇女，这种情况始终提醒我们必须确立新的经济政治方针。摆脱这一危机的办法，不能是重搬以已不能再重新出现的国内国际条件为基础的老一套发展作法。西欧国家经济的振兴是不能离开国内的深刻变化，首先，不能离开对工农业生产机构实行协调的改组，不能脱离引进规划的因素，以便指导资源的使用和投放；也不能离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旧思想以及过去和现在抱着这种旧思想不放的旧势力，再也不能够带来任何希望了。必须发扬新思想和新力量。这些新思想和新力量，一方面能够维护和发展多少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劳动和智慧所建立的价值财富，另一方面，能够建设性地表达由于目前危机而爆发出来的那种正义和变革要求，那种要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并在民主和自由中走向独特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普遍愿望。事实是，今天在意大利和西欧，只有改变结构和社会政治格局（民主的辩证关系应在这个范围内表现出来），民主才能生存，才能进一步发展并产生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效果。但是，这就是说，要做一些老的资本主义集团再也绝对无能为力的事。

意大利共产党人反对任何不加批判地、华而不实地看待欧洲的立场，但他们也看到了今天欧洲共同体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欧洲一个个单独的国家是过于微小的实体，以致不能成功地应付那些新的问题。这些国家，特别是最弱小的国家要是单枪匹马地行事，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处于依附大国和大经济区的地位。因此，今天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应该被看作是使参加共同体的各国享有真正独立、促进它们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

要振兴一体化进程，使它摆脱已陷入的困境，就要有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民主化进程，办法是：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和建立一个新的多国政权。这就要求对共同体农业政策作重大修改，要求执行一个新的工业政策、新的能源政策，要求真正地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就要求执行一个新的区域政策和重新实

现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平衡，这个问题由于共同体将扩大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将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这还要求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新关系，要求为确立一个共同对外政策而作出新的努力，这个对外政策应当能够使共同体欧洲成为缓和、裁减军备、解决重大世界性问题（从解决不发达地区问题开始）的政策的第一流主角。

理解这一进程的全部重要意义，推动并领导建立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进步的与和平共处的共同体欧洲，这一历史任务落在西欧工人运动身上。

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我们在新的欧洲议会中，可以就全面制定我们的政策和有关革新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起特殊的作用。

欧洲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企图用笼统的共同纲领来掩盖他们之间的深刻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欧洲议会权力，共同体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内容、共同体的扩大（想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英国工党之间的分歧就够了）等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一条不同的路线：我们从来都不隐瞒共产党之间在共同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而是公开地说明这些分歧点以及共同点。这是光明磊落、政治态度老实的一个事实。

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多次阐明了我们关于发展欧洲共同体的观点，并且将向代表大会提出我们将在新的欧洲议会中为之而斗争的选举纲领。在新的欧洲议会中有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是能使一体化和团结进程沿着革新和民主变革路线前进的一种保障。为此，我们将在新的欧洲议会中为争取一切有意朝这一方向行动的民主力量和左翼力量之间的最广泛的一致和谅解而努力。

十、我们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首先产生于我们的历史，并且符合我们国家的条件。但是，我国的情况与西欧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有一些基本共同点。“近年来，意大利共产党

人的考虑同西欧以及象日本这样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自主地作出的思考是相吻合的。尽管这些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遵循的方针都不一样，但是却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即争取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应该在充分扩大民主和一切自由之中进行。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选择。”我们认为，提纲草案中的这一提法是清楚的，是应当加以确认的。

人们也谈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个幸运的提法，我们承认，这个提法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我们还是接受了，因为这一提法已成为大众化、通俗易懂的了。但是，这一提法要求作确切的说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固然并非数不尽的，但肯定也是很多的，而且还会越来越多。我们不想提出一个别的模式来贬低其他所有模式。相反，我们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最初，我们有过第二国际的经验：工人运动为摆脱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第一个阶段。这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阶段。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在十九世纪末产生的，它们曾是唤醒千百万被剥削者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争取政治解决的主角。但是这一经验陷于可悲的危机，最后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主义作了让步。

第二阶段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十月革命、列宁的思想和活动标志着当代历史和人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从我们的提纲草案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在对苏联历史和现实的特定方面进行批判性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因为我们不仅意识到十月革命的意义，而且也意识到在当时条件之下作出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这种伟大抉择的有效性和建设新社会的意义。我曾经说过，这些都是开创了世界革命进程的事件。

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提出要求：在苏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克服社会主义革命所蕴藏的民主潜力同使民主生活不能充分发挥的障碍两者之间的矛盾。

但是我们确信，今天主要问题在其他方面，在于要负起沿着新道路来发展世界革命进程的任务，这些新道路应考虑和珍视前两个阶段的经验，并对这些经验作批判性思考。当然，必须使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根据它的各个不同的、自主的组成部分，去鼓励、促进并赞助寻求走向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在这方面，西欧工人运动所担负的任务恰恰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涉及到要弥补过去和现在都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全部发展的历史差距和迟缓。

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在西欧的确立将会对由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经验本身具有什么意义是十分注意的，并且认识十分深刻。只要看看这一段话就足以说明：“我们不把自己的道路强加给别的国家……在西方将以其他方式来做。也许，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希望西方无产阶级来纠正这些错误。因此，我们请欧洲无产阶级来帮助我们工作。”未经查对原文一译者

在当代，社会主义在西欧的发展对克服缓和危机，对建立工人运动同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与遭受排斥的群众之间有机的联盟关系，对实现和平战略应有的新的内容来说，将是一个重要贡献。

这将阻止欧洲的没落，使欧洲在发展文明、确保社会主义作为公正、民主与自由的整体体现的新的发展中重新具有首要的作用。

十一、我们的全部斗争都是为了争取这个目标。这一斗争早就开始了：早从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在重新赢得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行动中，为争取拯救全国团结和民族独立、为建立共和国和赋予意大利一部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是先进民主的宪法而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

就是在这三十年中，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进行了不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来维护民主制度，扩大公民和政治自由，充实以社会内容，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增加自己的权利和作用，从

而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我国民主制度的特点是：民主议会机构、经选举产生的代表会议制度是以公民民主生活的永久性组织为基础的，而这种民主生活是由人民的大党、工会、民主组织和广泛的联合中心来加以保障的。我国的民主制度，尽管经历了破裂、甚至是严重的冲突、急风暴雨的时期和悲惨的事件，但还是依靠顽强和广泛的斗争而得到维护。许许多多工人和农民、许许多多我们的同志以及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为这些斗争作出了巨大的战斗性贡献、付出牺牲，往往还洒下了他们的鲜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共和国尽管有一切矛盾、腐化现象与深刻危机，却仍然同它的成果一起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财富。

同志们，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当然不是放弃革命任务的机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斗争的道路，是一条需要顽强的战斗和持续的革命紧张的道路。

对最近的历史进程和具体的政治发展作这样的回顾——必然是概括的回顾——表明：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我们对一个建立在政治民主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并不是抽象臆想的结果，而是具体经验的结果。近几年一个新的事实是：我们越来越把这一种观点和斗争置于欧洲的前景和欧洲的范围之内，寻求并实现了与其他共产党相同的方针，追求同西欧具有社会主义信仰和进步倾向的其他力量实现一致的目标。

（译自1979年3月31日·意共《团结报》。
载《参考增刊》第14、15期。）

贝林格在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谈关于武装力量民主化问题

我还想谈以下武装力量问题。在这方面，也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我们已经争取到一些重要的革新性法律，如“原则法”，它破天荒第一次规定了军人的权利，提出了民主保证，制定了军队代议机构的选举，推动了军队与民主机构之间建立建设性关系。五十万军官、士官和士兵在全国所有军营中有可能选举法律规定新的代议机构，这一件事对军队生活和巩固意大利民主所具有的伟大意义也许尚未为人们所充分理解。当然，大家都应当认识到，这一革新的做法不应损害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团结一致，武装力量现在是、而且也应当继续是全国团结的象征。

近年来，军队和人民之间有了更广泛的相互了解，这是最有积极意义的事。

我们坚决赞成保持义务兵役制、反对成立职业军队的危险倾向，同时我们也希望，服兵役能真正不仅有助于使青年为保卫祖国（这是宪法为武装力量规定的宗旨）得到适当的军事训练而且有助于提高青年的公民觉悟和文化水平，应付居民在发生天灾情况下的一些紧迫需要，正如在弗里乌利大区地震期间，军人所表现的模范忘我精神那样。

我们还要指出，为了使武装力量得到民主革新和具有行动上的效率，重要的是在调整职衔方面应对军队干部的平等待遇，尊严和高度专业技能作出保证。

我们在这个对于国家生活极为重要的部门展开的团结工作，

现在应当继续下去，并加以扩大，以使意大利武装力量在忠于共和国宪法和日益同人民打成一片的条件下，为我国的民主与和平服务。

（译自1979年3月31日意共《团结报》。
载《参考增刊》第14、15期）

贝林格在北京大学集会 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

我们在制订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时考虑并且仔细地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我们主要以我国的独特条件为依据，不仅拒绝其他的模式而且也拒绝那种认为只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的观点。这是从我党整个历史留传下来的一种抉择。如果我们党的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斗争和牺牲中没有遵循这条道路，把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作为我们的愿望，意共就不会象今天这样起到在选举力量和政治影响方面成为意大利第二大党的作用，也不会是资本主义西方最强大的共产党。意共在全国五千六百万人口总数中有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名党员，并且在政治选举中获得近一千一百万张选票，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四。我们党同社会党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同其他左派力量一起，在我国二十个大区中的六个大区，在几十个省份以及在意大利一些最大城市里（罗马、米兰、都灵、那不勒斯、热那亚、威尼斯、波伦亚、佛罗伦萨）是主要的执政力量。

我们这个斗争坚持了很长的时间。共产党人曾经在二十年中一直站在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的最前线。意共在一个广泛而团结的人民运动所进行的反对纳粹侵略者的武装抵抗运动中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和伟大的民族力量。战后，我们为保卫和扩大民主成果及推动我国经济和文明的发展进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今天意大利是受到遍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危机的最沉重打击的国家之一，这种危机本身孕育着倒退，政治和文明的倒退的危险。这是个激烈的、艰难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反动的和野蛮的势力不惜使用血腥的和暴力方式来摧毁民主制度。多年来在我国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首先就企图让作为劳动者运动的一个不可放弃的财富和一个使运动本身发展壮大的手段的那种民主无法前进和发展。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确实巨大，我们为实行经济的发展，平等地满足公民们新的需要，限制大资本的权力的改革而斗争。

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确认我们的民族要求，确认这些要求的民主性以及确认在当前这个世界危机阶段，在意大利的发展将会听命于西方最富有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决定这种危险严重存在的阶段，使这些要求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原因。如果人们确认这样的选择，但又仍旧丝毫不考虑解决我国和我国人民的种种问题的必要性，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我首先是指就业问题。这同青年群众尤其有关，他们特别受到危机造成的经济、文化和道德后果的影响。今天的青年在建立他们个人生活的同时也想了解和参与左右他们前途的那些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决定。相反地，排挤他们意味着有使丧失信心和绝望过大的危险，这种丧失信心和绝望在一些人身上表现为转向极端主义和其它倾向、放弃斗争、自私地追求个人的特权、在日常烦琐单调的生活中消极地随波逐流。这种危险也波及我国其他一部分人。例如，妇女群众，今天意大利妇女以过去从未见过的活力和决心进行斗争，争取不再受到歧视和被排挤出从事生产的生活，争取在充分肯定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方面不再受到阻挠。还有意大利南部的居民，他们在忍受古老的而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造成痛苦后果，所有意大利人的未来在许多方面是同这个问题的解决相

联系的：就是实现包括南部在内的全国生产机构平衡发展的问题。

这些就是资本主义无能积极而公正地满足已经发展的社会中极其广泛的人民各个阶层的切身要求的一些最明显的表现。但当然还不止这些。意大利社会的全部问题反映和证实这样的危机那就是：怎样捍卫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而不使通货急剧膨胀？怎样更有成效地组织工厂中的劳动而不缩小工人阶级对生产宗旨和目的以及对投资发展的干预权力？怎样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条件更合乎人道？怎样使国家机关更好地为公民服务？怎样健全公共生活？这些公共生活在充斥着腐朽的丑闻，这些丑闻涉及到那一部分同社会治理的弊端有密切关系的政界和金融界，这些弊端把我们带到了当今的危机。但是，这些问题，除了揭示这么深重的危机的性质和复杂性以外，也是我们进行斗争的场域，我们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命运，也就是说把国家重新纳入秩序、民主和革新轨道的可能性，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而这意味着认真治理国家。但是没有象意共这样一支力量参加领导我们的国家，不仅难以治理意大利，而且尤其无法走上应付和克服意大利危机的道路，因为意共体现着意大利社会中那一部分最受众望和最渴望进步的人们的要求。

我们非常清楚，这不是一场很快就会过去的、暂时的危机。只要朝我们国境外面看一看，就会看到那些早已把一国的每一件事情都同世界的错综复杂情况联系在一起。第三世界人民的崛起，他们要自主掌握自身命运、掌握本国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的愿望，揭示出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即使在它显然是最稳固的和最繁荣的几个地方也不可能依靠把困难的重担转嫁给迄今还是不发达地区的那些人民来解决自己的困难。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已经能够衡量那些由于国际关系中缺乏公正和合作而产生的没有得到解决的、对大家都是日益增长的危险的世界性问题

是何等严重。在位于能源生产最富地区中心发生的伊朗革命、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津巴布韦进步力量的胜利，再次向世界传达了这个信息，即民族解放道路和摆脱新殖民主义的解放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今天所有工业化国家需要考虑的正是这些现实。但必须尊重新兴国家人民最关心的事情，即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平等。这些要求并非只是对正义的一种必要的、过迟的敬重。这些要求被强行提出来，应当接受它们，因此从那些野蛮压迫和掠夺当地人民几个世纪的老殖民帝国的废墟中，产生了这种情况。在客观上和结构上不可能再走它们的老路和重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强制推行并已失败的模式。硬要重新建立和维持旧的国际剥削制度会意味着世界战争。

由于整个这些政治、经济原因，并且面临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西欧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和民主力量的斗争只能以世界和世界各地的和平与正义的目标为依据，只能遵循缓和紧张局势，在一切存在争执和冲突的国家之间重新开展对话、进行谈判的意图。

帝国主义势力对各国人民施加严重的威胁。在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中再次出现令人惊恐的冷战气氛，这种气氛加剧了对抗集团各自的强硬态度和闭关锁国的状态。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增多了，而且尽管新兴国家的人民肯定自己是自身历史和全人类历史的主角，工业化世界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在扩大。⁹在旧的不稳定因素之上又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但从来没有得到全面而积极的解决。在国家关系中使用武力和各种形式的压力的倾向在发展。因此，世界上所有那些愿意保卫和平并保卫各国人民享有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权利的力量之间寻求理解和合作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这些力量认识到这个危险：军备竞赛除了成为新冲突的势头以外，还破坏把人类拥有的财富用于和平与发展目的的努力。今天抉择的范围越来越缩小为一种两

难的抉择，即或者建立基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自由协作与合作的世界新经济政治秩序，或者发生一场可怕的灾难。

我们看到世界上对这个令人惊恐的难题的感觉和担心在增大。在意大利和欧洲，我们通过复杂而不总是容易的对话向一切左翼和民主力量（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各种倾向的进步力量）呼吁，这种对话尊重各种力量的自主，目的是找到同它们一致之点，以采取行动，给西欧打开一条摆脱危机的道路。但是，这种行动必须找到同世界上努力争取缓和、裁军、和平、正义和合作的一切政党、运动、国家和政府——从“不结盟国家”起——的联系并建立同它们的关系。

但是，在国际上这种行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放弃的部分是，争取深刻地革新我们欧洲大陆各个发达工业国家和整个欧洲共同体的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

（原载1980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贝林格谈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

——贝林格和意大利《共和报》主编的谈话

斯卡尔法里：波兰事件是否动摇了您对现存社会主义的信念？

贝林格：我的信念？您为什么谈我的信念呢？最好还是谈看法。无论如何，我根本没有论述过“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斯：那么，你谈过什么呢？

贝：我使用的是“迄今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术语。

斯：老实说，我看这没有什么区别。

贝：它确实有所区别。这也许只是使用概念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您想想看，最大的宗教分裂总是由于措词问题造成的。

斯：请你阐明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吧！

贝：“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就是说它是存在的，某些人（但不是我们）可能把它设想为唯一有“实际”可能的社会主义。相反，“迄今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简单地说是到目前为止历史上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因为这种社会主义还很不完备，它需要在广泛意义上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只是可能的社会主义中的一种。在我看来，两个提法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斯：我承认这点。但是，打开窗户说亮话，我要告诉你，我在东欧政权那儿看不到任何看起来好象是社会主义的标志的东西。

贝：你弄错了。它们已经消灭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它们打破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统一性。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变革时代已经开始。你认为这一切不重要吗？

斯：不。但是，这一切对证明社会主义概念的正确性还有点不够。

贝：这不是全部情况。现在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力图实现收入平等的倾向，同样引人注目的教育的普及以及普遍的社会保险。

斯：我同意您的这一看法，但是，坦率地说，您为什么这样坚决地一再保证在那儿确实存在着一点点的社会主义呢？实际上您也知道，因为您无数次地看到了那些情况，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发言权，工人甚至没有罢工权利，波兰工人不得不通过艰苦的斗争赢得了这种权利。这一切情况合乎哪一种社会主义呢？

贝：这恰恰是“迄今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而波兰工人并不想把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交给任何资本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实行工人自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义斗争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而且是朝同样的方向继续前进的。

斯：然而，列宁造船厂的工人还是把圣母的画像挂出来了。您必须承认，在“迄今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存在了三十五年的情况下，这不是工人们信仰卡尔·马克思的原则的重要标志吧！

贝：宗教是波兰民族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可能犯了错误，但不管怎么说，它没有犯窒息人民的宗教感情的错误。它甚至也没有限制作为波兰人民的民族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天主教。我们为什么看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圣母画像就要惊讶呢？在这种情况下，您试图让我说些什么呢？说社会主义的波兰是粗暴的警察专制吗？这决不是事实。说波兰是由一些与工人为敌的剥削者统治的吗？这决不是事实。说波兰人只梦

想重开交易所，梦想波兰贵族和资本家回来领导工厂吗？这也绝对不是事实。说如果波兰共产党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她就将把所有大主教都关进监狱吗？连这一点也绝对不是事实。

斯：但是，每当我们谈到苏联是否可能干涉波兰的问题时，您的答复总是，迄今还没有发生这种干涉。为什么这样说呢？您是不是担心将来会发生这种干涉呢？

贝：我强烈希望不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那就将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波兰危机确实没有结束，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发展过程开始了。波兰政府和党第一次同意了某些制度方面的改革。让我们等待这一切将如何起作用。必须极其小心谨慎地和根据对历史上发生的许多过程深刻了解来进行工作。无论哪一方面的失误都可能危及全部工作。

斯：波兰事件没有促使您想到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先例吗？

贝：什么先例？

斯：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事件。那里的工人们也向苏维埃要求自治和权力。红色近卫军用武力回答了他们的要求。您不认为，从此，喀琅施塔得的列宁主义同瓦文萨讲得如此之多的自治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相一致了吗？

贝：一九二一年的俄国正处于革命之中，正处于内战之中。它受到了资本主义列强和白匪军的进攻。在我看来，作这样的比较是毫无道理的。此外，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没有任何人发动过红色卫队。

斯：自喀琅施塔得事件以来，列宁主义没有变。这就是我每次都要继续提出的问题，我这样做是因为您还没有说您抛弃列宁主义这一事实。尽管如此，当您谈到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时，我完全看不出其中有列宁主义。那么，你为什么不把那句话说出来呢？

贝：你认为谈谈列宁主义就如此重要吗？

斯：讲真话，是的。另外，您自己也说过，宗教大分裂都是由于措词问题造成的。我请求您回答我这个问题。

贝：好吧！我已多次重申，列宁并不是先知，对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来说，并不存在宗教式的十诫。我也多次重申，斯大林整理出来的东西——关于列宁思想的提纲，即一种在一切情况下都适用的简明扼要的概述——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完全拒绝它。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和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他的思想中，有许多我们认为对工人运动具有价值的重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因素，由于斗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发展，已经如此过时了，以致它们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已经“取得了应为死亡的资格”。

斯：我还想提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您，如果您愿意的话，就详细地回答它。列宁思想的哪些部分还鼓舞着您？您觉得哪些部分不再有效呢？

贝：我很高兴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列宁在一定的时刻实际上（不是在理论上）把党和国家融为一体了。我们完全反对这种党政合一的做法。其次，列宁始终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转折中的必要阶段。我们也反对这种论点。第三，列宁始终坚持认为，革命转变必须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接着是社会主义阶段。与此相反，在我们看来，民主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工人阶级要保卫并扩大它所争得的一整套的权利。因此，民主具有人们不可抛弃的普遍价值，通过开始和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民主将得到保证。

斯：我的印象是您完全否定了列宁。

贝：没有。列宁发现了工人阶级必须建立同盟，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列宁致力于使工人阶级超过旧工联主义、总体国家制度和工人贵族的思想，在这几点上我们同列宁也完全一致。最

后，列宁认识到了党的行动中的主动性、“主观”因素和党的创造及革新作用的意义，这种创造和革新作用使党看得比今天更远，使党能变革今天的世界和不依赖“自然的”进化论改良主义。在这几方面，我们也完全同意列宁的观点。

斯：马基雅维里早在列宁以前就说过以上这些话。

贝：正如您所知，意大利共产党人读过马基雅维里的著作。葛兰西读过，陶利亚蒂也读过。但是在自己时代里确实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马基雅维里谈论的是一个君主的个人的“优秀品质”，而我们讨论的是为改变社会而组织群众的政治形式。

斯：我从您到现在为止所谈的一切中断言，您的列宁主义已没有剩下多少东西了。

贝：这不是我的看法。但是，如果您的结论是这样的，我也没办法。

（译自荷兰《背景》周刊，1980年12月23日。载

《共运资料选译》1981年第2期。

钟山摘译，施群业校）

开辟为社会主义 而斗争的新阶段

——意共领导机构决议（节录）

按：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兰宣布国家处于“战时状态”后，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多次发表讲话，除对波兰军管表示谴责外，还联系国际共产，提出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开辟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阶段”等重要问题。十二月三十日意共领导机构又发表决议，进一步阐述了贝林格讲话中提出的论点。现将这个决议的二、四、五、六、七等节节录如下，供研究参考。

二、意共重申它的这一信念，即：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只有在充分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条件下才能确立。

近日来的悲剧性事态发展，使我们更加确信寻求和遵循崭新的道路的必要性，以便使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在全世界重新高涨。这一需要之所以提出，不仅是由于西欧左翼力量所处的不同条件。事实是：在东欧各国，已经发生退化过程、经常性的严重危机，这种退化和危机使政权的一元化概念、真正能代表社会的种种成分的机构的缺乏、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闭塞而又属等级性的理解方式、把社会主义看成模式而不是看成在世界上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思想都成为问题。

这就 在一系列民主因素同社会主义因素之间产生了矛盾，在文化的提高和东欧各国的发展本身给社会带来的新成份同一个不容许在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实行真正民主参与的制度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一切最终不仅是压制自由和创造力，而且还阻挠东欧社会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助长了改革力量同专制压抑二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

因此，必须看到：十月革命开始的那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已经耗尽了它的推动力，正如曾有过团结在第二国际周围的社会党以及工会运动的诞生和发展的那个阶段已告衰竭一样。过去也正是由于这一历史性变迁，世界才前进了，发生了变化。现在是要向前看，超越这个阶段。人类面临着前人所未遇到过的一些巨大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而资本主义是再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各国人民的需要和要求也是新的，这种需要和要求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在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是如此，而且在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也是如此。

因此，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最积极最先进的答案，不是闭眼不看现实和现实中的悲剧，也不是宣布反历史的背弃信仰。与此相反，这一答案正是要把为社会主义、为消除资本主义和旧的政权结构而进行的斗争理解为一个既有停滞和倒退、但也使人类获得伟大进展的开放性进程。必须以批判态度、但又特别应当以行动参加这个进程。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的进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和成果，依靠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独特道路所完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最进步经历的胜利。给西欧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以新的推动，并为这一斗争开辟新的天地，对于在全世界开辟争取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对于促进东欧社会的民主革新，是至关重要的。

四、一年半以来波兰发生的事件和近日来出现的引人注目的结局，促使人们对那些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社会及其三十五年的历史和政治事件、对在欧洲和世界上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现实问题进行更全面的考虑。

这种考虑（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说，它并非始于今日）的出发点是在东欧各国采用一种唯一模式——苏联型的模式——所带来的危害。这种危害既涉及经济，也涉及而且首先涉及政治制度。不能说这是雅尔塔协议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千真万确的是二次大战刚结束后，共产党领导人之间曾对人民民主国家本应具有的独特性质进行讨论。由于一九四七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和一九四八年对决定要遵循并且遵循了自己的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的南斯拉夫进行谴责而出现了转折。冷战、国际紧张局势造成的严重形势促进了这一转折。诚然，当时在所有东欧国家开始了一个艰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甚至通过对党的领导人和党的骨干分子的悲惨审判，把从打败纳粹之后一直到那时为止在各国为建立一种同过去反动的专制传统决裂的、以对苏联实行友好政策为基础的、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政治制度而进行的努力一笔勾销了。

这样一来，在那些国家，开始确认苏联模式的所有主要特征的进程，而这一模式在后来的年月里，在苏联本国则成了被激烈谴责的对象。

曾被称之为“人民民主”的国家无疑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那种社会，民主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方面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后来这些矛盾逐渐显得日益严重；至少对某些国家来说，自己本身的民族特点也被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扼杀了。

在谴责南斯拉夫之后不久，战后波兰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就爆发了，这不是偶然的。指责波兰党的领导集团有民族主义一举是

在那些年月里要把上述进程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信号。

特别是对像波兰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建设一个新的、更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不能不考虑到波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存在着拥有自己的组织的广大农民群众；天主教会的影响和在全国的作用，以及有倔强的犹太少数民族。在经济方面有一个考虑到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分工是必要而恰当的。因此，对波兰、匈牙利来说，对其它国家来说，根本上确认苏联模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历来的年月里人们感到了它的严重后果。

在这方面，苏共二十大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展示了巨大的希望。由于那次代表大会，人们又重新谈论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道路的必要性，并下决心为完全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化而具体地进行工作。人们庄严地提出了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之间另一种建立在完全尊重各国主权之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问题。人们宣告领导国和领导党的概念过时了。一些新的可能在东欧各国和苏联本身展现出来。由于从二十大得到了决定性推动的和平共处政策，甚至在世界上也展现了这些新的可能性。

然而过了几年，这个从一开始就始终在各种不同的矛盾、犹豫和抵制中前进的革新进程逐渐停滞不前了，正如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九六四年在其《雅尔塔备忘录》中所回顾的那样。出现这种情况也是由于二十大本身的缺点。二十大集中批判所谓“个人崇拜”，未能去深入分析苏联政治制度的结构。

五、由此而产生了进行更深刻考虑的必要性，这种考虑要超出批评某些具体的错误的范围。

为什么那些一再出现的革新努力都失败了？客观困难，有几年敌人用战争和内部颠覆的威胁给那些国家造成的严重压力，对受到包围的担心，冷战的严酷，这些都解释不了上述的一切。一

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证明这一点。在那个国家，推进新的民主进程的行动不是由象团结工会那样的力量，而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动和领导的。当时该党决心改革同捷克社会中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本身发生尖锐矛盾的政治和经济管理。

因此，入侵捷克以及粗暴的中断那一可贵的革新努力，证明了深刻革新东方制度的必要性，不仅同苏联模式发生了矛盾，而且同那种限制各成员国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概念也发生了矛盾。

我们很清楚，发展共处与保卫和平目前的确是不能同欧洲两个集团的存在分开的，并且不稳妥的改变现状对和平来说包含着严重危险。但是这却不能为压制今天在全世界表现出来的对自由和独立的需要、对革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进行辩解。相反，共处应当是使这一进程在和平与安全中前进的条件和手段。因此，在东方和在西方都不能把集团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现实和受强权逻辑支配的思想和军事阵营。相反，集团是和平共处本身的发展应当开始克服的一种政治现实。和平共处不能仅仅是各国之间外交关系和谅解的表现，而且要求各国人民的积极干预，首先是要求大规模的争取和平运动的积极干预。

因此，不论对意大利还是对任何其它国家，我们都拒绝接受一种逻辑；根据这一逻辑，必要的变革要为安全而牺牲，并且安全的含意是由霸权主义大国设想和强加于人的。拒绝这种逻辑是开辟争取和平社会主义斗争新阶段的条件。这一斗争一方面要正视从当今世界的结构中产生的新矛盾，另一方面要对在所有社会制度下和从最先进的发展条件。认识条件和科学文化潜力的条件下产生的新需要给予满足和解决。

因此，我们彻底地、平心静气地、毫不含糊地思考了东方国家的危机，但我们决没有得出社会主义前景已经暗淡的结论，也

没有得出那些事件表明社会主义失败了的结论。

社会主义的边界并不等于东欧国家的边界，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正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历史性的运动。

六、一九一七年十月在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事件。它对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斗争的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

尽管出现了斯大林时期悲剧和蜕化的沉痛事实，但通过艰苦奋斗、英勇斗争和巨大牺牲，苏联从革命前时期那种极其落后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了，成为一个工业强国，能够抵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并能够为击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而为世界和欧洲各国人民开辟新道路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十月革命打碎了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为全世界共产党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促进了它们的经济、政治解放斗争，促进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解放运动和独立运动。十月革命为许多国家的工人群众和人民群众所带来的胜利成果，以及它在世界平衡中为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所造成的变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关系重大的。

意共并不低估苏联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同那些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政权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在没有公开违背这些利益的时候也同这些利益发生冲突，如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就是这样。

七、欧洲对“第三条道路”的需要就是从这些历史事件和这些理论建树中诞生的。那些想要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需要和必要性已经过时的人们错了。事实上是旧的政治思想方案，即某一种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权的组织、同社会的关系的概念过时了。但是从事态本身，从那些关系到人类文明命运而资

本主义再也不能解决的种种矛盾的激化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客观的必要，作为一种历史的需要，被重新提出来。苏联所采取的、并被搬到东方国家的“模式”是不能重复的，任何把社会主义同民主、把所有制形式和社会对生产手段的控制形式同政权的民主组织的形式割裂开来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必须超越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这一点事实上也是清楚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过去没有力量、也没有愿望去触动资本主义政权的结构，而使工人运动处于消极和从属地位，并遭到失败，也因为在西方出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重大的新情况。社会民主党至今所取得的经验和所走过的道路使一些国家在社会和文明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如今却因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危机和国家本身的危机以及广大群众遭到排斥这一新现象而中断。这就需要——从法国到希腊，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德国——对思想、具体的纲领和政府进行新的探讨。当今的资本主义危机给人民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并给和平和民主的命运带来危险，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欧洲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努力寻求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西欧能够也应该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发挥伟大的作用。为此，欧洲应该在自己内部进行深刻的改革。保守派对震撼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对策是不可支持的，它会带来几百万人的失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衰落和对最大的一些资本主义强国的依附。

（摘自《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3期。伊钟莉译）

€

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第三阶段

恩里科·贝林格

一、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摘录）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

现在我来谈一谈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阶段推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前进的条件和道路的问题。

我们已经说过，在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中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推动力已枯竭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物质、政治和理想上的理由和要求以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动力已经消失了。在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的国家中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的。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所作出的社会主义类型和非资本主义类型的选择这一事实的全部世界性意义是值得评价的。这是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和影响的进一步打击，它使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内容得以丰富，有了新的和独特的形式。

应该研究这些经验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维护这些经验的本来面目，使之自主于那些想用资本主义西方的典型模式来使它遭到窒息和走上歧路的人，自主于那些正在企图把东欧政权所特有的公式和意识形态置于其上的人。

但是，使世界上社会主义前进能得到新的推动（包括真正为

东欧国家的民主革新进程做出贡献)的决定性条件是使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从西欧开始,得到前进。

我们谈论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第三个阶段恰恰是针对这一地区而言。

虽然我们要力诫各种粗俗的骄傲自满,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里和那里的事实本身要求决定性的革命首创性应该由西欧工人运动承担起来。

我们说第三阶段(或者第三条道路)是同什么东西相比较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重申一下也不错,因为这里还有某些误解,事情并不是寻找一条介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这是要超越资本主义在我们这里,在工业化和发达的西方所达到的阶段;要通过建设一种社会主义来超越它,这种社会主义是在保障维护已经争得的民主自由并发展这种民主自由中来实现。

此外,我们说第三阶段(或第三条道路)也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即这一阶段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后而来到的。

第一阶段正象我们在十五大上所说的,是这样一个阶段,当时在欧洲出现了工人运动第一批大的经济、工会和政治组织。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末期,从那时开始了争取超越资本主义斗争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阶段。从那以后取得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伟大成果,并且在劳动群众中也广泛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

这里并不是要从头到尾叙述迄今为止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所经历过的全部痛苦的事变。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些党(除了俄国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以及意大利人,他们直至一九一七年都采取“既不参战,也不破坏”的立场)通过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来支持参加战争的本国政府,抛弃了国际主义,失去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自主,站到了资产阶级和资本

主义一边。

但恰恰是在欧洲和工人运动这一历史性的惨重危机中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首创精神，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有了列宁而在俄国胜利了。

列宁是伟大的，他破除了工人运动中流行的所有准则和观点，按照这些准则和观点，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机械成果；列宁懂得，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发展不平衡（而且是战争）的时代，形成了在象俄国这样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中，依靠全体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无产阶级周围的极广泛的联盟来创造决裂的条件。

这是一个错误吗？只有那些被最顽固的反共主义所俘虏的人或者那些不了解错误这种概念是不能用来说明象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及由它所产生出来的伟大事件的人才会继续坚持类似的胡言乱语。

相反，这样说是正确的，即列宁在事变过程中干了操之过急的事——我还可以补充说是最大限度上的操之过急的事——，这影响了后来整个苏联生活所走过的路。但是也恰恰是这些操之过急的事使俄国免于四分五裂，把她从沙皇统治下的落后状态中救了出来并且为建立一个对资本主义自主的社会和国家开辟了道路。

就是这个社会和国家，尽管有着成为她建设中特征、尤其是成为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特征的各种矛盾、错误和悲剧，她还是战胜纳粹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在几十年中是数以百万计的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劳动者的战士们的依赖和向导。这些都是事实。

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不仅使各国共产党诞生了，而且引起了并鼓舞了各大洲许许多多的社会和民族解放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使本国革

命走上自己独特的道路。

十月革命是同世界工人运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第一阶段相互交织在一起，同时它又开辟了这一斗争的第二阶段。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并正在经历着第三阶段呢？

也许是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消失了？我们很清楚，这些党继续存在着，相反，它们在西欧许多国家中还是工人运动的多数派力量。它们在资本主义机器职能所允许的范围内也实现了一些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提高了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但是我们说，社会民主党的解决办法具有本质上的缺陷，因为尽管取得这些成果和改善，但这种办法并没实现超越资本主义。而且还因为我们今天处在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危机之中，这场危机打击到社会民主党在都市中赖以走运的物质基础，因为社会民主党是那种列宁当年称之为工人贵族的阶层的代表。在社会民主党中也出现了探索和试验新路子的必要性，而且这已经是或多或少先进的研究和尝试的课题了。

然而我们说第三阶段，也是同苏联模式的经验所构成的阶段相比较而言。这种经验和现实也还是我们及整个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性财富。因为毫无疑问，在法西斯时期，在抵抗运动过程中和冷战的年月里，这一财富的存在支持了西方工人运动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进行伟大的、决定性的斗争，同时过去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曾经用神话式的、不加批评的方式，也就是从属式的，所以是错误的方式来对待、体验和利用这一财富，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正是我们应该做，而且是在陶里亚蒂领导下在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就已经开始作出了自我批评的思考。

现在事实已经最终地表明：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所走过的道路对于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在今天的西方进行革命是行不通了；

——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政体不可搬到西方，
——而且东方某些国家中的这些政体今天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第三阶段的原因。所以我们并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或者是纯粹的概念上来谈第三阶段，而是针对工人运动迄今所完成的全部实际的历史进程而言。

当然，如果没有前两个阶段的经验、错误、悲剧、教训和成果，那我们在这里就不会去思考、工作和斗争。如果说我们提出超越前两个阶段，那也是因为前两个阶段为着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朝社会主义方向进行革命性变革和改造提供了它们所能提供的东西。

显而易见，一种以西欧工人运动（希望也有其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日本）作为推动力量的朝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时期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是不会仅仅从前两个阶段的枯竭中自动地和机械地产生的。

这尤其是全世界、欧洲和我国现有条件客观上提出的一种需要。

资本主义制度在解决当代人类的根本问题上明显地表现出无能为力。

面对着“福利国家”阶段的枯竭，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重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和不人道的固有特点的判断是有效的。

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同民主之间越来越公开的矛盾又重新可以觉察到了。在许多方面通过不同的迹象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限制民主生活并且首先是打击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所取得的权利和权力的倾向、企图和打算（在意大利也是这样）。

从这些总的情况中紧迫地产生了摆脱、超越资本主义的客观需要。

但不仅仅是客观上的需要和事物的压力。而且工人阶级、农民、劳动者的组织、成果和权力也增大了。一些运动、社团、组织、小组，特别是妇女、青年和脑力劳动者的这些组织在形成和发展。他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通过包括在劳动者各党之外和传统的政治形式之外反映出这样一些权利要求、追求和愿望。这些权利要求、追求和愿望是同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社会格局和文化成果相冲突的，要求一个不同的，比资本主义社会要优越的社会。

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想一想这些事件就行了，即工人阶级用种种方式表达出来的维护和平、生存和人类发展——这种发展只能是齐心协力的发展——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性而在今天历史地成熟了的国际主义。

意共是能够对今天所需要的国际主义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的：意共能这样做是由于她诞生的原因，历史、理论和理想上的财富以及她所积累的和从意大利工人阶级、人民群众那里吸取到的经验；是由于她的组织力量以及在意大利的政治影响；是由于她的革新能力。但是意共能这样做也还因为她既理解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解放进程的意义，又理解它的局限；既理解社会民主党经验的重要性，又理解它的明显的缺陷；此外意共也还理解世界格局和社会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以前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走上舞台和广大妇女群众的产物——，这样意共就是一个能促进作为十月革命果实的现实同仍然处在共产党经验之外的工人运动（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徒）以及世界其它地区解放和进步的革命力量和其它各种信仰力量之间的经常性联系。

我们全力以赴的总目标是摆脱资本主义和在和平与民主中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使西欧工人运动能成为极其广泛的和灵活的营垒中的推动力和聚合力。这一营垒在各国、在本大陆和世界范围内要有智慧和力量来克服各种类型的保守立场、民族主义的

闭关自守、狂热、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歪曲。

人们可能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认为上述作用主要取决于西欧工人运动呢？

使欧洲和西方工人运动成为争取社会主义斗争新阶段的中心是有结构上和政治上的原因的。这些原因我将会说到。但在说到这些原因之前，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想马上提一提，并且这也是上一次中央全会已经说明了的，即不管欧洲各国统治阶级和整个欧洲对其它各大洲人民的无知有多少，欧洲文化却是世界文化的最高峰。当然，欧洲文化的力量如不充分用来为革新社会、世界和思想的事业——这种革新是工人运动所渴望并为之奋斗的——自由地做出贡献，那就会衰落。

至于说到结构、社会和政治上的原因，我觉得至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欧洲资本主义是这种制度最高发展水平中一个，而今天又处在极深刻的手段、前景和思想上的危机之中。

（二）欧洲资本主义同美国和日本资本主义不一样，工人运动的斗争和成果从其内部进行了“加工”。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产生了强大的工会组织，而且产生了不只是社会党，而且是共产党——其中有我们这个党，她是我国工人阶级中的最大的党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强大的政党。

（三）随着殖民制度的瓦解，过去受欧洲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同欧洲本身及欧洲工人运动之间的政治关系和贸易比例发生了极大变化。

（四）欧洲是最直接受一场核冲突威胁的大陆（现在美国领导人方面甚至有人在谈论局限在欧洲“战区”的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了），所以欧洲人民和欧洲各国就最直接地被召唤去打破这种前景。即使那种认为不会使整个人类卷入其中的想法是愚蠢的，但这种前景首先要危及欧洲人民和欧洲各国。

(五) 在欧洲，两个集团面对面地对峙着，这种平衡是不能破坏的，因为除了将会有致命的战争危险外，一种对华约有利的平衡的破坏就可能意味着不能接受地把经济规划和国家政体方面的苏联模式扩展开来；而一种对北约有利的平衡的破坏就可能意味着在欧洲出现不能接受的反动倒退。而且现在很清楚了，在越来越高的军备水平，也就是越来越高的军费水平上确保平衡是不可思议的：这不仅是由于将会对经济和各国人民的生活条件造成严重影响；而且还因为正在制造出来的越来越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手段再也不能保证这些手段受到监督。因此就应该直接地和自行地参与积累和投资分配过程的要求；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内容；争取和平和裁军运动所具有的在范围和内容上过去少有的特点；通过音乐、艺术、戏剧、体育竞赛所表现出来的今天男女青年心灵的其它方式；保护和发挥自然作用、风景区和艺术财富的运动。正象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以及其它一些需要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同当初成为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根源的那些需要和追求不一样了。这些需要和追求再加上那些虽然是过去的，但尚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和追求同平等、正义、团结、自由以及从必然中解放出来，从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成果与思想汇合在一起（也应该使它们汇合起来），这些成果与思想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基础。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进入了争取社会主义斗争新阶段，表明许多事情正沿着我们建议的道路前进。

我指的是目前正在其它一些共产党和欧洲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力量（从法国到瑞典、从英国到德国）中进行的讨论和探索。在这些讨论和探索中明确地研究了实际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并且对社会民主党迄今所奉行的传统政策进行了批判和修改。

人们可以看到，谈论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种空泛的议论和痴

心妄想，沿着这条道路将使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西方取得进展并扎根开花。那种认为只有两条道路，即苏联道路和社会民主党道路，因为历史进程不可能产生任何与过去已经产生的道路不一样东西的人是瞎子，公式主义者，在新事物面前麻木不仁。

相反，我所提到的与客观条件和要求、与主动能力和运动、与许多欧洲政治力量内部正在进行的探索相联系的事实说明历史进程正走上一些不同的道路，而且可能达到更加先进的天地。

我们党早就参加了这种讨论和探索，这种讨论和探索关系到整个欧洲工人和人民的运动；我们党还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进步的天主教力量建立了关系和采取了行动。

在这一行动中，我们坚持扎根在西方的共产党力量的特点，坚持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推动者的力量的特点。

一些人害怕我们批判性分析以及更一般说，害怕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使我们党失去国际主义的特点。而且我觉得，科苏塔同志^①甚至认为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同某些共产党决裂的愿望。

这一指责是严重的，但是完全没有根据。

显然，我们发表批判性意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所不能放弃的，而且我们也承认别人对我们有这种自由——已经并且还可能引起不理解和论战。但我们寻求的不是决裂。相反，我们在要求和维护以平等和自主为基础的关系上是坚定不移的。

对于我们来说，领导党和领导国早就真正结束了。我们同任何党都没有并且也不想有特殊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是实践了这一原则，那么我们就不会赢得那种使我们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包括两年前同中国党恢复了关系。中国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导着一个在世界生活中起

^① 意共中央委员、领导机构成员，曾在中央全会上投票反对意共领导机构
1981年12月30日通过的有关波兰问题的决议。——译注

着不断增长的作用的国家），同西方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进步和民主运动建立有效关系的国际威望了。所以我们的自主根本没有缩小我们的国际关系，反而扩大了这个关系，并且促使我们去扩大这个关系。

然而事情并不仅限于此，而是涉及一件更加深刻的事，涉及一项长远的任务。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要确立新国际主义。这是今天所需要的国际主义，也是由于现在世界上通过缓和和裁减军备开始逐步超越集团，这正是首先属于欧洲工人运动的任务。这种作用归于欧洲工人运动不仅仅是，也不完全是由于它的传统的和平理想，而恰恰是由于缓和、裁军与合作是这样一种条件，没有它，在民主中建设社会主义将仅仅是一场美梦罢了。

对于那些要求我们准确说出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以及说明作为其特点的内容和具体建议的对手和现有的或可能有的对话者，我们只能回答说，一切还都没有最后确定。但我们知道，探索已经开始了，尽管还有许多内容和目标需要通过思想，特别是实践的发展，也就是行动和斗争来弄清并加以深化，但是我们已经有一种在意大利和国际舞台上实实在在影响的政策了。

（意共《团结报》，1982年1月12日。《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5期。张治宇译，韩瑞定校）

二、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总结发言（摘录）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在谈到这一点时（指第三条道路——译注）贝林格想说明一下辩论中出现的一个问题：第三阶段和第三条道路是同义词吗？他说，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是同苏联类型的模式，另一方面是同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模式相比较而言的。相反，“第三阶段”的提法

则涉及历史上的经验，因而也就涉及欧洲工人运动所经历过的前两个发展阶段。但是很明显，如果没有第三阶段，如果我们不认为有可能朝着这一阶段前进，那么就不可能去探索第三条道路。除了提法问题之外，重要的是要弄清这一目标的实质，也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必要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并且我们还经常说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这一方面说明，民主的形式必然是多样的，因此就必须注意，不能认为我们的“模式”（权且这样说吧）对所有人都合适；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主义中民主发展的要求在各处都提了出来（这就是自由、参与、工会组织的独立等等的要求。）在意大利和资本主义西方其它国家，要从已有的成果和巩固具体的民主机构出发。这些民主机构在最初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斗争结果，后来在某些国家也是无产阶级的斗争结果。在意大利，尤其要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所取得的政治民主以及由共和国宪法所代表的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手段出发。

（意共《团结报》，1982年1月15日。《共运资料选译》
1982年第5期。张治宇译，夏方林校）

三、在米兰庆祝意共建立六十一周年 群众集会上的讲话（报道）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意共总书记说：通过彻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式的思考以及分析世界、欧洲和意大利目前的状况，共产党人确认必须并且可能勇敢而坚决地走一条“新道路”，他们认识到，要在西方超越资本主义，这样一些推动力已经枯竭了，这种推动力起先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尝试和经验，然后是来自十月革命和那些用苏联所实

现的制度来指导自己制度的国家。

贝林格重申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对十月革命巨大意义的看法。从这一事件的思想从在国际上的创造性影响来看，在现代历史上只有法国大革命才能与之相媲美，而且比一七八九年更为突出的是，这一事件的思想在一九一七年之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广大被压迫群众之中了。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重申，他们十分清楚苏联在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使之不利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所起的作用，以及苏联在战胜纳粹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种迄今仍然重要的世界性作用，是作为对抗美帝国主义力量和侵略性的力量，但这种作用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既是因为今天其它伟大的革命力量已经出现并在活动，这些力量用自己的追求和自主来对抗帝国主义；又是因为在苏联的国际行动中存在着强权政治的特有立场和表现，这不是对被压迫阶级和人民解放的帮助。相反，则常常是矛盾的。贝林格指出，总之事实是，对于象我们这样一个党，在国际政策方面采取追随苏联对外政策的立场就是错误和自杀，相反则应该根据这种政策一般的或者具体的立场以及每个行动是否符合缓和与各国人民的独立的利益来加以判断。

然后在谈到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国内制度时，贝林格说，实际上他们的制度不能作为象西欧这样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因为传统和主观条件是根本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在那些国家中也早就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领域中表现出不断增加的危机，甚至是倒退的因素，直至到波兰的悲剧。这一切对社会主义的形象和思想是又一打击。我们体验到这一打击的份量，正如我们过去体验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关系最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其它一些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震动了同志们和劳动者的心灵。

但是，这些消极的、痛苦的政治和理想上的后果是不能通过无视现实或对其轻描淡写而得以减缓。贝林格再次指出，相反应

该揭露真实情况并进行完整的分析，以便从中得出全部必要的教训，特别是寻找通往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办法和目标，这种社会主义能够重新激发劳动者、青年、妇女和那些渴望在我们这里摆脱贫资本主义剥削和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热情、希望和信念。他们需要知道并看到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只有善于依靠我们的力量和思想才行。

.....

贝林格谈到意共最近采取的立场所引起的广泛反响，尽管某些评论家有时理解错了。

有人说：“我很高兴，但现在你们应该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公式了”。贝林格同志说，我怀疑这些人有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此外，这些人也不了解，马克思本人就多次说过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打算以此来排除把他的著作和思想变成任何戒律。

至于列宁主义，它并不是由列宁创立的，而是斯大林批准确立的。正象马克思一样，列宁实际上是一位杰出反教条主义的思想家。也许列宁比马克思更是这样的一位革命领导人，他始终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和实际的任务来进行活动和写作，从来也不企图确立万古不变的真理或者是为未来开出“菜谱”；相反，他是按照马克思说的话，即“解决我们鼻子下面的问题”行事的。因此，荒唐的是也正象某些人所做的那样去谈论“列宁主义的公式”，甚至可笑地说什么苏联和世界上的、甚至意共的一切弊端都来自这一公式。这样贝林格就联系到他在一年多以前的一次答记者问讲到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列宁思想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已过时了。

列宁发现了工人阶级必须要有联盟，贝林格同志说，这对我们是宝贵的教导。列宁为克服工联主义和工人贵族的行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对我们来说，列宁的这一教导即使在今天，而且今天

比以往更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列宁强调党的自愿参预、党的行动的“主观的”因素和她的创新作用，这种作用克服并改造了现状，列宁不相信“自然而然的”改良主义进化论。在这一点上我们从列宁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尽管我们的党在变成陶里亚蒂的新党之后在党内生活中有了自己的特点。

贝林格接下去说，但列宁从某一时刻起却在实际上——不是在理论上——把党等同于国家。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做法。再有，列宁始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过程必要的阶段。我们拒绝这一主张，并且这一主张很早以来就不是我们的了。

最后，列宁认为革命有两个截然分开的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及随后的社会主义阶段。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成果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且也是，在某些情况下还特别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就是工人阶级正在捍卫和扩大的成果的总和。所以民主对于我们是一种不能放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这种价值应该在走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保障。

贝林格继续说，有一家报纸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即《贝林格批评苏联，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却是强硬的》来评论我们最近这一次中央全会的工作。这个“但是”就表明这家报纸不仅理解错了，而且是什么也不懂。我们批评苏联丝毫也不减弱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相反，恰恰是我们这种发表意见的自主性——这一点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使得我们沿着独特的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更加有力。今天一切劳动者都更加清楚，沿着这条道路我们真正摆脱了任何外部的制约、各种预想到的困难、各种思想上的保留和各种意识形态上的混乱。

贝林格大声说，我们不仅丝毫没有放弃，相反我们比以往更加以自己的心声和思想来热爱我们政治的和人道的理想：自由和民主、劳动者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人摆脱贫困这些理想。我们正是从这些理想出发，一步步地走上并制定

被我们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道路。

谈到意共制定和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这一问题时，贝林格还对那些把第三条道路说成是花招或者是不知为什么仅仅是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才会搞的骗局的批评家作出了回答。他说，我将会提及恰恰是围绕着我们为了找到同东欧国家及社会民主党不一样的道路和解决办法而提出的问题，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的政党和工人运动组织中，如在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和信仰天主教的力量中，从一段时间以来就进行着讨论。

这场讨论在欧洲一些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中央特别热烈。

贝林格说，我们是带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来参加探索的，并做出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独特的贡献，努力在当前共同的目标上，为了劳动者与和平的利益，而实现尽可能最广泛的一致，这是作为朝着使欧洲恢复真正的、积极的世界性作用以及建设一个比目前社会更公正、更人道的社会这一根本性目标前进的一个阶段。贝林格说，这就是我们正在作出的努力。

（译自意共《团结报》，1982年1月24日。《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5期。 张治宇译，夏方校）

争取变革的代替建议（节录）^①

——筹备意共十六大政治文件

第一章 民主代替

一、实现民主代替和建立体现民主代替政府的必要基础是左翼力量和其它民主力量之间的协议。民主代替不只是政党集团或者议会力量的总和。它意味着社会力量和运动的动员、文化潮流和民意的改变以及政治和纲领的选择。这一切都是为了从今天起对经济、社会和国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因此，民主代替不是一个仅仅靠组成议会多数就可以实现的事情，而是一个从现在就可以开始的进程。

另外，我们也并不是从零作起。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其它左翼民主力量在这些年来——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后范围更加广阔——在意大利许多大城市，一些大区和很大一部分市镇和省的管理中所取得的联合经验具有巨大的威力，因为它表明左翼和其它民主力量有能力按照集体的利益管理公共事务。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要使国家有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政府。

其它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特别是社会党的一项赞成代替的明确方针，将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它将在所有劳动者和人民力量中激起斗志和信心。因此，以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来

^① 本文是1982年11月，意共召开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的筹备意共十六大的政治文件：《争取变革的代替建议》中的第一章全文。

拒绝代替的论点是没有道理的，而恰恰是声明争取这一前景，才有助于使这些条件得以实现。

二、首先就要提出维护和巩固左翼和工人运动基本团结的问题。这一团结是在工会、合作社、群众运动以及在地方政权中历史地形成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必须击败这样一种企图，即要围绕关于经济危机的出路在于打击工人阶级、打击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成果、权利和它的作用的主张来拼凑各种势力。关键的一点是：如发生上述情况，如果工人阶级同其它人民阶层的传统关系松弛下来，那么整个革新、进步营垒将遭到削弱。

在我们指出代替天民党的政治选择，也就是代替一个在意大利集中了大量人民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党的政治选择的时候，也必须问一下，怎样才能通过争取关心变革的力量来扩大左翼营垒迄今所拥有的社会基础。今天也有可能向天主教民主党竞选集团在有强大力量的传统地区提出一个更加有力的倡议：从南方开始，在那里，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在意大利推进代替政策的基本条件。

总的说来，各种联盟的全部问题都要求作出修改和补充。意大利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今天面对着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结构。脑力劳动者具有重大作用；第三产业的人员已占就业人数的绝对多数。但是在雇佣劳动内部，工人阶级仍然是最伟大的核心，这一核心是比较单一的。那些认为工人阶级的作用注定要减少的人是想错了。正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本身使工人阶级起着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要求工人阶级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和多样化。这是客观的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特有的东西。许多年之后，工业将仍然是革新进程的关键部门。这一进程给科学的研究、技术革新和组织机构的改革以决定性的推动。工业上将发生的这一革新进程将会影响整个社会格局。

工人阶级处于这一大转变的中心。人们已经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减少手工劳动的同时，甚至可能加剧劳动的无用重复。当

革新被用来加剧决策机制的专断特点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也是一个已经并且越来越要关系到技术人员和职员的问题，机关里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除了在分工上有不同外，在人们中间，尤其是在最年轻一代人中间，这样一些愿望正在成熟起来，这些愿望把种种共同的利益（更多地参与决定、专业特长和文化的新价值得到承认，对于一个能够真正发挥人的才能、安排好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组织的需要）聚合在一起。重要的是，面对技术革新所提出的问题工人阶级要有能力进行积极的干预，不是持被动的态度，而是在更民主的意义上和不那么格格不入地为这些革新进程指出方向。

正是在这个具有新质量的发展的前景中，把专业特长、劳动效率、劳动的人性化与创造性、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的民主化作为目标和价值来实现工人阶级同技术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这些新阶层之间更广泛的团结是可能的。为了这个目的，不是要容忍，而是要重视种种社会集团和社会力量日益增长的那种要发挥重大作用的愿望，他们甚至要建立各种自主的结社形式。这些形式既不能纳入政党的逻辑，也不能纳入工会的那种传统的代表制。事实是，这些劳动阶层（生产部门、服务行业、信息部门以及通讯、宣传部门的技术人员和中层干部、科研人员、教师、文化力量以及技术革命中产生的新专业人员等等）在社会生活和生产生活中，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即他们能够和工人阶级一道，成为争取国家变革斗争的非常重要的主角。因此，这些社会阶层大量向左转，对于民主代替的成功具有决定意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局限于仅仅强调这些阶层与其它人一样处于雇佣劳动者的状况。我们应该进一步依靠他们的专长和他们具有的特殊作用，其目的是为了使文明和生产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

这种更加广泛的发展，生产活动有更高的质量，劳动有更高的创造性，与原来不同的生活组织，这些都有力地促进雇佣劳动

者与中等企业家阶层（手工业者、自耕农、商人等）更加紧密地汇合。这些人是联盟体系的一个基本部分，他们应该起着主角的作用，自主地发挥自己特有的职能，为意大利社会的变革作出贡献。总的说来，要使不总是清一色的，而且并非自动就变成团结的种种观点、种种思想倾向以及种种物质利益汇合到这一革新的前景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广泛、自主地参与和致力于民主代替的建设是不可缺少的。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劳工界就能够把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和企业领导人作为对话者，这些企业主和企业领导人了解寄生的、瘫痪的制度的消极作用；特别是今天，他们由于政府的紧缩政策，由于公共财政的浪费，由于缺少技术现代化的政策而受到损害。

在劳动界的这个联盟体系中，工人阶级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失业群众、被排斥的人以及处于边缘的青年群众也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他们不仅关心社会和生产更广泛的发展，而且关心劳动和生活获得更好的质量的问题。这些是争取经济民主管理的斗争产生的问题。

三、为了改变国内各种现实力量，要进行工作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以下的各种群众运动，这些运动是围绕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或围绕着所有社会阶层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利益和思想而组织起来的。

在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运动中，这些年来，妇女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运动在提出与妇女状况有关的具体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需要对社会进行总的变革。妇女运动打破了阶级的界限，提出了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平等、妇女在政治生活和政治选择中的基本问题，而且提出了争取人在各方面的个性解放的重大问题：从个人和家庭关系到生产和社会关系。她们在法律、文化、社会和风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今天这些成果被否定，并且由于经济危机和保守势力的反攻的影响而面临危险。由

于有人千方百计重新提出男女作用有别的原则，使得妇女在工作、个人权利和风尚方面处在保守势力反攻的中心，并受到执政各党的倒退政策最大的打击。实质上，事情的现状，现存的社会机体和政权机器同广大群众的成熟、觉悟和主观能力所达到的水平两者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因此，今天妇女以及妇女运动是代替政策的一个基本力量。

必须以更大的兴趣认真注视“新的运动”。这些运动特别得到青年人日益增长的赞同，而且他们以重要的集体需要作为目标，如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争取一向被排斥在各种文化生活形式之外的群众参加活动；采取行动反对吸毒和各种方式的排斥行动，争取更好的生活质量的斗争；保护和重视历史文物和自然环境、关心生态。重要的是要懂得，这些运动的发展（不只是意大利有这种现象）本身并不会减少政党的地盘和作用，只要政党了解这些运动的自主权利要求，并善于在行政和政治行动中使这些要求得到解决。相反，这些运动体现了那些能够对革新社会、革新政治和革新政党作出贡献的政治、社会和文明各方面应做的工作的内容和形式。

在意大利，就象在其它西方国家一样，老年人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这不仅是由于老年人数量在增加，而且也是由于从这种情况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许多方面是新的。矛盾在加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竭尽全力要孤立老年人，宣称老年人对社会无用；另一方面，组织在工会和其它结社形式中的成百万老年人从他们的具体需要出发，进行了越来越广泛而有力的回击。他们有力地提出了全面修改社会组织、劳动组织、环境组织以及改变生活方式的问题。

四、从严格的政治方面来看，对于建立民主代替来说，同社会党和其它左翼民主力量的关系是决定性的。无论迄今尚未克服的争执的原因是什么，无论有哪些不信任和论战，对我们来说，

有一件事很清楚：没有左翼力量之间的协议，要在国家的发展中形成真正的转折是困难的。这并非因为除了传统左翼的政党之外，不存在准备变革的伟大力量；而是因为如不形成一个阵营，就很难前进，尽管这一阵营不限于左翼力量，但却是以左翼力量为基础。

这并不是闭眼不看矛盾的深刻性，幻想通过勉强接受那些我们认为对于建立真正的代替战略这个目标来说是错误的抉择的办法去克服矛盾。一个团结的建议不应是模棱两可的。然而它也要求我们能够考虑到意大利社会党以及意大利和欧洲的其它左翼力量的存在方式和文化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了解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和问题。

这就是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向意大利社会党发出的呼吁。我们十分明确地说，代替政策不应具有两党中的任何一党的标志或者让其中一党占优势，而应该是大家本着团结竞赛精神，进行自主和共同的探索与革新的努力的结果。对于这种竞赛，意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意大利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探索中，不仅吸取共产主义成分的传统，而且吸取意大利和欧洲工人运动的整个经验。他们决心以最大的开放性和坚定性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的态度是：既不固步自封地维护过去，但也不会使自己的财富化为乌有。

因此，应当认为下述事实是很消极的：意大利社会党领导集团并不是毫不拖延和不抱成见地就今天左翼和工人运动所面临的新问题进行讨论，而是在最近几年中企图掩盖已经开始的进程，掩盖克服不合时宜的旧障碍的可能性和需要。社会党领导集团不是要在工人运动更加广泛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战略基础上确立社会党自主制定政策、提出倡议的能力，以及确定意大利社会党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是使它同意共的冲突系统化，使左翼的发展、左翼的革新、左翼的整个进展和团结的目标都服从于专门加

强社会党这个唯一的目标。这样就把削弱得到保守——温和势力承认的天主教民主党的地位和削弱那集结了左翼那么大部分力量的共的地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了。由于想靠这种办法来占据“中心地位”这一明显的错误打算，争取整个左翼参加全国生活的领导的斗争任务就被抛在一边了。这一切也对政治观念和政权管理方式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后果。

今天，意大利社会党面临一种选择：或者坚持同天民党搞竞争性的联盟，但这事实上是忍受从属的地位；或者在民主代替的前景范围内，确定自己自主的、特有的作用。这个选择还未作出，而且还不可预料。共产党人怀着信心注视着这种可能性：意大利社会党对我国形势的重新思考会成熟起来，使社会党决定为支持代替政策而斗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必须强调，正是因为民主代替的前景提出了使政治和社会摆脱现今的政权体制消极的、腐朽的约束，从而提高政党的作用，重视政党的职能，这种前景才构成使每一种民主力量都能够进行革新，能够为国家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局面。意大利共产党并不低估无产阶级团结党和在左翼领贡中从事活动的其它政治组织，无论是为了完善纲领、还是为了分析今天提出的新问题所能作出的贡献，包括辩证的贡献。此外，我们始终强调，在意大利社会——由于我国的整个历史，显著的复杂多样——世俗的民主的思想流派具有的生命力和影响是不能够仅仅用选票来衡量的。甘愿充当天主教民主党附庸角色这种状况过去使得中间的世俗党派在政治制度行会化的总进程中力量削弱了。因此，我们所提出的代替政策正在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这个局面中，象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力量能够更好地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左翼堡垒一分子的作用，而共和党和自由党的立场不管它们执政还是在野，都能够独立地重新确立自己的独创性，为意大

利民主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在代替战略中，天主教徒问题一点都没有失掉它在意大利共产党的思考和倡议中一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相反，今天十分重要的是，要完全恢复在民主团结时期被弄得相当模糊了的天主教问题和天主教民主党问题之间的区别，虽然也要考虑到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至少天主教教徒积极分子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仍然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

不能再将天主教界是一个紧密团结和清一色的集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主教问题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属于天主教领域的那些力量、组织和运动所表现出的生命力证明了这一点。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尽管在这一领域中存在着保守势力激烈的反对和闭关自守的倾向。对于天主教问题和宗教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制定了一项内容丰富的政策。这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且我们现在还是加以肯定的。但是，在更直接的政治方面，有两点是应该特别加以突出的。

首先，必须强调，我们党对天主教问题作出新的、更有力的倡议的能力应被视为确立民主代替政策的决定性基础之一。实际上，民主代替不应当具有“世俗”代替的性质。也就是说，不应该是世俗堡垒和天主教堡垒的对立。在解决政府问题方面，民主代替是清楚地代替天主教民主党及其政权制度。但是这不是要提出意识形态的偏见，也不是要确立使世俗力量和天主教徒相对立的界线。如果说有界线的话，那就是那些接受整顿和革新纲领的人和不接受这个纲领的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所造成的界线。

在这一前景中，天主教界力量对于制定革新政策和建立一个把这个政策付诸实施的多数派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贡献的形式不可能抽象地预先确定）。这是因为，如果缺少这一贡献，民主代替堡垒只是世俗力量，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上和社会上保守力量的讹诈，这些力量在世俗范围内也有着不可否认的

影响。

要突出的另外一点是：同天主教界的组织和群众运动进行会晤和汇合的基础不应只限于争取具体的经济社会目标；而应了解——当然应尊重不同的文化思想立场并且在这些不同立场之间进行交锋——关系到总的利益和前景的重大问题，如致力于反对战争、反对扩军和饥饿的斗争，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平等和解放这些伟大目标，反对剥削、异化和反对排斥的斗争，反对黑手党和吸毒的斗争，即反对连天主教的意识也憎恶的这一切现象。在这些问题上，最近一个时期已经形成许多很有意义的联合行动，这些表明，进行共同努力的地盘是广阔的，其可能性是具体的。

六、至于说到天主教民主党（它不只是天主教徒的党，而且也是得到各种思想和各种社会地位、广泛的温和与保守阶层赞同的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申明，在我们的代替建议中不存在同这个党在政府中进行合作。在政府方面，民主代替是代替天主教民主党和它的政权制度。这就要求进行反对这一制度的斗争。当然这不排除为了维护和平和捍卫民主制度，为了体制的巩固和运转以及为了其它拯救国家的目标而汇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是避免国家的分裂和避免大批天主教民主党选民朝反动方向转变的需要始终是有效的。因此，最开放的，最先进的立场在这个党内确立乃是民主和代替政策本身的利益之所在。

通过天主教民主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新的多数派取得了优势。这一派看到所谓“前言派”集团所执行的目光短浅、传统反共的政策失败了。这种新情况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它的具体发展还是很不清楚的。下述情况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天主教民主党新的书记处承认歧视意共的偏见是行不通的。承认必须使政治制度摆脱僵局，其办法是把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共看作是互相代替的执政党，但要在自由的民主辩证范围内，也就是“完善的”民主范围内，来进行代替，尽管这种民主的前景还是不确定的。

在上述立场中有着向我们，也向天主教民主党的存在方式提出的挑战。事实上，由于旧的偏见失效，作为天主教民主党政权制度支柱之一的“反共堤坝”也就倒了。也由于这一原因，天主教民主党新的领导集团今天企图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恢复“中心”的地位，他们打算用实质上是靠压缩工资和工人的成果来取得生产的发展这一骗人的设想，来纠合杂七杂八的力量，从企业家营垒的各个部分到城市新老中间阶层，从“白区的人民阶层”到从主要是为了救济的公共拨款中获得好处的人。这并不是无痛苦的轻而易举的事。这样要有可能使天民党的阶级合作主义这个传统的观点陷入危机，反复宣称该党具有“人民性”这一说法再也不能掩盖现实的矛盾和严重的保守抉择，旧的反共偏见也不能掩盖这一点。

我们的政治倡议能够并且应该利用这些矛盾。这一倡议旨在瓦解上述社会集团，使其均势朝着民主方向推移，并改变国家的领导。不管怎样，我们和天民党之间的较量变得更加紧张，更加具体了。越来越要由事实来评判。而事实就是：社会冲突加剧、政党和国家间的关系状况紧张，民主遇到了危险、要进行反对黑手党的斗争以及在国家机构的生活和执政党的生活中进行反贪污的斗争。

（译自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意共《团结报》）

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意〕 乔瓦尼·贝林格

按：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意大利议会议员乔瓦尼·贝林格1982年6月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出席了澳大利亚共产党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5日，他与日本共产党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在墨尔本召开的一个题为《社会主义的未来——有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座谈会。下面是他在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

首先，我想说明，社会主义有着光辉的历史。尽管存在错误和各种过失，十月革命和其他革命无疑促使世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我可以说句反话：革命总是由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对以前的革命经验最持异端观点的人进行的。

马克思说，革命将在诸如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这种先进的、工业发达的国家爆发。但是持异端的列宁却表明，革命可以在一个相当不发达的国家开始发生，在那里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但是无产阶级在各个劳动阶级和人口中只占少数。

第二位持异端的大人物是毛泽东，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都说，革命将由工人，由产业中的工人领导。但是，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

更加持异端态度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所有的文献和革命运动的经验都说明，没有一个革命的党，革命就不能发生并继续下去。菲德尔·卡斯特罗则是靠一条船和一批人开始进行革

命的，就我们对政党这个词的传统理解来说，这一批人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政党。只是在第二阶段，他们才与古巴共产党建立联系，创立了一个新的党。

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主要的希望是在下一批持异端的人。

大家知道，过去，革命的进程经过了不同的阶段。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各自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由于有了这一发展，并由于属于传统的第三国际的人们之外的其他革命力量有了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已没有一个中心或一个组织可以自命为包括现代世界中的一切革命力量。任何想创立这样一个组织的企图都只会限制而不会鼓励革命过程的发展。这是实践的经验。

关于第二点：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用意大利共产党的语言来说，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努力走一条既不同于苏联的模式，又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说，根据不同的历史、经济和地理条件，可以有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许多条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要经常记住，有必要建立以不同方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各种力量的更加广泛的国际团结。

其实，在许多情况下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几乎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一个政党实现了一次革命之后，它总想把这样一种革命过程说成是唯一可能的革命过程。有时，他们会坚持这种思想，努力影响甚至严重地影响其他的党派，要它们按照这种思想办。这种做法造成了许多困难，有时使工人阶级和革命力量瘫痪，有时使他们分裂。

当然，如果把已经实现了的革命的模式，不管是完全地还是不完全地，向其他国家输出的倾向是危险的话，那么，想把我们还未实现的革命的模式向其他国家输出，就更加糟糕了。

因此，我不想把我的发言的第二部分用来向你们说明在澳大利亚应该怎样把欧洲共产主义付诸实践。就地理上的原因来说，这样做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更确切地说，我想谈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政策、战略和经验。

我想着重谈谈能说明我们行动和战略特点的主要四点，当然只能概要地谈。

改造国家机器

第一点是改造国家机器的倾向。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的传统论点，即新的阶级应该破坏国家机器、粉碎国家机器的论点不同。据我们的看法和经验，国家机器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资产阶级仍然占有支配国家机器的权力，但国家机器有许多职能是符合普遍利益的。

尤其是在意大利，国家政权是斗争——包括反法西斯主义时期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因而，它有工人运动和国内各种力量的重大参预。我将谈谈我们的两点经验。一点是，在意大利我们在地方政府中取得了极大的权力，左翼力量有力地参预了市议会和大区议会。意大利的大城市中有许多是由左翼力量管理的，有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市长：都灵、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罗马，甚至那不勒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看，它是个极难管理的城市）。因此，公共设施改善了，居民有着十分广泛的民主经验。

第二点经验很不寻常，这就是试图使警察民主化。在战后的年代里，工人运动遭到了极其猛烈的进攻。你们有着同样的经验——在冷战时期。在罢工中，警察向工人开枪——许多人被杀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工人和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学生运动中的青年的自发倾向，是为了说明警察是法西斯

分子。

我们的党反对这种说法。我们认为，警察是被用来进行镇压的，但警察当中大多数人来自社会的贫困阶层，我们呼吁警察与工人团结起来。随着民主的更大的发展和国家的镇压趋势的日益削弱，一种民主意识逐渐地在警察中发展。他们开始组成工会，经过许多年的斗争，他们赢得了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现在有了一个警察工会，这个工会享有除了参加中央工会的权利和罢工权利以外的所有通常的权利。所有其他行业的工人说，如果警察需要罢工的话，他们将替警察罢工。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警察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是工会会员，有约三分之一的人投共产党的票（我们在警察参加投票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计算）。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居民、工人与警察之间的合作。这是意大利在反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没有居民和警察的合作，这种胜利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是不够的；光靠地方权力、警察和我没有提到的其他部门，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必要参加政府的领导。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共产党参加政府的领导，对国家机器的改造，甚至于维护一种充分的民主，都会变得困难起来。有共产党员当部长也是不够的，因为还有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问题，提高雇员觉悟的问题，和改变国家机器的日常工作问题。改变国家机器的日常工作是个十分艰难的任务。

国 有 化

我要谈的第二点与经济有关，你们知道，法国政府实行了许多国有化的措施。许多共产党、社会党和工党的纲领都有国有化的内容。在意大利，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主要的企业已经是

公共所有——银行，能源，运输，钢铁工业，大部分化学工业，等等，都直接地或是通过占有股份属于国家。

我们现在的问题，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就是要对已经国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这就是说，要把这些正在被用来为私人利益或占支配地位的党派的利益服务的企业改造成为一种工具，用以解决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并且在一个混合的经济（它包括私有的部分）中领导其他的经济部分。在意大利，构成经济生活最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发展，合作社经济也日益发展。全国合作社联盟的预算在全国企业中占第四位，它是一个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等等参加的左翼组织。这个组织也是解决问题、发展经济和对人民进行民主教育的一个工具。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有关联盟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联盟总是被解释为生产力的联盟。一般的程式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当新的生产力在发展中受到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阻碍时，它们必须打破这种桎梏并冲出去，以保证获得新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中是这样，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经验。

首先是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经验。然后是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这是指与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结成联盟的经验。但是现在在联盟方面出现了新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有这样一些力量，他们不是生产性的，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例如教育、卫生、科学的研究、公共管理，等等。这些力量趋向于与工人阶级一样众多，有时比工人阶级更为众多。我们应当怎样办？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力量？

我们认为，应当把他们看作是与工人阶级相同的、处于同一水平的潜在的革命者，因为在他们自己的活动中，在他们自己的

条件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并不是在物质条件中才有这些矛盾，因为在当今时代，并不一定要挨饿，要有许多孩子或者是无产者，才能成为革命者。成为一个革命者可有许多许多新的原因。我们应当认识这一点，并争取那些与工人阶级处于同一水平的力量的支持。当然，工人阶级有他们的传统和组织，我们应当首先注意他们的需求。

边 际 化

另一点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了边际集团，加强和扩大了某些形式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并不意味着剥削。压迫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削。让我们以妇女为例，即使她们没有被剥削，她们也是受压迫的。与妇女相比，男工所处的地位有时是含糊的；他们既是受剥削者，又是压迫者。我们应当认识这种情况。

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传统态度是，这种问题将在革命以后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些问题必须在革命过程中得到解决。不然的话，革命将不会到来，或者，将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对待人口中边际集团的态度更差，甚至更为消极。比如说，如果你读恩格斯的著作，那么，无产阶级决不应该与流氓无产阶级发生联系，因为流氓无产阶级经常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被用于进行各种形式的挑衅或者冒险。实际上，我们的经验是，与流氓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是可能的。

让我们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意大利的政治奇迹之一是共产党在罗马市占有百分之四十的选票，而在罗马市，一个大的工业都没有。罗马最大的工厂是梵蒂冈。在一个有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只有一些二千、三千或者四千工人的工业，另外有建筑工人，运输工人，等等。特别是在战后，有大量的人口边际化了：流氓无产阶级和那些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人，他们所以住在罗

马，只是因为罗马是个开放城市，他们可以逃避轰炸。他们没有食物，没有住房，什么也没有。

共产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改善这部分人口的生活条件：为他们寻找住房、供水卫生设备和职业。通过这种斗争，建立了一个联盟。他们许多人支持共产党，成为工人，投我们的票。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城市有非常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和左翼的地方政府。

关于联盟，还有另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只想提一下。资本主义并不只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时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总是起限制作用。今天新的情况是，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且迫使其他国家发展一种与生产力正相反的巨大的破坏力量。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破坏，军备的竞争，环境的破坏和人权的破坏。

如果我们想一想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其他运动，我们就会明白，它们并不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开展的。它们是反对资本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坏力量。所以，联盟问题变得复杂得多了。那些热心于为争取和平、保护环境、反对边际化和争取人权而斗争的力量，可以同工人阶级一起对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改革的斗争作出贡献。

斗争和组织

最后，我想着重讲的第四点是关于斗争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从欧洲大陆到英国到美国到澳大利亚等国，经验是极不相同的。阶级斗争到处存在。政治斗争也存在。在美国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那主要是在个别问题上的政治斗争，但有时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我想起美国居民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但是，越南战争一结束，这些力量就被放

弃，一切就都完了。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又会有新的委员会创立起来。但是资产阶级的领导并没有被打断。所以，各个革命阶级，各种进步势力有必要建立一个或者更多的组织来全面考虑各种问题，提出一个总的纲领，并能领导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组织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但是，为了免得被人指责为是一个超级大党（因为不仅国家有超级大国，党派也可以采取超级大党的态度），我想强调，这个群众性的党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党员数量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工作质量的问题。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在任何形势下和在社会的各种人们当中努力进行活动的党。是一个不仅努力向那些非常积极的成员敞开，而且向那些不可能十分积极的成员也敞开的党，是一个采取盎格鲁—撒克逊术语中所说的持“解决问题”的态度的党。它不仅进行宣传和教育，而且真正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力图把群众行动和社会斗争同通过我们的代表在各种机构内部进行的工作和我们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协调起来。教育意味着传播经验，提供情况，和抵销各种宣传工具的消极作用，在宣传工具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使党自己与居民建立联系。

这些经验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十分不同，我只有机会介绍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

然而，尽管我们不把自己的政策看作是其他国家也应采取的模式，我们仍然认为，有两个原则是各个国家都必须加以考虑的。

一个原则是，每个党，每个组织或运动都应该自主和独立。这有两个理由。首先，以便更好地坚持从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其次，以便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团结。

第二个原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不仅仅是为社会主

义进行斗争的最有利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前，胜利期间和胜利之后，保持和扩大民主都具有内在的价值。我们采纳这个原则很可能是因为意大利是产生并且令人遗憾地是输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因此，在失去了二十年的自由之后，我们非常注意尽一切办法保持民主。当然，采取这个方针也有着原则性的原因。

（译自《澳大利亚左翼评论》 1982年9月号。载《共运资料选译》
1983年第3期。王李杨译校）

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乔治·马歇

按：本文是乔治·马歇在一九七六年法共二十二大上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摘要。其中主要观点提出要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阐明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特点和基础，指出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关键是“民主和自由”、“民主到底，就是社会主义”。并阐明了大会决定“不再把无产阶级专政列为党的奋斗目标”的理由。

我们要建设一个福利的、正义的、自由的、安全的社会，一个大家工作为大家的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繁荣的、自由的、与各国人民和睦相处的法国，一个为实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而积极战斗的法国，一个民主的法国，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在二十世纪最后这二十五年中，建设一个更加幸福的社会是有条件的！

我国的物质资源极为丰富。多少世纪以来，我国男女们的辛勤劳动使之结出了丰硕之果。今天的法国是一个具有强大生产潜力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实，我们还远未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因为私人大资本追求利润的结果，或者造成落后，或者造成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可以使经济摆脱大资本的挥霍，能够使国家资源和所有的潜力为民族、为法国人所支配。生产得更多更好的经济的新的兴盛将会代替当前的停滞状态。

国家潜力的要素之一，就是我国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

力量、才干和革新精神。追求利润的政权束缚和埋没了这些创造能力。社会主义通过解放这些力量和首创精神，使劳动人民的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我们不是说仅仅依靠我国的资源。今天，特别是随着和平共处的发展，存在着国际合作的广阔的可能性。由于现政权为垄断资本尽快地攫取最高利润，由于它按照从冷战继承下来的政治意图行事，所以它远不能充分利用这些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完全从国家需要出发，所以它能在互利的基础上大胆地发展国际合作，并使之多样化。这样，就可以找到一些使法国的经验获得成功的重要的补充手段。

此外，我国人民具备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即我国人民拥有一个在不断的斗争中受到教育的工人阶级，一个经过锻炼、富有经验的工人运动，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在其他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是在建设新社会的同时，才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的。而在法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具有牢固的群众基础。

由于上述理由，我们的信念完全是有根据的：是的，使生活更有保证、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手段是存在的。

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必须在法国开拓一个民主自由的新纪元。这就是我们的战斗纲领。

进步的关键：民主和自由

今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已经发展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少数私人的工业和金融集团掌握着所有的命脉。为了在最顺利的条件下掠夺民族和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近二十年来，当权阶级费尽心机地剥夺我国人民参与各种事务的一切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垄断性的集中愈加剧，政治和经济权力就愈加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集权化、专制主

义和官僚化构成这个制度的鲜明特点。国家元首拥有过分的权力是这种状况的集中表现。今天，共和国总统不断地扩大他的职权范围。他违反宪法规定的应由政府来“确定和指导国家政策”，完全根据大资本的利益解决和决定一切。劳动者、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关系到他们日常生活和国家命运的决策之外。别人代替他们做决定，等等，而别人的决定是违背劳动人民的利益的。

在生产停滞的时候，工厂却在倒闭，在政府谈论能源危机的时候，矿山却被废弃；在很多家庭因为太贵而买不起水果的时候，千百万吨水果却被销毁。当劳动人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怎能不想：“这太荒唐了！他们凭什么权利决定这样干？如果我们劳动人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办法，如果我们的代表能够做出决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确实，如果劳动人民在企业的经营和国家的领导事务中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能容许关闭工厂吗？今天会有一百五十万的失业者吗？如果劳动妇女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她们在工资及很多就业问题上受歧视的现象还会存在吗？如果农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法国的农业能象今天这样“无人过问”吗？显然不会的！只有一个办法能制定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应当由劳动人民自己制定这种政策，也就是说由劳动人民领导国家。这就是民主所要求的。因为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农村和城市劳动者占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

因此，今天民主已经提到了人民斗争的议事日程上来。

经济民主：决定经济活动的银行集团和工业垄断集团应该不再是一小撮利己主义者的私有财产，而应归国家所有。劳动人民应该参与经济决定，尤其是参加国有化的企业管理和规划。

社会民主：所有劳动者，无论是谁，都应该真正享有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平应该结束。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所提供的劳动的量和质获得能使他过上体面生活的收

入，特别是应该保证大家受教育和深造的权利，以便使所有的人能够担负起责任。

政治民主：应该使公民们、所有的公民真正能有选择、决定、监督、管理的权利，特别是劳动人民应该能够在企业、地方、地区以及在政府本身参加各级国家事务的领导和管理。今天，没有一个部长是或曾经是工人。

这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民主，即现代民主在今天已成为劳动者和法国人民的第一需要。因为它是繁荣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途径，是为劳动家庭带来更多福利的唯一途径，是恢复我国被一些市侩式的政客们所破坏的主动行动的自由的唯一途径。

大资产阶级害怕自由

当然，大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这一革新的领导者。资本主义在它产生的时期曾促进了生产力的有力发展，而今天却使国家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同样，资产阶级曾在一七八九年以自由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今天它却成了自由的敌人。

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电视上喋喋不休地大谈“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江湖骗子的所有本领——他只有这种本领（笑声）。很少有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这样的蛊惑人心。与此同时，政权和大老板却在指挥着一次我国久已未见的对自由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进攻。没有什么比自由和民主更使他们害怕的了。

在工厂，就是判罪—惩罚和解雇职工代表。一九七六年在法国，尤其在女青年工人占多数的那些企业里，工人没有说话的权利，甚至在班车上没有唱歌的权利。在其他很多企业中，领导变本加厉地对职工们施加压力，反对建立总工会的分会，限制劳动者的言论自由，依靠警察来禁止在企业门前散发传单。更可恶的

是，某些企业的领导甚至使用私设的武装组织和警犬来对付工人运动。在克利斯莱——辛卡工厂、在雪铁龙公司，打手们在领导人的支持下强迫劳动者参加企业工会，并为正常地选举工会代表一事制造困难。

自从吉斯卡尔·德斯坦执政以来，在警察部长、凡尔赛分子波尼利亚托夫斯基的领导下，对工人的镇压变得更加残酷。依靠警察来对付罢工的劳动者已经司空见惯，特别是用警察来对付为维护就业、坚持企业开工而进行斗争的劳动者。而人们却从来看到警察去对付任何一个把工资收入者拒之门外并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陷于贫困之中的资本家。《解放了的巴黎人报》和原子能专署的工人在维护他们合法的要求时，遭到野蛮的殴打。践踏宪法规定的权利，以罢工的罪名对总工会组织进行起诉。在雷诺公司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由于在企业中使劳动人民获得了政治发言权，我党的一些组织和党员受到法律追究。

同时，如果一些法官对那些在劳动中发生的死亡事故负有责任的企业主实行法律制裁的话，反动的部长们和反动报纸就会对法官群起而攻之，一些议员们则要求剥夺这些法官参加工会的权利。同样在军队里，政府除了镇压和制造事端以外，再也找不到什么灵丹妙药来医治由它的腐朽政治带来的严重弊病。

但是这还不够，因此多数派还企图规定对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新的限制，如破坏罢工和示威的权利。这就是几星期前四个反动的家伙在政府的同意下提出的那个法律草案的目的，这个法律草案被他们标榜为《自由宪章》。

政权唯一关心的是：压制人民的呼声，阻止各阶层的人民能够在大资本家无止境的欲望面前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使之取胜。在我国——她是代表制民主的摇篮之一，选举产生的议会被剥夺了一切资格和任何主动性。今天，国民议会的运转和工作条件使它成了一种装饰品、一种议会的伪造品。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在议

会的代表性上弄虚作假，拒绝比例代表制，而把一种完全不合理的投票方式强加于人。但是，在这里同样地也还不够，现在德斯坦政权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随意划分选区，以便为在下届选举中保住右派的地盘。最近，它还拒绝地区的领导机构由普选产生。实际上，政权、大资产阶级都害怕普选，害怕人民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

自由的问题，现在是每天都在谈论的问题。对于那些不得不终年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简单而又令人厌烦的动作的专业化工人来说，他们的自由是什么呢？对于那些没有工资，对生活发愁的失业者来说，他们的自由是什么呢？对于那些交不起债务和房租、被没收了财产赶出门外、生活在愁闷之中的无数家庭来说，他们又有什么自由呢？对于那些工作了很长时间以后、生活无保障、不得不数着铜板度日的老人来说，他们又有什么自由呢？对于那些从上学起就受到无情的社会隔离的打击、他们的父母无论如何也无法供养他们继续学习的工农子弟来说，他们的自由是什么呢？他们不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里，几乎每个人的前途都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根据他们父母的贫富事先决定了的。目前，主要的和现代的新闻手段——电视已成为政权所豢养的宣传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有什么新闻自由呢？

.....

共产党人是优秀的自由战士

事实上，在法国，只有一个党在任何情况下都高举自由的旗帜，只有一个党谴责对人权的侵犯，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都毫无例外，这就是法国共产党。（鼓掌）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根本行动和原则问题。我们为争取一个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自己命运的

主人和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而斗争。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为自由而战并不因此是出于天真的理想主义。这是阶级的战斗，这是迫切要求自由的工人阶级反对再不能容忍自由存在的大资产阶级的战斗。

工人阶级是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自由的阶级，因为他们的劳动是属于他人的，属于资本主义的；因为它是剥削和随之而来的使人精疲力尽的劳动强度、不能选择职业和个性被压抑的受害者。剥削越是扩展到我国人民的大多数，民主就越少，越失去地盘。

因此，为民主而斗争是工人阶级政党和号召消灭大资本剥削压迫的党的根本行动。

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扯下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其制度的不公正而还在挥舞着的“自由”旗帜。

请看，自从我党在总统选举之后提出民主挑战以来，右派及其部长和代言人们是多么忙啊！波尼亚托夫斯基已完全失去了冷静。我们已把这场自由、民主的辩论变成了全国性的大辩论。反动派对此非常苦恼，而我们那些左派批评家们则更加谨慎了。把广大人民群众集合在民主斗争中，我们就可以孤立大资本及其政权。如果不谴责大资本对经济和国家的统治，在民主的道路上将一无所获。民主和自由这是今天阶级战斗、革命战斗的主要阵地。

把民主一直推进到 社会主义的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一、所有制和管理问题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实现共同纲领就算大功告成。我们要使民主进一步向前发展，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

文件草案阐明了我们向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为

了使大家进一步了解我们为之而奋斗的是怎样一种类型的社会，我想谈一下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正象我们的文件所指出的，我们认为“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应全部归社会本身所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一，不实现这个条件，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它们领导过或正在领导的国家中，在需要取消大资本对国家主要资源的控制时，它们后退了，以至于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否说我们要在法国搞反动宣传所说的“集体主义”，即剥夺个人财产，实行千篇一律和强制呢？我们断然回答：不是。

第一、我们绝不想损害消费和使用财产的个人所有制，也绝不想损害这种个人所有制的继承权，如房产（住房或楼房套间）所有权。

第二、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根据这个目标，社会所有制将具有多种形式，如：国有化、合作社所有制，市、省、地区所有制。同时，在一些领域中，小私有制（手工业、商业和工业的）和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将更好地使需要得到满足；另外，鉴于国际经验，我们也要在社会主义的法国把这些保留下来。

第三、垄断资本家企业实行真正的专政，在现存制度中，技术官僚在发展，企图统治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资本的国家对地方行政包办代替。今天，我们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这种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制。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因袭这一套的！恰恰相反，我们要的是国有化企业拥有管理的自治权，要的是在劳动者和用户的参加下民主地制定计划，要的是企业管理本身的民主，即劳动者——工人、职员、工程师和干部——越来越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同样，我们要的是市镇、省、地区成为真正的决策和民主管理的中心。

我们关于文化生活的设想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希望有一种不受金钱支配的文化，这种文化再也不是商品和奢侈品，而是我国所有男女的共同财富。在社会主义的法国，文化将是广泛的、生动的，面向一切知识、一切研究和一切创作。它将发扬我国人民的伟大传统，用才智的多样性并通过使每个人有自由发展其才干的可能性的办法来丰富自己。

总之，我们不要那种有损害作用的千篇一律，而要的是有丰富作用的多样化。没有比那种把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都浇铸在同一个模子里的所谓“兵营式的共产主义”同我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更格格不入的了。我们关于我们要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是一个生动、灵活、具有创造性的概念，是一个鼓励办法的多样性、充分发挥各种积极性的概念。（鼓掌）

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这使我转到谈谈另一个问题。

文件提到了与第一个问题分不开的，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决定性的条件：“唯有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革”。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没有在文件草案中出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就此谈一谈。

文件草案没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来规定我们为之而斗争的社会主义法国的政权，这是因为它包含不了我们政策的实际情况，包含不了我们向国家提议的实际情况。

那么，我们在文件草案中谈到什么呢？我们谈到：

——领导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权将是工人阶级和城乡体力与脑力各类劳动者的政权，即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这个政权将在通过普选进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组成并发挥作用。它的任务将是实现国家全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最

彻底的民主化。

——它负有尊重并使别人也尊重人民的民主选择的义务。

而与这一切相反，“专政”使人很自然地想到希特勒、墨索里尼、萨拉查和佛朗哥的法西斯制度，也就是否定民主。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至于无产阶级，它今天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内核、核心。虽说它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它不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更不代表全体劳动者，而我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权将来自全体劳动者。

因此，显然不能把我们向劳动者和我国人民所建议的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什么为基础来确定我们的立场呢？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为 基础。

首先，是涉及工人阶级在为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必要性的问题。

如果劳动者和人民群众能够从今天起，通过斗争从现行政权那里争得某些急需的社会措施，甚至于争得某些新的自由，但政权的阶级性质不变，那么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权利的真正而持久的满足，是完全不可能的。劳动者和他们的代表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并对社会实行领导，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关键问题。在为社会进步、也为国家利益（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的斗争中，工人阶级是劳动者中人数最多，最有战斗性，最有经验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应该有它全部应有的地位并起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文件草案指出：“作为阶级来说，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革命斗争引向胜利。它的根本利益、人数上的优势、高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经验及其组织程度使它成为今天和明天为新社会而战的领导力量。……”

其次，是涉及为挫败大资产阶级的阴谋而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必要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文件草案强调指出：“剥削成性的大资产阶级决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和特权。它总倾向于千方百计地来保持或恢复它的统治和特权”。我甚至要进一步指出，对于法国资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我国，如果说存在民主传统的话，那么也同样存在凡尔赛传统，因为执政者的行径每天都使我们想起这个传统没有死亡。[◎]

因此文件草案指出：“为了挫败反动阴谋……为了阻止或者粉碎反动派诉诸非法、颠覆和暴力的企图”，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应该“在每个阶段都聚集力量，展开宏大的活动”。

话虽如此，我们本着我们学说精神本身，还仔细考虑“现实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仔细考虑我们时代和我们国家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得人们并要求人们考虑法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不同于已在本国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的人民所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和后来年轻的苏联所处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地进行曾经是必要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就不能进行和保卫他们已经实现了的，前所未有的解放事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所以当各共产党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吸取了教训而建立起来的时候，在当时的条件下，接受这个口号是正确的。

世 界 变 了

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并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独立自由、有利于民

主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和平共处正得到确认。通过复杂、激烈、时进时退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反动派和法西斯退却了，而民主却得到了发展，希腊、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事件都表明了这一点。无可否认，各国人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具有掌握自己命运，在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上前进的巨大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存在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它们取得的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群众斗争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及其内容的提高；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我国人民将从中得到支持，这种支持自然不能代替我国人民自己的行动，但将给这些行动提供着空前的完全独立发展的手段。另外，虽说位于西欧的法国的形势以及它与邻国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我们不会忽视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也能够为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提供进行合作与共同行动的可能性，以便为我们各国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来为开辟走上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而斗争。多年来，我们党一向致力于促进这一共同行动。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才为一九七四年一月资本主义欧洲共产党会议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参加了上述会议的各项决议的贯彻，并在不久前，我们和意大利同志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共同声明。

话虽如此，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势力对于智利所发生的事件自然是很敏感的。他们同样密切注视着在葡萄牙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件除有着重大区别之外，还十分鲜明地证实了反动派是不会放弃使用暴力的。谁真正想为了进步，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而对社会进行改造的人，都不能忘记和忽视这一事实。但这些事件同样表明，除了在政治力量对比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之外，反动派都没有能够，也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诉诸暴力的。

在智利，人民联盟曾以完全合法和正常的方式进入了政府。然而，不要忘记它开始时就不在国家中拥有多数。面对着国内反

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当时最重要的是要在各个领域中使得力量的对比变得对自己有利。为此，就要努力争取并扩大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智利同志们讲，在这个问题上，虽说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也犯了一些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极其有害的错误。在葡萄牙，法西斯的垮台曾使人民运动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是，民主力量的分裂导致了人民运动的后退，在这个分裂中，马里奥·苏亚雷斯的社会党负有绝大的责任。为维护并在将来扩大葡萄牙人民的民主成果的斗争，今天正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着。

提到这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教训别人，而是要为我们自己的斗争得出必要的教训。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这两个经验中得出的教训就是，应该经常注意防止下面的两个危险。

一个危险是：当条件具备时，不能依靠人民运动，及时地对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民主改造。

另一个危险是：提出一些口号或搞一些冒险主义的行动，而这些口号和行动都不符合现实可能性，出于“超越阶段”的愿望使革命力量陷于孤立和失败。

从中得出基本的一条就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是：要有而且要加强足够广泛的人民运动，要广泛到把牢固团结在改革目标周围的大多数人民都包括在内。

这条基本教训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从我国现存条件的分析中为法国得出的结论。

这个分析和结论是什么呢？

法 国 现 状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今天法国工人阶级共有一千万人，占就

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五。此外，还有几百万的工资收入者，首先是职员，他们在生活和劳动条件上都接近于工人阶级。加上工人阶级本身，雇佣劳动者的总数至少占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三。再者，危机不仅触犯了广大工资收入者的利益，而且也触犯了其他劳动阶层的利益。因此，所有这些社会力量的主要利益的一致性，给予争取多数人民支持社会改造事业、给予在工人阶级这个强大核心周围组成一个多数人民的广泛运动，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这是历史上一个新的情况。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可能性吗？——毫无疑问，应当抓住。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即所谓“资产阶级自由”问题。有人硬说我们反对某些自由，借口它们是资产阶级的或形式上的自由。这既歪曲了我们的立场又歪曲了我们学说的创始人的立场。有一种自由，只有一种自由是共产党人现在和将来永远反对的，即剥削劳动者的自由，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斗争都旨在消灭这种自由。如果压迫权竟能被称之为自由的话，那么这种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就是唯一的资产阶级自由。

此外，我们绝不把存在自由的情况归之于资产阶级。诚然，在我国，将近二百年以前资产阶级上台时，他们在生活中引起了他们的哲学家们所宣扬的某些民主原则。但是，在很早以前，他们就又迅速地把这些原则的阐述和实行都限制在符合其剥削阶级本性及其需要的范围内。

确实，在法国，凡自由的获得，无一不是以我国人民的痛苦、斗争、并有时是以鲜血为代价的。是的，劳动者和人民群众曾不得不为享有普选权，舆论、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罢工权、工会权以及拥有自己的政党等权利而斗争。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所有这些自由都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这就是他们渴望这些自由和共产党酷爱这些自由的原因所在。共产党人现在是、并且有志于永远更好地成为多少世纪以来在我国为自由而战的所有这

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普通公民和国务活动家的继承人。

如果说某些自由在今天只是形式上的自由的话，这是因为执政的资产阶级已竭力抽掉了它们的内容。我们非但不蔑视这些自由的存在，以免助资产阶级一臂之力，反而要全部恢复和更新它们。社会主义不是主观的臆造。它产生于历史的实际运动，产生于人民的实际斗争，产生于人民的传统和愿望。我们深信：在我国，社会主义应该与保卫和发展我国人民通过广泛而顽强的斗争所获得的民主成果相一致——否则就是空谈。社会主义应该这样，也能够这样。

我刚才提到，文件草案排除了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对于它尊重普选意愿的任何幻想。

但是，文件草案同时也注意防止下面这种主张，即：有些时候，人们可以用“非常坚定的小集团”的活动或用镇压的武器来代替多数人民的政治愿望。这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因为它只能给国内外反动派提供使用暴力的手段，只能把革命运动引向孤立与失败。

群众斗争和自由

在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没有，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通过斗争和普选的方法民主地表达的多数人民的愿望。不管在我国通过什么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预料到这些方式的细节，应该深信：在每个阶段，政治多数和算术多数应该相吻合，它们能够相吻合。

怎样为我国人民的这一必不可少的多数人的运动的发展，为使其更广泛、有力和有效而创造最好的条件呢？这是问题所在，除此之外，只是费话和挑衅。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所建议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作出

了严肃的回答。

通过今天为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主改革而斗争，我们就为团结广大的人民群众奠定了一个最好的基础，这个基础能够保证以新的民主政权代替垄断政权。

明天，实行民主改革将削弱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他们拥有的手段，必将加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地位，从而加强他们的斗争手段。

此外，通过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民主，进一步扩大个人和集体的自由，人民运动将得到加强，社会主义政权必将得到人民运动的支持和不可缺少的参与。反过来，群众斗争将进一步使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劳动者和各阶层人民方向转变。

事实上，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问题不在于剥夺少数反动势力的自由，而在于给予构成全国大多数的劳动者以自由。反动派将来能组织成一个反动党吗？今天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在将来也不新鲜。反之，例如劳动者将扩大自己在企业中的权利，他们的代表能够公正地使用电视，警察民主化，这倒是些重要的新鲜事。这样，劳动者将具有同反动派破坏经济的行为进行斗争的有效措施、使人们广泛了解和支持他们的立场、主张和行动的有效措施以及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击败他们的敌人的有效措施。劳动者将由于自己享受的自由而强大、而更加强大。

他们将依靠这些自由来开展斗争，迫使大资产阶级后退和失败；就是依靠这个广泛的斗争，社会主义政权能使反动派尊重大多数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抉择。

也就是说，我们决不放弃或推迟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提出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的路；最短的捷径。

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忠实于马列主义（它决不是教条的集成）教导的，是完全忠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创造性的经验的。

我们知道，例如，列宁在分析本世纪初的现实时，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相反，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论点。

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后来奠定了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的基础。同样，在一九六〇年，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在当今的条件下，世界大战是确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三十年了，和平共处正在发展，尽管它还不是不可逆转的。

在我国，人民阵线的主张已于一九三六年变成现实，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中是找不到这种现成的主张的。这种主张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还可以列举其他大量事实说明，我们今天的作法是从我们的运动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活的源泉中得到启示的。

这就是我们立场的基础，是导致我们在文件草案中提出建议采取民主道路的根据。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文件草案中没有出现。

所以，正如各省代表大会一致要求的那样，我们向大会提议决定放弃这个概念。（鼓掌）

我们还向本代表大会提议，委托我们行将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把党章前言中需加以修改的地方提交下次代表大会。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这样，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正是标志我国所需要的新社会——我们向人民提议建设的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特点。

这就是要有一个革命的改革，其主要意义就是从少数特权阶层统治过渡到由大多数人和国家掌握国家资源、劳动成果和整个

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发展。

这就是要建设一个具有如下特点的社会：结束不平等和非正义，取消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福利不断增长，每个人自由地为社会和文化运动做出贡献及人性的蓬勃发展。

正如巴波罗·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我愿生活在一个不再有人被驱逐的世界里。我也不驱逐任何人。明天，我也不再对达涅第介的神父说：‘因为你是反共分子，你不再要给任何人洗礼了’。我也不会对另一个人说：‘因为你是反共分子，你的诗和作品我不发表’。我愿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在那里人就是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称呼，人不再受法则、名词、头衔的纠缠……我愿再没有一个人在市政府门口被捕和被驱逐……我愿唯一的大多数人，人人都能讲话、写作、读、听，能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个理想只能是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成果。

什么是法兰西人民联盟？

讲这些，是强调联盟的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原则的政策。它是我们政治策略主要的和永久的因素。

我们希望聚集本民族反对大资本头子的全部有生力量。我们要的是法兰西人民联盟。

某些评论家认为在这个口号和我们关于阶级斗争必要性的信念之间（在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起着先锋作用）存在矛盾。其实，并没有任何矛盾。

我们建议的并为之而努力的联盟不是没有明确目标的不满者的联盟，不是侵略者和受害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调和。

这种联盟既反对某些东西同时也赞成某些东西，这是工业寡头和财政寡头的一切受害者的联盟，这个联盟反对统治和压抑国

家的阶层，也是为了通过深刻的民主改革，争取一种给予这个阶层以沉重打击的民主变革。这就是说，法兰西人民联盟今天有一个明确的基础即左翼政府的共同纲领。

同时，这也是一个战斗的联盟。因为只有在反对处于国家和经济领导地位的寡头政治的坚决而顽强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实现它的目标。

有人还非难我们的观点会使工人阶级现在的和将来可能的同盟者担心。

我们回答说，我们的观点相反会给他们带来最好的保证。

我们设想的联盟不是一个良莠不分的大杂烩。因此我们反对在下比里牛斯省首府代表大会上，社会党提出的关于“阶级阵线”的观点。首先，这个观点有很多模棱两可的东西。谁应该参加这个“阶级”？谁又被排斥在外？没有一个地方给这个阶级下定义，难道这个阶级本身能被看作组成了一个“阵线”吗？当人们得知米歇尔·罗加尔所发表的言论后，更会提出这个问题。下面，我引用他的一段话：“资本不是一个阶级……跨国公司的大多数领导是没有财产的，而是只带着很小的股份被选进去的人。有一个管理跨国公司的社会阶级，而没有一个拥有跨国公司的社会阶级，所有权正在变得无效”。（笑声）总经理们似乎在“阶级阵线”中有他们的地位？既然这个战斗的言词和同右派搞联盟的行动相一致，那么毫无疑问，某些反动政客也能参加“阶级阵线”了。

其次，由于下述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宁愿要我们的观点。

尊 重 多 样 化

首先是由于我们尊重并热爱多样化。

我们所希望聚集在一起的社会阶层有着共同的基本利益。它

们也有大部分来讲互不矛盾的特殊利益。它们可以在争取与其愿望和利益相符合的政治变革的斗争中牢固团结、共同行动。但它们之间并不因此而没有差别。它们都有自己的性质、特征和自己的作用。今天的联盟和明天联盟获胜后所建立的国家需要这些独特的贡献并从这种多样化中得到丰富。

我们希望在工人阶级的周围，有大量的工资收入者，特别是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干部，当然这不包括大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那些享有优厚待遇、死心踏地的奴才。我们不会对干部说：成为工人吧，向他们那样行动和生活吧。不，我们对他们说：你们是干部，这很好。你们别指望我们会支持你们与工人阶级利益相违背的立场，但你们能够依靠我们帮助你们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作为干部和他们组成联盟。联盟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联盟。明天，我们所希望的社会主义将需要大量的干部，并将正确地对待他们。

除开一小撮大地主外，我们要对农民们说：你们是农民，这很好。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中，你们会充分享有你们的地位，因为，你们也同样遭受大资本的统治；因为工人阶级和国家关心如何维护你们的生存并给你们提供发展繁荣的法国农业的条件。

我们对各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来说：你们的工作正在为民族创造财富，创造不可替换的价值。你们在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们的领域里为开辟未来的道路作出贡献。但是，今天你们所处的地位、创造性的劳动和你们的希望受到了打击。为开辟国家复兴的道路，参加法兰西人民联盟吧。

我们对被称之为中等阶层的数百万法国人讲几句话：你们是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小企业家，这很好。你们正起着有益的作用，在我们希望的社会主义中你们同样也能享有地位，因为社会主义将需要你们。当然，你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我们不瞒你们说，我们现在维护并将永远维护工人的利益。

但归根结底，只有支持工人阶级和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中，你们今天的迫切问题才能得到解放，你们的未来才能得到持久的保证。

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

不仅社会是多样化的，而且哲学和政治也是多样化的。我们设想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应该尊重言论自由、尊重各种思潮流派和反映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并促进它的进步的宗教信仰。

关于这一点，文件草案指出，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的相互接近具有新的重要性。我想强调指出这不是假套子。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后果把基督教劳动者和无神论劳动者一起卷入到日常的斗争中。同时，在无数基督教徒的信仰中，对正义的向往、团结的关心和人被尊严的要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具有了更具体、更深入的表现。基督教徒怎能不支持劳动人民、一无所有的人和被剥削者呢？他们对基督教必须在社会上存在的考虑和研究越来越经常地导致他们必须要对于他们的信仰赋予一种政治色彩或政治含义，促他们参加民主改革和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今后，那些人数相当可观的完全不放弃其信仰和宗教活动的男女基督教徒可以积极地参加到我们党内来。这表明存在着激励着我国人民的深刻运动。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重视法国教会最近所采取的某些立场，即对危机所带来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结果表示了不满，对基督教徒们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行动表示理解。最近，法国教会还表示希望“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最不幸的人都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能听到他们的呼声”。毫无疑问，在他们中间也有某些人有时也诅咒马列主义和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将不惜一切努力，促进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之间从简单的会晤到统一行动等各种形式的接近，正如我们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并体现了我国人民的形象。

这样，我们要的不是蛊惑人心的联盟，是光明正大的联盟，是一个广泛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联盟中组成联盟的每一个力量的多样化、独立性和特征对于取得胜利来说并不是阻力，相反，在各种力量为胜利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时，它是使这个联盟强大、发展和取得胜利的一种因素。

对，工人阶级起了先锋作用

正是从联盟这种概念出发，我们不能同意对工人阶级用“阶级阵线”的概念来表示。社会党事实上断言：“阶级阵线的策略否定社会先锋这一整个概念……”。否！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认为工人阶级有权单独存在，不能把它埋没在一个毫无区别的整体中，而且还认为它在为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斗争中，也确实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即先锋作用。在当今法国的社会斗争中，肯定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并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没有任何其他社会阶层，只有我国工人阶级——其中自然也包括外籍劳动者——最关心改革。

工人们——即千百万男女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们却是巨大财富的创造者。是他们，一年到头节衣缩食，住宅非常简陋；是他们，被人们从大城市的中心驱逐到远郊；正是他们经受着流水作业所带来的劳累，遭受着工伤事故，生活前途渺茫；正是他们的绝大多数孩子不能适龄上学，并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又正是他们无权享受娱乐和文化。他们不能参加政府，他们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劳动场所和来回的奔波中度过的，资产阶级企图否认工人在企业中进行政治活动的权利。

党 在 企 业 中

我想谈谈问题的最后一方面，因为它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工人阶级是为社会和政治的改革而斗争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它在这个斗争中有着最大的利益，而且由于它集中在企业里，并直接地、集体地受到老板的剥削它发展了斗争。在这十多年的斗争期间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阶级觉悟，它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有一个革命的政党：法国共产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存在大老板——国家的共同阵线，把所有权利要求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劳动者每天都在同各种形式的国家政治机构发生冲突，经济问题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意义，政治改革的斗争是尖锐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劳动者能够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建立和加强他们的党，并依靠党参加政治生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困难，任何会出现并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工会和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问题，都不能为在斗争最首要的要求面前的哪怕一点点退却而辩护。这个要求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地点发展共产党的活动和组织。（鼓掌）

实际上，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想以否认工人们的这个权利，把他们限制在不能充分享受公民权的地位上，并且拒绝他们在民族中的地位，阻止他们争取政治改革的斗争。

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的问题，它的先进政治作用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小宗派的问题。这关系到劳动者的利益，关系到国家本身的利益和将来。

我们并不建议其他社会阶层归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恰恰相反，我曾指出，我们懂得这些社会阶层为了保存自己而斗争。而我们帮助他们斗争也正是为此。反过来，我们告诉他们，他们的斗争只有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汇合在一起才将是有效的，才能获

得胜利。我们告诉他们，法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弊病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在国家生活中、在国家事务的领导中拒绝给工人阶级以地位。

其他劳动阶层对于工人阶级负起责任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工人们不想剥削任何人。其他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贫困或受压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不幸或破产，这些都不能给工人们带来任何好处。他们为了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而斗争。他们不能够单独取胜，而是需要一个和其他被压迫的社会阶层组成的牢固而持久的联盟。

工人阶级所起到的这个先锋的、社会运动动力的作用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的性质。这个作用并不牵涉任何隶属关系，不是用来发号施令的。从现在起，这种作用只不过是在反对大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策和为了共同纲领的胜利的战斗中，得到发挥并受到检验。今后，这种作用在实现共同纲领的过程中，或者更远一点，如果法国人民选择了共同纲领，在建立社会主义过程中都将是不可缺少的。

为了完全搞清楚，我们重申：如果工人阶级失职的话，如果共产党人不帮助它承担这个责任的话，在法国就不会有民主和社会主义，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本身及我国全体人民的解放。（鼓掌）

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希望左翼团结起来

我们为之而斗争的，联合大多数人的关键，这就是在共同纲领周围的各左翼党之间的谅解。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而斗争。自从达成谅解以来，为了共同目标的胜利，我们党极力巩固它、扩大它、提高它的战斗力。再往远看，在迈向社会主义和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党也赞同左翼党——首先是共产党和

社会党——之间的持久合作。因此，左翼联盟的政策对于我们不是暂时的策略，而是我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国民主政党之间的合作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斗争胜利的一个条件，它同时也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

事实上，左翼联盟并不象签署一个普通的合同那样就可以保证实行，由于下面两个互相联系的原因，它是一个长期的战斗。第一，因为资产阶级永远不接受工人和民主力量的联盟，他们运用所掌握的全部工具不断地反对它、粉碎它。第二，因为这个压力在社会党内部不是没有反响的。

因此，为了这个联盟，我们党不得不总是作出顽强的努力。为了制订左翼的共同纲领我们斗争了十年。自从它签定以来，我们加倍地提建议和倡议，有时公开地批评那些暧昧的态度和倒退的行为，以便巩固我们之间的谅解，并在生活中、行动中表明谅解，象人们所说的那样，起了“发面”的作用。因此，在共同纲领周围的人民运动力量壮大，以至一九七四年五月接近多数派的力量。每个人都能够证明，在整个战斗中，我们党表现出最光明正大，最忠诚于联盟的事业。

联盟是一场战斗

以后也是如此。在总统选举后的时期内，我们不得不告诫劳动人民和全国威胁着联盟的危险。文件草案明确表明：在危机恶化的条件下，政府当局只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政治基础了，大资产阶级既极力保护他们的权力，又扩大它的影响，创造条件，是为了使社会党（控制了被削弱的共产党）在必要的时候，重新搞阶级合作，以便延长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我们努力粉碎当局的这些企图。但是，相信大资产阶级会放弃他们的目标就太天真了。

批评我们的人说我们党态度强硬了、转变了。我们既没有“强

硬”也没有“转变”，而只是在新形势下为联盟而继续战斗。为组织群众的统一行动，为实现各民主党派的共同行动，为共同行动的成功所作的努力和对阻止威胁运动发展的立场和阴谋的公开批评，是为团结统一的战斗的不同阶段和形式。如果有必要我们不能放弃加以利用。它来源于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只有依靠劳动人民和民主人士的本身的警惕、参与和合作，联盟才能实现，才能坚持，才能胜利。联盟就是而且越来越该是他们的事业。

面对这些问题，在代表大会预备性的讨论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他们的疑问：“难道和一个改良主义的党搞联盟吗？联盟对社会党来说不是对我们更有利吗？在这上没有危险吗？”他们的疑问是合情合理的。

确实，社会党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党。相信共同纲领的签署本身就足以改变现状是天真的，尽管它能带来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社会党的性质和它的全部历史，和它缺少理论上的连贯性有联系。例如，我在前面引的米歇尔·罗加尔的话，与他们的领导班子的社会成分有关，与它长期和右翼搞合作，现在已成为习惯，特别是当选者，在这里或那里继续搞阶级合作，例如大约一百八十个城市的领导班子就是这样。此外，社会党要公开继承莱翁·布鲁姆的衣钵。

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中央委员会在签署共同纲领的同时，就意识到了这一切，并强调指出，这个纲领的签署“也许会给社会党削弱我们提供基础”。

综上所述，中央委员会——正如文件草案中所表达的——认为我们所作的选择是对的。为社会改革斗争而服务的联盟是不可缺少的。此外，在危机的深化要求有一个明朗的前景的时候，在签订一个好的共同纲领的条件具备的时候，拖延和社会党的谅解是有损于劳动大众和我国人民的利益的。最后，当社会党一作出决定，我们中央委员会就指出：如果纲领所开创的新形势能够使

某一个时期内产生一些混乱因素，那么，群众所创造的经验可能得到阐明，可能得到一个充分肯定的结果，具备“履行应尽义务”的条件。

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了吗？中央委员会回答：是的，由于采取了我们制定的所有政治倡议和决议，由于我们为之贯彻而斗争，我们基本做到了，即使事后有人会想，或许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可能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

为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党

综上所述，应该继续下去，因为任务没有完成，危险依然存在。这不是为责备社会党而说的，正如我们在去年十一月中央委员会上所说的，对于右派的压力，对于反对联盟的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埃尔姆特·施密特的压力，法国社会党是敏感的。如果左翼发生了对社会党有利的不平衡，如果社会党控制了左翼，我们说它又回到了与大资产阶级搞合作的老路上去，目的并不在于谴责它。它仅是一个经验教训，我们国家的经验教训，某些法国城市的经验教训，也是今天一些共产党没有足够影响，社会民主党拒绝联盟而大搞反共活动，直到损害自由，并替大资本家效劳的国家的经验教训。

做应该作的事，对今天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说共产党要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斗争的前列。在任何场合下，最积极捍卫他们的利益，努力说明符合这些利益解决的办法。因而，使劳动人民、民主人士有能力对各左派政党的明智、忠心和他们反对吉斯卡尔政权，为争取实现共同纲领所主张的改革而斗争的决心进行比较。

这还意味着通过与之相适应的创议，（我们党在前一段时期已做了一些）要推进各左派党的共同行动。

这同样意味着要继续进行反对改良观点和行动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比如，我们对危机进行了解释，采取了立场反对所谓作出牺牲的思想，呼吁在危机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为国有化作了斗争，其结果是积极的为戳穿吉斯卡尔·德斯坦设下的所谓对话的骗局作出了努力。

最后，这还意味着加强党的影响和党的组织，因为，要有一个强大的联盟，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党。

对我党的真诚讲几句

某些人好心地提疑问：“共产党是真诚的吗”？

我们真诚的第一条证据、正是这个事实，在我们看来，在法国，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了我们确定的这条民主道路之外，没有其它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次，决不失言是法国共产党值得自豪的。法国共产党总是言行一致，它从未损害过自由，为了自由和民主，它不怕镇压、不惜牺牲许多党员的生命而进行了不懈的战斗。

今天，看看我们的代表大会吧！这就是我们党的缩影。在这里，谁会怀疑自由呢？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全部生活，只有一个意义，只受一种热情的激励：把工人阶级从剥削中解放出来，把社会从一切压迫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能够真正自由地生活。

我们的所有建议，全部行动都是向着这个目标的。它制止并将制止专制主义的冒险行为。历史（首先是法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希望思想划一、使成百万公民变成个人集权的象铁板一块的社会顺民是幻想。这一切是大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而这正是对大资产阶级的谴责。因为，现代社会相反地需要每个人的思想和首创精神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只有通过民主的道路，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没有其它更好的捷径。民主到底，就是社会主义。

一条独立的独创道路

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独创的道路。正如我们在《民主的挑战》一书中所写到的那样，法国共产党的政策确定着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和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怎么可能有别的道路呢？我们的政策的民族特征具有原则性的依据。社会主义是一种正在出现和发展的社会形式，它是符合一个国家客观需要的必要答案，这些客观需要是具体的、特殊的，而社会主义给予他们的回答也应该是具体的，特殊的，在法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法国全部社会组成部分的现实基础之上的。

这些和现存的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及普遍原则毫无矛盾。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集体所有制，计划化，劳动者的政权，整个国家生活的民主化，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党起有领导作用的影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规律。在生活中，这些规律可能具有而且必然会有极为不同的表现形式。每个国家的条件和传统必定在各个领域中有它的特点，不管是在立法和政治生活中，在各个社会生活的结构和经济组织中，还是在文化中。社会主义现实的必然多样性是早已存在的，除非出于恶意的反共宣传才能否定它。在苏联、越南、匈牙利、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愈多，社会主义的现实也愈加多样化。因此，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能够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或者照抄的社会主义的“样板”。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斗争方法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形象地说：今天的法国既不是一九一七年的苏联，也不是一九四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阶级斗争的民族条件和历史条件是深刻不同的。任何一个政党或者党的集团都不能对其他党发号施令，提供万能药方和制定模范的策略。因此，不可避免，我们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时，遵循一条独立的道路，这是一件好事。

这种多样性并不导致任何的闭关自守和削弱我们与其它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在这些共产党中，尤其是好几个党已成功地把他们的国家引向了社会主义。我们有共同的伟大目标，共同的学说，共同的对手，我们共同热爱社会主义。他们已经完成了多么宏伟的事业，他们已经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作了何等充分的证明！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这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即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设了一个没有危机，没有失业，没有物价飞涨的强大的经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劳动人民负起责任，在企业中有民主，机会均等，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普及。是社会主义使古巴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了饥荒、贪污、失业和种族歧视，在工业化、卫生、扫盲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是的，我们是和完成这种伟大事业的党团结在一起的！反动派休想看到我们这个团结破裂！相反我们注意发展这个团结，并坚决与任何煽动者和兜售者的反苏主义和始终把目标对准社会主义国家的谎言和诽谤进行斗争。

本着有助于社会主义的进步，增加其影响和威望的同样愿望，我们对在这样或者那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坦率地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无意教训别人和干涉兄弟党的事务。但我已说过，我们有共同的原则和社会主义这个

共同理想。此外，社会主义是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活生生的现实，也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实际斗争和我国革命劳动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关于这一点，发展社会主义中的民主和自由的必要性是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苏共二十大揭发在斯大林时代发生的错误、罪行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时，我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它视为打开社会主义历史新篇章的国际重大事件。

从中得出的基本教训之一是：对以任意使用权力和镇压手段来代替以说服、交流和思想斗争的民主努力的企图；应始终提高警惕。因此我们不同意在任何地方采取侵犯舆论、言论或是创作自由的镇压措施是很自然的。对于苏联出现的某些事情，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确实我们不能容忍以人的幸福为目标的、并且我们号召全体劳动者为之而战斗的共产主义理想，被不公正的和未能证明是公正的行为所沾污。这种行为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当问题涉及到这个国家的人民牢固地、始终地团结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事业周围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容忍这些行为。

在这方面，我和苏联共产党存在着的分歧当然不会导致，过去也没有过，削弱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实现我们共同大目标的斗争中与苏联共同合作的愿望。正如各国共产党在一九六九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共同指出的那样：“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本身不应给兄弟党在国际事务方面共同的立场制造障碍，尤其是当涉及到反帝斗争的基本问题时”。

我们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对于这一点，我想迅速地回顾一下我们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问题。确实，我们民族任务的重要性，我们对于祖国的利益和幸福的关注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忽视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文

件草案着重强调了我们斗争的不可缺少的广阔性。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给各国人民，给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民主力量以不懈的声援。兄弟般的关系把我们首先与各国共产党团结在一起。在独立和权利平等的原则下，我们共同建立了这一强大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它对于世界事件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个影响没有什么神奥之处。它的产生是由于各国共产党为之而奋斗的目标是符合于各国劳动者的利益和愿望的。是由于共产党人为了取得这些目标的胜利而在他们本国进行了有效的斗争。

通过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及那些走独特的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所表现出来的战斗支持，使这种影响得到了无可争辩的加强。把各国共产党团结在一起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是在这种相互支持中得到了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知道还有任何一种更高于它的国际主义形式，更不能容忍把它按照地区分割开来。正是这种支持的相互性，我们的国际主义的普遍性使得我们能够谈得上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因此，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一个“教会”，也不能是一个集权组织，让每个党服从它的强迫命令和统一规律。此外，运动本身的发展，各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责任，一些党执政，一些党在野的这个事实，及在和平共处条件下国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会导致产生各种不同观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考虑这些。在这种形势下，有一个问题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在共同大目标之下联合行动的问题。是为了争取和平、集体安全、裁军、国际合作所采取的联合行动。是声援被反动派镇压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的联合行动。根据经验我们深信：如果各国共产党在这个领域里起了先锋作用和带动作用的

话，那么和平、工人、民主、反帝的广泛力量就有可能为这些正义的事业集中行动，尤其是在欧洲。我们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我们要努力用以更生动、更有效的新形式发展我们同其他兄弟共产党之间的合作，这些新形式通过我们的运动符合我们达到的阶段，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成功地开始付诸实践。

在标志我们时代特点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其他反帝力量起了一个卓越的作用。民族解放运动，民族民主政党领导着他们的人民为了独立、更大的福利、发展、社会正义进行着斗争。对于这个斗争（不管这个斗争的政治领导力量是谁）我们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法国共产党为始终站在越南人民一边，从一开始就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感到很光荣。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关系，从今以后就把我们与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和政党团结起来。在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战斗中，由于我们忠于把一切反帝力量团结起来的思想，我们更希望发展这种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亲爱的同志们，以上就是我要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基本问题，以便阐明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特点和基础。

（摘自《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

未 来 从 现 在 开 始

——一九七九年五月法共二十三大通过的决议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在理想的鼓舞下，依据指导其斗争的理论，依据法兰西民族的传统、现状和需要以及世界形势的演变和各种革命力量的经验，这次大会为法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开拓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前景：通过发展在斗争和普选中表现出来的多数人民运动，保证国家民主地走向民主的社会主义，走向一种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确实，如果国家不进行深刻的政治变革，不进行同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统治决裂的民主改革，那么，它就无法找到解决今天打击着它的危机的真正出路。如果在国家生活和职责方面不给劳动者、工人阶级和法国共产党以应有的全部位子，也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由于今天出现了人类进步的新的可能性，上述要求是可以变为现实的；但这些要求只能在复杂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进展。

肯定二十二大通过的目标和政治战略完全有效；置身于人民的愿望和斗争之中，明确和丰富彻底地、创造性地贯彻这一战略的手段，以便在生活中创造国家以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就是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一、 法国没落的道路

法国社会的危机

十年前，法国共产党在分析国家局势、总结一九六八年五一

六月伟大运动的教益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法 国进入一 种深刻、持久和全面的危机。危机的主要根源是在积聚利润和加强资本的实力方面的竞赛。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上述分析和结论的正确性。

(一)一次全面的危机

政权和资方把尽可能快地追求尽可能的高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的手段和唯一目标，对劳动者实行了超额剥削，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限制了他们日常的消费。它们有步骤地鼓励物价和货币的膨胀，利用通货膨胀来直接增加它们的利润，减少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使储蓄贬值。它们侵吞公共基金。它们把企业集中、合并，加剧了失业、农村人口外流，使破产倒闭现象增多，使有些地区整个地归于消亡。

政权和资方竭力使用那些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再生产的相对价格。它们对劳动者说：“你们生产得再多一些，你们就会生活得更好。”而实际上，它们却将剥削和压迫扩大到所有的劳动阶层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几百万妇女和男人成为工资收入者。这种演变反映了劳动力的社会化，但在现存的制度下，它迫使千百万人进行那 种报酬低、无专长、细小和令人疲惫的劳动。由于他们、尤其是青年人日益渴望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决定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感到他们的职业生活是一种暴力，是一种强迫性的义务。

消费品的生产转向了收益大、质量低、使用期短的成批生产的产品方面，而必不可少的物质、社会和文化需要却没有得到满足。

医学在发展，平均寿命延长了，但劳动和生活条件却在损害着几百万人的健康；在疾病和死亡方面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

入学人数有所增加，但学校缺少教学手段；教育体制实际上维护着社会差别，教学落后于生活，常常没有针对性。

很多人根据廉价而不平等的城市规划迁往城市。农业被推上了衰败的道路。一些村庄、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日益凋蔽，几百万劳动者迁往远郊和设备低劣（尽管许多市镇当局作了努力）的楼群。

邻居关系遭到破坏和削弱，发生了变化，跑路的时间增加，生活环境恶化，这一切导致生活的贫乏，为生活丰富的可能性设置障碍。家庭碰到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受到打击，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新的要求。

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和权势，这是衡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成就的标准。体现这条法则的各种现象，促使暴力、犯罪、贪污和道德败坏发展。贩卖毒品、宣扬色情、经营淫窟成了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下流的新闻把杀人犯当作英雄来炫耀。因此，资产阶级践踏着社会在历史上获得的道德价值，窒息着对更高的新的道德价值的向往。

这场危机既是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大资本完全垄断了国家的领导权和主要机构，使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它集中了权力，将决定权集中在上层，普遍进行行政干预，加强国家对国计民生的控制，加剧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对公务人员的政治压力增加，对他们更加专横，使他们进行活动的条件变得更糟。政府和资方拒绝给劳动者、公民以参与关系到企业、城市、地区和国家的抉择和决定的权利。

（二）危机和斗争的关系

危机的种种后果孕育了社会斗争的发展。这些斗争限制了资本的侵蚀，遏制了危机在各方面的加剧，提出了一些适应新的要求的新的解决办法。变革的愿望增大了。正是为了给这一愿望开

辟一个政治前景，法国共产党一九七二年签署了一项它为之奋斗了十多年之久的左翼共同施政纲领。危机本身促成了建立联盟的条件的成熟，而联盟又在变革问题上，加速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阶级斗争的激化。

但是，经验已经表明，危机及其后果既不能自动地、也不会很容易地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变革的条件，并使他们起来为实现这些条件而斗争。危机及其后果不仅产生对新事物的向往，而且也包含着一些导致害怕新事物和引起抵制必要改革的因素。危机的深化加剧着政治和思想斗争，人们的觉悟在这场斗争中得到提高。在分析人民运动未能克服右翼和社会党在它前进道路上设置的障碍、并在一九七八年三月选举中遭到失败的原因时，我们考虑到上述矛盾的现实。

十年来，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下述后果：加剧和扩大了资本主义内部的、造成极其混乱局面的矛盾；在经济与社会需要和为了大量积累资本而疯狂追求利润率之间产生激烈的对立；增加了由于法国大资产阶级目前的统治制度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转而产生的紊乱、停滞和混乱。

这就是危机，是一种尽管不限于我国，但首先是全国性的危机。

资本主义各国的危机和世界的演变

（一）一场国际性危机

危机也是国际性的，这包含两层意思。

一方面，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利润和资本积累方面的竞赛导致了一场对每个国家来说具有同该国特点相联系的特殊性的危机。

另一方面，危机具有影响各国危机的、完全是国际的特点。

美国依仗其统治地位和美元的特殊地位，极力煽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采取了如此大的规模，以至于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于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受到抑制和“第三世界”国家遭到掠夺而导致的市场萎缩，加剧了竞争。一般说来，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发展方式，不仅造成了对人民的剥削、种族主义、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而且造成了大量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很多手段不能被正确地利用或得不到什么成果，而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则可以使这些手段更好地发展。这种发展方式破坏自然环境，破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它扩大在统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阶层的权势和财富同不发达国家数以亿万计的人民吃不饱饭的境地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的不平等。

（二）世界力量的对比

这场危机及其特点、表现和后果，同世界上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发展和活动是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这一历史性的巨大进步，最终地结束了饥饿、瘟疫、文盲这些人类的大悲剧。它们使本国的经济有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有大幅度的提高。它们在解决下列重大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充分就业；同满足社会和国家需要相联系的经济增长；劳动人民得到知识、文化和担负责任；机会均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世界里巩固着自己的地位。还有一些国家以各不相同的形式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社会主义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的演变，产生着虽然还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日益增长的影响。它们的存在和行动业已给人类带来了这样一种无法估价的成果：三十四年没有世界战争。

然而，除了资本主义的影响之外，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一些

阻碍其前进的内部问题及分裂。在最近这个时期，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无可辩解的侵略，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场侵略遭到了最广泛的谴责，与国际现实相抵触，因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停止这一侵略。值得可取的是，通过谈判在有关国家之间建立持久的和平和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准则基础上的关系，即：独立、不干涉、不使用武力、权利平等、友谊和团结。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反对紧缩、失业和打击自由与民主的政策的重大斗争有所发展。一些法西斯政权不得不下台。在一些存在有影响的共产党的国家里，进行深刻政治变革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新的成就。又有一些国家的人民赢得了独立，如在越南和安哥拉。争取经济独立、由国家来掌握自己的财富、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有力地表现出来。虽然帝国主义竭力要夺回自己的地盘，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或分裂进行投机活动来调整自己的统治，但是，这些要求仍取得了一些成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这特别是在联合国内表现出来。在当今世界上发挥着积极作用的不结盟运动也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主权与和平的要求，反映了这些国家为建立国家之间真正民主的关系和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而采取的行动。

反对形形色色的剥削和压迫、反对浪费物质资源和人类财富的大规模斗争潮流，在这世界三大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在我们的时代发展着。反对种族主义、反对世界范围内的饥饿、保护生态平衡的愿望、争取个人自由、青年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憧憬，是斗争的动机。在这些潮流中间，争取妇女权利完全平等和妇女从千百年的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的斗争的巨大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事态的发展证实和加强着下述看法：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民族和人类解放力量的变化。新的因素使今天的形

势深刻地不同于三十年代的形势。就是在世界上发生的这些变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对付一场危机，这说到底 是他们剥削、压迫和掠夺各国人民和劳动者的制度的危机。这就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寻求与其手段相适应的解决办法，从而为解放斗争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是，这并没有排除危险，因为资产阶级不会放弃维护其依然是强大的阵地。为此，几年来，它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反攻，来维护其势力范围和利润。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世界形势具有复杂的特点，包含着一些相互矛盾的方面。

（三）帝国主义的反攻

军备竞赛

如果说资本主义列强过去是在战争中谋求解决其制度矛盾的“办法”，那么，现在它们不再能随意乞灵于战争了。它们不得不接受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原则，这个原则现已列入为重大的国际协定、如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所体现的缓和进程。它们不得不承认新的世界现实。

然而，和平共处、缓和的根本倾向是不能自动地发展的。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竭力阻挠缓和，制造新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它们阻挠缓和并以裁军的措施；它们甚至加快军备竞赛，研究或制造一些越来越野蛮的武器。这种局势积聚着对于人类的严重危险，这特别是因为人们看到，帝国主义从而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如果它把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就会发动军事冲突。

“跨国公司”的活动

在危机中，资本的势力已着手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条件，以维护其利润和统治。跨国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维护可以获得传统的能源和原料来源的最有利的条件，并竭力控制新的来

源。它们千方百计地扩大对生产和交换的直接控制。它们把自己的活动转移、扩大到可以产生更高利润的地方。它们利用金融机构和公共资金，利用货币的不稳定、通货膨胀、投机和交换中的不平等。它们将尖端产品的研制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竭力控制它们本来让与其他部门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实行适合自己目标的工艺流程。它们试图在某些地区，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为了自己的利润，组织国家经济一体化。这些旨在为现在的危机找到符合资本需要的出路的企图，远远不能给世界各重大问题带来积极的解决办法，而是起到一种可与人类经历过的帝国主义战争相比拟的作用。这些企图给发达国家人民带来的是紧衣缩食和失业，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的是超额剥削。它们破坏着重要的物质生产能力，浪费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恶化着各国人民的生活环境，使权力和职责的集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瓦解着国家的生产机器、主权，最终瓦解着这些国家本身。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谈论的“世界化”，其结果只会是使资本主义世界变成一个单一化的、标准化的、非人道的、由最强者统治的一个整体。

大西洋主义的再兴

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的一切手段用来为这些目标服务。危机和发展的不平衡，无疑加剧着各国资本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但是，当前时期的特点是，它们企图把这些矛盾保持在共同需要的限度之内，这个共同需要就是：对付进步力量与革命力量，开展系统的协调行动。早在一九七三年，“三边委员会”就为此目的制定了一项旨在使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三个中心——美国、日本和西欧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合的战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各种会晤，如瓜德罗普会晤，就是属于这一战略的。

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最高领导之下，大西洋团结得到重申和扩大，只是根据世界的现状在今天作了些调整，即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了某种分工。因此，在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领导下的欧洲一体化，是得到美国赞同和鼓励的一个目标。

意识形态战争

由于没有使用武器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就使思想斗争具有了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的特点。从拥有巨大物质手段和大批工作人员的许多中心开始，通过大的新闻手段的传递，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有指挥的激烈的宣传运动。这些运动打击一切进步的思想，首先是被粗暴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它们试图在人们的思想中摧毁民族的概念。它们鼓吹放弃斗争，逆来顺受；它们散布愚昧主义和非理智主义，打击认识科学的一切可能性，以及驾驭社会运动的一切愿望。它们企图不准人们抱有希望，不准人民求得解放，使之怀疑一切，以便让资本主义从这种怀疑中得到好处。

政治干涉

在这一战略的范围内，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导人以多种形式加强政治压力和干涉，以阻挠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他们虚伪地自称是人权的维护者，然而他们却无视人权，毫不犹豫地支持或组织对人民的屠杀，以扶植独裁政权。但是，世界发生的变化，各国人民对法西斯主义的体验，民主愿望和斗争的高涨，这一切都使得扶植这类政权是困难的，而要把它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推荐给各国人民就更加困难。因此，资本势力极力将这些愿望和斗争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使这些愿望和斗争只能导致一些不妨害其政策实行的简单的调整。为了这个目的，它们有意识地、更加有步骤地求助于社会民主主义。

（四）社会党国际的作用

社会民主主义在执政时，一贯表现为资本主义事务的“忠实管家”。由于社会民主主义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劳动阶层的一部分，并且自诩拥护社会主义，因此，特别是在那些有共产党存

在、并活动着和发展着的国家中，它就不能对社会斗争和民主斗争的发展无动于衷。但是，自从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演变的特点则是它积极地参与资本势力的反攻战略。社会党国际的活动无论是从其方针还是从其频繁程度来看均证实了这一点。

最近，这个在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下的国际中心以更多的手法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

它极力加强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加剧了对许多国家的干涉，为此而建立了一些依附于它的党派。它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对实行有利于资本势力的管理危机的政策以充分广泛的支持；致力于在西欧和大西洋集团内建立超国家的一体化，阻挠将实行打击资本统治、给予危机以符合人民要求的新出路的政策的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损害革命运动的成果。这一切，在前一段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葡萄牙社会党的政策中，从在丹麦、比利时、法国不同程度地看到的社会党向右转，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社会党所采取的某些立场中反映出来。

从温哥华代表大会上表现出的社会党国际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加强和扩大其活动一事，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另一特征。这种努力旨在能对一些政党和运动施加影响或扩大这种影响，在一些组织和知名人士中寻求支持，以便帮助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重振起来，把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限制在它们统治制度的范围内。

德斯坦的政策

德斯坦政权的政策反映大资本的观点和要求，完全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一世界战略。

一九六九年，我们曾经指出大资本的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政策旨在密切与美国和资本主义邻国的联系，使法国的

雄心只限于加强跨国性的资本主义集团，并企图使国家的生活依附于这些集团。但是，尤其是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由于危机加剧，法国的政策随着德斯坦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而明显地朝这一方向转变。一九七六年巴尔政府上台后，这一政策得到议会多数派所有党派的支持，被特别坚决地执行，一九七八年三月选举之后更加速推行这一政策，并有新的发展。

（一）紧缩、失业和抛弃

自一九七六年以來，通货膨胀率实际上保持着它的高水平；失业人数增加了近百分之三十；劳动者的购买力下降了，经济增长几乎停滞。对外贸易不稳定的平衡只是在控制国内消费、冻结经济的情况下取得的。国家所患的弊病正在恶化。

德斯坦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不是以医治这些弊病为目标的。其真正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国家的资源和力量引向以法国为基础的少数多国公司，以便使它们有办法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头企图组织的对势力及利润范围的重新划分中分享一份。

肆无忌惮地使群众接受越来越多的牺牲，就是为此目的而使用的第一个手段。资方和政权在工资和社会补助问题上施加压力，它们求助于提高物价、房租和税收。它们打击诸如社会保险、退休金或失业补助、社会住房之类的宝贵成果。疾病、事故、残废给家庭带来令人苦恼的困难。给公共设施的贷款和公共事业单位的活动手段受到限制。由于国家拒绝向市镇和省提供必要的财政经费，使幼儿园、学校、夏令营的费用更加昂贵。这一紧缩政策在限制人民消费和国内需求的同时，加剧了经济停滞和失业。

强迫接受大量的和持久的失业，是所使用的另一个手段。这一祸害是与加速对最大企业有利的集中和改组、加速振兴和资本输出的活动（很快就是人口输出）等打算相联系的。法国男女的

就业要求已经增长，在今后的二十年内还将继续增长，而政权不是建立必要的工作位子，而是竭力使求职者灰心丧气，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要求。政权掀起一场运动，企图剥夺几百万妇女的工作权利，企图大量发展低报酬的半日制工作。政权侈谈增加那些在它的逼迫下失业和不能充分就业的人的娱乐。政权还在着手撤销全国职业介绍所的公务部门。同时，经济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新的特殊努力来策划就业的不稳定。他们想通过增加季节工、实习生、辅助工、临时工，半日制雇员的人数，建立起一支新的劳动后备军，这些人可以被任意宰割，做任何苦力，被任意调动、输出和解雇。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施加压力，以便在生产及劳务部门迫使人们放弃工作，实行解雇，并与此相联系，削减工资，破坏已取得的权利。这种压力，以及越来越多的工资收入者被迫的流动是加剧对全体劳动者的超额剥削、力图在企业中推行阶级合作、寻求对这一政策的一致意见的手段。

一个摧毁这张国家的王牌、即公共与国有化部门的真正计划已付诸实施。除了打击社会与民主权利之外，还打击公共劳务这一概念本身；公共劳务的质量在下降。已经实现的投资不是用来发展国家和地区的活动，而是越来越满足多国集团的利益及其在一个扩大的欧洲范围内的振兴。中小用户的购买价格提高，设施和活动费用越来越多地由地区和地方行政单位负担。

这一政策的各种作用加剧着不平等。成百万法国和外籍男女劳动者、成百万的家庭、青年和老年人不能保持在今天法国的条件下生活的最低水平。工人阶级和人民阶层的一部分被忽视，被排斥在劳动生活之外，靠救济度日。这对多数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是有消极影响的。我们考虑了这些情况才提到一种现代的贫困，一种不是一八五〇年式的贫困，但确是目前危机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大资本政策的一个手段。这种贫困成了全面危机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形势证实和肯定了我们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以及我们从中得出的政治结论。

伴随着紧缩、失业、对劳动者的超额剥削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利润的增加。这些利润不是用来投资于国民经济，而是流往国外，助长投机或维持豪富们极其奢侈的生活。

这种混乱严重地影响着国家的全部活动。

法国拥有多样化的工业经济，但今天它却在损毁整个钢铁、造船、纺织、制鞋、机床、造纸、印刷、国家商船航运等行业；阻碍飞机制造或农业食品业的发展；取消煤、铁矿等国家重要资源的开发；放弃在生产设备，电子技术、专业计算机技术的主要部门中的独立；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损害国内的需求来致力于通讯、运输设备，原子能方面的出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人数在四年内减少了五十万人。

农业本是法国的一张主牌，但法国家庭经营者的收入已经连续五年下降，农业生产力的更新停滞。法国正在牺牲海洋渔业及其附属业。它有可能在粮食方面变得依赖外国。

法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潜力，但现在则在一些关键领域中落后了，在技术上依赖外国，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退步了。在孔多塞特、让·马塞、朗之万和瓦隆的故乡，教育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政权竭力使之服从于资方要求的人们和深造教育，职业培训仍远不能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培养人和公民的基本教育变得贫乏；科学技术学科仍被忽视；退步的现象出现了。体育被废弃。文化遭到破坏，被当作一种奢侈品或商品。一种不可容忍的压力企图把美国的模式强加给我国。

危机的所有因素都在对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出生率今天已达不到法国人口的更新率。法国人口的老化将会危险地影响民族长远的未来。

在海外省和海外领地，殖民主义类型的一套东西盛行，贫困和失业大量打击着那里的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已经弱小的经济

力量还在恶化。许多人被迫离开故乡，而在他乡常常也是失业。这些人民的基本自由遭到非难，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遭到拒绝。

(二) 腐 败 化

大资本及其政权越是加深法国的危机，也就越要在外国寻找出路。它们把欧洲和大西洋一体化，把使法国依附于美国和联邦德国作为其战略的决定性方针。

在经济方面，以法国为基础的多国公司把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国外，而外国公司的控制却伸展到我国经济的许多部门——有时是关键性的。公共部门被抛弃或被用来为这些公司服务。尖端活动的发展取决于外国多国公司的同意。

由于政府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时多方制造障碍和实行歧视，所以使法国逐渐落在其西方伙伴的后面。

在货币和财政方面，“欧洲货币基金组织”导致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马克区，并使联邦德国利用由此而来的权力和施加压力的极大手段，而起到欧洲银行家的作用。法国因此让出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货币主权。

在防务方面，法国重又回到了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集团。吉斯卡尔政权发展了法国军队同这一军事集团的联系和活动。同时，政府也参加了法国军备欧洲化的进程，它是取消我军务的民族特点和建立一支欧洲军队的真正陷阱。这样一种前景对我国、对和平都是可怕的，因为它将使德国染指核武器，并且进一步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政治方面，吉斯卡尔政权参与、提出了意味着恢复大西洋主义的创议，其标志就是定期举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会议”。

人民对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迫使

吉斯卡尔政权发表了一些意向声明和使我国参加了日内瓦裁军会议。然而，该政权至今非但没有采取任何致力于减少世界军火生产的具体的主动行动，反而坚持把法国变成军备竞赛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坚持发展军火贸易，致使我国成为按人口计算的头号军火出口国，这特别是为了支持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政权。

在世界一些地区，特别是在非洲，法国为大西洋集团政策打先锋，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干涉。

这一政策的危害性在欧洲最为明显。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吉斯卡尔政权加强了它同联邦德国的特殊联盟，从而把法国变成了德帝国主义在欧洲称霸的垫脚石。它成为超国家一体化最狂热的活动者。从一九七四年起，它就不断地提出通过扩大欧洲机构的权力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建议。它已经不再使人在各种国际谈判中听到法国的声音。它参与了在布鲁塞尔采取的损害我国农业利益的措施。有关我国经济的一些整个部门、如钢铁、造船、纺织或化工的一些重大决定是在外国做出的。

把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扩大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计划，正是这一方针的组成部分，它将加剧共同体的所有消极因素。

它将使我国农业和工业的困难显著恶化，一些部门甚至受到取消的威胁；它将加剧地区性危机。总的看来，这一扩大将使多国公司能够利用工资、社会福利方面的不平衡来加强其紧缩、失业和振兴政策。

它所包含的政治打算也同样是严重的。反动势力和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已从中看到了向欧洲一体化的方向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机会，特别是在共同体机构内用多数表决取代一致通过的原则，这样一来，外国就可能对法国发号施令了。

（三）主要的政治目标

在当代的条件下，获得足够广泛的人民赞同，比以往任何时候

候都是任何政策得以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更是如此。因此，这就成了政府在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来维持资本统治的一个基本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使用了许多强有力手段。

在企业中，大雇主们在有时是新的形式下企图在对劳动者的超额剥削中取得他们的合作。他们试图把一些被迫采取的措施——这是他们考虑到工资收入者渴望参加管理以及这方面的经济需要而采取的——引到这个方向来。他们为此拿出了大笔款项和提供了许多干部。但同时，资方和政府却在加强对工人和工会的镇压，制造更多的惩罚，给劳动者建立黑档案，把劳动者束缚在单纯地干活的地位，千方百计嫁罪于劳动者，践踏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劳动者每天工作八小时，没有权利行使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

在国内，吉斯卡尔政权侈谈“自由主义”。但是，它却领导着限制民主权利与自由的系统的活动，这一活动在最近一个时期得到了特别严重的发展。吉斯卡尔政权向法国人民通过伟大斗争获得的一切个人与公共自由进攻；它蚕食着、减少着这些自由，降低着其水平。它大量公开或隐蔽地侵犯个人自由。它对那些鼓吹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人表现出好感。它打击罢工权，打击诸如张贴权等各种形式的言论自由，打击示威游行的权利，有时它为此而求助于由它操纵的一些集团的挑衅。它鼓励发展类似于在联邦德国和欧洲机构实行的就业禁止的行政手段。它力图降低议会的威信，限制其职权，强迫议会接受不可容忍的运转条件。它拒绝给地区以必要的民主权力，使全省的生活服从省长；使市镇处于受托管的地位，并试图用专制和技术官僚的方式来协调市镇的活动。它力图把电子计算机技术变成监督和约束手段，对已沦为操纵舆论的工具的重要新闻手段进行严格控制。

吉斯卡尔政权也侈谈国家的团结，与此同时，它却通过对一

部分人给以特权、对另一部分人数众多的人搞紧缩、失业的政策来分裂国家。它利用危机造成的不同后果，一直企图使收入最少的劳动者和其它工资收入者对立，使失业者和有工作的劳动者对立，使工人和政治上被要求顺从的干部对立，使法国劳动者和外籍工人对立，使城市工资收入者和农村劳动者对立。

这一切努力在政治领域内也反映出来。大资产阶级为保证——如它所希望的那样——其适应危机的政策更广泛、更迅速地得以实施，就需要有一个更可靠、更稳固、拥有更广泛政治基础的政权。它憧憬联邦德国或英国的做法，即右翼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而又不改变符合大资本观点的政策方向。这就是鼓吹西德模式的根本原因。

在法国，要实现这种前景，就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执行资本势力反社会、反民族的政策时，得到社会党的支持。这就是吉斯卡尔·德斯坦自一九七四年起公开宣称的主要政治目标。这就是反对共同纲领和该纲领所提出的反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以及反对以共同纲领为中心的团结的一切努力的原因。这就是共和国总统在“合理共居”的口号下所采取的各种主动行动的真正目的。

社会党的政策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社会党重又把自己的政策引向右转，从而为上述的前景打开了大门，参与了为实现这一前景创造条件。从一九七四年起，它就对开展反对紧缩政策的行动犹豫不决，并对吉斯卡尔的“拉拢”一再迎合。从一九七五年起，它就明显地接近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从而重新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和承担更多的责任。它这样就顺应了外部的迫切要求，外部要求之所以迫切，主要是因为法国斗争之所系具有重大的全国的和国际的意义。一九七七年市政选举的竞选联盟协议，完全依靠共产党人的

团结愿望和坚持才得以签订和广泛执行。而社会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包括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内，顽固拒绝在他们的城市里实行这一协议。一九七六年底，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社会党领导人越来越明确地发表背离共同承担的基本义务的言论，开始对共产党使用最后通牒和专横的语言，表明要将自己的霸权强加给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作为参政的一种辅助力量，同时却保留社会党的行动自由。他们伙同左翼激进运动的领导人，给落实共同纲领的谈判的正常进行设置了许多障碍，直至单方面中断了谈判。

其实，他们早已决定毁掉左翼联盟，抛弃在他们看来已成枷锁的共同纲领。实际上，这一纲领所包含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它为维护法国的（包括在防务方面的）独立和主权而提出的保证，完全与他们的党早已支持的——特别是在社会党国际内支持的——欧洲和大西洋一体化的政策背道而驰。社会党因而使左翼在选举中失败，它对此负有全部责任。

一九七八年三月以来，社会党继续推行这一灾难性的方针。它宣布共同纲领已“失效”，并且宣称“不存在重新制订的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显示出同吉斯卡尔政权有许多共同点。它为欧洲一体化以及扩大共同市场出了一份力，从而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它支持由资本势力所决定的紧缩、失业以及抛弃地区和国家的政策。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省议会选举中，由于社会党采取的方针和主动行动，它没有很好地把票让给共产党候选人，所以使几十个右派候选人当选。它继承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衣钵，内部也出现了其目的不在于否定它向右转的方针、而仅仅涉及实行这一方针的方法的个人争吵和策略矛盾。

根据社会民主党的同一传统，社会党领导人在从事右的实践的同时，也不惜使用左的言论。这种两面手法反映了他们害怕舆论日益广泛地意识到：共产党仍然忠于其义务，而且是目前坚持

不懈进行反对金融巨头及其政策的唯一政党。

对于吉斯卡尔的势力以及社会党来说，整个问题就在于此。共产党的存在、影响和活动成为它们为共同执行资本政策而谋求互相接近的主要障碍。所以这二者都把削弱共产党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它们开展了一个反共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封锁和败坏二十二大向全国提出的大胆和创新的民主政策及前景。

资本势力及其政权使法国所走的道路不能给危机找到出路和解决国家的严重问题。这条道路给今天带来严重的后果，给明天带来危险。

当然，以法国为基础的大资本丝毫没有放弃维护自己的地盘，相反，它想要保护它在法国和在全世界的地盘。但是这个目标今天却完全违背法国的利益和需要。

劳动者经历数十年的失业和牺牲；国家的经济被削弱；一些地区被破坏；当前的社会是一个动荡的、被分裂的社会，在那里，存在着强加给劳动者的德国式的劳资合作，也存在着暴力和绝望的行动；青年人的朝气受到打击；四分五裂，成为附庸和依赖于人的法国变成了美德帝国的一个省，这就是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和赞同这一前景的政治力量为我们准备的二〇〇〇年。

这是法国走向没落的道路。

二、 法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

为了切实并持续地改善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使国家摆脱危机，为了真正的变革，必须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以粉碎资本对经济和国家以及整个国民生活的独裁统治。必须进行社会改革，使民主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必须创

建一个新型的共和国。

走向本身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法国共产党二十二大向全国提出的前景和根本抉择。

客观的一切要求我们重申这一抉择。

（一）民主的、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

法国需要一种社会民主。使每一个人的日益丰富多采的不同个性在新的团结中得到发展，应该成为现代经济和现代民族的奋斗目标和推动力。这种发展首先就要求进行反对紧缩政策和失业、反对贫困、反对不平等的斗争。

法国需要一种经济民主。法国应该实行由劳动者、用户、公民们、并为他们的利益设想、指导和监督的新发展方式。这种控制要求把大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变为社会所有。这需要有一批足够数量的民主的国有化企业，同社会所有制其它形式，以及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部门同时并存。

法国需要一种政治民主。工人阶级在其中起政治领导作用的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应当尊重并使人尊重多数人的抉择。这个政权将保证神圣的人权、空前扩大的自由、尊重多党制和轮流执政的可能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国家领导机构方面进行这些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但还不够。由于标志着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剥削和压迫长期而深刻地渗透到整个社会关系、思想、习惯和文化之中，以致在所有制和国家政权改革后，这些东西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有可能重新产生存在于这样一种社会的等级和行为，在这个社会中少数人领导一切，而劳动大众的作用仅限于贯彻执行。这一新的经济基础本身仍带有它赖以产生的旧社会的一些特点。

我们为之努力的社会改革不会是用一些官僚代替另一些官

像，用一些技术治国论者代替另一些技术治国论者。这种社会改革也不会导致由一种集中和专断的机构代替另一种集中和专断的机构；由一种思想禁锢代替另一种思想禁锢。^❸

因此，在进行所有制和国家政权改革的同时，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来改变社会关系。应该在一切领域里、各种水平上，利用已有的或独创的各种可能形式从唯命是从过渡到参与决策，从受人指挥变为主动。在企业里，应该用劳动者创建的新生活取代独断专行。应该向市镇的自治管理发展，让地区政权有职有权。应该把高高在上、由行遥控的、为少数人效劳的政府，过渡到由劳动者、公民自己对整个社会进行日益广泛的管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实行自治管理和彻底的民主，将为每个人和所有的人开辟更为不容置疑的可能性。法国所需要的、我们想建立的自治管理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如此。

（二）我们这种抉择的理由

我们这种抉择是雄心勃勃的，但不是武断的。

这种抉择是对法国社会的客观需要的适时的、符合民心的、现实主义的答案，是解除危机的唯一道路。它考虑到了劳动者和人民的切身要求。

我们的抉择从我们的人道主义和解放的理想中汲取力量。我们不主张在书本中寻找现成的公式，以便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但我们忠于鼓舞我们战斗的信念：改变生活，建立一个福利的、正义的、博爱的社会，建立沉浸在自由之中的、并由自由保证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抉择是民族的抉择。法兰西民族具有为它的人民所珍惜的悠久历史、传统、自由和生活方式。我们坚持这一成果，并愿意继承下去，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成果来自富于斗争的历史，而且因为它为今天和未来蕴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潜

力。

我们的民族为实现有利于满足法国人民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政治力量对比提供了最有利的环境。我国人民对独立的热爱和它的爱国主义，构成团结的宝贵基础和革新力量。

法国的生产力是根据本身的协调而构成的，它具有民族特点。法国的生产力构成一个独特的整体，既包括资产阶级政策造成的弱点，也有未被发掘的发展潜力。法国只有维护自己的主权并保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才能最好地为国际合作做出贡献，并从这种国际合作中汲取必要的手段促进本国的发展。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尊重各民族的差异和利益，才能发展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最现代化的生产力，而不是靠集中和只是服从多国公司的力量与利润意志的一体化。

人类将在相互声援又保持差异中进展和富裕起来；差异是指精神生活、流派、要求、情感或思想以及构成文化的一切东西的不同。

我们认为，未来不属于统一规格的、官僚化的、划一的集团。法国社会不能通过在西德控制下拼凑的西欧内，实现美国化来寻找幸福和自由的道路，而应通过确保其主权（既不能放弃、也不能限制），保持其特性。

我们的抉择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它考虑到我们从国际经验的各方面得到的教益。

社会主义已经在实现，它必将以十分多样化的形式得到更进一步的实现。

社会主义是根据一般特点和经过实践检验或修正过的规律建立起来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带有各种各样的面貌，因为社会主义是由人建立的，是由几个世纪培养出来的人民建立的，而这些人民都是在各自国家的特殊条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中行动的。正如标志人类发展的所有大的社会类型一样，社会主义也是

为了具体回答各个国家的具体需要而必然产生并壮大发展的。

从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得出了两个不可分割的结论。

首先，我们坚决摈弃了把来自外国的模式照搬到法国、或者采取同外国的东西完全相反的立场——这是一回事——的教条思想。我们的抉择是独特的，因为法国过去的历史情况和今天的现实情况，都是独特的。法国一定要搞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不搞。

其次，我们过去摈弃、现在仍然摈弃另一种教条思想，即：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不存在社会主义，借口是那里的社会主义同我们为法国设想的社会主义形式不一样。

（三）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

社会主义是存在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当俄国工人和农民在本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了政权、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时，社会主义就跨进了历史。继苏联之后，其他一些国家也经历了这一决定性的变革。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在有限的但又负有重大使命的历史时期内，根据各自在开始及后来所处的条件，完成了足以证明新制度存在及其优越性的事业。它们建立这种新制度是为了解决本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对有关国家和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所做的贡献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结总的来讲是积极的。

无论是这种观察，还是承认社会主义应有不同形式，都不意味着我们对人们常叫的“斯大林主义”一笔勾销。斯大林领导时期，在苏联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党和国家的领导是个人专断，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泛滥，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上，还是贯彻共产党之间应有的关系准则方面，都有严重错误。斯大林一死，苏联共产党就致力于结束这些错误和罪行，并在一九五六年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此进行了揭露。过去的一些做法和缺陷今天依然存

在。不仅如此，在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严重在于长期低估社会主义应有的普遍民主要求。因为，如果说每个国家的人民固然在按照并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那么，一切社会结构和所有社会关系的逐步民主化就成了社会主义的普遍必要的组成部分。

对待这些重大问题，法国共产党的立场是毫不含糊、始终如一的。我们曾宣布坚决谴责“斯大林主义”，因为它所代表的观点和实践同我们的理想和政策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根据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得出了跟我们有关的基本教训：我们为法国制订了一条实现本身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我们为发展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新概念和新实践做出贡献；我们竭力发扬我们的理论的创造性并不断改善党的民主生活，我们用下述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随时注意反对动辄用专断独行代替说服和政治斗争的民主方法的企图。我们重申二十二大的有效性，就是明确重申作为二十二大组成部分的一切根本方针的有效性。

忠于这条坚定的路线就要求我们继续进行思考，以便通过思考为我们自己的战斗得出一切教益。这要求我们把公开表示不赞成侵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或创作自由的措施，看作是我们的义务和权利；我们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事就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因为对我们来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同意让非正义的、毫无道理的行为来玷污共产主义理想。我们这样做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恰好相反，我们要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和根据我们应负的责任，帮助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忠于二十二大路线，使我们拒绝任何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决裂和闭关自守的思想。

我们的抉择考虑到国际声援的必要性。

阶级斗争既是本国的又是世界性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缓和与和平共处的进展是法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基础之

一，是它的主牌之一。忘记这一点，就等于自杀。

(四) 必要的国际主义声援

因此，我们申明要声援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与和平、争取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

我们声援那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被人民置于领导岗位的共产党，支持它们争取和平、裁军、和平共处、尊重各民族自决权的斗争。

我们声援正在为反对执政的剥削阶级而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这些剥削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它们的努力，以便把危机的恶果转嫁给劳动者和各国人民。我们很重视下述事实：我们同其中一些党在认为有必要提出用民主发展为其指导路线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人们所说的欧洲共产主义作为解决危机的途径这一点上，有相同的或近似的观点。

我们声援那些往往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本国的独立和发展而斗争的共产党。

我们为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关系而斗争。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各党的独立、平等、不干涉。不再有运动的中心。我们认为，不应该有中心，不管什么样的中心。独立并不反对国际主义的声援，而是它的组成部分。同样，我们也不会掩饰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分歧，应该正视这些分歧，如有必要，讨论这些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丝毫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同所有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必要性的理由。我们准备同其中任何一个党为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

声援不能局限于共产党之间。世界的一切力量，正在很不相同的情况下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自由、独立、和平的斗争，它们都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积极声援。我们尤其注意加强对领导着本国人民为独立、社会正义和发展而斗争的

民族民主政党及运动的声援（同时尊重各自的个性）。我们愿意促进我们的战斗和它们的战斗更好地协调起来，以便建立更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我们如此关切这一点，因为这种作法在我们看来是符合我国的愿望的。

尤其是在欧洲范围内，我们正在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建立和发展接触。如有可能，采取共同行动，以便实现符合我们欧洲人民切实利益的目标。我们重申这一立场，尽管目前这些党中的多数党的行为对这种接近并不是有利的。

根据同样的思想，我们愿意继续努力寻求同天主教人民群众的代表力量建立积极合作的基础。

一条民主和革命的道路

为了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愿意走一条本身也是民主的道路。目的和手段是协调一致的。

二十二大抛弃了那种认为社会改革似乎是“少数办事有成效的人”的事业的观点，也抛弃了认为需要有一个专断的集中的预备阶段的思想。二十二大决定在其目标中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不符合适宜于我国的道路和目标。

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建立在工人阶级、整个劳动人民和全民族的普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是这一斗争的灵魂。

（一）斗争的道路

在当代法国，民主的每一进展只能来自资本的一次被追后退，并成为迫使它进一步后退的立足点。夺取、维护和发展每个权利、每项自由和民主利益，对资产阶级来讲，就是减少了一个特权，减少了一件武器；对劳动者来说是增加了一个地盘，增加了一个手段。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提出的民主，招致一切大资本

势力的反对，它既是变革的目的，也是变革的手段；民主已成为阶级斗争的焦点和主要阵地。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道路也就是斗争的道路，即除了内外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正如我们在二十二大上所指出的，“这是一系列顽强的斗争，是为了进一步改变社会政治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劳动者和一切人民阶层的群众斗争”。

在这条道路上胜利前进，就要求存在并发展一个强大的多数人民的运动，这一运动在以改革目标为中心的行动中，集结一切深受资本之害的社会力量和赞同这些目标的组织和政党。这一运动在每个斗争阶段和普选中都表现出来，它将使普选的结果得到尊重。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有影响的、有战斗性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先锋队党。这个党，就是法国共产党。

一九七二年以来，法国人民的实践能够否定二十二大的根本方针吗？我们认为正好相反，实践证实了这些方针的有效性，表明了一切共产党人估量这些方针的全部意义并为自己的政治实践而从中得出一切结论的必要性。

这种实践实际上表明了什么呢？

（二）共同纲领的经验

一九七二年我们同社会党签订了共同纲领，我们曾为这个纲领而奋斗了十几年。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协定不能解决民主变革斗争的一切问题，甚至会提出新问题。我们当时知道：社会党不是我们的党；它的战略也不是我们的战略。

社会党的整个历史表明，它一贯倾向于同资产阶级搞阶级合作。从不介入西班牙到同意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投降，从一九四七年把共产党部长排除政府到粗暴镇压工人罢工和查封《人道报》，从派兵到阿尔及利亚到一九五六六年对苏伊士运河的殖民主义远征，法国社会民主党人都采取了极端反人民、反民

主、违背民族利益的决定。当政的时候，它忠诚地管理了资本的事务。在某些时候，由于革命党——即我们党提出的要求和领导的人民斗争的推动，它的政治实践脱离开这条路线。这就是一九三六年或国家解放时的情况。一九七二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因它在一九六九年总统选举中遭到惨败，加斯东·德费尔只得到百分之五的选票。

但是，当时我们就认为，共同纲领的签订不能改变渗透到社会党内的思潮、领导机构的社会成份，在长期实践中同右派建立的联盟关系，以及从属于社会党国际的受制约的地位，这是同社会党的性质有关的，并在它的历史中表现出来。我们并不愿意签订一项简单的“上层”协议。我们说过，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倍努力使这项协议的内容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事。

然而，社会党领导人同我们建立联盟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加强自己，削弱我们，以便时机一到，使自己处于可以代替右派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地位。这一点后来已得到证实。右派则通过执行“一箭双雕”的政策一直在支持社会党的这种花招。一方面维护了它的政权；另一方面企图削弱共产党在左翼中的地位，以便为联盟的破裂和实现社会民主党的解决办法创造条件。这些一致的努力得到了从共产党和社会党签订的共同纲领存在之日起就发展起来的对社会党的演变及意图的幻想的支持。这些努力还得益于下面这种态度的涣散作用，这就是指望从一种上层联盟（认为仅仅这种联盟就够了）得到一切，把问题的解决推到选举以后。要充分理解这些幻想和行为的出现及持续的存在，必须考虑到危机提出的问题，以及为给危机找到积极的出路而在深刻的民主改革的目标下实现联盟的必要性，必须考虑到使所有向往变革的人认识到变革应具备的条件的困难。所有这些情况说明，尽管我们做了努力，但是未能保住联盟，未能使共同纲领成功，也未能阻止

社会党利用左翼内部有利于它的不平衡离开共同协议，直至破裂。

社会党的行为造成了新的局面。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但从这一点上还不能认为有理由放弃我党二十二大的路线。相反，我们认为，只有发挥一切潜力，扩大和充实三年前我们所确定的新方向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我们才能够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答案。

（三）建立联盟

我们重申，为了进行不断深入直至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革，建立一切人民力量的联盟和法国人民联盟，现在是、今后仍然是我们的路线。这个抉择是不可逆转的。正是根据这一抉择，我们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建立一种新的更加牢固、更加持久、更加名副其实的联盟。

经验表明，联盟要建立起来，必须一直给予基层的联盟、即劳动者自己、人民群众自己在行动中的联盟的优先地位。联盟要经得起考验，必须在社会各阶层反对资本政策的多种多样的斗争中建立。联盟应该表现在广泛的强大的人民运动之中，这一运动在每个阶段把这些阶层为自身利益进行的不同斗争，统一到具体的明确的民主改革目标上来，以适应他们的共同需要和国家需要。联盟应该不断地把公开的民主辩论和具体行动结合起来，以便劳动者和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判明真理，并知道为什么而参与活动。

我们这样说，并非在情况好转以前提出一种凑合的办法。恰恰相反，我们提出的是最迅速、最可靠的途径，是最有效的途径。实际上，正是在日常活动，和这种活动带来的各种民主成果以及有利于劳动者的力量对比变化之中，联盟的条件，必要的变革以及这些变革需要的选举胜利的条件才能逐步形成。从实践中得出的教训是，以此来建立社会斗争和选举斗争之间应存在的联

系、而又不把两种斗争混淆起来，是有决定意义的。在法国，民主的进展不可能靠“伟大的傍晚”，即使是选举的傍晚来取得。只有在不断的激烈的斗争中——其形式与速度不能从上面一下规定下来并强迫实行——才能解决实现和维护人民联盟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是能够使由于危机而显示出的联合的可能性取得成果、使得在危机中导致联盟遇到困难和不稳定的障碍得以克服的唯一道路。

有必要结成联盟的各社会阶层由于其性质、处境、需要和愿望的不同而各异。由于它们的多样性，是不无矛盾的。危机加剧着其中的某些矛盾。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些矛盾。实现联盟，就要求摒弃任何简单化的看法，在行动时要考虑到可能性和任务的各种困难。

我们党决定作出新的努力，研究今日之法国的各社会阶级，这无疑将有助于上述看法和行动。

（四）应该联合起来的一些不同的社会阶层

联盟必须首先表达工人阶级的利益。它应该使这一阶级在最迫切的权利要求方面得到满足，应该使这一阶级在各级做决定和领导方面担负起属于它的那份责任。因为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它代表着现代经济的活跃力量。因为它的权利要求的满足是解决国家各种问题的一把钥匙。因为由于它受到最直接和最残酷的剥削，它最关心改变。因为它积累了丰富的斗争和组织经验，站在反资本战斗的最前列。它能够实现本身的团结，也能够把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

这种深刻的一致、这一基本利益的共同财富没有阻止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中存在的一切差别和差异进行投机。另外，工人阶级的成份也发生着变化。例如，一个人数特别多的阶层——技术人员阶层在最近几年形成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权利要求越

来越同工人阶级的处境和总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以及一些职员和某些管生产的工程师，今天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一使工人阶级得到扩大的变化同时也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而老板力图把这些问题变为冲突。

我们在利用一切积极变化的可能性的同时，同全体男女劳动者——他们在企业中每天共同生产着巨大的财富，共同受剥削——一起寻求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和疑问的具体答案。我们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参加企业和国家管理的能力以及构成他们的生活和利益的一致性的一切东西。

职员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他们的集中使他们接近工人阶级。虽然他们还没有工人阶级的经验，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受到资本主义剥削，但是他们同工人阶级一样，关心社会变革。他们越来越多地参加斗争。为帮助他们认识到这种利益相互关联的情况，帮助他们同所有其他劳动者一道发展自己的斗争，需要进行顽强的工作。

在企业中，由于工程师和干部的利益同工人阶级利益的客观一致性，可以广泛地进行工作。这种一致性在工程师和干部参加斗争时表现出来，同时，也提出一些新问题。因此，帮助他们克服对老板拉拢他们的企图所表现出的软弱性，解除他们对工人取得新的权利会损害其处境的担心，是重要的。

联盟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农民问题。同全体农村人口一道，农民受到收缩国内消费、砍掉一大部分民族农业、在共同市场内屈从于外国法律的政策的后果之影响。合作的进展——我们维护合作的成果，反对损害合作——推进了农民之间的互助和团结。他们对民族独立的热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构成他们同工人阶级联盟的决定性基础。但是，他们仍然还有一些疑虑。我们同他们一道为他们的利益斗争，使他们看清社会主义将使法国具有建立在家庭农业经营基础之上的现代农业的理由，这样，我们就将克服

这些疑虑。

如同对于工程师和干部一样，危机从它的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危害着全体知识分子。今天，在生活与工作条件方面和就业方面，危机沉重打击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迫使他们通过斗争维护自己各种不同的权利要求，参加民主斗争。男女教师、大学师生和研究人员强烈感到教育和研究危机。医生、律师、建筑师、城市规划人员在进行职业活动的过程中，看到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文艺生活中的创作人员、业余的、专业的人员体会到文化危机。法官、军队和警察的干部、高级公务员看到国家机器的危机、集权主义、专横武断、以及放弃民族性——这是政权政策的特点。在这些不同的阶层中，产生着要求根据当代的个人与社会需要来改变他们的工作的愿望。然而，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接近不会自发地进行，这一接近会碰到一些或大或小的障碍。这些障碍来自他们的不同处境，来自资产阶级为把他们控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使他们为自己的政策服务而进行的活动。争取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这是一个首要问题，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同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处境和愿望的新的看法相联系的。

陷入危机的手工业者、中小工商企业的处境则提供了最广泛的联盟提出的问题的另外一些例子。

这些可能性和这些困难证实我们关于联盟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这并不是一些不满分子的杂乱结合，把一些相互之间有距离的、甚至是相对立的权利要求无原则地相加。而是一场为了把大资本的所有受害者联合起来、反对统治国家的一小撮人、争取民主变革的复杂战斗。

同工人阶级的联盟丝毫不意味着其他社会阶层牺牲自己的特点、利益及未来的前景。相反，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可以在这一联盟中找到自己愿望的答案。它们的多样性应该丰富联盟。同

时，应该做到这些阶层中的每一个阶层要考虑运动的总利益，应该使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和责任中的位子得到承认。

（五）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

联盟必将把多种思想、意见、信仰、哲学流派组织在一起，从而反映法国人民生动的现实。这种多样性必然会提出许多问题，但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财富和一种推动力。

我们特别重视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话和共同行动。世界和法国出现的变化、对过去和现在的思考、人民斗争的经验不仅仅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思想。这些现实也以自己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天主教界。

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想使他们的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地表达出来。我们反对贫困与不平等、争取社会正义和博爱、争取民主与自治管理、争取和平与国际友谊、争取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斗争同他们的愿望相吻合。天主教徒由于他们自己的信仰主张尊重人格和人的尊严，而这正是我们以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加以维护的。

我们认为，我们从二十二大以来进行的思考和接近天主教徒的努力是积极的。我们不掩饰存在着对危机的性质和对解决危机的办法的幻想，不掩饰宗教界的某些阶层竭力在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设置的障碍，然而我们决心继续行动，以便使双方的会晤具有新的规模。

根据同一思想，继续努力克服仍在妨碍着实行我们关于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观点的某些反宗教残余，是重要的。

（六）对人民运动的新贡献

在行动中实现的广泛的联盟应该不仅从维护自己利益的各被压迫社会阶层所开展的斗争中得到丰富，而且还从包含着新的共

同愿望的大规模运动中得到丰富。

妇 女

在这一方面，最近几年最突出的事实是，妇女广泛地、具有战斗性地参加到人民斗争中来。

女工、女职员、女知识分子、女农民或无职业活动的妇女在属于她们各自的社会阶层的愿望之外，表示出下列意愿：结束一切歧视和压迫、在一切方面取得真正的平等、使她们的人格得到承认。这是一个真正的向前发展的妇女运动。

然而，这一运动的发展不是没有矛盾的。妇女不是一个清一色的社会阶层。不是每一个妇女都看清了妇女解放的手段，并且存在着向她们掩盖这些手段的企图。

争取每一个妇女参加争取民主变革、走向社会主义的斗争，使这一斗争越来越好地从妇女要求平等、自由的愿望中得到丰富，这就是我们行动的意义。

青 年

青年的斗争是伟大变革力量的又一支力量。

当前的形势在年轻的一代中引起一个强有力的谴责资本主义旧制度的运动，使他们产生一种要求变革的日益强烈的愿望，青年人越来越经常地把变革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同时，危机产生的一切混乱、政权发动的运动使一些青年人在个人的解决办法中或在无成果的行为中寻求解决他们处境的一种不可能的或绝望的出路。因此，争取多数青年参加民主和革命斗争，使他们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就要求帮助他们赋予他们变革的愿望以阶级内容，要求坚定地反对危机在青年中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一努力之所以重要，特别是因为随着青年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占有的分量，没有青年的贡献，没有他们的战斗性、主动精神、创新力量的贡献，就不可能有决定性的民主进展。

在本地生活、工作和参与决定

要求在本地生活、工作和参与决定、要求保持和丰富本地区特点的愿望，最近时期以越来越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共产党人参加这些运动，深信法兰西民族一定能实现其内部各地区的繁荣，使它们富有活力，多样化，有民主，有主宰其范围内出现的一切问题的自主权。所有那些现在是和愿意成为法国人、同时是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阿尔萨斯人、布尔戈涅人或沃克西坦人的人在同一斗争中的汇合，简言之，所有那些愿意在民族统一的范畴内肯定他们地区的特性、并且通过确保地区的前途来确保自己前途的人的汇合，可以成为争取进步和民主的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联合爱国者

德斯坦的使法国没落的政策，使一切热爱独立、安全、国家主权的人，即爱国者（他们在法国是不可胜数的）忧虑不安。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分歧和对立，从而使他们的相互接近成为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但是，法兰西民族面临的问题是那样急迫，以致使人们感到把大家的努力汇合在一起是必要的。我们愿为这种汇合作出贡献。这种联合在将来可以成为联盟的最广泛的表现，而法国需要这种联盟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并且在世界上发挥一种与其国力相称的作用。

（七）工会、组织和结社生活的重要性

许多劳动者、公民参加工会组织和各种各样的家庭、社会、妇女、文化、体育运动或其他运动，从而由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组织和运动是法国多党制民主生活的传统特点之一，是千百万人围绕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自主的干预的基本手段之一。尽管遇到种种障碍，结社生活有了新的表现。共产党议员促进所有这些活动的自由发展，支持鼓动这些活动的人参与各级的抉择和决定；他们寻求坦率和忠诚的对话、合作。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

主义将保障结社活动、工会活动和各种运动的存在和自由发展。法国共产党把它同这些运动和组织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独立、各自的宗旨、和自由发表看法与批评的基础之上。它准备本着这种精神，同所有愿意这样做的工会、组织和协会开展对整个人民运动富有成果的会晤、探讨，发展一致点。

（八）同社会党的联盟

正是通过这种做法，将找到解决共产党同那些宣称赞同民主变革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同社会党的结盟所引起的问题的办法。

这种联盟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国各种政党的存在——无论是在多数派内还是在反对派内——现在以及将来在我们所希望建立的社会中，都是国家民主生活的一个特点。这种联盟是各人民力量联盟的政治体现，是以各人民力量联盟为基础的；反过来，它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各人民力量联盟的推动力量。我们今天和明天都需要这一联盟。我们的建议没有改变，这就是一个明确的、强大的、持久的、以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愿望和需要的改革目标为中心的、平等和正直的左翼联盟。

怎样同一个保持原貌的社会党——而且我们也不把要求它变成我们这样的革命党作为先决条件——结成这样一种联盟呢？

经验有力地表明，这个问题所提出的难题，只有在人民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只有在人民运动的发展中，在劳动者赢得新地盘的过程中，在由此而产生的现状和思想的改变中，才能创造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更加广泛和更加持久的接近的条件。

这就要求在斗争的发展中，反对使用左派语言进行右派活动的政客游戏，明确双方的一致点和分歧，支持而不是阻止劳动者的行动，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形式下达成必要的政治协议。我们党必将本着这种精神，在适宜的时候，根据人民运动的发展情况采取主动行动，以使人民运动通过各政治组织在行动中

适当的联盟形式表现出来。

上述的政治协定，只有在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决定意义的基层行动中才能形成。这种努力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已经进行。

人民运动表现为许多富有战斗性的社会斗争。它们起因于劳动人民对德斯坦政策的严重后果的不满和愤怒，它们反映了前一时期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许许多多的劳动者从围绕共同纲领的斗争和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人民斗争的发展中认识到，他们是一支伟大的力量，民主的解决方法是可能的，应该为实现这些方法而采取行动。对梦想使劳动者驯服，使工会屈服，使共产党削弱的政府和大资产阶级来说，梦想同现实肯定还离得很远。

(九) 斗争目标

从现在开始(不容迟缓)，就要最广泛地开展所有这些争取人民权利和愿望的斗争。要争取可以争取的一切，支持民主在任何一级取得的每一步实际进展，不断注意说明成果的局限性、造成危机的原因以及深刻政治变革的条件和内容。要利用我们掌握的各种渠道、各种材料，在斗争中推进社会各方面的民主化。我们不能事先决定运动是什么样子，决定权利要求的内容和水平以及斗争的形式。我们现在这样做了，还应该更好地这样做：到处都有我们的力量在积极活动，在各个领域致力于一切正义的事业。

更好地生活，改变生活

面对生活条件的恶化，劳动者把下述可能性看作是人的权利：吃得好，有衣穿，健康受到保护，住质量好的房子，使子女受到教育，并给他们一个好的职业，提高文化知识，进行体育活动，旅行、娱乐，保证有一个体面而独立生活的晚年。

我们把反对贫穷、反对一切不平等的斗争置于优先地位，这符合于上述的要求。这一斗争也符合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不提高人民、首先是最贫困者的消费水平，不提高劳动力、首先是受剥削

最深者的劳动力的价值，就不能摆脱危机。不保证每个妇女和每个男子能够没有物质方面的忧虑地组织自己的生活，就不能使法国社会走向民主。

应该通过给收入最少者以最多的东西来提高劳动者和家庭的购买力。应该采取大量的措施，减少收入和报酬的不平等。应该用低收入往高调的办法缩小工资等级。

应该实现税收方面的公平合理。

应该维护并取得新的社会保险，根据当代的要求发展社会保险，扩大它所提供的保护，改革它的收费办法，使它的管理民主化。

面对失业和就业不足，劳动者认为劳动权是一项基本权利。法国经济应当把充分就业作为一项重大的目标。它应当消除失业，大量地提供符合个人要求和国家需要的稳定的职业。

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三十五个小时，而不降低工资；增加工资照付的一年一度的假期，实行五周休假期；把妇女和从事艰苦劳动的劳动者的退休年龄降低为五十五岁，其他工资收入者为六十岁，使他们有权享受到充分的和体面的退休，这对那些越来越渴望支配自己时间的人的幸福、对充分就业的实现和民主参与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劳动者希望确认自己的人格。他们拒绝被当作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隶属于企业和国家，被限制在由别人指定的工作小圈子里。在这一方面，我们特别支持专业化工人的斗争。

我们同全体劳动者一起，为争取最好的就业而斗争。我们利用一切可能性和一切缺口，为改变劳动的质量和内容而斗争。特别是限制劳动强度和劳动量；限制在最艰苦和最危险的岗位上的工作时间，而不减少工资；除非技术上的需要，不得实行夜间工作；在危险的工作中以及对孕妇和青年，不得实行定额生产；实行五班工作制；逐步减少几班倒的工作。我们为减少在劳动之余

浪费在日常事务、特别是家务、路上、办交涉上面的时间而斗争。

我们的政策也符合外籍居民的需要。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同他们一道，为反对种族主义、争取社会权利的平等、保证个人和集体的自由、维护他们的尊严而斗争。为了共同的利益，必须停止将城市、市区或居民区变成真正的移民区，应该使接待机构分布得更好一些。必须停止种族隔离、蛮横无理的驱逐外籍居民的行动，保证家庭团聚的权利。应该根据国家间的协议控制外籍人的移入，而在目前的危机中，应该加以制止。

我们为个人和集体消费的新形式而斗争，使大家都能使用优质产品和享受高质量的服务。这个要求符合人类的需要，即满足多种多样的需求和发展个人及其自由。同时，也符合同资本主义浪费作斗争的经济的需要。

为了使住房权利对每个人来说都变成现实，坚持国家对社会房建和房客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我们反对压制独立见解和个人的敏感性的强制和死板的制度，为争取开展新的活动而斗争，使每个人能够单独地和集体地得到培训和进行创造，同大自然接触，改变人与人关系的内容、形式和格调，增加成年人之间、以及子女和家长之间的来往。我们为使男女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相互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努力。

我们为使儿童们在法国社会中有充分的地盘而斗争。

我们为争取优质教育而斗争，使每个人能够发展自己的个性，在各个方面为每个人的生活准备条件。我们为使所有人都能受到下述职业培训而斗争：它能授人以真正的技术，使人有最广泛的职业选择，它是为了使人得到一个好职业、使民族得到长期发展而设想的，它有利于每个人的发展。我们为争取一种真正持

久的培训而斗争。我们同男女教师一起为提高他们的地位、为使他们具有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的手段而斗争。

我们有正义感。我们同千百万退休的或受忧恤的法国男女一道，要求提供可使他们过上体面生活的财力，保护他们的健康和安全。我们反对企图孤立他们的一切东西，并为使他们在当代的条件下很好地度过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时期而斗争。我们认为，他们职业活动的停止不应意味着他们参与国家与城市生活的结束。我们同残废者及其家属一起行动，争取足够的收入、受教育权和劳动权、以及尽可能生活在其他人中间的权利。

我们支持抗德老战士和战争受害者的正当要求。

在我们看来，社会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而是一个共同体。我们的斗争要使每个人都能从孤独走向新的团结，使城市居民能够相互接触，共同决定为改变其生活环境、活跃居民区生活所必需的措施。我们要求每个市镇都拥有提供住房、运输、学校、以及公民所需的设备的手段。我们还为下述目的而斗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使警察用于保护人与财产而不是用于镇压民主斗争。

我们认为，并非个人的一切问题都属于政治范畴，我们党既没有解释、也没有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天赋。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我们的责任感，使我们为争取更好的、更自由的生活而斗争，为建立一种基于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每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感的更高尚、更真实的道德而奋斗。

这一斗争回答了深受危机影响的青年所忧虑的问题。它符合他们的主要愿望，以及他们对稳定、安全、新观点、对话和理想的追求。

这一斗争符合妇女解放的意愿。她们反抗历史遗留下来、现在由政府和资方为利润目的而继续保存的歧视和偏见，拒绝继续接受低下的职业、低级别和低工资，拒绝自己的劳动权利被否

定，拒绝被置于下等地位，被看作玩物。她们要求真正的权利平等，尊重她们的人格，实行和改进避孕和自愿流产法，要求改变对她们的看法以及对她们在夫妻和家庭中所分担的任务的看法，要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真正参与各级的决定，从而对打击反动思想和走向更加人道主义的文明起着首要的作用。妇女的斗争是大家的斗争。

更多地生产，以不同的方式生产

要实行社会民主，必须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使经济的抉择不再建立在追逐利润和积累上，而是建立在改善劳动者和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以及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进步的基础之上。即：为了更好地生活和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要更多地生产，以不同的方式生产，部分地说来，生产不同的东西。

这种变化要求增加生产，但也要求在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新条件下实现新的质量。私人资本的财政收益，应逐步地为考虑到劳动者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的社会和国家的新的财政收益所取代。

要生产适应需求的、更加耐用的、更加节约能源和原料的、保障身体和环境安全的财富。

要更加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特别是要改善劳动条件，提高专业训练和技术水平，保证劳动者有参与抉择和决定的可能性。要大力推广科技成果，使之为人类和社会的利益服务。

要实现所有这些必须实现的东西，劳动者就必须捍卫和扩大公共部门。实现决定性部门的国有化，也作为他们斗争的目标。在某些决定性部门，劳动者的斗争正在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在钢铁业和核工业就是如此。

我们为争取从现有的全部潜力出发，发展法国工业力量，使它满足社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而斗争。这特别是指钢铁、化

学、工作母机、电子、电子计算机、飞机制造、造船、海洋运输、农业食品、木材业等部门。要最大限度利用国家资源，保证多样化的能源生产的蓬勃发展。这就要求充分利用传统能源，同时，根据可能的程度，充分利用新能源；这就要求有控制地发展核能源，同时要考虑到安全、技术独立及财政开支的问题。

我们为争取利用法国农业、渔业及林业的一切可能性、为保证国家在粮食方面的独立性、为发展出口、开发所有地区、为保护自然界而斗争，我们要清除任何帝国主义思想，努力为世界反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斗争作出贡献。

我们同农民一起，为改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发展农村的各种活动而斗争。

与盲目的生产主义相反，我们要在充分考虑环境的需要，保护和改善生活质量、发展产品的回收及反污染的技术的同时，为开发并丰富自然界而斗争。

我们为根据国家的就业、活动的扩大和平衡、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在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发展法国的对外贸易而斗争。我们要求在某些部门采取保护措施，以制止任何废弃，支持我们生产机器的现代化。我们为使法国的对外贸易恢复平衡而斗争，法国对美国、联邦德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有大量的赤字。

自由、民主与自治管理

为了改变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就要改变当前的决定和领导体制。应使每个妇女和男子能够作为自由的、负责的公民来进行决定。我们号召劳动者、民主人士有力地反对对个人及集体自由的任何损害。我们反对吉斯卡尔政权和资方侵犯这些自由。我们为丰富这方面的成果而斗争，并要求政权和资方给以新的自由，使劳动者和公民的声音得以倾听，使他们能够行使自己的经济与社会权利、受教育权以及在新闻、文化方面的权利。这样，

我们将可以帮助组成我国人民的男女由他们自己在行动中实现现在我们题为《自由生活》的声明（草案）中提出的自由。

使整个经济生活民主化，通过实行新型的、民主的、自治管理的国有化以及本身就是民主的计划化，使劳动者、公民掌握大的生产和交换工具：这就是当代非常迫切的任务。我们同劳动者一起，为争取更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为争取个人和集体得到各种保障而斗争，为使企业中的劳动者通过建立车间或班组委员会有直接干预的可能而斗争。

在这一运动中，我们还主张按照自治管理的前景，从基层起改建公共机构。法国的民主化要在各市镇、各省和各地区实现，否则就谈不上实现。

地方的生活应完全由市镇负责，而市镇之间的问题则应依靠它们之间的自由合作来解决。省议会必须在管理省的事务中摆脱国家的监护。一个拥有经济主动权、领土管辖权和文化自由的真正的地区政权应使我们国家集体的这个中间一级能够利用全部潜力。地区应该拥有更多的、多样化的资源，同时，这些资源应分布得当，以缩小法国在区域划分上的严重的不平衡。议会的权力应受到尊重并加以扩大，它的运转应得到改进。在各种选举中都应实行比例代表制。建立在真正实行人民主权之上的国家，应通过权力下放和克服官僚主义来解决全国性的问题。我们为使议员有必要的时间和手段来执行自己的职责而斗争。

根据我们的设想，法国应是一个由自治和团结的集体组成的和谐的整体。它要求有一种新的政治生活，要求进行长期的斗争来消除一成不变地把人们划分为领导与被领导、指挥者与劳动者、决策者与实施者。

使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各种新闻手段和交流手段，这正在并将日益构成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我们的全部政策驱使我们为争取一个自由的、多元化的电视广播、为获得新闻自由而斗争。我们

号召劳动者为行使有获得消息的权利而斗争，并把这一斗争做为他们所进行的所有战斗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要通过斗争使电子计算机技术完全为公民和国家服务，使它的使用既不有害于个人与集体的自由，也不有害于民族独立。

法国共产党为承认海外省和领地人民的自决权、即自由决定自己命运和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而斗争。法国共产党要求法国的政策为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作出真正的有效的贡献。

一个主权的、在世界存在并起积极作用的法国

法国共产党认为其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贯彻执行法国的重大国际政策。我们的国家应当在全世界扩大自己的存在和活动，这种存在和活动是符合其使命和可能性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它为解决世界上重大问题做出贡献，同时也可以使它找到满足其人民愿望的必要手段。这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与人结盟，这是在独立基础之上的最广泛的合作，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我们本着这一精神而斗争，使法国参与实现对于全球的平衡和未来至关重要的世界任务：如组织和平、裁军、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反对不发达和消除饥饿的斗争、尊重人和人民的普遍的基本权利。

面对军备竞赛加剧所造成的危险，我们愿对全世界和平力量为保证缓和的持续和扩大、为采取有效的裁军措施而进行的行动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方面，法国有能力起到有影响的作用，保持自己的独立，加强自己的安全。我国为此目的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备忘录包含有一条列具体、和谐和现实主义的建议，这些建议能够对停止军备竞赛和削减军备作出有效的贡献。它们是发展不可缺少的争取和平的斗争的一个有动员力的基础。我们要求吉斯卡尔政权采取具体的、有实质内容的主动行动，揭露仍拒绝批准好几个国际协议的法国政策，参加一切关于裁军的谈判。我们为摆脱和同时取消军事集团而斗争。我们要求

贯彻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全部条款。我们要求巩固和平共处，在我们看来，和平共处不认同维持社会与政治“现状”或同大国对世界的分割混同起来。

我们为使法国在共同市场范围内发展关系而斗争，为使欧洲成为劳动者的、人民的、民主的和摆脱集团的欧洲而行动。我们已经为一个新的欧洲起草了二十条建议，这是我们日常行动的目标，我们要求法国人民和我们一起支持这些目标。

要使法国在欧洲内部的行动有效，就要求它在任何情况下维护其主权所具有的一切手段，保持完全的自主。这就需要有独立的国防。在今天，常规力量不足以保证这一任务的情况下，只有依靠保持核威慑力量，独立的国防才能成为现实。这种独立的国防应该拥有一支建立在兵役制基础上的民主军队。

因此，法国人民必须反对旨在把我们的国家淹没在由资本的代理人所领导的实行紧缩与普遍失业的欧洲的企图，不管这些代理人是右派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法国人民必须坚决拒绝共同市场的扩大，和未来的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大以及任何形式的超国家机构。法国人民必须断然反对任何妄想取消民族性质的防务力量，而建立欧洲军队的企图。这样，法国人民就可以维护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法国共产党就是号召我国人民参加这一伟大的战斗，为法国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开展一个强大的全国性运动。

我们要努力使法国在尊重其盟国的情况下，保持和扩大同所有愿意同它发展关系的工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我们始终认为法国同苏联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是欧洲和平与均衡的一个基本因素。

我们要努力使法国在为建立世界新经济秩序的斗争中把它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它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针。我们为此已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国家能够而且应当在这方面发挥其重要和独特的作用。

二十二大路线指导的党

劳动者和法国需要法国共产党。没有它就不能建设未来。

（一）伟大的、群众性的、进行斗争和有 执政能力的党

经验证明：共产党影响的不力，左翼内部出现的不利于共产党的不平衡和对社会党有利的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鸿沟的加深，使人民力量陷于放弃改革的绝境和失败之中。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其行动与组织能力的加强，在今天是摆脱危机，保证国家民主地走向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

我们是、而且应当更好地成为深入群众之中的斗争的党，从而使我们在日常的斗争中，发挥我们作为启蒙者、鼓动者、组织者和团结者的作用。

完成这项工作绝不是要把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人。我们并不把一个强大的党和一个发号施令的党相混同。我们与劳动者和人民共同行动，以便帮助他们在斗争中建立各种可能的关系、行动及团结形式，我们是通过这一行动来把我们具有领导力量的影响提高到必要的水平，并行使这一影响。

我们是斗争的党，我们现在是并且想越来越好地成为一个有执政能力的党。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准备着完全担负起在各级包括在政府中为劳动者和人民服务的责任。我们也愿意参加管理法国的事务，因为不这样，劳动者就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变革。

（二）一个革命的党

在发展人民运动的伟大战斗中，我们不能在劳动者和国家面前模糊我党的特有面目。正相反，民主道路要求我们保持和发扬我们的革命特性。

我们党与其他一切组织的区别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组织。在法国只有它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导致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的明确观点，只有它具有通过粉碎资本统治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始终不渝的意志，只有它能使自己具有一切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法国共产党的存在与影响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因素。而这一因素是从社会民主党人的投降受到教育、受到十月革命胜利启发的我国革命者一九二〇年做出的选择的结果。

我党在十分复杂的国内环境中所从事的长期活动不是没有错误的。例如，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没有及时从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没有及时制订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这一迟缓确实造成了有害的后果。

但是，如果没有我党的发展，没有党对最初的革命抉择的忠诚，那么，我国人民近六十年来所进行的任何伟大的进步斗争都不会发生和发展，即便那些不是由我们直接发动的斗争也是如此。

没有我们党，没有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者用战斗，探索和牺牲所造就的党，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不可设想的。

（三）我们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由于为贯彻科学社会主义付出了巨大努力，“二十二大”通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和民主道路已经制定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这一理论绝不是一个干瘪枯燥、教条主义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训诫所构成的一个终止的体系。它是唯物和辩证的，对我们说来，它能使思维和行动获得新水平，使人类具有新的能力，在认识和掌握自己生命方面前进，在解放自己的道路上前进。

这一理论，一部分起源于我们民族的哲学与政治潮流。它帮

助人们觉醒，帮助盖得和若莱士的党组织起来，我们的党是他们的党的继承者。这一理论今天已成为法国文化和全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在以批判的态度注意使自己的结论不断地与经验相对照方面做出了榜样。随着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变得更为复杂了。这一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伟大革命家的著作推动了这一发展，而居于革命家前列的是列宁。

理论在发展并将日益发展，这既是由于各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多样化的研究和行动，也是由于杰出人物的贡献。这一理论由于知识和社会经验在各方面的进步所取得的成果而得到丰富。它要求人们不断注意区分新的东西和已不再符合现实的东西。

在最近这个时期，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问题给予了创造性的回答，从而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走民主道路就要求我们全党发展这一生动的研究，要考虑到我们党自身的需要，同时考虑到思想与政治斗争以及与我们的战略及其实施直接关联的理论问题的需要。为从事这一工作，我们党非常需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个人或集体的探索。需要他们的特殊贡献。

走民主道路同时还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提高到当前斗争的水平。这一战斗的目的不仅是要打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且要把新的力量争取到实现变革的斗争中来。这是全党的—项任务，也是需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作出个人贡献的一项任务。

要让所有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政策的制定，参加意识形态斗争，就要求每个党员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并使之不断深化，这就突出说明了在党的各级进行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 改进我们的宣传加强我们的组织

我们若不改进我们的宣传活动，人民运动就得不到发展。我们要采用时刻与行动相联系的、迅速和直接的、善于抓住人的注意力并促使劳动者和群众深入思考的宣传手段来普及我们的思想。我们为使电视和广播尊重我们的独立、尊重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真实性、给我们一个符合我们的实际影响的地位而斗争。

我们特别重视使所有的共产党人读到我们的全国性和地区性报刊，特别重视发行这些报刊。这首先就是《人道报》。这份报纸代表着我们全部的政策，是斗争的长期支持力量，是党内交流经验和思想的场所。每个支部都应建立和领导一个《人道报》和《人道报星期刊》发行委员会。

走民主道路要求我们为达到一百万党员的目标而继续努力。一九七八年党员超过七十万，这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那些决定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男女们尽管出身不同，所受教育不同，觉悟程度不同，甚至哲学和宗教信仰不同，但他们这样做都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愿，这就是为制定改革做贡献，并有效地参与政策的实行。

我们党基本上是由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组成的。工人在党的各级占优势。外籍移民与其他党员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这个直接剥削劳动者的地方是工人集中的场所，是危机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有所反映的场所，是斗争发展、可以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它同其他阶层的联盟的场所。作为推行我们政策的主要手段的支部应出现，活跃在车间、办公室和实验室。我们要获得这样一个新的自由，即劳动者在企业中参与政治的权利。

知识分子当前和将来的利益，以及工人阶级和民族的利益，要求我们担负起下述任务：为一场新的进攻创造条件，这场进攻

的目的是把法国知识分子大众争取到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来。在共产党内，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不是联盟关系。作为先锋队的工人阶级政党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整个历史性运动的先锋队。我们号召知识分子站在工人、职员、农民及七万共产党知识分子一边，在这一运动中占有自己的全部位子。

我们是主张妇女解放的党。我们党有二十五万女党员。我们要在党员人数中提高她们的比例，并使她们更多地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同时，我们要继续努力，创造更有利于她们参加党的活动和她们的进步的条件。

我们党勇敢地召唤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它的队伍。它始终对发展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给予重视，这一运动的政治与思想活动对青年男女参加争取变革的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共产党人在注重持续地展开党的活动的同时，还有很多人参加工会、协会和各种各样运动的活动。在那里，他们当然是本着负责精神、作为共产党人——他们不会不当共产党人——来参加活动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注意发表自己的观点，根据他们行动的深刻理由和所涉及的人们的真正利益提出建议，同时注意符合他们所在组织的特点和所确定的目的及民主运转的规定。当他们处于领导地位的时候，他们本着同样的民主精神担当领导责任，使他们所在组织的同志们具备所有共产党人都应有的优点：忠诚、有能力、工作效率高、集体工作精神以及与所有人真诚合作的精神。他们坚持参加党的生活与工作，这对他们驾驭工作中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帮助。反过来，它又丰富了党的经验。所有这些方针在《共产党和工会运动》这个重要文件里都谈到了。

（五）修改党章的意义

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符合法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

道路所提出的革命成效的需要。

多元论要求对政党与国家、对政党与社会作原则的区别。对我们说来，我们希望不要把这些明显不同的现实及其不同的作用混同起来。因此，我们反对把我们的党组织作为我们要建设的那个社会的模式。如果组织共产党是为了明天使它混同于整个社会，这就是想搞一党制。

党的团结，就是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全体党员在共同制定的、并共同为之斗争的目标的基础上的团结。当工人阶级的民主的、革命的政党的存在与巩固构成人民运动与联盟取得进步与成就的一个条件时，派别或组织派别的企图只能分裂和削弱党，使党的民主生活和革命成效陷于瘫痪。

党的团结是与专横的作法和行政手段根本不相容的。它意味着在党内实行广泛的情况交流、深入的、自由的讨论，实行多数通过的方式作出决定并由全体执行。它要求有日益丰富的党内生活，使它的民主特点以及赋予共产党员参与制定和贯彻党的政策的手段日臻完善。这就是对党章进行修改的意义。

民主道路赋予我们党的任务是艰巨的。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这些任务要求我们发展党的活动，发扬所有共产党员的负责精神、主动性和创新思想。它要求我们每一个男女共产党员使党的面貌更好地符合二十二大制定的党的政策和社会蓝图。这就是一个开放的、有效的，讲求实际的、勇敢的、完全忠实于所有正在受苦和有所企求的人们、忠实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忠实于法国的党。比起我们的面貌更重要无比的，是我们存在的必要性。

× × ×

两条道路摆在法国面前：

要么屈从于多国公司的目标和法则，顺应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的危机，让劳动者和国家承受着灾难性的后果。

要么否定资本的地位与特权，实行新的民主改革，把社会主

义道路作为摆脱危机的真正出路。

这就是两种选择，二者必居其一。围绕这一基本选择的战斗是当前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中心。出路并不是预先决定好的。斗争复杂而艰巨。

法国共产党号召法国的劳动者和人民参加到争取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去，坚定地充满信心地把这一斗争继续下去，不要等待。未来从现在开始。

（原载《共产主义手册》1879年第6—7期，《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

法国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七九年法共二十三大通过)

前　　言

法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是革命的党，是由一切为改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目前的命运并给法国带来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共同奋斗的人自愿结合组成。

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存在符合历史的需要。为了对资产阶级每天的进攻开展有效的斗争，为了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工人阶级极其需要自己先进的政治组织，需要一个能在争取当前权利要求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群众性的革命党。工人阶级不解放整个社会，便不能自身解放；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所有为了正义和自由、为了人类的解放、妇女的解放、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的政党。

法国共产党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它批判地吸收并在加以丰富的同时继承了我们历史上人民斗争的遗产。法国的工人运动中出现过一七八九年革命所宣布的人道主义、世俗和民主的理想，乌托邦和自由主义的口号，工团主义的发展，天主教徒对正义和联合的渴望。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法国工人运动开始觉悟并组织起来了。因而成立了法国共产党的前身——以盖得和饶勒斯

为首的社会党。

一九一七年，使苏联得以诞生的十月革命向全世界无产者指出了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在法国，社会党因为缺乏坚定的理论并逐步滑入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道路，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就破了产。

由于反对阶级合作和机会主义，法国共产党在原社会党多数成员决心走革命道路的基础上于一九二〇年诞生了。它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斗争以及人民阵线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解放祖国的抵抗运动中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更广泛地说，它自诞生以来进行的一切反对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社会政策和殖民战争政策、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使得法国共产党成为我们国内最先进力量联合的中心。

法国共产党对社会现实的一贯分析，它的理论活动和实际行动，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并被列宁及工人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依据的。这一唯物辩证的理论，通过认识和社会实践的进展，通过法国和世界各国劳动者阶级活动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教益而不断地丰富起来。法国共产党作为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并对人民和法兰西民族负责的组织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

法国共产党的根本目的是要将危机深重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适合法国特点和我们时代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将在工人阶级和城乡其他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夺取政权并由劳动者自己行使这种权力、在主要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社会所有的基础上，把社会、经济、政治的民主推进到底。社会主义使生产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从而满足人民对福利和文化、发展一切个人和集体的自由、争取新的权利、在企业和乡镇实行自治管理，区域自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要求。这种自治的社会主义将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它将开拓导向共产主义（即实行按需

分配、国家对人们的任何约束均将消逝的社会)的历史过程。

法国共产党采取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和平的、民主的、多数人的和多元化的道路。这是一条最坚决、最审慎的阶级斗争、一切人民力量进行直接和自觉行动的道路；没有人民力量，任何成果都无法取得或保持。工人阶级领导的这一斗争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有影响的和活跃的共产党，一个扎根于法国社会、能够促进并推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群众性的党。

这就要求实现广泛的政治联盟。这一政策应该把工人阶级、职员、知识分子、农民和所有关心民主变革并希望结束不公正及压迫的人联合起来。它应当在哲学和宗教流派、社会组织和政党派多元化的基本上把一切人民力量团结到变革的目标周围。

在法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每一阶段都应是大多数人民意志的结果。

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争取实现深刻变革的斗争道路。这些变革将把民主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来形成有利的力量对比，从而满足权利要求、获取新的权利、在一切领域推进民主。每一个新的民主阵地都是一项进步，而且是向前进、在生活中实现民主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据点。

法国共产党不仅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它忠于自己的历史传统，把同社会主义国家、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真正团结看作是一项重要的义务。

法国共产党在独立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加强（国际共运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组成这一运动的其它部分发表不同意见。它对

世界上一切为进步、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给予不懈的支持。它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排犹主义及其偏见和做法，维护各国人民应毫无例外地享有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权利。

法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利益，有力地为确保法国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同时，它致力于巩固不同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致力于在欧洲和全世界实现安全、缓和及裁军，致力于实现劳动者的民主欧洲并发展各国之间的平等和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一合作是正义、博爱、和平的新国际秩序的基础。

第一章 入 党

第一条：凡承认党的基本目的、遵守党的章程、参加一个支部并定期交纳党费者，均可成为法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入党须经支部同意，由支部立即向新党员发给党证。支部要欢迎新党员并有义务为他参加党的活动创造最好的条件。

第三条：党员更换工作地点或居住址点，要通知所在支部的领导，由支部发给一张调动通知书，以便立即同新的支部领导取得联系。与这一调动有关的组织机构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妥调动事宜。

第四条：法国共产党的党员不得加入其它政治组织。

其它政党、政治组织或属于这些组织的团体的领导人入党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

第二章 党内生活：民主集中制

第五条：为在社会中发挥革命作用，法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生

活准则，使它能够：

- 民主地制定和发展党的政策和理论研究；
- 确保党员的行动一致，从而保证党的政治活动光明正大和卓有成效；
- 民主地选举各级领导。

民主集中制是确定党内生活准则的基本原则。这些准则涉及到：向党员通报情况、党内讨论、党的机构的决定和执行情况，以及领导机构的选举。

第六条：向法共的每一党员和每一组织通报情况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这使他们能够掌握必要的材料来进行讨论、提出建议和采取行动。

通报情况和帮助思考的手段是多方面的：

- 《人道报》、地区性的日报和党的所有其它出版物；
- 党的支部和各级机构的会议；区和省一级的党员会议；
- 当选的领导机构向推选他们的人所做的工作汇报；
- 大区一级的会议；
- 学习日；
- 讲座、培训班和各级党校。

用多种形式提供情况有助于党员更积极地参加党的活动、发展党的民主生活，也有助于使党的政治活动更为广泛、富有成效。

第七条：讨论应建立在这种积极报道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党员的不同情况、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及处理方式。讨论将吸取党员对阶级斗争和党的活动的经验。所有问题的讨论应在各级自由开展。

讨论将在以下场合进行：

- 从支部到中央的各级组织机构的定期会议、各级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
- 各工作委员会，它们向所属的领导机构提出它们分析的

结果和建议：

——每次代表大会前必须在党报上开辟的、或中央根据严重政治形势或重大事件主动倡议设立的论坛。

讨论可使法国共产党的每一党员和每一组织能对制定党的政策及实施这一政策的必要决定作出贡献。在党的所有组织中自由开展批评，不论涉及何人。建设性的批评有利于纠正缺点和错误，克服弱点和不足之处。

第八条：各级政治性的决定由有关的机构——支部和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构——作出。

全国代表大会是法共决定自己基本方针的机构。

各项决定须由多数人通过并关系到每个党员。人人必须加以贯彻。集体起草就能产生由集体做出并由集体执行的决定。

本着同一精神，所有的组织都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

组织各种倾向和派别并进行活动是与党的民主运转不相容的。这会破坏党的团结和有效行动。这是不能允许的。

党员的个人身份、出身、经历的不同，他们对极为复杂的法国社会现实的看法，是法国共产党十分重要的财富。任何企图以有组织的倾向或派别使党的活动僵化和贫乏的行为，任何把党员同集体起草并共同执行政治战略割裂开来做法，实际上都会严重地限制党的民主生活。

第九条：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由支部大会，区、省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它们的活动以集体领导的准则为依据，这是作出正确决定并正确执行的主要保证。集体领导并不排斥、相反它要求每个领导人个人负责。

第三章 党员的职责

第十条：作为自愿参加者，每个党员都有一些权利和义务，

使他有可能参与制订和执行党的政策：

——参加他的支部及他所属机构的会议和活动，以便对所有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为制订党的政策、执行集体做出的决定、加强党的力量作出贡献；

——阅读并散发《人道报》和党的刊物，获得他的参与、讨论和行动所需的一切情报；

——拥有政治、理论教育手段，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并领会党的理论成果；

——积极维护劳动者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宣传党的政策、纲领和解决办法，帮助组织联合行动；

——在尊重他所加入的工会和协会性组织的独立、纲领和特性的同时，在这些组织中积极活动；

——与其他党员建立坦率、诚挚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使一起为一个博爱的社会而奋斗的男女团结起来；

——维护党和党的成员，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

第十一条：每个党员都有权：

——在其组织做出决定时参加投票；

——参加领导机构的选举，当候选人；

——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向上级机构、包括党中央委员会申诉自己的意见并得到答复；

——在党的机构内对任何党员或党的组织的活动提出他认为是正确的批评；

——了解有关自己的任何意见或批评。

第十二条：在贯彻党组织的决定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必须遵守自己所赞成的纪律，这种纪律是在党员自愿接受党的民主运转的准则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所有党员和党的组织的一项义务。这意味着各种意见自由讨论，并对所有党员进行耐心的政治解释和说服工作。讨论之后，只要不妨碍共同执行由多数人作出

的决定，党员可以保留不同的观点或不同意见。

第十三条：当讨论中出现分歧致使某个党员决定退党时，由支部备案并通知其它有关的党组织。

第十四条：如出现蓄意违反党的原则、政策和运转准则或有可能给党带来损害的严重行为，党组织可以给予处分。

第十五条：对党组织的处分有：党内警告、公开警告、撤销受处分的领导、代之以临时领导机构。必要时可以解散一个支部。

对党员的处分有：警告、撤职、开除党籍。

警告处分须报区委和省委批准。

开除党籍和解散支部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可予以公布。

一旦决定开除某人出党，在处分被批准之前，受处分者应调离党的工作。凡重新入党均得报中央委员会。

第十六条：可能受处分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成员均应了解对自己的指责，并在他们所属组织的党员大会上阐述自己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允许向各上级机构，包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

第四章——第十章（略）

（《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6—7期）

为了民主的前进（摘要）

——乔治·马歇在一九七九年法共二十 三大的政治报告

按：马歇在这个报告中重申法国社会正处于全面危机之中，解决法国社会危机的唯一的真正出路，是走“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建立“民主和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解决国际问题的路线是：确立民族主权、独立和任何强国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和平共处、裁军和各国人民的解放；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国际共运已发生变化，“它不再是一个把所有共产党看作支队的集中组织”，已不存在什么“中心”，各国共产之间的新关系是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欧洲共产主义是一股持久的思潮，不是一个新的“中心”。

一、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解决危机的出路

今天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越来越多的民主

不管人们今天采取什么立场，怎样看待企业内外工人阶级的状况，职员、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怎样考虑青年的愿望，群众运动、前进中的妇女运动提出的新问题，或者在社

会风俗和家庭方面进行的演变，怎样研究经济、地方团体、以及国家机构的困难……，人们在各个方面，到处都看到同样的需要，同样的权力要求，同样的旨在解决人民和法国日益增多的困难的有效办法。形势所要求的，摆在法国一九七九年和今后整个时期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就是要有更多的正义，更多的平等，更多的自由，个人生活中有更多的实际选择的可能，更多的参预决定和负责的权利。一言以蔽之，今天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越来越多的民主。

是的，为危机打开一条积极的出路，就是把现在的进程颠倒过来：它导致所有制、政权和知识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使社会的一极积累的财富日益增多，而另一极却饱受困难、贫困；使一切都依附于所有那些参加跨国公司董事会、内阁会议或者欧洲经济共同体布鲁塞尔委员会的技术官僚和大资产阶级。把民主进行到底，使之贯彻到整个社会生活，贯彻到生活的各个范畴，这就是我们对法国面临问题的有效的、现代的和革命的回答。

我们的决议草案有理由确认：“必须进行一场使民主达到其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社会改革。必须创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这也是我们谈到民主和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时所持的看法。

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处于危机中的法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实行同资本在全国统治相决裂的深刻的民主改革。这就是大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其控制权应通过民主的国有化的手段，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就是国家领导权的改革，国家应当成为代表劳动人民，由工人阶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政权。这些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改革，社会斗争的成果仍然是有限的、不稳定的，可能被资本势力夺回。

因此，这些改革本身是不够的。正如决议草案重申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份文件——为了民主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中阐明的

一个内容丰富的观点，“在改变所有制和国家政权的同时，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努力来变革社会关系”。必须在各个领域里发展新的社会关系。

在经济领域和企业内部的新型关系：因为解决法国遭受的危机，要求有新的经济发展，以人、以劳动者为经济中心的新的经济增长，它使得满足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要求，发展劳动者的首创能力成为经济活动的动力。

城镇和乡村内部的新型关系：它们通过市镇自治管理，有助于公民们掌握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生活；它们在个人自由掌握自己命运的前提下建立新的团结，消除紧张、对抗和不安全。

地区内部的新型关系：地区可以自由地确定自己的特点和生命力，而这种特点和生命力将充实和巩固全国的统一。

国家内部的新型关系：系统地克服不平等，给个人以保障，扩大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实行制度的民主化，权力下放，把整体利益和人的发展置于谋求私利之上，所有这些将奠定真正的民族团结的基础。

最后是自由、平等、团结的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这个问题下面再谈。

大家看到，当我们谈到民主和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时，当我们将自治管理列入我党的基本目标时，我们没有玩弄文字游戏，也没有人云亦云。我们不做投机性的抉择。我们对一个具体社会的具体需要，即一九七九年法国社会的具体需要作出回答。

可以看到，我们的前景，即由劳动者、公民自己日益广泛地管理整个社会的前景，是符合共产主义理想所赋予我们的目标，也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尤其是卡尔·马克思所阐明的观点的，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的建议是雄心勃勃的。但是，我们正在同一场异乎寻常的危机打交道。只有不受旧框框的束缚，不向现存资本主义制度

的法律屈服，才能真正地战胜危机，朝前发展。这场危机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回答。它不是要求谨小慎微，恰恰相反，要求大胆勇敢。

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把必要的改革推到以后去进行。从现在起，我们要在日常的战斗中促进改革。为了支持这一改革，我们号召劳动者和人民群众踏上征途，进行一场坚决的、富有想象力的、生气勃勃的和强大的斗争。

斗争的 目 标

斗争是为了什么？

首先是表示反对：反对紧缩、解雇、失业、就业不稳定；反对企业破产、地区破产、向外扩张；反对法国衰落、丧失独立和主权；反对一切要劳动者承担这种灾难性政策后果的企图。

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无论今天由德斯坦来执行，或者明天由别人来执行，我们共产党人都坚定而明确地表示反对。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为捍卫就业和企业生产，为通过振兴人民的消费和符合国家紧迫需要的生产部门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斗争。

我们为维护和提高劳动者的购买力，把房租、负担和税款限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为捍卫社会保障而斗争。

我们为争取三十五小时工作周而不降低工资而斗争。对此，我想指出，我们不要让这项权利要求的实现取决于施密特、卡特或撒切尔事先达成的协议！相反，我们决心通过必要的倡议，使劳动者的斗争能尽快满足这一合法的要求。

我们为争取六十岁（男）和五十五岁（女）体面退休的权利，为改善和改变劳动条件而斗争。

我们为争取外籍工人的合法要求——社会权利的平等，保证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尊重人的尊严而斗争。

我们为保护和扩大公共事业，实现非国家化的民主国有化，以及从牺牲这些企业的资本手中收回对关键性生产潜力的控制权，如钢铁、铁路、核工业等部门而斗争。

我们为保证和提高家庭农业经营者的收入，发展农业生产而斗争。

我们为满足妇女要自由、平等、担任负责工作和更好生活的渴望，即争取妇女的劳动权利，反对任何歧视，尊重女工的尊严而斗争。我们为争取夫妻权利平等，实行和修订有关节育和人工流产的法律，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采取有利于妇女进行干预和承担责任的措施而斗争。为此要进行持久的努力，反对落后的思想，改变老一套的分工，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发展。

我们为建立新的医疗手段，发展医学研究，消除富人和穷人享受不同的医疗待遇而斗争。我们要竭力维护社会保险这项人民斗争的重大成果。

我们为争取一种真正向全体人民开放的现代教学，良好的培训，提高教员的作用，让人们最广泛地接触文化和创作而斗争。

我们为发展社会文化设备和体育设备，让地方的集体事业拥有进一步活跃市镇生活，促进社团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活动的手段而斗争。我们为创造一个更加富有人情的生活环境，反对污染和自然条件的恶化而展开活动。我们要求确保居民安全的手段。

如前所述，我们也为捍卫和扩大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而斗争。

我们为建立真正的地区政府，举行普选，按比例选出拥有实际权利和手段的地区议会而斗争，这个议会有个由其内部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为首、同当地有生力量的代表——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紧密配合活动。我们把“就地生活、劳动和作出决定”的权利作为我党行动的首要目标。

我们赞成承认海外省和领地的自决权。在上月访问留尼汪岛

之后，我要提请本届代表大会注意一九七九年海外省和领地遭受的悲惨和难以容忍的处境。

因此，仅以留尼汪岛为例，岛上有近半数的就业人口被全部或部分地剥夺劳动，但同时却没有失业者的补助金。岛民的平均收入是法国本土的四分之一，生活费用却高出百分之四十。要知道，百分之四十的留尼汪人不会念书写字，仅此一例就足以证明，当局对留尼汪人民的失职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众所周知，走私和暴力是留尼汪右派的两大传统武器。现在则添上了不那么出名的第三种武器：对留尼汪共产党实行无条件的、全面的新闻检查达二十二年之久。这里要提醒一下，留尼汪共产党本身就获得了当地近百分之四十的选票。

最后一点，真正的殖民掠夺阻碍着岛上的一切经济发展。其后果是，在一万名同年龄的留尼汪青年中，每年有六千人被迫迁移到法国本土。

这就是留尼汪岛作为带有殖民主义特点的海外省三十年的总结。法国其他海外省和领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法国共产党重申法国海外省和领地人民有自决权。它支持留尼汪、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海外省的共产党，以及其他进步力量所提出的权利要求：在法兰西共和国范畴内拥有人民民主的自治的地位。

我们深信，这一立场是正义而负责的。我们在决议草案中完全把它作为我党自己的立场。

民主是阶级斗争的主要阵地

我刚才列举的各项目标不是限制性的。我们对于劳动者、人民群众通过斗争来满足自己或大或小的要求的能力不加限制。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观念出发，可以得到的一切都应该得到。

能前进一步绝对向前迈进。获得任何一项成就，都是一个新的阵地，以便向实现比我们期望争取的还要深刻的民主改革前进。

这条为法国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有两重性。

它表达了我们的意愿：不但要确切地满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要适应法国人民和民族的共同利益；保证法国民主的真正更新，使法兰西民族所有的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

它建立在我们认识的基础上：只有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在迫使大资本家的统治和特权后退的阶级斗争中，才能赢得进步。争取民主的斗争，是现代法国阶级斗争的主要阵地。

忘记这一点，就会陷入一种不切实际的、最后自取灭亡的民主观念之中；就会以迁就代替妥协，以推行有利于资本的、反人民的、反民族的政策代替实行者在解决危机的积极改革。

归根到底，正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发生了矛盾。

今天，人们总是可以试图重写历史，发表带有革命色彩的讲话，或者把手放在胸前来表明自己的善意——事实摆在那里。弗朗索瓦·密特朗不能掩盖下列事实：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可能发生真正变革的时候，他放弃了我们同他签署的共同纲领，拒绝了足以破坏资本统治的那些有效措施，放弃了对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保证，却拥护加速欧洲一体化，其中包括防务计划。不管密特朗怎样行动和声明，肯定都是徒劳的。改变立场的不是我们，正是他自己。

当前社会党在奉行这条右的方针，梅茨代表大会已证实了这点。由此，它迎合了德斯坦的要求，迎合了现行制度支持者的希望。

总而言之，今天有两条道路摆在法国的面前。

要么是为了跨国公司的利益，适应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国人民和法兰西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要么是卓有成效地破坏资本的统治，实行一系列通过民主使法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深刻的民主改革。

这就是抉择，唯一的抉择，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共产党人全力以赴，使法国避免出现大资产阶级和为大资产阶级利益效劳的政客们正在准备的那种困难、失望、混乱和屈从的前景。我们要实现民主的改革。

二、我党的国际战略

世界性的重大问题

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来朝着有利方向的发展，是经过成功、进展，以及挫折的复杂过程而实现的。在世界范围内，有些严重的问题既反映危机的深度，现有社会力量对峙的尖锐性，也反映对新型社会关系的迫切要求。因为，正如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危机是号召建立新型社会组织、争取新型发展那样，资本主义的国际危机也要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使现有的关系从帝国主义强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我们有一项崇高的国际政策

法国卷入了这场伟大的运动。它既受到帝国主义反攻的影响，又受到有利于进步力量的变革的影响。自以为能够孤立于这种形势之外，当然是荒谬的。

我们远未朝这个方向前进，因为那样做纯粹是断送我党的战略，我们只是希望法国提出一些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建议，使用一些适应其能力、而且符合其历史和民主传统的手段，为解决世界上的重要问题作出贡献。

我们主张法国奉行一项适应上述目标的方针，而我们自己从

现在起就有了这样的方针。我们试图通过同样的途径，为在国内的基础上解决法国的危机，为走向一种适合我党要求的社会主义而创造最好的条件。

这项崇高的国际政策，可以在彼此紧密相关的四大目标的基础上表现出来：

民族独立和不干涉

第一个目标：我们确认民族主权、独立和任何强国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这就要求法国在内政和国际活动方面，拒绝任何政治压力和任何外来的干涉。同样也要求法国对别国的事务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并严格尊重别国的主权。这项不干涉的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

由此可见，无论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别人，都不能接受大国的发号施令。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拒绝消除民族意愿的集团存在。民族是国际关系基础的集合体。每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应当能够积极地参预解决国际问题，并且在必要时，根据其要求，得到国际集体对它的有效声援。

这种民族独立的要求远不是意味着闭关自守，恰恰相反，它是各国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和发展新关系的条件。

这种民族独立的要求也不是意味着对各国奉行的国内政策的各种后果，尤其是对损害人权的后果漠不关心。我们拒绝让世界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美国领导人利用人权这面旗帜，作为其政策的屏风和转移视听的手段。对于这个权利，我们的主张要高尚得多，其中包括人的普遍的基本权利，个人和集体的自由，以及各国人民对社会进步、正义、民主、和平的向往，和接受知识和文化的机会。

法国在世界上任何情况下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符合捍卫和扩

大这些权利的这一绝对要求。

和平共处、裁军和各国人民的解放

第二个目标：我们为和平、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和平生活的权利是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虽然缓和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它必须得到维护和扩大。

面临着尚未消失的战争威胁，我们今天有可能将和平与裁军的队伍广泛地集合起来。法国共产党致力于促进人民运动在这方面的蓬勃发展，要求法国为解决上述的世界性问题进行干预，当然其条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法国的安全。对此，我们认为，法国应当批准限制制造某些武器的条约，积极参加国际会议。法国应该参加美苏防止核战争的协议，并且呼吁其他大国也来参加；应该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有进展的适当时刻宣布参加；应该建议签订一项禁止生产诸如中子弹等各种大规模灭绝性新武器的条约，根据能以维持对发展中国家一笔援助基金的统一规格来缩减军事预算。管制军火交易，停止向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府出售各种军火。

上述的全部活动对于有监督的全面裁军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促进欧洲和地中海和平方面，法国也应当发挥特殊的作用。

法国拥有将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本中关于安全、合作、人权问题的条款付诸实施作出贡献的手段。它的行动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它应该在欧洲进行活动，为超越和同时解散集团而努力，这显然排除了任何搞欧洲部队的观点。

法国能够在解决中东冲突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把地中海变为一个进行广泛国际合作的和平地区的目标。因此，我们表示支持诸如拆除外国军事基地，禁止在地中海地区使用核武器，限制外国舰队等明确的裁军措施。

这项政策的目标是解放各国人民，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它将加强与维持社会和政治“现状”毫无关连的和平共处。它将开辟各国在尊重各自民族利益、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广泛和丰富合作的天地。这种合作政策主张加强每个国家的经济协调，寻求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互通有无，以此来反对跨国公司所支配的专业化战略。

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第三个目标：我们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而斗争。

帝国主义确定的旧秩序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各国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和谐、公正、民主的关系，即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要求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一范畴中，我们想展望一下法国同世界各国实行没有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合作的前景。

法国应该同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在尊重每个伙伴主权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多样化的交流，进行经济、贸易、科学和文化的来往。

法国应该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克服迄今为止还阻碍着这种关系的障碍，同它们进行一种具有新规模和新质量的合作，包括特别是尖端部门合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包括其他部门中的共同计划，如开拓自然资源和文化合作。

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该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针。法国人民对这种关系是毫不担心的，相反是支持的。在清除新殖民主义的种种阴谋时，贫穷国家的发展只能促进法国自己的发展。这是法国依靠日益广泛地参加世界贸易，来解决本国危机的一张重要的王牌。事实上，许多发展中的国家特别希望同我国建立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该错过的良机。

法国共产党密切地注视和积极地赞赏不结盟运动。面对帝国

主义及其危机，面对世界上不发达和不平等的严重问题，这个想要置身于集团之外的八十六个国家集合在一起表达了正当的愿望。

我们理解和赞同不结盟运动关于各国人民自由地拥有自决权，完全否定外来干涉，拒绝向大国屈服，掌握本国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所表达的关切。

我们赞赏不结盟运动关于稳定原料价格，制止其对外贸易恶化的倡议，以便各国在联合国内协商一致，处理重大的发展问题，对那些落后状况最严重的国家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不结盟国家的这种总的步调同我党是一致的。它们的建议同我党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六日在墨西哥提出的建议相吻合。因此，我们认为，法国在这个旨在争取民族独立，缩小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各国的合作，争取裁军与合作的总运动中，可能而且应该发挥重大作用。

这就要求法国有自主的自由，能够象不结盟国家那样，摆脱来自集团政策的种种束缚。这就要求它在建立更加民主的国家关系和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秩序的行动中站在最前列。

恩里科·贝林格同志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制订和实行国际和平与发展宪章的思想。我们准备本着促进的精神，研究和讨论贝林格的这一建议，因为它符合我刚才阐述的那些考虑。

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

最后是第四个目标：我们为建立一个民主的、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步的、向世界开放的、独立与和平的欧洲而斗争。

众所周知，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了反对法国参加共同市场的立场，因为我们认为，与共同市场发起人当初许下的美妙的诺言相反，共同市场是不能为法国和法国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看一看后

来发生的和今天发生的一切，我们认为，生活已经证明我们是有道理的。

无疑，由于这个原因，在我那天提议由欧洲议会选举名单上的四个领衔者双双进行辩论后，其余的三个人都避而不答。人们看到，希拉克建议同西蒙纳·韦伊夫人辩论，这就是说，在他们中间进行辩论。但我本人却提出一项极其民主的建议：一对一的辩论。我准备以法国共产党的名义，同其他三位领衔者会晤。只有这样才能澄清问题。

不过，共同市场的建立已经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造成了一种早在一九六五年就使我们认为单方面的割断关系是不可取的局面。本着这种精神，我们的行动一直表现为双重性的考虑。大家在左翼共同纲领中可看到这种考虑：一方面，维护法国的主权和行动自由；另一方面，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同时致力于改革该组织、使它摆脱金钱帝国的无情统治，朝着劳动者的欧洲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忠于这条路线。

今天，法国领导人打算把法国进一步参加托拉斯和银行家欧洲的一体化，变为他们让法国适应于危机，为资本谋利政策的基本手段。他们想利用这样的欧洲来加剧紧缩和失业，加快企业集中和关闭有关的企业以进行整顿，损害法国劳动者几十年斗争的成果——社会和民主的权利，进一步压缩农业的收入和活动，使之有时受到清洗的威胁，破坏法国防务的民族性，再度侵蚀法国议会的特权以利于欧洲议会，拍卖国家主权，并在外国的支持下迫使法国人民接受他们今天所反对的政策。

法国领导人希望利用共同市场扩大到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来达到上述目标。

因此，我党声明坚决反对这种扩大，坚决反对法国参加在美国高度监护下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直接统治的西欧和大西洋集

团。

对此，我想说明，我党这一态度绝不是意味着对西德人民的仇视或无理指责。我们拥护德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权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例，面对德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共同问题，我们和西德共产党共同行动。

但是，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也注意事实和现实。它们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帝国主义大国试图建立的“三级”（美国，日本和西欧）体系中，目前西德的处境使它拥有手段在西欧一切领域里建立霸权。我们也知道，在一个遭到危机的体系里，世界反动力量将不择手段，以确保它们制度的生存。我们不想忘记历史的教训。我们说，忘却历史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前景。

由于我们充分认识到我党的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我毫不犹豫地指出后者），所以，我们拒绝将西德奉为典范或法国的宗主国的前景。

在我们看来，法国的主权是它积极参加欧洲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之所以说积极参加，是因为我们打算在排除各种孤立和割断一切关系做法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以便使法国对一切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行动，对一切阻止跨国公司托拉斯以及为其服务的政治力量进行有害勾当的行动，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进步的欧洲。它将开始实行自己反垄断的共同措施，从积极的意义上协调社会立法，取缔一切种族歧视。

我们要建立一个欧洲国家之间紧密合作、同时向世界广泛开放的欧洲。

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它尊重各国议会的决定，允许劳动者的组织出席和更广泛地参加欧洲的机构，真正实行欧洲人权宪章。

我们要建立一个为解决冲突、促进缓和、组织裁军与和平作

出特殊贡献的、和平的欧洲。

我们要建立一个为解散集团、确立经济新秩序而有效工作，并愿意摆脱最大强国结盟的欧洲；只有彻底摆脱美国的监护，独立才有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明确而坚实的基础，我们号召法国的男女公民联合起来，在今年六月十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时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法国的男女公民们如果支持主张欧洲一体化和扩大共同市场的政党，无法兰西民主联盟和社会党，就不能表达自己保卫法国和法国人民的利益、捍卫法国的主权，看到法国为建立一个新欧洲作出贡献的意愿。他们如表示支持保卫共和国联盟和雅克·希拉克，也不可能表达自己的这一意愿。希拉克此人使用了最愚蠢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手法，自诩为保卫民族利益的头号人物，却每天都在宣称忠于置国家利益不顾的政府和多数派。因此，法国的男女公民们只能以下述的唯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投共产党的票。

我们愿意增强国际主义的团结

大家看到，同所有孤立和结盟的做法相反，我党有一项为法国而制定的重要国际政策，一项让法国积极而友好地出现在世界上的政策。

这不是一项争取一个没有明确目标前途的政策。我们从现在起，在一切领域里，都为上述的目标而斗争。

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各国人民不应该仅仅让国家来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当问题已经提出，行动的条件已经具备时，应该由各国人民来进行干预。

明确地说，我们认为，当前国际问题的广泛性和尖锐性，以及从革命和进步运动的进展中产生出来的新的可能性，都要求加

国际团结，将它扩大到组成革命和进步运动的各派力量。

共产党之间团结的新关系

理所当然，我们打算谈谈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

象世界一样，国际运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把所有的共产党看作支队的集中性组织。今天，各国共产党均已成长起来：某些共产党领导着自己的国家事务；大多数党则在同依然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

这种广泛的多样性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是一种成熟和壮大的标志。它表明，共产党已经扎根于本国的现实生活；有理由预计这种多样性将来还要得到发展。这就是说，根据我们的观点，看到这种多样性如同看到共产党之间存在分歧一样，不应当被看成是发展国际合作和团结的障碍。

因此，我们正是在充分考虑到这些新现实的情况下，为建立共产党之间的新关系而努力。

共产党之间的新关系要求尊重每个党的独立、权利平等和方针政策，互不干涉。独立自主地制订党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方法，这对每个共产党员来说，是发展自己影响，争取本国劳动者参加斗争的根本条件。这种新关系只有在以上准则明确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它的前提是既要考虑到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共同目标，又要考虑到存在着一些掩盖起来毫无益处的分歧。

所有这些能为国际主义团结的新观念和新实践奠定基础，我党打算为发展这一团结作出贡献。

本着同样的精神，在同一地区进行斗争，或者面临着相似问题的共产党感到有必要协调一致，彼此建立特殊的关系，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这样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在西欧，在对执政的剥削阶级进行斗争的那些共产党（包括我党在内）之间，彼此也建立了这样的关系。

发展同各种进步力量的团结

这就是说，根据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必要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希望发展我党同其他力量的积极团结，这些力量正在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现实中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独立、和平与自由的斗争。

我们同许多民族运动和政党保持着友好而富有成果的关系。我们很关心它们，十分重视加强同它们的合作。因此，我们将赞助一切能够促进双边共同行动、或是促进关心相同问题的力量的协调行动、或者更广泛地讲促进各种反帝力量和进步与和平力量在争取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战斗中联合的创议。

我们特别致力于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接触和联合行动（如果可能的话），以利于实现那些符合我国人民真正利益的目标。尽管大多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作为不利于这种接近，但是，我们仍要重申上述立场。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打算继续努力，以便找到同基督教人民群众的代表力量进行积极合作的基础。

由此可见，国际主义的团结，法国在世界上奉行一项积极的新政策的行动，正是我们争取法国危机得到国内民主解决这一斗争战略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这一斗争战略获得成功的条件之一。

三、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

我们拒绝任何样板，
并且从现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中汲取教训

我们坚决拒绝所谓社会主义有一个样板，或者有一个反样板

(同前者一个意思)的观点。这种立场没有一点策略性，但它却来自“社会主义作为对各国具体需要的具体回答，必然要诞生和成长”的看法。不可能有一个符合每个国家的蓝图，也不可能事先就为每个国家的人民决定好必需经历的循序渐进的阶段。在一个欧洲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历来要有一种独特和新颖的创造，也历来是一种打头阵的事业。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种发展的真正多样性。显而易见，这种多样性将随着新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我们许久前确实说过存在多样化的形式，但也不应隐瞒；经验和思考已经使我们这一概念得到深化，并且超过了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略微有些乌托邦和抽象的看法。

这是否意味着不存在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呢？不，这样看问题将是一种误解。存在着普遍规律，存在着舍此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原则。例如，消灭大生产和交换资料的私有制，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掌握政权。但是，这些规律不能理解为一整套教条或药方。正如让·卡纳帕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举行的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今天”的报告会上所讲的那样，“这些规律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其普遍性来自其抽象性。它们不是先于经验，而是总结各式各样的经验。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具有历史的相对性。这就是说，一方面，规律不能独立于工人、民主和革命斗争的具体现实之外；另一方面，经验越多样化、越丰富，规律的内容就越具有相对性，被越来越多的新规律所补充和代替”。

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普遍的民主的组成部分。这里指社会主义的普遍要求而言，因为人的解放，全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逐步民主化，仍是社会主义的关键目标。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的进步，这种普遍要求在我们的时代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当然，民主的普遍要求本身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它根据国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提法。这种要求应该在什么特殊形式下得到满足，任何人都不应越俎代庖，代替各国人民来确定。我们这样讲，并未跟那些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总结总的说来是积极的人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是以我们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形式和方法为出发点，去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的。我们既拒绝所谓我们必须照抄别国做法的观点，也拒绝把我们自己的做法强加于人的观点。

我们法国共产党人为法国提出一条以多党制、定期普选和尊重选举裁决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

关于欧洲共产主义问题，正如决议草案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很关心下述事实：我党的这种活动已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其他一些共产党的活动相吻合，这些党把发展民主列为它们为本国提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心。这种一致的看法已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

宣布这种新的政治现象已经“死亡”的预言家是不乏其人的。他们正在自欺欺人。

实际上，我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股持久的思潮，因为它既来自彼此对社会主义普遍民主要求的考虑，也来自由大资本统治和陷入深刻危机的那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形势的相似性。它不是事物发展中的表面现象。这就说明，除了可能出现的差别和分歧以外，有关国家的共产党正在发展一种建立在共同成果和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团结。我们自己将朝着这个方向坚决地行动。

当然，欧洲共产主义既不是一个新的“中心”，也不是取代其他东西的样板；它不会回过头来反对任何党。那些对欧洲共产主义到处表示害怕的同志是没有理由忧心忡忡的。

四、争取民主变革的联盟

……新的形势远未超过二十二大制定的、通向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它仍然是唯一可能走向革新运动的道路。

那么，这条民主道路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首先，它是一条联盟的道路。没有我国人民多数的联合——瓦尔德克·罗歇称为“劳动人民的多数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民主变革。我们希望建立人民联盟，一切在社会、政治、精神、意识各方面受资本政策之害的人的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不动摇，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抉择。

其次，民主的道路就是斗争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进展只能是一个群众斗争的过程，它通过获得日益发展的民主成果，逐步地改变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利于人民力量。这种进展，在每个阶段中，都将通过斗争和普选而表现出来。

大家看到，对我们战略的这一简单回顾表明，我们提出的民主道路仍然是唯一的现实主义道路，唯一的革命道路。同时，很明显，我们现在必须从分析共同纲领的经验中，汲取能够使我们的战略经受生活考验的必不可少的教训。

有哪些教训？

第一，基层、在行动中的联盟

首先，我们应当绝对优先考虑在行动中的联盟，劳动者和人民的斗争在基层中实现的联盟。这应该是我党的各级组织，每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点开展活动——首要考虑的事情。

为什么？

首先，因为斗争和争取实现权利要求的统一行动，今天是劳

动者反对政府和企业主，进行自卫所拥有的唯一手段。只有在一切阵地展开斗争，重视全力以赴地获取成果，才能在目前形势下，毫不等待地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必要的。

在行动中联盟也是唯一可能的道路，因为它是从今天开始向社会日益深入的民主化道路前进的唯一手段，是日益改变大资本同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唯一手段。

我要强调这个问题。事实上必须明确，共产党人到处促进在行动中联盟的这一做法，并不是我们在等待变革来到之前，别无他法而出此下策。实际上，在行动中联盟的做法对于建立民主变革的条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我强调指出：是必不可少的。其实，经验明确地告诉我们，目前存在着一系列困难、障碍和矛盾，这是我们不可能仅仅用思想斗争的手段来解决的。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唯有实践，唯有经验才能改变认识。

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民主的进程中，它使得通过斗争每取得一个新的阵地，都成为对争取更大成功，对更广泛和更具有决定性的斗争的一个支持，正是在这个民主进程中，才可能克服人民力量中由于处境和意见不同而反对必要的人民力量多数联合的一切矛盾。

我刚才指出，如果说危机创造了更加有利于实现上述联合的条件，但它同时也引起了矛盾、害怕和抵制。任何联盟的设想如果回避这种现实，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失望和失败。

正视这些困难，就是要看清，正是在围绕那些符合人民和国家需要的变革目标而进行的基层斗争中，障碍将得到克服，利益的统一将得到肯定，团结的认识将得到发展，必不可少的相互支援的关系将得以建立，共同的利益将战胜一切利害矛盾或思想对立。

一次公开的、大胆的、有魄力的行动

同志们，由此可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首先就是在

一切领域里用这些行动将取得的成果来开展各种各样的行动。

这样做同认为向社会主义的演变是直线的、逐步的、安静的、平坦的观点，或者同认为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绿洲的幻想毫无共同之处。

不！社会主义的改造要求消灭资本对经济和国家的统治。因此，它要同现有的制度决裂，在激烈阶级斗争的范畴中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

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实际：在我国和我们时代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并且可能通过明确地、民主地表达出来的协议，通过我国人民多数的积极干预而实现。

我们最近获得的经验只是加强了自己的这一观念：要建立这一运动，并使它能迫使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考虑到一种决裂的过程，一系列能以实现不断向前推进的民主改革的“群众斗争”，这种民主改革将为过渡到本身作为民主化最高表现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而不要追求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改造那种类型的决裂。

我党关于法国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观念的这一深化导致我们宁愿使用“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而不用“先进的民主”的提法，以便使我们的考虑和建议具体化。

同时，我们肯定了二十二大关于不再把无产阶级专政列入我党目标的决定的正确性，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党的目标中已不再有其地位。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因为事关一份论述战略问题的代表大会文件），我们在决议草案中不是提出一份纲领，而是提出某些斗争目标。民主的目标已载入我们为法国开辟的社会主义前景之中。这些目标如同我们想要汇集的人们的愿望一样，如同法国的那些必须满足的需要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目标对法国摆脱危机和满足人民群众权利要

求来说，都是向前迈进的一步。

但是，本着我前面所讲的精神，我们不愿意事先决定人民运动需要发展壮大和在何时提出何种权利要求的能力。我们也不愿意将人民运动束缚在我们为它制定的纲领和严格规定的结账清单之中，因为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反而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我们把那些能促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变革推迟了，将它们推迟到这个或那个阶段之后。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当前解决法国社会危机的唯一的真正出路。

这就是说，我们的意图决不是人们所谓的意味着什么后退和孤立，而是一种公开的、大胆的、有魄力的行动。这是一个战斗的号召。

凡是有男女共产党员的地方，我们都号召他们肩负人民的各种希望，促进和支持那些与各种形势相适应的斗争。

我们号召他们更多地开展接触、会晤、同一切遭到现有政策危害的男女联合行动。

我们号召党员、支部、区委和省委要大胆，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采取必要的主动行动，以便在每个企业、每个居民区和每个市镇建立行动中的联盟、基层的联盟。

是的，同志们，我们要立即在各地开展斗争，让民主日益深入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让我们日常的实践符合我们的理想：民主的社会主义，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

第二，通过民主的政治辩论、澄清问题，（略）

第三，促进行动的协议，（略）

第四，以正确方向重新平衡左翼

最后一点是我们最近一个时期汲取的第四个基本教训，一个不仅有益于我们共产党人，而且有益于全体劳动者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没有革命党即法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加强，争取民主变革斗争中的联盟就不能很好地实现、维护和发展。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用这样的论据来反对我们，说我们希图在最近这个时期保存自己党的实力。

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在进行支持联盟和变革的一切政治战役中，不断地关心伟大、强盛、积极活动的法国共产党这张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主要王牌，那么，同志们，这是事实！

法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法国共产党是工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党，被剥削者、老百姓和被压迫者的党。法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和民族的党。法国共产党是法国社会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建设和发展法国共产党，必须有数代人，才能把这个党建成一支伟大的人民力量，如果没有这样一支力量，那么，所有唯一靠双手和大脑生活的人就会丧失前途。

人们是否会指责我们，说我们不仅关心阻止法国共产党的衰落，而且关心创造有利于它发展壮大的条件？是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是一种犯罪的态度。劳动者完全有理由为此而责备我们。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法国就不可能进行变革。

再说，我们最近经历的事实，以及我们号召劳动者同我们一起从中汲取教训的经验都表明，已经产生的那种不利于我党的不平衡，有利于社会党玩弄造成不幸后果的赌博。因此，以正确方向重新平衡左翼是当务之急，是争取联盟和变革的斗争的关键。

我们确认这点，但我们的目标绝不是想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党或统治者。谋求这个目标的不是我们，社会党领导人倒是想把我党变成一支能为社会党开辟执政道路，却不配享受同等权利

参加政府的辅助力量。

这样的观点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种忠实的、态度明朗和尊重多党制的联盟，而且我们想把这种合作一直保持到社会主义。我们正是为了这个目标而保留着我们党本身的权利：做一个在人民运动和各级国家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革命党。

我们的决议草案明确地指出，法国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党。共产党人到处同人民群众在一起组织行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成果，推进正义和自由。

与此必然联系的是，法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有能力执政的党，劳动者为了争取自己所希望的变革，需要法国共产党参加法国政府。共产党的部长们尽快地参预法国事务的管理，这是符合劳动者的利益的。

五、发展党及其活动的几个问题

我们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的行动在一切理论领域里，都是一致的。

为了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我党需要识别和分辨一切社会现象、已经成熟的矛盾和在一切领域里由此而产生的行动的可能性。党需要经常地对自己的预见和经验、决定及结果进行总结。党总结时考虑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

正是通过开展这样的研究，我们党能提出对危机的分析，并且根据分析的结果制定法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

我们的理论不是一套完善的学说，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无需进行重大的变动而能运用的一套戒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经过一些卓越的革命家，首先是列宁已经总结出其

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与此同时，无论在社会的现实和我们对这一现实的认识，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问题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巨大的质的变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不同活动，推进了理论和实践，使之辩证地发展。我们力图在这一探索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我们用“科学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来指导我们的理论，正是为了提醒大家考虑到这一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的生动和丰硕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在意识形态的战斗中，这一提法对一切拒绝让工人阶级政党有权以科学为依据，并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认识社会以及从事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科学实践的人来说，是有力的驳斥，因而显得更加适宜。

这一实践要求进行坚持不懈的巨大努力。在提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及其继承人曾力图避免使其真正的进程概念化。例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了强调在思想和行动中不可少的运动和成熟过程而把其著作《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德文版冠以更辩证的题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提交本届代表大会审议的文件，难道不是在努力朝科学前进吗？

关于唯物主义问题，我想补充几句。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论就是唯物的和辩证的。它与闭关自守和经院式的教条完全不同！无视人类的敏感、激情、情感和性灵、不安和希望的那种干瘪的观念也完全不同！

因此，对于生活问题，对于实际斗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疑问和得出的教益——这些教益反过来有助于指导和发展斗争，我们党需要进行大胆的和富有成果的研究。

这种探索是一种科学的研究。它要求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全部手段和条件，特别是把实践、讨论、面向事实的谦虚和勇气联系起来的持久的批评性的比较，深信任何现实都可能被人类的思想接受，但人们能够认识的真理却是无限复杂的，认识是一个没有休止的运动。关于这个问题，维特里的会晤已经表明了我们必须进行的努力，决议草案现在也正确地谈及这点。我们必须更好地使全党，特别是党的知识分子，完成这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日臻完善地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壮大，对我党来说，就是日臻完善地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当代法国阶级斗争和社会选择的性质阐明了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历史必要性。正如默尔特·埃·莫泽尔省委的费尔南·蒂贝里同志在论坛上指出的那样，今天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改变上述信念。恰恰相反，在工人阶级内部和总的社会结构中，目前发生的和将来预计到的那些变化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念。

工人阶级的现状

所谓工人阶级，首先是：专业工人在男工中占百分之四十，在女工中占百分之六十；粗工和类似粗工的工人在男工中占百分之十五，在女工中占百分之四十。在这些受超额剥削的男女劳动者中，多数是外籍工人：五人中有一人是外籍工人。党章修改草案中规定外籍工人在我们党内的地位和权利。

这些受到严重超额剥削的男女劳动者，组成了穷人的大军。是的，我们是穷人的政党。穷人可以指望我们来保护他们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参加斗争。决议草案肯定了这种行动的必要性及其基本的政治价值。它正确地驳斥了那种有时责难我们把这一正确的政治行动同复古主义的悲天悯人主义混为一谈的指控。历史学家们很了解，关心最受苦难者的命运，是一切真正革命斗争的特

点，对于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更是如此。如果对这一点还会有问题，其原因不是我党对穷人干的事太多，而是在这一活动还存在不足之处。

人们指责我们只是根据马克思首先阐述的科学标准来确定工人阶级，这就更站不住脚。正是这些超过出身、年龄、级别、职业的多样性的科学标准，建立了工人阶级的统一。例如，简单化和狭隘地将工人阶级与体力劳动混为一谈，决不是我们的看法。

工人阶级领导的历史作用来自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处境，同时也来自它的政治能力，这种能力在二十世纪这段时期，通过社会进步、民主、民族独立、各国人民的团结、文化等具有决定性意义重大问题的考验而逐渐形成、发展和获得肯定。在法国，工人阶级作为同资本直接斗争的阶级，作为在决定性的生产领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阶级，同时作为有组织的阶级和联合起来的阶级，已经担负起它的领导职责，并且正在学会执行这种职责。工人阶级的这种作用主要归功于法国共产党数十年的活动。

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产生一种更加复杂和更加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导致形成在质量上超过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时代的新质量的“集体劳动者”。

某些分析认为，这种变革的倾向在于削弱工人阶级。甚至扬言自动化的普及终有一天要使工人阶级消亡！这种障眼法不过是便于给社会民主主义所谓“阶级阵线”的理论蒙上实际基础的外罩。

但现实却与此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降低，而是更加突出工人阶级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生产的比重正在增长。劳动力的质量正在提高：有文化的工人越来越多，工人阶级由于增加了数以几十万计的技术员——他们中的最大部分——甚至还有某些工程师而壮大。与此同时，这种内部发生的变革使工人阶级更好地准备接受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

职 员

在许多企业中也有很多职员在工作。二十年间，职员的人数翻了一番。今天有四百万职员。他们在国家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诚然，他们往往不在生产领域中劳动，因此有别于工人阶级。可是，工人同那些不属于工人阶级的职员之间在处境和利益方面的社会联系却在不断地增长。

在服务行业中更多地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和技术，为职员同工人阶级的接近和团结奠定了特有的基础。今天的职员工资低，经常集中在庞大的劳动单位中，被迫接受同工人相似的工作方法和强度，因此同自己过去相比，已经不再有大的共同点了。比如，请大家想一想在打字员“联营公司”，在机械化办公中心，或者在大商店的生活。关于后者，有位女售货员在我们党组织的见证会上说：“‘春天商店’（译注：巴黎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就是一个工厂”。

如同在工人阶级中一样，党应该在职员中展开活动。通过艰苦的工作，我们在职员中还可以争取到许多力量。

工人阶级的前途和法兰西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

当然，这一社会学的重大演化不是没有矛盾的。它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遇到生产关系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个基本事实本身就增强了工人阶级——包括它在现代发展中——的历史作用，而工人阶级的干预对于生产方式的革命来说是必要的。法兰西民族的前途与工人阶级的前途是紧密相连的。向新社会的民主前进，其途径是将工人阶级一直提高到管理国家和经济的地位。

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从整体上讲，要更加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作用，提高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才能，发展组织，

增强在社会和民族方面的雄心。法国共产党的重大任务是竭力为此作出贡献。日臻完善地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要成为各部类男工和女工的政党，全体技术员的政党，全体职员的政党；就是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将他们大量地争取过来。

党在企业中的活动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我们党能够和必须完成其任务的主要阵地是企业。企业，首先是大企业，乃是我党战略的中心。决议草案把企业指明为工人阶级提高觉悟，发展团结和进步的阵地。首先是在企业中通过斗争建立基层的联盟，这是人民运动的基础。企业是优先发展工人阶级联盟政策的阵地。

因此，党章修改草案比现在的党章更加明确地规定，我们全党应该优先在企业内进行活动。它不仅规定了共产党员在其工作单位所属的支部内的义务，如不存在支部去建立支部的义务，而且要求党的地方组织和各级领导为企业支部开展活动和壮大力量经常提供帮助。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虽然党的二十二大以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不仅是不足的，而且不断还处于被损害的状态。此外，雇主和政府是如此深知企业的重大战略意义，以致于它们在企业内部，用巨大的手段展开思想和政治反攻，而社会民主党也在企业中竭力进行活动。因此，我们党的斗争，争取党在企业中开展活动的斗争，都要求进行一种持久而激烈的战斗。斗争要求我们采取新的主动行动。

所以，我建议代表大会确定党的下述目标：建立一万两千个企业支部！

我们党同工会的关系

关于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我补充几句。近来，政治局就此

发表了一个文件。我要指出，该文件的意义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列入我们数年来制定的基本文件中的一份参考文件。

正如你们能够看到的那样，文件重申工会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以及在工会中的共产党人要尊重民主准则的原则；重申我党愿意日益良好地发展同工会，特别是同法国总工会的关系。

同时，文件否定了下述的不能接受的意图：认为要开展工会运动必须削减共产党员承担的工会工作，或者，共产党员一旦参加工会活动就应放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去开展自己的工会活动和政治活动。

实际上，工会活动和党的活动是不矛盾的。我们既不想同工会争夺在领导争取权利要求的斗争中所承担的职责，也绝不限制工会在政治方面认为有益的干预。与此同时，党担负着它自己特有的任务，任何组织都不能取代党来完成这一任务。工会运动者渴望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只能认为，党扩大和延伸了工会的活动。由于共产党人参加工会活动和党的活动，两者相互补充，我们对此予以最大的重视。

改进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工作

加强工人阶级历史作用变化的本身也导致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他们社会成份、作用和处境的改变。这两种现象都产生于同一的社会倾向。

诚然，我们谈到的变化包括大量的矛盾。当今的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完全一致。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以及在社会主义本身的制度下，这两者的接近是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的。

这些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危机而增多和加剧。资本家不能不兴办研究室，或者学校、社会服务行业。但是，与此

同时，由于超额积累的必要性，资本也不能不尽量阻挠研究、培训、健康和文化方面的支出。由此出现了大批知识分子工资低、处于不稳定，甚至失业的现象；由此产生了许多知识分子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恶化的现象；由此也产生了根据每种行业以及各行业内部的等级而造成的使知识分子分裂的深刻不平等现象。对知识分子生活处境和生活方式的这种多样性，我们必须深入研究。

右派力量和社会民主党利用一切矛盾和分裂，妨碍同工人阶级联盟。危机中的帝国主义也特别把这种矛盾和分裂作为其进行反攻的赌注和目标。

目前的形势表明了这种反攻的危险，但它也表明，知识分子注定就会去选择右派或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国家的利益，整个历史运动的利益，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把下列任务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一场新的进攻创造条件，以便为争取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参加党的行列。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我们是解放妇女的党

党章修改草案在新的前言里指出，我们党是解放妇女的党。

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向前发展是一种具有新的广度和质量的现象。它不仅限于法国或欧洲，而且在不同的条件、形式和程度上，具有世界的特点。

在资本主义国家，妇女斗争所提出的权利要求改变了生产关系。这些要求也包括有关个人和家庭生活、人权、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追求新价值的愿望。它们不是简单地倾向于要求男女平等——象他们今天生活的那样——而且要摆脱目前妇女和男子都遭受到的身体摧残和精神错乱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妇女争取权利要求的斗争为争取更加人道的文明将作出独特而有力的贡献。

共产党努力表达和满足这些重大的愿望，和妇女提出的权利

要求。近几年来，我们作了重大的努力，使得这一斗争在一切必须进行的领域，包括在思想意识方面，具有必要的规模。

这就说明，我们党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女党员的人数为何增加了两倍，占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七，而不是当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一九七九年，我们党有二十五万名女党员！这是一个十分喜人的重大进展！

要打好这一仗，我们党就不能对妇女斗争的复杂性和矛盾视而不见。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头脑清醒是前进的条件。必须进行重大的努力来澄清思想，这是我们全党的任务。

社会变革，向一个更高的、解放的社会过渡，其基本问题在于消灭剥削，因而是一个阶级的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压迫在特殊的形式下加深和加剧了千百年来对妇女的压迫。必须停止对妇女的压迫，已经成为群众的理想。妇女解放应该同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革齐头并进，而不能推到以后去进行。从今天开始，各种不同性质和意义的民主斗争都必须开展。

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内灌输这种思想，并且为自己从中得出各种结论。正如几位同志在论坛中指出的那样，结论之一是：我们党的组织和领导必须继续努力，日臻完善地改造党的生活，以便使妇女——不仅使那些没有或不再有孩子负担的妇女——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在各级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是青年的党

我们党有一种禀赋，也可以说是一种天性，就是成为青年的党。

我们为建立新社会，争取自由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斗，回答了大批青年的疑问、符合要求变革的意愿和革命热望。在他们中间，有八万三千名不满二十五岁的青年，是我们党的党员，占全党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八。十万多青年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

中积极活动，我们经常关心青年运动的发展和活动。

随着谴责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强大运动在青年中间的发展，随着青年更加广泛地、以多种形式和富有战斗性地参加人民的斗争，我们党在青年中的影响近几年来已经有了新的增长。民意测验表明，目前，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占我党选民的百分之十六以上。百分之四十二的青年男工，近百分之四十的青年女工投我们党的票。因此，我们是青年中的第一大党。

但是，这些成绩不应该向我们掩盖问题，我们的工作距离在青年工人、青年职员、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及农村青年中可能和应该达到的目标，还相差得很远，很远。

青年在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占有日益增长的地位，因而已经成为激烈的政治和思想战役所争夺的对象，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但是，认为青年能够自发地预防反动思想和阶级合作的思想，自发地准备参加革命斗争，都是莫大的错误。

关于这个问题，必须对危机在青年中的后果作出更加准确的估计。特别是面临当前社会矛盾，青年中间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犹豫的一面，甚至还有我前面谈到的倒退的一面。

在危机的受害者中，青年是首当其冲的。他们强烈地感觉到危机的影响，特别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而一无所有，并且深感自己的地位同我国和我们时代所提供的可能性不相适应。以至对自己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产生疑问。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得出了下述结论：必须改变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改变生活，即改变社会。他们希望进行干预，让人们听到自己的意见，参加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时候他们比过去更早地意识要这样做。有的青年则更容易接受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教育制度的影响，受到就业不足和思想战的持续打击，因而向压力让步。他们过着逍遙闲散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或者在犯罪、愚蠢和非正义的暴力中沉沦。并非夸大其词，我们对这种行为的日益

扩大不能无动于衷。青年一代的一部分人生活在深刻的混乱之中，这对青年不利，对人民运动不利，也对国家的前途不利。

这是一种充满有利条件，但也危险深重的新形势。事关国家的前途，所以，形势要求我们全党进行新的研究、思考和活动。无疑，在今后若干个月，我们应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共产党人应立即重视更加接近青年，更加关心他们的困难，更加坚定地支持他们的斗争，尤其是有关劳动权、学习、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娱乐、体育、文化、民主权利的斗争。共产党人将坚决反对危机在青年中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指出，革命者的态度不是袖手旁观，听之任之，而是为改造社会而斗争。共产党人将努力向青年指明，争取上述改革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是推迟以后，而是从现在开始，在日常的战斗中创造条件。必须和我党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一起来帮助青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进其活动。只有在这场斗争中，青年才能——象决议草案指出的那样——对“他们的愿望，他们关于信念、安全、新观点和对话以及理想的探求”作出回答。

群众性的党，革命的党

努力改善我们的民主生活

我已经谈到党章修改草案。我想对该草案的某些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承认多元化的一切含义，这是我们党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并未把我们党的生活，同我们打算法国实行的民主和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未来的特征混为一谈。多元化要求对政党和国家、政党和社会作原则的区别。假如共产党试图今天就预先勾划出明天社会的特征，那它就是想成为一个单一党。实际上，如果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潮流在共产党本身

都得到体现，那么，何必还要多党制呢？

这个问题使我们需要再来谈谈革命党及其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派别或者试图树立派别，否定各级当选的领导机构和负责人的作用，实际上拒绝工人当脱产干部，所有这些做法只能分裂和削弱我们党，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效能陷于瘫痪。如果将某些建议实行到底，那实际上就是要以一个单一的社会民主党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做是完全矛盾的，完全不可能的。是否需要强调这点呢？

派别的存在只会使个人思想贫乏，内部的争吵加剧，助长用领导人和集团的利益、派别的纪律来取代全体党员对所有问题的自由讨论，这种讨论是为了达到全党在政治路线上的统一行动。这样，每个党员只需要这面旗帜或那面旗帜下站队，而不用了解党的政策归根结底是什么内容，因为正是那些“头头们”之间在代表大会的幕后进行交易来作出决定。这种缺乏民主的做法恰好符合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目标。社会党的梅茨代表大会最近提供了新的证明。但是，梅茨代表大会同革命实践毫无共同之处，它将使我党丧失发挥其先锋队作用的能力。

那么，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就是使全体共产党员富有成效地参加党的生活，进行干预，提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在思考、讨论和作出集体决定的重要时刻。与人们经常丑化的情况相反，民主集中制与尾巴主义、与领导者操纵被领导者的做法格格不入。

加强我们党的组织

加强党的组织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自从二十二大以来，我们党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因为在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已拥有七十万零两千名党员，两万八千个支部，其中包括企业支部一万个。但是，我们距离这方面存在的

可能性还很远。

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要求我们党更好地发挥其先锋队的作用，以及进一步成为群众性的党。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有了自己的战略，无疑应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但这个革命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只要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和培训工作，这是有可能做到的。

阶级斗争到处都在尖锐化，思想战役也随之而来。我们党必须广泛地到处扎根，各个地方应该有更多的共产党员来进行对抗、反击、斗争、以理服人和团结群众。我们能够做到这点，因为与此同时，危机及其影响在不同的劳动者阶层中间，尤其在劳动的地点，增强了巨大的斗争性和要求变革的实际愿望。今天，数以几十万计的男女是我们党的潜在力量。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我们党可能而且应该达到一百万党员。

为此，我们的党组织必须大胆地靠拢这些男女和青年，向他们指明：参加我们党，参预我党政策的制订、讨论和实行，是有益的。我们无所畏惧，相反，由于党的组织得到肯定的加强，由于给我们党带来这么多的忠诚和智慧，我们党将赢得一切。

（《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6—7期）

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摘要)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

乔治·马歇

我们行动的前景，就是建设完全符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在今年二月举行的二十四大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将以法国的方式发展，法国将在社会主义中发展**”。

把我们的战略与我国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热爱法国和法国的未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着一味追求标新立异的想法，也不是由于我们有一种狭隘的沙文主义。

这首先是由于我们是法国共产党人。我们属于法国人民，我们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经受着共同的考验，怀有共同的希望。凡有关人民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还同我们历史上的斗争有关。事实上，我国发生的所有伟大革命进展都始终是同维护法国、维护法国的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溶合在一起的。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取消了贵族的特权，给公民带来了新的权利。同时，共和国的部队击退了驻扎在我国边界上的反革命的进攻，保卫了国家。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世界上建立工人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同时，公社也是对法国资产阶级背叛民族利益以及对外国入侵的一次反击。

我们党在成立以后的六十二年来，始终是这些革命斗争与民

族斗争的继承者。从一贯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到积极投入抵抗纳粹的运动，从一九三八年反对希特勒的要求和慕尼黑的投降协定到一九四五年参加法国政府，我们党始终不遗余力地为维护我国的利益并争取社会与民主进步而斗争。

今天，我们仍在努力继续进行这一斗争，根据当代的条件，向我国人民提出在法国建设一个新社会，即法 国 式 的 社 会 主 义。

我国今天遇到的严重问题只有通过这一深刻的社会改革才能得以解决。

当然，这些问题同你们国家在革命胜利前遇到的问题不同，因为你们国家的历史、文明和发展都与我国很不相同。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我在我们党的二十四大上曾经说过，“我们既不是生活在《悲惨世界》或者《萌芽》的法国，也不是生活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而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法国”。

在二、三十年内，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法国在生产、生产率、消费、教育、生活与劳动条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法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大国。但是，这些变化都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发生的。利润法则使这些变化受到限制和歪曲，甚至产生相反的后果。今天，资本主义制度愈益表明它无力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最尖锐的问题，无力满足出现的新要求。法国社会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结构危机。

不可否认，我国的生活水平是高的，但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极少数特权者占有绝大多数的财富。最大的收入差距超过一与一百之比。在两千三百多万就业人口中，在一千七百五十万的工资收入者中，有二百万的男女和青年失业，许多平民家庭生活拮据，节衣缩食，不得不做出牺牲。

因此，要解决我国遇到的问题，首先就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

会，使所有的男人和妇女都得到工作和象样的工资，都能享受到当代的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和舒适的生活，这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是能够做到的。

我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我国能源丰富，工业门类多而齐全，农业享有盛名。从工人到技术人员，从职员到工程师和干部；我国的劳动力很能干，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有的是从知名的学校或大学培养出来的。但是在今天，资本家整个部门整个部门地断送我国的经济，关闭企业，解雇人员。他们不是利用科技的进步来减轻男女劳动者的笨重劳动，而是对它们进行超剥削。资本家不考虑职工的培训，而是录用没有专长、始终从事重复而令人厌烦的工作的劳动力。

要解决我国遇到的问题，就要建立一个经济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经济服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的生产与交换资料将属于全社会，社会将实行新型的增长模式。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国是在争取自由民主的几个世纪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今天，资本家把决策机构集中起来，使它们远离公民。资本家企图保持他们在企业中的绝对权力，把劳动者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小卒，似乎劳动者今天在劳动场所还应该听任老板们独断专行。

要解决我国遇到的问题，就要建立一个法国的一切自由成果都能得到保障、深化和新的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劳动者和公民都能民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决定社会的发展，并由他们自己决定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形式。

我国的文化丰富多采，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莫里哀和德拉克罗瓦，笛卡尔和比才，大教堂的建造者和彼埃尔·居里夫妇都是人所共知的。我国的大学及普通学校教育是高水平的。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我们的学校变成了实行社会隔离的工具，变成了淘汰平民家庭的子女或使他们不能得到足够的培训和学非所用的

过滤器。这种统治使法国成为一个人们很少看书和美国货泛滥的国家，使文化进步局限于少数人。

要解决我国遇到的问题，就要建立这样的社会：那里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之间的新关系将使文化成为大家的财富，学校给每一个人（无论男女）以完善的教育，使他们将来都能得到真正职业，那里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消灭暴力和对人的歧视。

以上就是我们号召我国人民建立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轮廓。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是根据在别处制定的一个现成的社会主义样板，并企图使它“符合”法国条件来确定这个新社会的内容的，我们的做法恰恰与此相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只能来自真正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矛盾的成熟**”。因此，我们在采取这一做法时，考虑到法国社会今天面临的具体问题。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对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结构提出质疑，只有我们提出的办法才能彻底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只有这些办法才触及到今天法国所经历的危机的深刻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已提上日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社会主义将是法国式的，否则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

为了走向这个新社会，我们还根据我国人民和我国的现实确定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民主的法国道路，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尊重根据明确的目标和抉择通过普选表达出来的多数人意志；就是人民运动联合和斗争的道路。这条道路将使人民运动一步步地夺取新的地盘，击退资本势力，在逐步解决问题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步步地前进。

当然，我们并不那么天真。我们很清楚，法国资产阶级是决

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的。历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只要有可能，决不会放弃用暴力和强制手段来对付人民运动。我们不抱任何幻想，当前的事实也向我们说明，我国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走向新的社会。我们的全部战略正是要通过民主的办法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力量对比，使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

出自所有这些战略抉择的考虑，我们决定在三十四年之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二次参加政府及领导国内事务的多数派。随着我们为之作出充分贡献的左翼的胜利，在普选所体现的力量对比的范畴内，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满足法国人民的要求，利用一切条件在我国人民需要的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自从我们参加新的多数派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社会和民主成果。国有化的公共部门扩大了，还将给企业的劳动者以新的权利。为了大力发展民族生产并增加就业，我们决定号召劳动者在每个企业、每个城市里行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倒行逆施，揭发资本输出和金融方面的投机倒把，发展本国的生产能力，与此同时为争取专业化培训而开展有力的斗争。

这一行动遇到右翼力量和财经界的反抗，他们极力破坏新政策的贯彻或企图改变这一政策，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对这种阶级对抗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你们可以确信法国共产党人将下决心帮助劳动者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使既定方向不变，击败金融势力的阴谋，使法国人民选定的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

※ ※ ※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正如我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这一战略是根据法国的现实制定的，也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现实和变化。

在这方面，我们十分珍视这一战略的独特性，珍视我们党的完全独立和行动自由，但这丝毫未使我们党忽视我们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由于我们在一切方面自主

地作出自己的政治抉择，我们便更加能够对在每个国家为争取和平、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种力量表示我们的积极声援。

我们这样做，仍然是忠于我们工人阶级以及我们党本身的最优良的传统的。多少年来，我国人民通过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无数斗争确立了这样的信念，即法国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些力量中间，当然有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它们在帮助自己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知道，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它无疑是人类至今从未进行过的最宏伟的事业。就我们来说，对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各国所取得的十分多样化的经验，对他们的贡献以及这些经验当前的局限性，我们要努力保持清晰的看法。

我们认为，由于这些国家首先需要结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所留下的遗产，由于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继续对它们进行阻挠，在这种艰苦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在主要方面，已经完成了重要的事业。我们来到你们国家后所看到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点。由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中国在反对饥饿、慢性疾病、贫困以及对人的蔑视等祸害方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祸害至今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天都存在的悲剧性现实。而你们的这些成就是在十亿人口、即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内实现的。

我们在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贡献作出估价时，也考虑到它们的国际作用。它们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与一切和平力量在一起，对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核战争贩子作出了贡献，它们对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是一种支持。

我们在你们国内所看到的一切，也向我们证实，社会主义是

十分多样化的、富有生气的现实。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每个国家——现在各大洲都在建设社会主义，都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要对付从未见过的挑战，清醒地估计自己的成就和挫折，纠正所犯的错误，并寻求符合自己主张的解决办法。这样的发展远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丰富多采。它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思考，并向我们充分证明我刚才提到的思想，即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该寻求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我们认为，与社会主义不能有“样板”一样，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也不能有什么“中心”，不能有什么“指导党”。

相反，根据世界发展的情况，我们为实现新的国际主义而斗争。我们对一切共产党表示声援。更广泛地说，我们十分重视同正在为使自己的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枷锁，摆脱帝国主义压力，为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世界一切争取解放的力量加强声援和合作。我们要使与各种力量进行联合的一切可能性成为现实，以便围绕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目标、特别是和平和裁军而进行斗争。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的必不可少的阶级声援，不能与某种无条件支持的要求混为一谈。各国共产党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甚至分歧。我们对此并不感到不安。相反，我们要坦率地、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而丝毫不使其阻碍共同行动。

我们关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这种观点，是与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的观点一致的。大家知道，我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立场。对此，我们应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我们的前几次会谈正是这样做的，而不应因此而影响我们两党为了共同的伟大目标而加强合作的愿望。

（原载1982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法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让·卡纳帕

按：本文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新法兰西》周刊对让·卡纳帕的访问记。我们译的是它的西班牙语译本，载一九七七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前进出版社出版的文件集《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一书。这篇访问记，比较集中地说明了法共对涉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些方面的态度，特译出供参考。

新法兰西周刊记者：最近报刊转载了某些共产党发表的文章或者它们的领导人的声明的摘要，而且说法共等几个党是他们所攻击的目标。我们就此请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卡纳帕谈谈你的意见。

让·卡纳帕：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怀疑这种作法。因为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同某个共产党发生了分歧的时候，不会用影射的办法或者吞吞吐吐地谈论这种分歧，而是坦率地陈述这种分歧。比如，对于在现实社会主义中行使自由权利的问题，我们在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表明了我们同苏共的分歧。

记者：尽管如此，报刊还是认为上述文章和声明是对法共的批评，特别是指责法共忽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社会主义“划分成民族区域”，发明社会主义的“地区版或民族版”……。

让·卡纳帕：请原谅我打断你的话。对象我们党这样的一个

党进行这样的指责，这简直出人意外得不可想象。大家都知道，法共经常表现出强烈的、积极的国际主义精神，就象它表现爱国主义精神一样，这是法共很大的一个优点。例如，在法国这样一个拥有辽阔的殖民地的国家里，共产党有一项特别紧迫而又特别难于履行的义务——支援各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义务。作为党来说，我们党长期以来就单独履行了这项义务。我们不是以理论的形式或通过发表声明来履行这项义务的，而是通过行动具体而实际地履行的。苏联过去在处于被围困的堡垒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幸运的是这种被围困的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们党对它也是这样作的。我们总是站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人民一边，即使从而受到考验和碰到困难也是如此……而在今天，在这处于守势的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进行干涉和镇压的时刻，凡是遭受这种镇压的共产党、民主运动和爱国者，凡是受到压迫与欺凌的人民，无不感到我们党大声疾呼，号召我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对他们表示声援。你去看看《人民日报》吧：它没有哪一天不提醒人们注意西班牙、伊朗、乌拉圭、智利、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所发生的事情。它没有哪一天不说：请向这个国家的代表或那个国家的军事法庭提出抗议；请到处募捐去帮助这儿或那儿的囚犯；请为监禁在遥远监狱里受到折磨的某个爱国者举行示威；请为反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剥夺从业人员的工作权利而进行斗争。当然，在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应该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我们是很好地尽到了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的！

记者：也许是由于我们对苏联表示了不同意见，报刊这才指责我们？

让·卡纳帕：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国际主义作了独特而非常有局限性的解释。他们可能把国际主义看成为各个共产党在思想上的铁板一块了。但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绝不是指 的这种整齐划

一。它意味着全世界劳动者的相互支援（对此，列宁非常正确地补充说，在我们的时代，还应该加上那种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的相互支援）。因此，它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相互支援。这种支援自然不损害每个党的抉择和行动自由。也不能说各个党的活动的所有方面都必须毫无例外地体现这种支援，我们不要求任何人做到这一点，而谁也不能要求我们这样作。

记者：你说的是相互支援……

让·卡纳帕：当然罗，比如说，我们反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对外政策，因为这是一项出卖民族独立的、旨在把我国重新纳入美国轨道并一贯阻碍国际缓和的政策。我们这样作的时候，某个共产党却吹捧这项政策。毫无疑问，这个党就缺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我们从未这样对待过任何一个共产党。

记者：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文章说那些想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主张一种国际主义的“地区版”。他们这是指什么呢？

让·卡纳帕：我不知道。乔治·马歇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里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优越的国际主义，我们也不能容许有划分地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例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这一概念，就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个概念是一九六八年出现的，用来指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特殊地联合在一起的国际主义团结，据说这是一种比把其他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关系“优越”的国际主义。总之，这就有了第一等的国际主义和第二等的国际主义。坦率地说，我们从未承认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这种“版本”。

记者：社会主义的“民族版”又指的是什么呢？

让·卡纳帕：撇开引起争议的意见不谈，这就不过是一种人所共知的道理罢了。显然，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独

特形式，这是历史的经验证明了的，而随着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将越来越得到证明。怎么能够不这样呢？社会主义是从每个国家中每个民族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不是舶来品。它不是可以套在某个民族头上的模式。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是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基本原理和一般的原则，而各个国家则都具有民族色彩。此外，社会主义比之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也具有优越性，使为资本主义所窒息、毁伤、损害的民族特点得到发展的优越性。共产党面对着出卖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总想更加接近民族现实，要在这一点上去指责它们是十分荒谬的，这是它们有力量的因素与条件之一。我不理解我们法国共产党人在法国所需要的怎么能够不是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我们怎么能要带其他国家色彩的社会主义，或者没有民族特征的社会主义呢？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

记者：好，我认为现在事情是很清楚的了……

让·卡纳帕：我希望是这样。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在这儿表明了态度，也许以后省得每天都来作解释了。

（张莘译 吴名祺校）